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論文

抒情、烏托邦與自我技藝：鄭孝胥的政治詩學

Lyric, Utopia and Self-Techniques: A Study of Zheng Xiao-Xu's

Political Poetics

指導教授：曾守仁 博士

研究生：陳仕軒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論文考試審定書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陳仕軒 所提之論文

抒情、烏托邦與自我技藝：鄭孝胥的政治詩學

Lyric, Utopia and Self-Techniques:

A Study of Zheng Xiao-Xu's Political Poetics

經本委員會審查，符合碩士學位論文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周志煌

委員兼召集人

高嘉謙

委員

曾守仁

委員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七月七日

論文名稱：抒情、烏托邦與自我技藝：鄭孝胥的政治詩學

校院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頁數：177

畢業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學位別：碩士

研究生：陳仕軒

指導教授：曾守仁 博士

## 摘要

鄭孝胥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國，政治的觸角延伸至不同層面，成就了非凡的歷史功業。清王朝逐漸凋零，鄭氏浸染於此，遊走在張之洞的武漢幕府，得權重任。同時，在詩學上創制「同光體」，引領舊時代的詩人，迎向中國文化最後一道古典榮光。辛亥革命以後，自許避世遺民，又決意與民國為敵，在自我封閉的「海藏樓」關切「復辟」的一切消息，其後參與北京的「小朝廷」，與殘存的清室迎向未知的前途。時至北京政變的發生，鄭孝胥親自協助溥儀來到了由日本管轄的天津租界，得到了相當的信任，未盡的政治理想也有實現的機會。意料之外，「小朝廷」在日本扶植之下，以「滿洲國」的國家形式歸返歷史現場。溥儀暫且接受執政稱號，鄭孝胥則是出任國務總理，宣揚王道，在生命晚期展現了積極的政治行動。然而，滿洲國的「偽」字在民國的歷史成為定論，鄭孝胥不得不承受「漢奸」之名，自此蓋棺論定。

經歷了士人、遺民，至於漢奸，鄭孝胥在各個階段有著不同的面目。有意思的是，考察鄭氏每一次的政治抉擇，其實也是思索與身分關聯至於影響晚清民國的歷史事件。本文嘗試發明「政治詩學」的關鍵詞，直指不曾退卻的「詩人」身分，探討鄭孝胥一生琢磨的詩學如何相互牽動、映照詩人面臨的政治情境，如是悲怨而抒情，為內在的理想予以迫切的回應。於此，本文歷時的回顧鄭氏的生命歷程，擬定四個主題建立共時的討論，期望與學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展開對話：

「負氣」一章緣自同光體「言之無物」、「規摹古人」的「死文學」論斷，藉由鄭孝胥詩論的重構，以「性情」回應「文學革命」為革命目標而張揚的批評話

語。首要重返詩論發生的情境，聚焦在詩人性格與武漢幕府的經歷，由「負氣之詩」到「為己之學」，定調了「政治詩學」的主導意識。

「海藏」與「夜起」二章進一步探索兩項私人技藝，如何成就了鄭孝胥不同時期的政治生命。前者以字號、寓居體現了前半生「避地待時」的決定；後者則以極為嚴謹的作息為生活重心，標示著一種晚期風格的追求。近乎「儀式」的舉行，鄭氏為此思慮自身的政治前途，鍛鍊的「自我技藝」巧妙劃分了一生的政治道路——「海藏」著眼於個人得失之間的過渡時期；而「夜起」充斥著王朝失而復得的烏托邦想像。

終於，滿洲國的建立讓「烏托邦」有了直接的對應，「復辟」一章為此疏理鄭孝胥在革命以後明確而複雜的「復辟」心理。遙想過去清遺民的接連失敗，鄭氏「英雄」的自覺延續一直以來的「負氣」性格。直到滿洲國的事實逐漸明朗，製作建國史略，為國家的合法性溯源；成立初始，持續深化「王道」為主旨的思想風氣，推動一切建設，發揮著蓄銳已久的治國理念。如是違背民族大義的政治抉擇必然在事過境遷以後擔負了歷史罪名，然而，當時滿洲國的願景已然發酵，鄭孝胥視為理想得以實現的方向，竭力爭取一席之地，完成了一生纏綿不斷的政治命題。

關鍵字：鄭孝胥、同光體、海藏、夜起、復辟

Title of Thesis: Lyric, Utopia and Self-Techniques: A Study of Zheng Xiao-Xu's Political Poetics

Name of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Pages: 177

Graduation Time: 07/2017

Degree: Master

Student Name: Shi-Xuan Chen

Advisor Name: Dr. Shou-Ren Zeng

## Abstract

From the tim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eng Xiao-Xu had multiple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his dramatic life. The Qing dynasty lost power gradually, he hoped to improve it. In the beginning, Zheng participated in Zhang Zhi-Dong's group. In the meantime, he founded Tung-Kuang style in poetics, and led other poets to study it. This style had a great impact at that time.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Zheng stayed at Hai-Cang building to resist a new regime. On the face of it, he shut himself away from the world, but still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ynasty in his diary and poetry. As a result, he decided to assist imperial power, which remained in the Forbidden city. Crucially, Zheng played a key rol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Beijing Coup, for he was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Xuantong Emperor away from abduction. For this reason, Zheng won high recognition for his ability in Tianjin concession.

Unexpectedl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actically invited Puyi to lead a new nation, called Manchukuo. Zheng promoted to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nchukuo as well. In his Term of office, he actively implemented national policy and propagated Wang-Dao spirit. In Manchukuo, Zheng obtained a great achievement during his later life, but he was regarded as a traitor. Therefore, Zheng had a bad reput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Zheng's life, researchers must follow his multiple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recognize related historical events.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is attempted to emphasize Zheng's another identity, meaning that he was a poet all the time, and lots of his poetry represented political expectation. For instance, the experience that Zheng proposed in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by explaining it, this thesis framed four main themes and expanded different points.

Keywords: Zheng Xiao-Xu, Tung-Kuang style, Hai-Cang, Ye-Qi, Restoration

# 目次

摘要.....	i
Abstract.....	iii
目次.....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場景 .....	1
第二節 傳統主義者 .....	8
第二章 負氣.....	13
第一節 自傷與自負之情 .....	13
第二節 天下懷抱之人.....	16
第三節 為己之學 .....	21
第三章 海藏.....	27
第一節 命名 .....	27
一、 懷想東坡 .....	27
二、 避地待時之志 .....	30
第二節 海藏：隱逸的政治 .....	35
一、 悲世之怨 .....	35
二、 輕世肆志之學 .....	41
第三節 海藏樓：過渡儀式 .....	47
一、 厥世 .....	47
二、 獨居 .....	54
三、 積恨 .....	59
第四章 夜起.....	67
第一節 位置 .....	67

一、 從「海藏」到「夜起」 .....	67
二、 從「滿洲國」到「夜起」 .....	72
第二節 革命 .....	77
一、 無明火 .....	77
二、 易代之辨 .....	82
第三節 小朝廷 .....	86
一、 歸返 .....	86
二、 獨立 .....	92
第五章 復辟 .....	101
第一節 樂土 .....	101
一、 滿洲國的願景 .....	101
二、 鄭孝胥的理想 .....	107
第二節 英雄論 .....	114
一、 妖狐之露尾 .....	114
二、 謀夫之不臧 .....	118
三、 安知非楚囚 .....	124
第三節 復辟主義 .....	130
一、 製作「史略」 .....	130
二、 迴向「王道」 .....	141
附論 殘夜不須眠——論鄭孝胥晚期的政治詩作 .....	145
參考文獻 .....	169
一、 報刊 .....	169
二、 文獻 .....	169
三、 專書 .....	172
四、 一般論文 .....	175

五、期刊論文.....	175
六、會議論文.....	176
七、學位論文.....	177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場景

鄭孝胥（1860—1938）者，字太夷，蘇堪（龕、戡、庵、厔）其號，福建閩縣人也。負有詩名，錢基博（1887—1957）於《現代中國文學史》有此定評：「沉摯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sup>1</sup>行文間，援引張之洞（1837—1909）、陳寶琛（1848—1935）等前輩詩人的評語，肯定鄭氏的詩學造詣，有過之而無不及。略述平生，尤其提及鄭氏投刺中朝貴人，署曰：「詩人鄭孝胥」，手寫唐宋大家詩，錄後亦有詩作題之。可以想像，鄭氏自許「詩人」，立意以「詩功」作為追求「事功」的手段，其詩學要旨琢磨在「士階層」如是爭取仕途的背景，本於「性情」的「為己之學」，指向了自我的「政治」理想。<sup>2</sup>

詩名在向來穩固的文學場域漸漸發酵，陳衍（1856—1937）《石遺室詩話》記載：

近來詩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奧衍，學詩者不此則彼矣。<sup>3</sup>

相對於陳三立（1853—1937），各有所長，鄭孝胥的詩作顯然在當時具有主導意義，號稱閩派，貴為同光體魁首，至於「後來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sup>4</sup>陳衍遙想清代詩人陳沆（1785—1826）詩稿的特點：「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奈何「當時嗣響，頗乏其人」，少了後生的支持與延續。今日見證了《海藏樓詩》建立的路標：「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為魁壘，其源合也。」鄭氏的詩名為當世詩人景仰，即使字句未有海藏工跡，詩學亦汲取其精神。同樣地，王揖唐（1877—1948）《今傳樓是詩話》如是宣揚其名：

<sup>1</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75。內容由陳衍論詩帶出陳三立、鄭孝胥二人，故評語多取材自《石遺室詩話》。

<sup>2</sup> 同前註，頁176-178。

<sup>3</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十一》，收入氏著；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50。

<sup>4</sup> 同前註，卷三，頁37。

君（陳三立）與海藏一時有鄭陳之目，海內論東南壇坫者，輒首及兩公。海藏序君詩云「伯嚴之作，至辛丑（1901）以後，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雖出於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裏也。」君服膺其言，故刊詩自辛丑始，訖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辛亥以後，君詩境一變，閔亂傷時，多變雅之作。君曾屬海藏代刪其詩，而海藏以為不可，且曰：「散原之詩直類於《春秋》。」其推崇可謂至矣。石遺室論詩，謂君「少學昌黎，刊有《遊廬山作》一卷，皆韓體也。中年論詩，益惡俗惡流易，於時流尤少許可者。」又謂君與沈乙盦，均詩中夢窗。信然。<sup>5</sup>

詩話記述了鄭氏對散原詩精要的評論，同時以後輩詩人的眼光去閱讀陳衍、沈曾植（1850—1922）的評語，感染了同光體的論詩氣氛，也思量詩人在革命以後的變體之作。無論是陳三立的「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或是鄭氏開始重視「詩」與「春秋」的聯繫，兩人的轉變牽動著多數詩人的走向，擔負的詩名不只是技術的琢磨，多少引領失落的清遺民面對民國紀年的一切憂慮。

縱使鄭孝胥與陳三立的詩名當之無愧，以帝王年號（同治、光緒）組成的同光體必然在民國處於邊緣——當然也是他們的信念。陳衍與王揖唐等人的評價固然確認了近代詩壇的規模，在新時代亦是微不足道，不會是錢基博自覺的「現代」文學史。同光體源自陳衍與鄭孝胥的談話：

丙戌（1886）在都門，蘇戲告余，有嘉興沈子培者，能為同光體。同光體者，余與蘇戲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sup>6</sup>

名稱的出現早在 1886 年，延續了「道、咸以來」的「學宋」的風尚，屬於清代詩學的一端。錢仲聯（1908—2003）先生即指出「同」字有上乘前期傳統的意味，真正的發展其實落在「光緒」與「宣統」，跨入了民國，加上《石遺室詩話》1912 年在《庸言雜誌》的刊載，同光體就成為了近代宋詩運動的代稱。<sup>7</sup>無奈的是，民國正經歷著社會文化的重大轉折，同光體的宗旨剩下「復古主義」，原來的立場也因為「現代」的更新而顯得「傳統」，淪為革新的對象。質言之，無論是政體的轉型，或新語詞的轉化，同光體其實一直在中國文化為

<sup>5</sup> 王揖唐著；張寅彭、李劍冰校點：《今傳是樓詩話·海藏推重散原》，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 3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頁 277。

<sup>6</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頁 6。相似的言說又見〈沈乙盦詩序〉（1901），收入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12。二者大同小異，錢仲聯的文章已有分明，見氏著：〈論同光體〉，《夢苕盦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416。而最早呈現於文字的材料在〈冬述四首視子培·其三〉（1899）：「往余在京華，鄭君過我邸。告言子沈子，詩亦同光體……」，收入陳衍撰；陳步編：《石遺室詩集》，《陳石遺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109。

<sup>7</sup> 同前註，頁 418。

主體的前提之下探尋一切可能，論者如是評述：「這種面對外來文化挑戰的回應，有保留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態度，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反現代性，也應理解為是一種對現代性的回應。它本身就具有『現代意義』。然而，對於後發現代化國家來說，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文化上的被迫『西化』卻是必然趨勢，這種回應也就顯得軟弱無力了。」<sup>8</sup>於此，同光體的進步意識沿著皇朝的生長，恪守帝王之尊號，只能成為完全迎向「現代」的知識分子群起而攻之的對象。

且看林庚白（1896—1941）在〈麗白樓詩話〉（1940）的排名，可以發現同光體已然是其他詩派標舉「現代」思維的批評對象：

曩余嘗語人，十年前鄭孝胥詩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數年，則尚論今古之詩，當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矣。<sup>9</sup>

自視甚高，評論文字承認了鄭氏當時的位置乃一時之選，將詩名推至頂端。然而，十年的轉變，既是詩人的自負，或有鄭氏成為滿洲國國務總理的否定，不可否認地，林氏的言說大抵延續南社竭力驅逐同光體的思路，直言：

民國以來作者，沿晚清之舊，於同、光老輩，資為標榜，幾於父詔其子，師勸其弟，莫不以老輩為目蝦，而自為其水母。不知同、光詩人之祖宋，與宋四靈、明七子之學唐，直無以異，蓋皆貌其面目、聲音，而遺其精神也。……或謂同、光詩人，如鄭珍、江湜、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皆不盡雕琢，能屹然自成其一家，固矣。然珍、湜實當咸、同之世，不得列為同、光人，當世、孝胥、三立，則詩才與氣力，故自不凡，而孝胥詩情感多虛偽，一以矜才使氣震驚人，三立則方面太狹，當世則外似博大，而內猶局於繩尺，不能自開戶牖，以視珍、湜詩，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用，抑又次焉。<sup>10</sup>

將鄭孝胥、陳三立及其後輩之詩作視為「標榜」與「模倣」的產物，面目盡失矣。甚且，「而孝胥詩情感多虛偽，一以矜才使氣震驚人」一語，直指鄭氏標舉「性情」之詩學要旨，以為「負氣」非詩人情感之摯，只是自持材能以構築詩境，沿著同光體的詩法，為文而造情，完全改寫了原來的主張。於此，林氏的排名跨越十年前後，鄭孝胥「今人第一」至「不足道矣」的升降，隱然有競爭同光體的意味。<sup>11</sup>且看「杜甫第二」的闡釋：「而余之處境，杜甫所無，時

<sup>8</sup> 袁進：《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98。

<sup>9</sup> 林庚白：〈麗白樓詩話〉，收入氏著；周永珍編：《麗白樓遺集》下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983。

<sup>10</sup> 同前註，頁978。

<sup>11</sup> 林庚白早年其他詩文直接表露了對鄭孝胥的欣賞，一如〈秀野草堂小集呈石遺〉詩曰：「……鄭君坐耽詩，舉念發清吹。四座咸傾聽，語妙使心醉。並代論工力，此老合稱

與世皆為余所獨擅，杜甫不可得而見也，余之勝杜甫以此，非必才力凌鑠之也。」

<sup>12</sup>不以才筆爭勝，詩人自覺得力於「時」與「世」的配合，身處前所未見的現代情境，迂迴地跨越杜甫（712—770）的經典位置。<sup>13</sup>同樣地，鄭孝胥與同光體的隱沒也是失去外在條件的優勢，「模倣」與「標榜」的詩學理念無法順應時代開創新視境，以南社「比較進步」的觀念汰換了那些「一般亡國大夫的遺老們」。<sup>14</sup>甚且，杜甫之於宋詩的意義也讓林氏的評論顯現不同的評判意識。宋詩在盛唐以後面臨了重建價值的難題，而江西詩派閱讀與書寫的策略儼然是「自作語最難」的氛圍之中不得已的回應，將「杜甫」經典化，作為崇拜的對象，亦是焦慮的源頭。<sup>15</sup>有趣的是，同光體號召的宋詩運動，在局外人眼裡只是將以改寫、拼貼為策略的宋詩再一次製作。同樣地，在林氏的評說裡，數年以後，順應時代的詩作必為榜首，而杜甫的宗主地位不變，同光體已然「不足道也」。於此，林氏標舉杜甫不止於詩人的欣賞，進一步評價「模倣」的作品到底無法承受時代的檢驗。

同光體的威脅尚有一端，來自新文學運動持續激進的宣導，即是五四人物為首的話語霸權。運動前夕，陳獨秀（1879—1942）在《新青年》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一文，「敢問」雜誌（第15卷6號）譯載日本《東亞之光雜誌》〈中西文明之評判〉，又別著〈迷亂之現代人心〉、〈功利主義與學

---

帥。吾儕目朱顏，未便撥一幟。且覆掌中杯，起看玉龍戲。」（《急救集》）於此，詩話的排名特別舉出鄭孝胥，似乎修正了原來的看法，亦是承認了他在同光體的領銜位置。

<sup>12</sup> 林庚白：〈麗白樓詩話〉，頁983。

<sup>13</sup> 林庚白有專文提出詩詞的創作必須依賴著時代的養分，其曰：「最可笑的是中國的詩人、詞客，寫起詩或詞來，總要擔心著這幾個字是不是有所根據，或者像不像古人，富於模仿性，而缺乏創作力，這大概由於生活方式的『一成不變』桎梏了人們的心靈，另一方面也是幾千年以來的宮殿式、館閣式、幕府式的文藝，養成了傳統的劣根性。」（頁880）然而，真正的大家亦能後出轉精，又言：「其實古人並不這樣，李、杜、蘇、黃生於今日，必有所以為李、杜、蘇、黃者，我相信不會像同、光以來的詩人、詞客，這樣的『食古而不化』。」（頁881）簡言之，古典詩詞有其時代背景限制，杜甫材能可以調適，亦不能完全跳脫於此，而同、光以來詩人迎向「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作品卻是「當著活人面前說鬼話」，仍是舊社會的習慣。於此，林氏的自信緣於材能與現代的相輔相成，而文章建構的詩論還是一則對於同光體的評判。見氏著：〈詩、詞的時代性和社會性〉，《麗白樓遺集》下卷，頁877-882。

<sup>14</sup> 此處援引南社發起人柳棄疾對同光體的偏見：「我呢，對於宋詩本身，本來沒有什麼仇怨，我就是不滿意於滿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國大夫的遺老們。」見氏著：〈我和朱鶯離的公案〉，《南社紀略》，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26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頁188-189。

<sup>15</sup> 楊玉成借用布魯姆（Harold Bloom）「誤讀」與「影響的焦慮」理論探討宋代詩學如何在「盛唐之音」的典範之後，以遲來者的身分建立自身的價值。研究顯示：杜甫不斷出現在宋人詩話與筆記，在創作過程之中成為甩不掉的魅影。見氏著：〈文本、誤讀、影響的焦慮——論江西詩派的閱讀與書寫策略〉，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355-366。

術〉論文之用意。<sup>16</sup>刊載的文章紛紛指出西洋文明的輸入是導致中國「精神界之破產」的原因，主張「吾人今日迷途中之救濟，決不希望陷於混亂矛盾之西洋文明，而當希望於己國固有之文明」。然而，陳獨秀的質問在《新青年》與之對立，此舉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主編杜亞泉（1873—1933）為此卸下職務，為商務印書館解雇。這段敘事不單純是象徵「五四運動」（1919）的勢不可擋，李歐梵（1942—）先生進一步指出了其中的策略：「故意製造出一個敵人，借以用作箭靶，並以此引起讀者的興趣和共鳴。」<sup>17</sup>為達成目的不惜曲解原意，提出具有理念的控訴，緣於當時知識分子需要在報刊的公共空間引人醒目，力求在「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發酵。

同樣地，胡適（1891—1962）意圖建立話語霸權，致力於「五四運動」的宣傳策略。採取的手段是語言文字的統一，革新的主張完整地表述在〈文學改良芻議〉（1917）的「八事」<sup>18</sup>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sup>19</sup>。胡適直言：「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截然地切斷過去中國文學的多數成果，徒留白話的文學發生意義。換言之，胡適亟欲建立絕對的話語機制，掃除舊文學之餘，讓自己擅長的白話文體可以回應所有挑戰，推動現代化的工程。<sup>20</sup>於此，胡適進一步取得共識，實踐龐大的文學革命論述，不得不將當世的「死文學」視為「箭靶」。留學日記（1916年4月17日）記曰：

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呻吟。……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無物。……晚近惟黃公度可稱健者。餘人如陳三立、鄭孝胥，皆言之無物者也。文勝之敝，至於此極，文學之衰，此其總因矣。<sup>21</sup>

話鋒指向同光體詩人相互唱和、宣揚的「宋詩運動」，讓胡適「主張破壞」的「八事」有了更清楚的對應。日記結尾處又言：「頃所作詞，專攻此三弊。豈徒責人，亦以自誓耳。」明確表示目標在於文學主張的具體建設，並非針對其

<sup>16</sup> 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1922年），頁273-283。

<sup>17</sup> 李歐梵：〈文化與社會：五四運動的反思〉，《未完成的現代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1-22。

<sup>18</sup>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收入氏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4-15。

<sup>19</sup> 同前註，〈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頁52-68。

<sup>20</sup> 李歐梵：「我認為胡適的語言的確是他最大的『文化資本』，這種語言不適於寫出好的文學作品，卻最適於作理性的論辯或介紹新知——譬如杜威的實證主義。換言之，我認為他的白話文體是和翻譯西學不可分開的。」見氏著：〈文化與社會：五四運動的反思〉，頁25。

<sup>21</sup> 胡適：〈吾國文學三大病（四月十七日）〉，《留學日記·卷十三》，《胡適全集》第28卷，頁356。

人，只是檢視、評判這一類的詩作，藉此引發革命的效應。於此，胡適必須維持「八事」的標準：惟黃遵憲（1848—1905）可稱健者，餘人如陳三立、鄭孝胥皆是「言之無物」，即以同光體概括了當時絕大多數的詩作，因而「文勝之敝，至於此極，文學之衰，此其總因矣」，親眼見證，卻私自定義了古典文學最後一次匯流。

同一年，胡適〈寄陳獨秀〉也提及了當世的古典詩人，這次給予了不同的批評進路：

嘗謂今日文學之腐敗極矣；其下焉者，能押韻而已矣。稍進，如南社諸人，誇而無實，濫而不精，浮誇淫瑣，幾無足稱者。更進，如樊樊山、陳伯嚴、鄭蘇盦之流，視南社為高矣，然其詩皆規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為至高目的，極其所至，亦不過為文學界添幾件贗鼎耳，文學云乎哉！<sup>22</sup>

依然肯定同光體詩人的材能，不止於「能押韻而已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擔負的罪名是「規摹古人」，原來的「言之無物」成為南社諸人的弊病。誠然，胡適對「八事」都有進一步的解釋，如是形容後者：「文學無此二物（情、思），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sup>23</sup>南社一直是文學革命的重大阻礙，彼此互不相讓、你來我往的論戰仿若一場又一場新舊文學的交鋒，引文大致符合了胡適對南社的評判。<sup>24</sup>然而，無關乎對象，「言之無物」的標籤落在南社身上，亦是胡適對「死文學」的攻勢。同樣地，言及「務去爛調套語」，列舉「吾友」胡先驥（1894—1968）的詞作，以為「僅一大堆陳套語耳」。<sup>25</sup>可以想見，在胡適「文學革命」的想法裡，南社與同光體其實沒有顯著的差異，僅是超乎「八事」標準的「死文學」。

有趣的是，胡適指出同光體「規摹古人」的評語在〈文學改良芻議〉亦舉陳三立的詩作申明之，即言：「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詩人』摹仿古人心靈也。」這是對陳氏的肯定，奈何無法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奴性」仍然，才會如此失敗矣。胡適接續說道：「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仿古人，而惟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sup>26</sup>完全自由的白話文與容納一切的小說體

<sup>22</sup> 胡適：〈寄陳獨秀〉，《胡適全集》第1卷，頁2-3。

<sup>23</sup>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頁5。

<sup>24</sup> 胡適與南社互動頻繁，材料亦相當豐富，初步的討論請見林香伶：〈南社與新舊文學的拔河拉扯〉，《南社文學綜論》（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頁543-569。

<sup>25</sup>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頁8-9。

<sup>26</sup> 同前註，頁7。

裁得以準確描述「今日社會之情狀」，重要且迫切的是與「世界」接軌的意圖，真正符合「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換言之，無論是同光體或是南社，胡適考量的是當前文學界盛行的趨勢，如何回應關聯著「文學革命」的成果，大背景還是中國在世界潮流的定位問題。<sup>27</sup>

同光體在「文學革命」的呼聲，又一次承受「規摹古人」的責難，影響甚於林庚白不可一世的評斷。這是胡適始料未及的結果，革命的目的並非掃蕩一切舊體詩文，而是工具的轉換。真正的傷害來自胡適在上層文化造成「典範」(paradigm)的震盪，原來「白話」的工具意義發生變化，隨著《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與《白話文學史》(1928)的盛行，確立了學術史的基本框架。於是乎，胡適以「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的價值成為定論，余英時(1930—)先生為此評曰：「即一方面開啟了新的治學門徑，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許多待解決的問題。」<sup>28</sup>遺憾的是，胡適的「嘗試」固定了學術研究的基本方向——「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即是在胡適的觀點裡尚未解決的問題。緣此，同光體在文學史的位置也沾染了胡適推行「文學革命」的偏見，無論「言之無物」，還是「規摹古人」，存在於晚清民國的詩派似乎註定捲入「現代」的浪潮，在革新的過程之中，或是敵人，或是幽靈。

誠如以「新民」一詞催化「文學革命」的梁啟超(1873—1929)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3)回顧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是看待革命的餘燼：「……革命時候，因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勢力來做應援。這種勢力，本來是舊時代的游魂。舊時代是有二千多年歷史的，他那游魂也算得『取精用宏』，一二十年的猖獗，勢所難免。如今他的時運，也過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滅。經過一番之後，政治上的新時代，自然會產生出來。」<sup>29</sup>可以想見，「固有勢力」亦是革命的對象，不屬於民國時間（新時代）的「游魂」終將消散。梁氏在「新文化運動」開展的一系列思維運動裡找到問題的癥結，決意以「現代」作為「民國」這一新興場域的主導。於是乎，思想界的體氣漸趨康強，梁啟超的想法預見了「新陳代謝」的結果：「新民」與「游魂」儼然成為「現代」與「傳統」的代名詞。

<sup>27</sup> 李歐梵借用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論，以為「民族國家」的建立來自小說和報紙形塑的「想像」過程，使得社群的每一分子「共有」同一件事情，逐步確立穩定的基礎，並非一次重大的革命運動可以完成。由此思索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一系列構想，其為文學的閱讀與傳播付出的努力，真正促成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見氏著：〈文化與社會：五四運動的反思〉，頁27。

<sup>28</sup>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2004年)，頁188。

<sup>29</sup>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收入氏著、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5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3251。

## 第二節 傳統主義者

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對「Tradition」（傳統）一詞有此補充：

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裡，tradition尤其是 traditional 通常被視為貶義詞，具有負面意涵並且缺乏特殊性。實際上 traditionalism（傳統主義）似乎是用來專指妨礙任何改革的習慣或信念，而 traditionalist 幾乎是個貶義詞。<sup>30</sup>

論者巧妙定義了現代化進程的負面詞語，以為「傳統」只是阻礙一切變化的扁平形象。「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似乎可以說明同光體在晚清民國的定位，而堅持立場且持續寫作的舊體詩人「幾乎是個貶義詞」。於此，在「現代」的視野之外，只存在批評空間而無法立足於文學史的同光體需要不同的解釋，甚是擴大至「清遺民」在當時的評價問題。

黃錦樹（1967—）先生如是關切這些為「現代」排除的一代人，他們也確實汲取了晚清民國的養分：

從晚清到五四包含了幾個世代的一代人，大抵皆親歷了中國傳統世界與現代世界的分離脫落。那並非瞬間發生的事，而是在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內被現代性（或現代化）的不斷切割，終於變成了兩個世界。<sup>31</sup>

文章討論的對象是張愛玲（1920—1995）《對照記》裡「抽大煙的人睡得晚」的父親形象。同時，特別留意了「相較於被污名化其實卻極具文化創造力的所謂的文化守成者」。具體的成就或大或小，因為「傳統」的堅持，依樣劃分在同一個世界。誠然，這些「文化守成者」的一生貢獻眾所矚目，王國維（1877—1927）、陳寅恪（1890—1969）自是重要的學術風景。只是在西學建立的思維主導之外，他們深入其中世界的面目，以及如何為「世變」感染的「時代氣氛」尚未明朗，進一步描述他們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或是構想集體心態的變化，還有待更多不同的研究進路。<sup>32</sup>

<sup>30</sup>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493。

<sup>31</sup> 黃錦樹：〈採珠者・超自然傳統・現代性〉，法鼓人文社會學院主辦：「兩岸青年學者論壇」——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研討會，2000年12月，頁241。

<sup>32</sup> 如何掌握「世變」之下的「時代氣氛」，王汎森有簡要而深刻的說法。見蔣宜芳記錄：〈世變與文變——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卷4期（1998年12月），頁14-20。

有意思的是，更具污名化的「鄭孝胥」可以是探索這個「世界」的首要研究對象，生命歷程正好落在中國近代史的關鍵時期。且看鄭氏留下的第一手史料：《鄭孝胥日記》，時間自光緒八年（1882）至民國二十七年（1938），延續 56 年，幾乎經歷了晚清進入民國的重大歷史事件：甲午戰爭（1894）、庚子拳亂（1900）至於辛亥革命（1911）。甚且，日記收納了清王朝的晚景，見證帝國的西山日薄，朝廷挽救頹勢的努力，鄭孝胥亦參與其中，進入自強運動（1860—1894）、戊戌變法（1898）與立憲運動（1906）的核心。重要的是，面對革命與維新的反覆對抗，日記的內容不會是民國史觀的歷史解釋，即使在事件過後多有回顧，亦是親歷者真實的心路歷程。遙想一句為學界津津樂道的「民國乃敵國也」，鄭孝胥畢竟是清遺民的身份，不免期許著新政權持續的動盪不安，因而日記也特別寫出了張勳復辟（1917）、北京政變（1924）、九一八事變（1931）與滿洲國建立（1932），給予了不同的評論位置，都是屬於這個世界在為「現代」割裂以後，持續不斷的吶喊。

然而，日記的宏大規模在今日提供了清遺民清楚而生動的聲音，卻也不能忽視作者的獨到見解。值得注意的是，鄭孝胥一生與政治的密切關聯，對於事件的評判可以與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展開對話。史學家周一良（1913—2001）先生以此為史識，將鄭氏的一生劃分為三個階段：

辛亥革命之前，算第一階段，鄭氏既是傑出詩人，又是主張維新的政治運動家。他才思敏捷，一八八二年鄉試第一，長期在張之洞湖廣總督幕中，深受器重。張之洞稱贊他的詩「沉雄宕逸，簿書旁午中而不損其高雅之趣，此為無匹也」。清末名流蒯光典說「蘇堪如魏晉人」把他和王鵬運並舉。因而著名學者李詳贈鄭詩有「一世風流魏晉人」之句。

辛亥革命後的二十年，是鄭孝胥生平的第二階段。他誓忠於清王朝，甘為遺老，並在溥儀小朝廷中任職。但他始終以上海的海藏樓為根據地，寫詩賣字，與滬上文人墨客文酒往還。盡管政治上思想上應當歸為封建餘孽一流，但他文學（舊體詩）藝術（書法）上的造詣與貢獻，在我國現代文化史上是不可磨滅的。

可惜這位文化界前輩老人不自愛惜，九一八事變後跑到東北，一九三二年三月當上了「滿洲國」總理。……從一九三二年到他逝世的一九三八年，這七年的日記中，再也看不到海藏樓中友朋酬唱詩酒流連的場面，而是整天被日本人包圍，與日本人周旋，為日本人寫字，給日本人作有關「王道」的講演，陪日本人一起照相，等等，一副窮形盡相的傀儡面目。<sup>33</sup>

---

<sup>33</sup> 周一良：〈關於鄭孝胥的日記〉，《周一良集》第 5 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文章如是分別鄭氏的一生：「由『一世風流魏晉人』變成封建遺老，再一變淪為賣國的大漢奸，這就是鄭孝胥一生的最後結局。」以關鍵的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標準，大抵完整呈現了鄭孝胥的生命史。只是周氏稱許第一階段在政治與思想方面「很有氣節」、「始終站在時代潮流前面」似乎是為了對應之後的轉折，並在「封建餘孽」與「賣國的大漢奸」評語展示了民國史觀的評判。誠然，當時知識分子回顧與之親近的歷史，類似的評判比比皆是。即使は致力於近代詩學的錢仲聯先生，閱讀《海藏樓詩》不免說道：「鄭太夷早年詩云：『用遼猶足支天下，北睇雲山萬疊青』，野心如此，其後偽滿洲國之僭立，此老固蓄意已久也。」<sup>34</sup>直接將鄭氏早期在東北的「負氣」之作聯繫了生命晚期才有的滿洲國。同樣地，汪辟疆（1887—1966）先生在《光宣詩壇點將錄》將鄭氏詩學列為「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地位極高，卻也指出：「蓋以自托殷頑，而不知受庇倭人，於清室為不忠，於民族為不孝」，特別提醒讀者：「若就詩論詩，自是光宣朝作手。海藏一集，難可泯沒。孔子不以人廢言。」<sup>35</sup>面對詩學與政治的衝突，鄭孝胥晚期的政治抉擇顯然構成了他們評價的難題。

然而，他們不得已的結論卻是「清遺民」本身極為重要的事件。鄭孝胥承擔的「封建餘孽」與「賣國的大漢奸」名號，正是指向了今日學術研究必須澄清的二個議題：「遺民」與「漢奸」。前者在民國迎向共和體制的潮流之後，從此沾上了封建的污名，躲藏租界淪為「失語」（voiceless）的群體，自成一個世界；<sup>36</sup>後者則是在民國政權穩固以後，為持續激進的「復辟」行動冠上的罪名，尤其是接受了日本誘惑的一切人選，必須以「通敵」（collaboration）視之。於此，鄭孝胥在生命的different stages經歷了這些身分，從「詩人」至「遺民」而「遺民」至「漢奸」的轉折，諸多複雜的心境不能限於單一的解釋模式。探求每一次的政治抉擇，無論是日記的獨白，或是文學在面對如是艱難的政治處境裡激盪的情感，回到第一手史料加以細膩的討論都值得學界重新省思緣於「現代」與「政治正確」（political）的干擾而無法完善呈現的歷史評斷。<sup>37</sup>

---

年），頁 79-82。

<sup>34</sup> 錢仲聯著；張寅彭校點：《夢苕盦詩話·鄭太夷早年詩》，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 6 冊，頁 216。

<sup>35</sup> 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新校本）》，收入氏著；張亞權編撰：《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69。

<sup>36</sup> 相對於新舊的二分，羅志田將近代中國劃分為多個世界，評曰：「由於研究者多習見史料中明顯的新舊之分，『不新不舊』的人與事，以及新舊各自陣營中表現不那麼極端或積極的群體，在我們的研究中多半處於一種『失語』（voiceless）」的狀態之中。（頁 51）而大隱於租界的清遺民便是羅氏以為的一個世界。見氏著：〈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9-60。

<sup>37</sup> 近年來，高嘉謙處理「汪政權」即有明確的問題意識：「……除了民族與愛國精神的抗戰詩詞，我們在從前以汪政權為首的『漢奸文學』或認定戰爭『漢奸』的個案裡，該

「鄭孝胥」的位置如是特別，以「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的姿態敘寫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風景，投以「歷史行動者」的視角，擺落了史家的「後見之明」。<sup>38</sup>於此，鄭孝胥的生命歷程可以將之議題化而重新劃分，這也是論文試著提出的研究框架：

第一階段是「詩人鄭孝胥」。時間還在辛亥革命以前，詩人覺察了時代的動盪，而清王朝尚未面臨直接的破壞。此時，鄭孝胥的詩名還有討論的餘地，自成一家，引領同光體在近代詩壇嶄露頭角，至於獨領風騷。然而，研究的重點必須落在當時蔚為流行的「宋詩運動」，進入同光體的詩學視域，尤其關切「不尊宗盛唐」與「言之無物」、「摹仿古人」的差異，由此修正胡適為宣揚「文學革命」不自覺留下的文學史評價。

第二階段是「遺民鄭孝胥」。時間進入了革命以後，遺民散落四方，面臨或出或處的艱難抉擇。無法親赴歷史現場，不得已停留在上海的居所——「海藏樓」，鄭孝胥只能在此自我辯證革命的真相，心中的「負氣」無法宣洩，詩與日記的文字皆是「積恨」而來。有意思的是，樓閣標明的「海藏」即是詩人在革命以前便不斷琢磨的政治技藝，由「避居」至「閉居」，鄭氏懷著理想的答案延續「避地待時」之志。

第三階段是「政客鄭孝胥」。時間落在了北京政變發生以後，馮玉祥(1882—1948)逼迫溥儀(1906—1967)離開了紫禁城，而鄭孝胥親自護駕、引領「小朝廷」來到了日本的天津租界。其後，得到了相當的信任，不再是「海藏」的形隻影單，恪守的政治懷抱有了實現的機會。天津的屋舍以「夜起」為名，其實也貫徹了另一項早期的技藝。鄭孝胥以「夜起」調適天津時期的政治得失，無論是清遺老之間的算計、「小朝廷」的未來，更多的是自我晚期政治懷抱的求索。於此，由日本野心成立的滿洲國疊合了鄭氏大清帝國的想像，自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理所當然地，此一階段結束在溥儀等人前往東北的列車上，他們的期望不會存在於民國的歷史。

---

如何有效重新解釋這些文人／政客複雜的生命歷程，以及詩詞又能發揮何種釐清生命軌跡和文人意識的功能？……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語境內的『文學與政治』議題，在這些戰爭協力／通敵者的個案討論中，將形成有意義的觀察。」見氏著：〈家國零落餘此身：梁鴻志通敵前後的憂患與風雅〉，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古典文學新視境」學術研討會，2016年4月，頁247。同樣地，面對鄭孝胥在滿洲國，如何透過「詩」彰顯隱而未見的政治情懷，不同於民國史觀主導的評斷，值得持續的討論。

<sup>38</sup> 王汎森特別強調了歷史行動者與史家的分野：「對某一個定點上的歷史行動者而言，後來歷史的發展的結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擺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資源和不確定性，未來對他而言是一個或然率的問題，他的所有決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個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資訊、偶然性，夾雜著群眾的囂鬧之下作成的，不像我們這些百年之後充滿『後見之明』的人所見到的那樣完全、那樣透明、那樣充滿合理性，並習慣於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邏輯將事件的前因後果順順當當地倒接回去。」見氏著：〈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第14卷4期(2003年12月)，頁183。

第四階段是「英雄鄭孝胥」。時間正是 1932 年以 73 歲的高齡出任滿洲國「國務總理」，短期兼任「軍政部」總長、「文教部」總長，幾乎參與了建國初期的一切建設。鄭孝胥對滿洲國的想像根源自革命以後，在「海藏樓」對於「復辟」行動的袖手旁觀。然而，不問世事的立場與「負氣」之間的不斷衝突，導致鄭氏「英雄」論的轉向，也是鄭孝胥歸返政治現場的主要動能。於此，鄭孝胥為堅持「復辟主義」投入了滿洲國的建立，體現在《滿洲建國溯源史略》的合法性發明與「王道」詩學的轉化。以「英雄」指稱此一時期的鄭孝胥，有意與過去「漢奸」的形象對應，形成解釋的張力。不止於開國元勳的身分，重要的是自己當前的認知，鄭氏深信滿洲國將是「小朝廷」的前途。

綜言之，今日的分期可以重新理解鄭孝胥一生的政治成就及其複雜的心路歷程。議題化的同時，突出的甚是學界處理「清遺民」研究不可迴避的問題：同光體、辛亥革命、遺民心理、漢奸形象，至於「現代」強勢進入中國以後的「傳統」面目。鄭氏的材料幾乎見證了晚清民國劇烈變化的時期與過渡，如何疏理這段歷史？詩文的聲音又如何平衡過去的認知？研究過程已然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訓練，從「史事」的疏理到「史觀」的省思，盡力琢磨新興的觀點。

## 第二章 負氣

### 第一節 自傷與自負之情

汪辟疆（1887—1966）先生《光宣以來詩壇旁記》談及「海藏樓」，引陳灝一（1822—？）〈記鄭孝胥〉一文概其平生，如是評述海藏功業：

鄭孝胥之得名也，不以書，復不以詩。世獨以美書工詩稱之，斯固然矣。而於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數數預謀，實一政客也。<sup>1</sup>

由此推想，「政客」在鄭孝胥身上的顯影似乎逾越了詩人墨客的文士形象。質言之，「政客」其實定調了鄭孝胥的人生哲學，亦是推動其作為的處世邏輯，於書於詩縱有盛名，可以視為「政客」表現的不同姿態。且看內文試舉〈四月二十四日渡海〉詩為證：

決決渤海意如何？騰碧翻金眼底過。出世只應親日月，浮生從此藐山河。  
南歸不用懷吾土，東去誰能挽逝波！愛煞滔天露孤島，棄船聊欲上嵯峨。

<sup>2</sup>

汪氏指出詩作的背景乃「是年孝胥往來京滬間，策畫鐵道國有之說」，勞碌於政策的感懷。有趣的是，從民國的史觀看來，收回鐵路權、鐵路國有政策激起了多數人民的抗議，一般以為是辛亥革命爆發的原因。然而，重返歷史現場，鄭孝胥當時深信這是解決國家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其在日記（1911年7月12日）張貼六月初八日《時事新報》節譯《太晤士報》，題云〈西報論鄭蘇戲之奏對〉：「鄭氏之論全國財政之情形，誠大可為訓，而其審度國勢之後，歸本於鐵路之在國家實具有軍事上之重要，斯真簡明翔實之論也。」<sup>3</sup>甚者，鄭孝胥即是鐵路政策的發想者：「余告盛（宣懷）、端（方）鐵路包工之策，謂『此

<sup>1</sup> 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收入氏著；張亞權編撰：《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22。

<sup>2</sup> 同前註，頁224。又見鄭孝胥：〈四月二十四日渡海〉，收入氏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18。

<sup>3</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332。

策既定，則風潮皆息，省費而工速，不可忽也。」」<sup>4</sup>看似切實的構想實則富饒了現代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想像。<sup>5</sup>於此，知人論世之後，詩作呈現的是由「政治」結構而成的情景，如是琢磨的眼光投射於自然，只見爭光之日月。陳瀓一如是評曰：「讀此詩，想見其人其志。」<sup>6</sup>政治的憧憬積蓄於胸，巧然以不同的聲道體現了「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宗旨。

若是歸結鄭孝胥詩作顯露的「政客」蹤影與「政治」意圖，體系的核心其實來自詩人性格某一面既有的膨脹。汪辟疆接續陳氏的評論說道：「睥睨一世之氣，冥心孤往之懷，感慨於中，情見乎外，不必即心馳三島也。」<sup>7</sup>鄭孝胥以為自己真正洞察了時局的走勢，不止於鐵路政策的規劃，在軍事、外交，至於地方行政在存亡之際的應對都有明確的觀點。<sup>8</sup>因而在世變當下的自我定位顯示「出世只應親日月，浮生從此藐山河。」縱然還是理想，卻有了相當清楚的面目：「愛煞滔天露孤島，棄船聊欲上嵯峨。」汪氏的論說還涉及鄭孝胥如何有意識地擴張自己的性格，甚或以定名為「夜起」的私密技藝作為深化及延續政治情懷的儀式。<sup>9</sup>即使歷史的視點轉換至辛亥革命以後，詩曰：「江哀漢怒此爭流，斷送才人又暮秋。今日中原應失望，莫將淚眼更登樓。」感慨實際官職與自我定位的距離，理想難有發揮的空間；或是生命晚期在滿洲國的歲月，鄭孝胥的文字一以貫之：「誰惜英雄袖中手，枉教弄筆掣長鯨。」對政治的期望形塑了詩人的衷腸密語，自始至終匯合為一股激進的驅力：「詞客有才應賦此，老夫無夢亦淒然。」於是乎，汪辟疆有此總結：「其自傷與自負之情，不難玩味而得也。」<sup>10</sup>將鄭孝胥多采的生命經驗劃分的諸多斷代，以其一致穩定

<sup>4</sup> 同前註，頁1325。又見日記（1911年3月5日）：「孟庸生來，邀至孫公園同志講演會。午後二點半赴會，李木齋為主席，余為財政及借債造路之策，自二點三刻至四點余乃畢，聽者百餘人。」（頁1311）；日記（1911年8月24日）：「午帥送照會，奏請以余為川漢、粵漢鐵路總參贊，月支薪水、公費一千兩。余笑謝曰：『公能用吾策，不必加以參贊之名。薪水則不敢受也。』」（頁1339）

<sup>5</sup> 同前註，頁1326-1327。日記（1911年6月21日）：「八點，至勤政殿謝恩，攝政王召見於東小閣，命坐。余言：『中國如欲自強，機會只在二十年內。以二十年內世界交通之變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馬運河、二恰克圖鐵道、三俄印鐵道是也……今中國若能急造恰克圖鐵路，則由柏林至北京只須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進步。從此以後，中國與俄分作歐亞交通之主人，而南滿、東清皆成冷落，日本經營朝鮮、滿洲之勢力必將倒退十年。此乃中國自強千載一時之機遇也，願攝政王勿失機會。』」

<sup>6</sup> 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頁224。

<sup>7</sup> 同前註。

<sup>8</sup> 日記（1911年10月12日）：「宮保來電話，云：請至澤公府；即往謁見。澤云：『明早叫起，請酌應陳之策。』余請言四事：一，以兵艦速攻武昌；二，保護京漢鐵路；三，前敵權宜歸一；四，河南速飭戒嚴；更請暫緩秋操。澤甚然之，留飯畢乃去。盛於座致瑞帥電：『力保鐵路，請速責成張永漢。』亦余所陳。」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49。

<sup>9</sup> 汪辟疆：《光宣詩壇旁記》，頁224。鄭孝胥「夜起」的相關討論請見論文第4章。

<sup>10</sup> 兩段詩文皆是汪辟疆在援引陳瀓一文章以後，接續評述鄭孝胥「其人其志」的其他面向。有待釐清的是，汪氏舉〈漢江秋望圖〉：「江哀漢怒此爭流，斷送才人又暮秋……」

而張揚的政治性格作為挈領。

「自負」與「自傷」之情志緣於政治，發言為「負氣」之詩。孟森（1868—1938）為《海藏樓詩》寫的序言說道：

海藏援功成身退之義，累疏求去，驟不得請，意頗鬱鬱，形於詠歌。不佞指詩集開卷第一首中一聯云「三十不官寧有道，一生負氣恐全非」，戲問海藏：「今日之求退不得，與十餘年前未出山時語氣相較何如？」海藏謂出處之故，情隨境變，未可執也，獨負氣不自瘳耳。今又閱三十年，前言尚可理也。<sup>11</sup>

詩序落於丁丑孟夏（1937年），鄭孝胥和孟森即將步向人生的終局。序言聯繫了《海藏樓詩》的最後一次印行，頗有總結的意味。回首當年，兩人結識於龍州幕府，期間事功於旁記多有記錄，以為治邊弭亂之綱領。<sup>12</sup>孟森親自見證了「鄭龍州」不凡的軍事成就，相當熟悉海藏為政治執著之性格。戲問之餘，鄭孝胥的回應相當堅定，表明出處進退並不影響自我對才識的肯定，而這份「負氣」又延續了三十年，直到生命盡頭亦不減當年氣勢。孟森如是評價：

然則才分有定，愛好之結習與負氣並行，所行皆負氣之事，所作亦皆負氣之詩。

這段文字或有微詞，卻也是極為相稱的評語，可以概括鄭孝胥的性格。誠然，詩人的抑鬱與政治上的挫敗直接關聯，在提煉作品內部細微的情感之外，應當盡力還原政治現實的意義，特別是鄭孝胥的詩作以「政治」為意在言外的關鍵詞，越是「負氣」興發，越是情緒凝重。孟森入幕時得到了《海藏樓詩》初刻集，在龍州的事業可謂海藏以才識自負的全然顯現，儼然與詩作的調性相同；直到「海藏援功成身退之義，累疏求去，驟不得請，意頗鬱鬱，形於詠歌。」孟森的提問又開啟了進一步的解釋空間，探問海藏「求退不得」與「未出山」的轉變何如？而鄭孝胥「獨負氣不自瘳耳」的回覆本身就是一種「負氣」的聲明，政治得失不會添加過多的焦慮和悲傷，甚或消弭了抽象與現實的界線。質言之，鄭孝胥的眼光強烈直視當下的歷史實體，至於三十年以後仍然挺立於政治舞臺。孟森持續說道：

---

<sup>11</sup> 一詩以為鄭氏有感於徐樹錚被刺身死而作，如此可能存在年代混亂的問題。徐氏 1925 年遇刺，詩作卻見日記（1915 年 1 月 12 日）：「題〈玉樓慘語〉二絕，題〈填詞圖〉、〈漢江秋望圖〉各二絕……」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546。然詩作仍可說明其在辛亥革命以後顯現的詩人性格，亦不背離汪氏之評述。

<sup>12</sup> 孟森：〈海藏樓近刻詩序〉，《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7。

<sup>12</sup> 孟森：《廣西邊事旁記》，收入氏著；孫家紅編：《孟森政法著譯集刊》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44。

負氣之事之果為是非，將付難齊之物論，而詩則當世固已無異詞矣。<sup>13</sup>

言不盡意的是鄭孝胥出任滿洲國總理職務的決定，其實不無指責的意味。<sup>14</sup>身後的功過暫且不論，鄭孝胥「負氣」的性格完滿徘徊在「政治」與「詩」之間，這是鄭氏調適自我定位的方式，「詩言志」也是位居前線的傳統知識分子遭遇「現代」僅有的手段。甚且，設想鄭孝胥與滿洲國的關聯，當然不會以「偽」字點染其內在性質，若只是從「遺民」如何「忠君」的框架為進路，可能也忽略了時代的駁雜。此時，不妨歸返鄭孝胥獨有的政治性格，到底如何「述意」當下：探索「投門避地久周旋，遼左龍飛信有天」，詩人從隱逸到入世的政治思維；觀照「紀事會須成本末，崎嶇又歷十三年」，詩人堅定鍛鍊以「負氣」為樞紐的自我技藝；然而，在滿洲國得到總理職位的鄭孝胥，真正體現了「皎然進退自分明，中止休疑業未成。天道從來看後起，祇將白髮待還京」的歷史哲學。<sup>15</sup>詩人如是抒情，過去的理直氣壯具體終於收穫政治現實的成果。

## 第二節 天下懷抱之人

鄭孝胥的「負氣之詩」可以在政治實踐上找到根源，日記的詳細記載恰好提供了研究者對應「情」與「事」的進路，明白詩人何為「負氣之事」。<sup>16</sup>此外，「詩」作為傳統士人依存的技藝，鄭孝胥的思考與理論的歸納如何體現為自我的政治性格，成為值得關切的論題。視域的轉換必然碰觸了原有的邊界，於此，首要探勘「同光體」詩學的歷史脈絡，鄭孝胥的信念亦根源其中。誠然，舉世之詩名來自張之洞（1837—1909）「蘇堪是一把手」的慧眼獨具，歷史現場的政治互動關係甚是不言而喻。據陳曾壽的紀事：

<sup>13</sup> 孟森：〈海藏樓近刻詩序〉，頁 8。

<sup>14</sup> 孫家紅：「1937 年 11 月 10 日，鄭孝胥父子從關外特趕來看望孟森……然從孟森遺詩來看，當天孟森曾再次勸鄭氏收手，不要作國家和民族的罪人。但是鄭氏一意孤行，孟氏乃與之決絕，並作詩三首譏之……」見氏著：〈師之大者：史學家孟森的生平和著述〉，收入何齡修編：《孟心史學記：孟森的生平和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頁 122。

<sup>15</sup> 鄭孝胥：〈述意〉，《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429-430。

<sup>16</sup> 史學界談論日記作為一種史料，區分且強調了「史事的真」與「記述史事的真」。桑兵：「當事人的記述無論由於客觀條件還是主觀因素的作用所產生的差別，間有放大或掩飾的故意，卻不一定是有意作偽，不僅所記大都是真（當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如此這般或那般記載這一史事的行為本身，同樣是真的表現。前者是他們的眼見為實，後者固然有部分隱晦，但他們如此記述，仍然是真實心境的寫照和真實行為的體現。」見氏著：〈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頁 70。

公忠純白，盡瘁國家，苦心孤詣，有非世人所知者……蘇堪一日雅坐便談，謂公方之古人，所謂「忠順勤勞似孔明」也。公為之起立，謙讓不遑，而慨歎首肯者再，蓋深知公之心者。故公于蘇堪之詩，獨嘆賞不置也。<sup>17</sup>

前文約略述及二人之交遊，陳氏的評語並非有所責難。試舉廣雅堂詩曰：「詩才已為塵勞盡，霜鬢空教海內知。」其內在盡瘁為國的意蘊由鄭孝胥發覺，始有「忠順勤勞似孔明」的共鳴，起初其實不以詩才為明盛。接續而來，陳氏提及張之洞難得填詞：「……可恨是、英雄不共山川住。霸才無主。剩定韻才人，賦詩公子，想像留題處。」其蒼涼悲壯之感，別有時不見英雄的慨嘆。而鄭孝胥有意以詞回應：

……馳馬來者髯公，微吟弄策，憂國顏成纈。喚起忠魂應再世，滿眼英年  
人傑。楚戶終強，江流休轉，老去餘心鐵。鼓鼙聲遠，受恩空自腸熱。<sup>18</sup>

彷若閱讀了詞作的弦外之音，暗示了亂世當前，南皮的在場即是英雄的到臨，忠國不以身老為念。猶記，陳衍嘗言：「余謂文襄於蘇戲詩，實有偏嗜……」趣味地辯論鄭孝胥〈續雜詩〉詩：「門外大江漢，轉覺詩難好。吟就武昌花，寄與南皮老。」何以得到了張氏的稱賞。<sup>19</sup>言談間，其實突出的是「深知公之心者」的緣由。

張之洞畢竟是當時為人敬重的新政領袖，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出任湖廣總督一職，武漢幕府即是「熟諳洋務」的晚清士人嚮往且活躍的場域。甚言之，張之洞的聲勢作為背景，直接影響了「同光體」詩人的崛起與定位，且看陳衍早期詩學論著《石遺室師友詩錄》（1909）將其放置於卷首，並稱：「相國生平文字，以奏議及古今體詩為第一。奏議旁皇周匝，見人所未及見，達人所不能達……古體詩才力雄富，今體詩士馬精妍，考據題詠，皆有名論新意寓乎其間……」<sup>20</sup>有意思的是，此處強調了「名論新意」，似乎背離了「同光體」詩論的基本命題。即使意圖將廣雅堂詩聯繫了諸多南北宋諸大老，仍然可以從陳衍對「奏議」的評述發覺其用心於推崇張之洞「清流」與「洋務」的身分轉換，至於在變法革新的諸多創見。<sup>21</sup>錢仲聯（1908—2003）先生直言：「陳（衍）

<sup>17</sup> 陳曾壽：《讀廣雅堂詩隨筆·二六》，收入王培軍、莊際虹輯校：《校輯近代詩話九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65。敘目：1918年刊於《東方雜誌》，載二次。

<sup>18</sup> 同前註，二七。

<sup>19</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七》，收入氏著；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10。

<sup>20</sup> 陳衍：《石遺室師友詩錄·卷一》，收入國學萃編社編：《國學萃編》第4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1909。（標點自注）

<sup>21</sup> 甚者，陳衍有意提及自己的功業為張之洞賞識：「甲午（1894）五月，林贊如侍郎由御史出守雲南昭通，道過武昌，謁相國。相國見侍郎扇頭有余贈行三絕句，至為激賞。」

在張之洞幕府時，任官報局編纂，聲名未起，所以追敘一八八六年話，推沈為魁傑，明明是挾沈以自重，是舊時代文人標榜的惡習。」<sup>22</sup>因而「同光體」的生成可能充斥著算計與想像，在詩法之外還有許多的外緣問題值得探討，其中牽涉的政治因素同樣成為了規範詩學的開端。

其次，學界已然關注了作為「同光體」詩論中心的「三元說」自有可以對應的政治脈絡與時代意識。據《石遺室詩話》記載：

蓋余謂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沈曾植）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固有「開天啓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幹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之書不讀，有日蹙國百里而已。故有「唐餘逮宋興」及「強欲判唐宋」各云云。<sup>23</sup>

如是聯繫「不墨守盛唐」的觀點，理論落在「元和」與「元祐」之間的調和。然而，類似的論斷在當時以張之洞為首的武漢士人群體內部並不陌生，且張氏的詩學理論一直相當明確：「廣雅堂詩之脫胎於長慶，習於唐宋之辨者，一望即能知之。」<sup>24</sup>自己論詩亦有言說：「平生詩才尤殊絕，能將宋意入唐格。」<sup>25</sup>顯然是在詩學興盛的唐宋各有取法，並在理論內部致力於溝通彼此，如是銜接了「三元說」標舉「開元」卻又執著於「不墨守盛唐」的設計方案。此外，張之洞注目唐宋，謝絕六朝及江西詩派的文學史脈絡有其道理，論者巧妙指出了其間政治現實的面向：「在張之洞看來，晚清西教西學的侵入、世風的墮落、民生的凋敝，種種『敗氣』都與道咸以來詩人『攘臂學六朝』相對應。外放疆臣以後，張之洞更對『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的風氣深惡痛絕。因而提倡貫通唐宋，反對『浮誕嵬瑣』，實際上都包含著對當下

---

丁酉（1897）臘月，又在他處見余論時事文數篇，以為才識罕有其匹，令梁節菴致電招往武昌，又電告鄭蘇戡令轉邀。戊戌（1898）正月，余至武昌，遂留幕府……庚子（1900）後，相國與兩江總督劉忠誠公會奏變法條陳，曾採余〈變法權議〉入……寅壬（1902）又以熟於中外古今政治之學薦之於朝，尤為逾量稱許。前後委辦學務、商務，創譯商律及理財各書，籌議銅元、鈔票、小銀元各貨幣，刊在雜報，一時有錢流地上之稱云。」（頁1910）此與鄭孝胥的從政意識相似，張之洞建立的願景吸引了多數晚清士人的目光。

<sup>22</sup> 錢仲聯：〈論同光體〉，頁416。錢氏再舉章士釗〈論近代詩絕句·張文襄〉：「達官名士一身兼，一味矜名却又嫌。見說駿驥冠下客，不教陳衍炫依嚴。」注曰：「集中無與石遺詩，聞己詩亦不令陳和。」可以進一步揣想陳衍的性格。

<sup>23</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頁9。

<sup>24</sup> 胡先驥：〈讀張文襄廣雅詩〉，收入氏著；劉夢芙審訂：《胡先驥詩文集》下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頁421。

<sup>25</sup> 張之洞：〈四生哀·薪水范昌棣〉，收入氏著；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0478。

政治、學術走向的關切。」<sup>26</sup>於此，「貫通唐宋」可以說是張之洞用心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漫漫思考的結果，也因為在武漢士人群體的領袖身分得到了「同光體」詩人的附和。<sup>27</sup>

「同光體」汲取了諸多養分，理論的生長有不可忽視的政治場景。甚者，詩學的發明為當前的時代氣氛感染，形塑一種世變之下的危機論述。錢仲聯先生即有閱讀的提醒：「看法雖然是向後，沒有看到前途，但他（陳衍）把近代詩歌聯繫近代歷史來看待，也是正確的，我們不應該因為《石遺室詩話》多談藝術而忽視了他理論中正確的一面。」<sup>28</sup>詩學具有的政治關懷延續至辛亥革命以後，理論內部也有了轉化的過程。陳衍如是說道：「自前清革命，而舊日之官僚伏處不出者，頓添許多詩料……故今日世界，亂離為公共之戚，興廢乃一家之言。」<sup>29</sup>且不論生命出路的何去何從，世變當前的詩人在顯隱之間，確實有了新的取向，類似的說法多有舉隅，一如詩話對李宣龜（1876—1953）的評述：「拔可詩最工嗟嘆，古人所謂淒惋得江山助者，不必盡在遷客羈愁也。」想像的鄉愁不及現實的真正慘景，因而「經亂頗遭蹂躪，又目擊武昌兵亂，故語意時含淒惋。」<sup>30</sup>又，陳三立（1853—1937）「力求生澀」至「參錯於杜、梅、黃、陳間矣」，同樣經歷了「然辛亥亂後，則詩體一變」的轉折。<sup>31</sup>於此，試以陳衍的慨歎總括其名：

近又見晦闌一詩，甚清婉，急錄之。〈南歸經滬寄京邸舊游〉云：「繞道江皋計早迂，經行湘曲又旬餘。無多懷抱將銷歇，已換寒溫問起居。聽曲再來當暮雨，題詩還寄及春初。遲歸別有沈綿意，難為臨風一一書。」讀第三句，使我慨嘆無已。人之有懷抱者，本已無多，而富有懷抱者更少。至懷抱無多，則一經頓挫，遂爾銷歇矣。胥天下懷抱之人，安能忍而與終古哉？<sup>32</sup>

<sup>26</sup> 陸胤〈「同光體」與晚清士人群體〉，收入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 22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16。論者主要援引及解釋的材料為〈哀六朝〉：「……今日六合幸清晏，敗氣胡令怪民招。睢水祆祠日眾甚，蠟丁文字煩邦交。笛聲流宕伶嘆樂，眉鬢愁慘民興謠。河北老生喜常語，見此蹙額如聞梟。政無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為妖……」，《張之洞全集》第 12 冊，頁 10503。

<sup>27</sup> 鄭孝胥：〈廣雅留飯談詩·其一〉：「半生作詩多苦語，一見尚書便自許。彌天詩學幾詩才，五百年間闕標舉。寢唐饋宋各有取，挹杜拍韓定誰主。忽移天地入秋聲，欲罷宮商行徵羽。」，《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102。雖然有推崇張之洞的用意，足見當時武漢士人的詩學主張是以其為中心流轉，成為當時的共同話題。

<sup>28</sup> 錢仲聯：〈論同光體〉，頁 430。

<sup>29</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九》，頁 132-133。

<sup>30</sup> 同前註，卷十四，頁 203-204。

<sup>31</sup> 同前註，頁 202。

<sup>32</sup> 同前註，卷二十七，頁 368。

黃節（1873—1935）的詩句彷若觸及了陳衍的敏感神經，「急錄之」以定批語，感念「天下懷抱之人」。對照陳衍在鼎革以後的蹤影：「先生無取於遺老，亦不仕擾攘之戰國，而以講學畢其生。」可以發現其間張力——即使不汲營於仕途，内心情志依然蕩漾：「先生（陳衍）獨不為曼殊之殷頑，以為清之更為民國，與往古滄桑易代非一途……」<sup>33</sup>有趣的是，或許展現了一種具有現代意識的易代思維，遺民的身分別於傳統，而是訴諸情感的政治判斷，主要依循自己的懷抱作出的政治抉擇，映照在個別的出處進退之間。然而，被時間拋擲的清遺民不全然有此懷抱，即是陳衍感傷之處。緣此，得以判別多少詩人及詩體在「一經頓挫」之後的變遷。

近代學人朱鴻雛（1894—1921）曾有此辯護：

世有詬石遺、海藏、散原諸家為舊官僚者，遂並棄其詩，不知諸家之對於朝廷，未嘗迎合干進，反噬同種。若果為官僚惡習所薰染者，歌功頌德不暇，亦何至窮愁抑鬱，苦語滿幅？試細味其詞，語意之間，莫不憂國如焚，警惕一切，世奈何其不諒耶？

此一言說劃出了陳衍、鄭孝胥等人與「舊官僚」的分別，並稱：「石遺、海藏、散原諸家之為同光體，以時代言也。若謂其生際遜朝，便為亡國之音，則今之作詩者，須自民國元年學平仄仄起，然後避此嫌疑矣。」<sup>34</sup>可以想見，他們的懷抱如此獨特且耐人尋味，何以「冷眼」相待？<sup>35</sup>甚且，這份「同光體」凝聚的「懷抱」必然聯繫他們的詩學背景，即是士人群體當時在武漢幕府的共同體驗，萌發的政治想像。論者已然指出：「……『同光體』雖與晚清政局有著種種聯繫，但其所依托的士人集團的政治立場既屬於調和折衷一派，其對政治的介入與『反映』機制也要婉轉曲折得多。」<sup>36</sup>不同於「詩界革命」的激進口號，「同光體」一直遊走保守的路線上，倒也不是缺乏了識見，其間的政治意識依然蓄積於「士階層」內，關切的是個人的進退，未有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然而，他們的「懷抱」如琢如磨，流瀉之情志既「憂國如焚」又「警惕一切」，非關「遺民」姿態，未有「新民」之理想，而是一次次關乎安身立命的政治抉

<sup>33</sup> 錢仲聯：〈陳石遺先生詩論合集序〉，收入氏著；周秦、劉夢芙編校：《夢苕盦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下冊，頁752。

<sup>34</sup> 楊天石、王學莊編著：《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57。錄自《民國日報》1917年7月9日。

<sup>35</sup> 吉川幸次郎閱讀散原詩以「冷眼」言及改革者的敵意與霸權，漠視了同樣體會當時政治與文化危機，只是選擇保持忠誠的「遺老」。見氏著；章培恆、駱玉明等譯：〈清末的詩——讀《散原精舍詩》〉，《中國詩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16-317。

<sup>36</sup> 陸胤：〈「同光體」與晚清士人群體〉，頁322。

擇。於是乎，陳衍「既不為官，絕口不談政治」<sup>37</sup>，埋首書堆、專注講學也是一種恣意的安放，考量個人政治利益與現實情況的自在方式。<sup>38</sup>1915年，陳衍同樊增祥（1846—1931）、易順鼎（1858—1920）於畿輔先哲祠坐中論詩，憶起武漢光景，聊及近況，得詩有言：「未秋北地已先涼，入夏渾河欲混茫。端藉西風收宿雨，待將池月換山光。萬鴉沈郭悲元老，一笑橫江下建康。回首題襟詩事盡，散原分散海藏藏。」<sup>39</sup>可以想像，無論是「離居金陵」之陳三立，抑或「屏居不出」之鄭孝胥，各有一段親炙殘酷現實的抒情紀事，值得逐步探索。

### 第三節 為己之學

晚清的士人親歷文化與社會的天崩地解，時間不必然以辛亥革命為致命的落點，汲取了世變形塑的「感覺」（feeling），詩人的生命史各有艱難的關鍵時刻。簡言之，陳衍的「仕隱」可能體現了較為政治正確的抉擇；相對地，陳三立的「孤兒」境遇創設了前所未有的疏離感，情願流連於此也是現代情境下自我坦然的悼念狀態。<sup>40</sup>他們的作為獨具一格，而鄭孝胥微妙的「海藏」宣言「負氣」萬千，同樣展演了詩人面對政治現實有所為之的思緒。誠然，「同光體」劃分的政治意識固然是重要的理論資源，鄭孝胥確實相當依賴且嚮慕張之洞幕府的權力結構及「中體」主張，在「同光體」的規劃裡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認同。然而，陳衍的眼光關切了鄭孝胥的詩學游移其中，精要處向來牽連著個別感懷，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sup>37</sup> 陳聲暨編；王真續編；葉長青補訂：《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收入陳步編：《陳石遺集》下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2027。

<sup>38</sup> 論者巧妙敘寫了符合陳衍性格及「士階層」的基本考量：「這種『市隱』，並不離開人世紅塵，也不諱言追求名利，更不願意放棄人生享受，只不過自身不涉宦政界，而是依附政界要人，得到一種較為穩定和優裕的社會地位，以便能夠安穩地研經撰史，著書立說，乃至吟詩填詞與品文評賦。」見錢仲聯、嚴明：〈袁枚與陳衍——論詩壇盟主對清詩發展的積極影響〉，收入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主辦：《第一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頁345-346。

<sup>39</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八》，頁250。

<sup>40</sup> 縱然有中年喪父的史實，劉納以為散原詩常有近似「孤兒」的感受，表現真摯的悲戚與深致的痛楚，甚或擴大解釋為士人與家國鎖鏈的鬆動，深陷其中卻沒有積極的作為。甚且，論者也注意詩人的感受「已經無法參照古人提供的文化經驗，再在出入進退之間維持心理平衡」，這是現代性的傷痛，陳三立剩下的只有「詩」了。見氏著：〈陳三立：最後的古典詩人〉，《文學遺產》第6期（1999年），頁84-85。

蘇戡三十以前，專攻五古，規撫大謝，浸淫柳州，又洗練於東野。沈摯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三十以後，乃肆力於七言，自謂為吳融、韓偓、唐彥謙、梅聖俞、王荊公，而多與荊公相近，亦懷抱使然。余敘君詩，論之詳矣。君嘗言作詩工處，往往有在悵惘不甘者。因舉荊公「別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二十字，為與神宗遇合不終，感寓之作。余謂貴人之不能詩者，無論已。其能詩而最有山林氣者，莫如荊公。遇亦隨之，非居金陵後始然也。<sup>41</sup>

在「同光體」發明以前，鄭孝胥而立之年在己丑（1889），詩之技法逐步由唐入宋，尤其親近王安石的手段，「亦懷抱使然」。前文述及陳衍妙言：「胥天下懷抱之人，安能忍而與終古哉？」所謂「懷抱」，已然是貼近詩人情志，塑造自我風格的重要元素。甚且，鄭孝胥的詩學理念值得進一步探索，陳衍論之詳處有言：「君（鄭孝胥）每言作詩無深抱遠趣，所謂不可適獨坐者，固已；若處處不忘是作家，而不敢極其才思，誠作家矣，然終於此而已，安有深造自得之境。」<sup>42</sup>由此觀測，鄭孝胥將不止於技法之琢磨，或有超脫「作家」之意念，近似一種境界的探求。於是乎，鄭孝胥如是服膺，閱讀了荊公詩「往往有在悵惘不甘者」的滋味，言不盡意是「遇合不終」的政治主調。倘若「海藏」取自東坡詩句為名，內在理路儼然映照了荊公之實。有意思的是，陳衍又指出「其能詩而最有山林氣者，莫如荊公。」相互共感，詩之興會擺盪在山林野趣與政治期望之間，甚是鄭孝胥「海藏」情志之所在。<sup>43</sup>

鄭孝胥在武漢士人群體裡汲取了「同光體」的政治意識，詩學的淬鍊則以王安石之模範為形，又不止於宋詩的描摹。鄭氏有一言說：「作詩當求獨至處。孟東野詩勝韓，正在此耳。真氣旁薄，奇語突兀，橫空而來，非苦吟極思那能到，千古一人而已。」<sup>44</sup>在講求技藝的詩派之外，盼求靈光湧現之契機，意在突破詩法的疆界。可以想見，在鄭孝胥的詩學實踐裡，「同光體」難以簡約為宋詩派，模倣到底限制了詩人的才性。胡適（1891—1962）先生如此評述：「近代的作家之中，鄭孝胥雖然也不脫模仿性，但他的魄力大些，故還不全是模仿。」

<sup>41</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頁9。

<sup>42</sup> 陳衍：〈海藏樓詩序〉，《海藏樓詩（增訂本）》，頁3。

<sup>43</sup> 陳衍特別說道：「遇亦隨之，非居金陵後始然也。」其實是為鄭孝胥與文學傳統的對話及聲明：「余嘗謂金陵詩自王子敬桃葉，陳後主璧月後庭花外，惟李太白鳳凰臺一首，劉夢得懷古一首，及五絕句，稱為高唱，至荊公退處，而名作以多，類撫景感時，藉抒悒悒之抱。蘇戡、拔可，先後寓居金陵，又皆服膺荊公詩，發音之同，有自來矣。」見氏著：《石遺室詩話·卷十四》，頁204。陳衍的澄清加強了鄭孝胥學習荊公詩的「懷抱」心緒。

<sup>44</sup> 狄保賢：《平等閣詩話·卷一》，收入張寅彭選輯；吳忱、楊煮點校：《清詩話三編》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7039。

<sup>45</sup> 大抵是肯定詩人不囿於此的識見。接續而來，鄭孝胥的魄力使然，詩論不同於清代遙想「學人」的詩學標準，申明了「詩人之詩」的立場。鄭氏作《盃山詩錄·序》（1889）即言：「世之為詩者，不必皆詩人，故詩人之詩難見。」並稱顧雲（1845—1906）之詩作「豈世之多所役，又時以剽竊塗澤為詩者所能望乎？」<sup>46</sup> 巧妙的借題發揮，隱然開啟了與當時詩界的對話，且有自己堅定的主張。陳衍雖然也有類似的聲音：「然不先為詩人之詩，而徑為學人之詩，往往終於學人，不到真詩人境界，蓋學問有餘，性情不足也。」<sup>47</sup> 思想的終極目標仍是追求「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sup>48</sup>，未若鄭孝胥真正珍視了「性情」的道理。且看《石遺室詩話》一則記載：

漁洋山人自喜其「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之句，謂可擬范德機「雨止修竹閑，流螢深夜至」二語。漁洋最工摹擬，見古人名句，必唐臨晉帖，曲肖之而後已。持斯術也，以之寫景，時復逼真，以之言情，則往往非由衷出矣。蘇軾少日，嘗書韋詩後云：為己為人之歧趣，其微蓋本於性情矣。性情之不似，雖貌其貌，神猶離也。夫性情受之於天，胡可強為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則吾貌吾神，未嘗不可以不似似之，則為己之學也。世之學者慕之，斯貌之貌似矣，曰異在神。神似矣，曰異在性情。嗟呼！雖性情畢似其失己不益大歟。吾終惡其為僂而已矣。韋詩清麗而傷雋，亞於柳，多存古人，舉止則高於王，遺王而錄韋，與其不苟隨時，然亦不可與入古。柳之五言，可與入古矣，以其淵然而有渟也。柳之論文也，曰得之為難。韋之為韋，亦曰得之而已矣。弗能自得其性情，而希得古人之得盡為人者也。蘇軾論入古處，尚有古之見存。其論性情神貌，則固淵明問答之旨，濠梁魚我之機也。<sup>49</sup>

陳衍旨在探討王士禛（1634—1711）的摹擬工法，實行「時復逼真」與「本於性情」的辯證。猶記，鄭孝胥曾有類似的言說書於韋詩後，輯錄於此，對話韋應物（731—791）與柳宗元（773—819）之間存在的批評傳統。值得注意的是，「韋柳體」自是明清詩學探求復古的經典論題，鄭氏有所延伸：無論「得之為

<sup>45</sup>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入氏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96。

<sup>46</sup> 鄭孝胥：《盃山詩錄·序》，收入顧雲：《盃山詩錄》，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5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光緒十五年刻本），頁743。（標點自注）

<sup>47</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四》，頁197。

<sup>48</sup> 陳衍：〈近代詩鈔述評敘〉，《陳衍詩論合集》上冊，頁875。錢仲聯直言：「本來，學人詩人，努力的方向不同，並無高下之別。而在舊社會，一般文人却懷有學人高出一籌的偏見。陳衍正是用這樣的眼光來談什麼『學人之詩』以抬高『同光體』詩人的地位。」見氏著：〈論同光體〉，頁422。

<sup>49</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四》，頁23-24。

難」，抑或「得之」，皆是自我性情之生發，「弗能自得其性情，而希得古人之得盡為人者也。」進一步，鄭孝胥意圖將「性情」導引至「為己之學」，不止於抵禦巧構形似之言，亦不為佞也。又見潘飛聲（1858—1934）《在山泉詩話》的紀事，歸納徐鑾（1885—1936？）的詩法：「以真切為旨，謂須處處有我，處處有當時在。」<sup>50</sup>亦舉鄭孝胥、陳三立等人為例。可以明白，鄭氏確實發明其意，詩學以「自得」為指歸，突出了「性情」之「我」。

試想詩人「懷抱」及其「為己」之聲明，理論的形構已然標誌著強大的自我臨現，而具體實踐在「海藏」的命名及宣言甚為清楚。有待聯繫的是，在隱逸與政治之間，如何安置「性情」，甚或作為詩人思想體系之樞要？遙想鄭孝胥平生志業，無論歷史實體的求索或抽象思維的辨析，可以在其貫徹一生之「負氣」探求「性情」完整的脈絡。前文述及「負氣」完滿了詩人的「政客」心理，尚有一些詩學的面向可以探求。質言之，鄭孝胥不為「同光體」所限，立論即是絕妙的「負氣」姿態。昔日嚴復（1854—1921）傳來詩人榜排名之事，鄭孝胥欣然留存於日記（1908年6月23日）裡：「夏劍丞邀至九華樓，又陵、伯嚴皆至。又陵言：叔伊在京出詩人榜，無第一，以余為第二。評云，『恨無長篇，否則可為第一。』伯嚴第三，伯潛第四，易實甫第十，余人不能詳……。」<sup>51</sup>《石遺室詩話》亦有記載：「近來詩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奧衍，學詩者不此則彼矣。」<sup>52</sup>然而，陳衍將鄭孝胥的詩法比擬陳沆（1785—1826）：「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韵，積韵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原本「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鄭氏則繼承了自道光以來的文學傳統：「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為魁壘，其源合也。」有意思的是，配合了鄭孝胥自身汲取的理論資源：「後來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sup>53</sup>詩人耽習於此，必然碰觸鄭孝胥細心營建的詩學，獨特之「負氣」真正成就了一家之言。誠如錢仲聯先生如是不解其晚遇者，依然有此定評：「鄭蘇堪孝胥如三峰太華，獨見高標。」<sup>54</sup>《海藏》一集，難可泯沒。

<sup>50</sup> 潘飛聲：「江南詩人徐貫恂鑾，年纔弱冠，已成詩話、雜文十數種。承貽書訂交，暢論詩法，以真切為旨，謂須處處有我，處處有當時在。能斯義者，推余與黃公度、易實甫、陳伯嚴、邱仲闕、鄭蘇庵、范肯堂七人。伯嚴、蘇庵、肯堂之詩余未見，然余何能臻是境界。」收入氏著：《在山泉詩話·卷二》，《清詩話三編》第10冊，頁6916。

<sup>5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1146。

<sup>52</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十一》，頁450。然而，陳衍晚期獨標散原，可能與鄭孝胥加入滿洲國的決定相關：「五十年來，惟吾友陳散原稱雄海內，後生英俊，謬以余與海藏儕諸散原，方諸北宋蘇、王、黃三家，以為海藏服膺荊公，遂以自命……」見氏著：《石遺室詩話續編·卷三》，《陳衍詩論合集》上冊，頁584。

<sup>53</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頁37。

<sup>54</sup> 錢仲聯：〈近代詩評〉，《夢苕盦詩文集》下冊，頁512。

持續探問，鄭孝胥如何在詩法的模習之外張揚「性情」？錢氏有所感慨：「彌來風氣多趨於散原、海藏二派，二家自有卓絕千古處。散原之詩巉險，其失也瑣碎，海藏之詩精潔，其失也窘束。學者尚其短以相誇尚，此詩道之所以日下。」<sup>55</sup>詩道不堪乃經不起再模倣的陋習：難學散原詩，可能與執意飄零之身世相關；以「精潔」概之海藏風格，似乎有些拘謹，其實在突出鄭氏深思熟慮的面向，嘗言：「鄭太夷早年詩云：『用遼猶足支天下，北睇雲山萬疊青。』野心如此。其後偽滿洲國之僭立，此老固蓄意已久也。」<sup>56</sup>然而，聯繫陳衍形容之「伉爽」，馳騁「性情」，則明白海藏詩難學的道理。可以推想，詩人情感積於內，未有相當情志者徒於蹇澀而已。相對地，錢氏以為真正實踐鄭氏詩學的李宣龔，將「窘束」昇華至「精思健筆，深刻簡煉」，且「精潔」不失，甚有「精警」之工。<sup>57</sup>有意思的是，李氏仰之彌高，感佩之情還是朝向鄭孝胥的「海藏」性格：

丈夫出處要行意，猿鶴何心動相異。盛年已惜付蹉跎，到老端須養才思。  
南荒不樂早歸來，睥睨世間商位置。一日樓成海內知，滿壁題詩附氣類。  
銀釣鐵畫作闌檻，醉帖垂空寫奇字。入門不見果下驅，倏忽奔車掩耳至。  
由來懷抱不同俗，鷗榭濠堂猶夢寐。當前物態公莫失，竹亞楓翻各嫵媚。  
山塘遠為致雙栝，手植應堪資好事。他時風雨聽龍吟，記取高樓夜深味。

58

詩作於己酉（1909）落筆，鄭孝胥閒居海藏樓，即有「知天命」的想法。詩人歷練已多，沈潛於武漢幕府、威武於龍州督辦；傷逝亦不少，摯友顧雲與光緒帝的失卻分別代表了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崩落，燃起鄭孝胥不得已的情感危機。如今，李宣龔的文字並非描繪一位事過境遷的隱者形象，倒是思忖個人出處進退的潛行者。開場即言「丈夫出處要行意」，內心的情志依然故我，「到老端須養才思」，貫徹「待時」之「待」字。心嚮往之，鄭孝胥任由「負氣」引領向前，奮於探索立身處世之定位，且不斷翻越標的，「睥睨世間商位置」，逐步擴大了自己的邊界。作詩當若是，沈其光（1888—1970）說道：「然蘇堪胸中先有意，以意赴詩，故不求工而自工……。」<sup>59</sup>詩法所見，《石遺室詩話》

<sup>55</sup> 錢仲聯著；張寅彭校點：《夢苕盦詩話·乙庵卓然為一大家》，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6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209。

<sup>56</sup> 同前註，〈鄭太夷早年詩〉，頁216。

<sup>57</sup> 同前註，〈李拔可為閩派之最工者〉：「近代為海藏一派詩者最多，號稱閩派。然惟李拔可為最工，《石遺室詩話》以為最早為海藏樓者。大抵精思健筆，深刻簡煉……」，頁178。

<sup>58</sup> 李宣龔：〈秋夜宿海藏樓呈太夷丈〉，收入氏著；黃曙輝點校：《李宣龔詩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1。

<sup>59</sup> 沈其光著；楊煮校點：《瓶粟齋詩話》，《民國詩話叢編》第5冊，頁571。

記載：「蘇戡為詩，一成則不改。在天津時與余書，所謂骨頭有生所具，任其支離突兀也……」<sup>60</sup>「負氣」若高樓，甚或陳衍晚期表明之「專作高腔」<sup>61</sup>，伉爽音響，皆是詩人「性情」使然。職是，性格如此，隨之詩名與政治情境的變化，高漲之「負氣」成為鄭孝胥明確的「性情」表徵。奚侗（1878—1939）詩曰：「豪氣欲吞黃歇浦，詩鄰如卜海藏樓。」<sup>62</sup>可見「負氣」釀成詩名，亦有感染他人模習之效。

鄭孝胥獨標「性情」，發源於己，終於歸返自身，成就了「為己之學」。避兵滬上，奚氏自許「能窮能健百無求，筆硯平安更不憂。」唯一依賴且信仰的僅有文字，方能將豪氣出似健筆。同樣地，鄭孝胥「銀鈎鐵畫作闌檻，醉帖垂空寫奇字」，情之所至，行負氣之筆觸，獨居樓閣以詩文強勢喧嘩於外。有趣的是，「奇」字張揚了主體，對應發明「海藏」的用心，「海藏樓」的矗立如何聯繫詩人「避地待時」之志？長居於此，鄭氏之詩名令「海藏樓」難以真正潛藏，「海藏樓」成為在貧困時代以文字構築之高閣，詩人有意識地限制自己的蹤影，而「負氣」流瀉其間，闡明「海藏」之宗旨：「一日樓成海內知，滿壁題詩附氣類。」詩人的政客性格如是激烈，競以文字消化滿腹的不合時宜，「由來懷抱不同俗」，成就了「海藏樓」難忘的標記。同樣地，鄭孝胥「海藏」之本義呼之欲出，樓閣內外的政事辯證與負氣話語，句句皆是詩人待時奮起的心緒。

<sup>60</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頁12。

<sup>61</sup> 陳衍：「鄭蘇戡詩專作高腔，然有頓挫故佳。而亦少變化，更喜作宗社黨語，極可厭。近來行為益復喪心病狂，余與絕交久矣。」見氏說；錢鍾書記：《石語》，《陳石遺集》下冊，頁2183。

<sup>62</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十九》，頁397。

## 第三章 海藏

### 第一節 命名

#### 一、懷想東坡

鄭孝胥（1860—1938）「海藏」名號遍傳各地，不同於「太夷」、「蘇堪（龕、戲、庵、厂）」等字號，其卜築高樓、集成詩作，率皆標名「海藏」。可以想像，鄭孝胥如此珍視這樣的「命名」（naming），儼然像一則宣告，標示著自我的位置。申明其意，論者大抵以為「海藏」典出蘇軾（1037—1101）「萬人如海一身藏」的詩意。<sup>1</sup>且看陳曾壽（1878—1949）〈蘇堪六十生日〉詩曰：

白日當天三月半，萬人如海一身藏。使君留得堂堂去，四海都知鬢未霜。

<sup>2</sup>

詩人直接在祝壽詩引入東坡詩句。時至已未（1919），被拋擲的清遺民仍存在辛亥革命（1911）的茫然裡，祝壽詩的用心試著引領他們相信恢復榮耀的可能，因而詩人歸返「海藏」的初衷，期盼鄭孝胥可以延續自己的志向。由此對應鄭孝胥盛年的「海藏」想像：

四圍山海一身藏，歷落嶽崎自笑狂。天際雲濤秋益壯，樓頭風雨晝初涼。  
操心稍悟安心訣，更事翻思忍事方。獨有韋郎言可念，俸錢虛愧對流亡。

<sup>3</sup>

<sup>1</sup> 誠如錢基博先生史述：「鄭孝胥者，字太夷，蘇堪其號，福建閩縣人也。中式光緒壬午鄉試榜首，取蘇軾『萬人如海一身藏』詩意，自名其樓曰海藏，又集其所為詩曰《海藏樓詩》，凡八卷，以年先後為次。」見氏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75。

<sup>2</sup> 陳曾壽〈蘇堪六十生日〉，收入氏著；張寅彭、王培軍點校：《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21。

<sup>3</sup> 鄭孝胥：〈七月七日官舍風雨中作〉，收入氏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8。

同樣地，詩作巧妙化用東坡「一身藏」的典故，約略明白鄭氏嘗以「海藏」揣想東坡的意念。

鄭孝胥如此自傳：「平生吾東坡，異代獨眷眷。」<sup>4</sup>應是心悅誠服於夙昔之典型。且看詩名容納的紀事：「杭州南高峯煙霞洞東坡嘗遊處也寺僧刻巖石為財神湯蠻仙斥之易刻坡像杭人遂題之曰蘇龕蠻仙以書報余且屬作詩」，意圖將東坡的銘刻視為強大的自我臨現，並且得到多數人的認同。有意思的是，鄭氏甚言「敢懷爭墩意，易此執鞭願」，顯現「彼可取而代之」的志氣，內在理路則諧仿了王安石（1021—1086）「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名姓尚隨公」的歷史意趣，而非「人謂與死人爭地界」的敬重與惜別的心態。<sup>5</sup>於此回顧，鄭孝胥過去以「蘇龕」<sup>6</sup>為字號的「命名」即有轉化東坡生命際遇於真實之情調，無論悵然時刻遙想「坡公端自喜，人厄天未窮」<sup>7</sup>，或在迷惘當下思量彼此化境之異，內省「逝者固如斯，一闌偶當前。坡公觀不變，我意方留連」<sup>8</sup>，直至生命晚期，鄭氏於戊寅（1938）正月試筆：「東坡既南歸，何不依子由。吾計殊不爾，猶堪營高樓。」<sup>9</sup>依然眷念不已，只是傾慕之情已然昇華至與東坡之神交，甚或開啟了對話，緣於自己也有大把故事可說。東坡「常恐坦率性，放縱不自程」<sup>10</sup>的詩句預言了命運，鄭氏為之感慨，卻又不願在政治路途收束自身性格。此刻分隔東坡，詩人已經歷了太多，卓立一身無法自藏，便說「種漆待成器，古有樊敬侯」，驀然回首，貫徹一生的性格翻越歷史的限制，終於收穫了自我。

東坡原句：「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sup>11</sup>旨在肯定蘇軾（1039—1112）「大隱隱於市」的決定，為私人緣由暫且潛藏既有的政治情懷。鄭孝胥的用心亦在擋淺自己的政治情懷，只是「海藏」的意義甚為深遠又有機巧之

<sup>4</sup> 鄭孝胥：〈杭州南高峯煙霞洞東坡嘗遊處也寺僧刻巖石為財神湯蠻仙斥之易刻坡像杭人遂題之曰蘇龕蠻仙以書報余且屬作詩〉，《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127。

<sup>5</sup> 「敢懷爭墩意，易此執鞭願」自有來處，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十四》：「王荊公作〈謝公墩〉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名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收入氏著；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第 3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頁 440。

<sup>6</sup> 鄭孝胥一字「蘇龕」非取自湯蠻仙易刻東坡像以後，《鄭孝胥傳》按曰：「先生一字蘇龕，故蠻仙屬作詩也。」見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收入周谷城主編：《民國叢書》第 1 編第 88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1938 年版影印），頁 23。

<sup>7</sup> 鄭孝胥：〈七月二十五夜作〉，收入梁如冰、馬國華：〈海藏樓散佚詩輯錄〉，《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494。錄自《東方雜誌》第 5 卷第 9 號。

<sup>8</sup> 鄭孝胥：〈雜詩·其七〉，《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272。

<sup>9</sup> 同前註，〈戊寅正月試筆〉，頁 481。錄自《同聲月刊》第 2 卷第 11 號〈海藏樓未刊詩鈔〉。

<sup>10</sup> 蘇軾：〈初別子由〉，收入氏著；張志烈等校注：《蘇軾全集校注》第 3 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563。

<sup>11</sup> 同前註，蘇軾：〈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其一〉，第 1 冊，頁 253。

思，關聯詩人偏執的政治性格，浮沉之間，蓄勢待發的意念始終支援著詩人的等候。設想歷史的後見之明，鄭孝胥的理想在滿洲國的總理位置得到了完滿的實現，漫長的修行凝結成詩：

投門避地久周旋，遼左龍飛信有天。紀事會須成本末，崎嶇又歷十三年。  
皎然進退自分明，中止休疑業未成。天道從來看後起，祇將白髮待還京。

12

鄭孝胥嘗以「无悶」<sup>13</sup>為號，存有遁世之意，時至今日，潛龍於東北覺醒，終於體會了「飛龍在天」的境地。回顧來時路，確實崎嶇難行，期間經歷多少事變，熬煉了何等強大的內在動能？因為詩人在困頓時刻依然相信歷史未了，天道尚未定論是非功過，即使是為近代史「冷眼」相待的清遺民也不必然成為歷史的餘燼，只是立意「不見是而无悶」。

於此，「海藏」不彷視為詩人的修行，標記的是鄭孝胥一生沉重又複雜的政治心理。甚言之，其與東坡在經驗層次的告別可以如是理解：早年（1890）在東坡生日時即興作詩：「江上殘年我又歸，高齋雪後正添衣。終知此老堂堂在，贊覺虛名種種非……」<sup>14</sup>內容散發的閒適氣息絲毫不察時局動盪，視點落在生活周圍，詩人功名在身，盼望自己的修為可以貼近東坡一些。然而，時間推至丙子（1936），鄭孝胥慨然歌吟東坡詩：「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sup>15</sup>投入了不同以往的閱讀視角，嘗以一生鍛鍊之「道」共感於東坡寫作之「情」，映照自己生命經驗的存在情態。相對於在場作為聽眾的陳曾壽依聲情懷想：「遺詩千載動心魄，當年身受何滋味？故作達語掩悲涼，豈真解脫忘憂惄？」由衷敬佩東坡排遣苦難的意志，在生命晚期觀乎超然，真正庶幾淵明之心：「惟公解事人勝天，晚歲和陶入聖諦。當歌對酒萬端空，領取當前真實意。」<sup>16</sup>另外，直言「興致殊不減，平生吾老坡」（1936年1月14日）<sup>17</sup>的鄭孝胥則是歸返自身，以東坡陳跡疊合人生境遇：

<sup>12</sup> 鄭孝胥：〈述意〉，《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429。

<sup>13</sup> 陳衍評述李宣龔詩「石遺小住藤為屋，无悶新居竹滿庭」注曰：「无悶，海藏號。」見氏著：《石遺室詩話·卷八》，收入氏著；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10；鄭孝胥有詩「決壁施窗豁然見海題之曰无悶」，結尾處：「前身疑幼安，遯世送日月。」見《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34。可知「无悶」化用「潛龍勿用」之意涵。

<sup>14</sup> 鄭孝胥：〈東坡生日集翁鐵梅齋中〉，《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10。

<sup>15</sup> 蘇軾：〈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蘇軾全集校注》第7冊，頁4835。

<sup>16</sup> 陳曾壽：〈東坡生日酒間蘇堪誦寒食雨及蒼梧道中寄子由詩聲情激壯為作此詩〉，《蒼虬閣詩集》，頁265-266。

<sup>17</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613。

蘇集猶能誦，當年手自丹。平生再丙子，回首雜悲歡。世已波難挽，心如井不瀾。杯行春又入，聊共抗餘寒。<sup>18</sup>

「海藏」名號來自「萬人如海一身藏」，鄭孝胥思想系統的搏煉隱然存在東坡的理型。匆匆六十年，詩人適逢東坡生日多以追念為引子，「殘歲真堪惜，年年就老坡」，同時檢視自己的生命歷程。繁華落盡，東坡生日的正月不具開端應有之奮起，終於鄭孝胥把握了自我積累的道，「崎嶇終泯滅，況味飽經過」，自在調適著時光的流轉。直到抒懷了「世已波難挽，心如井不瀾」的置高態度，從此在人間世的應對上告別了東坡，釀成一種冷靜又不可解的晚期風格。「海藏」取自東坡，鄭孝胥的性格及政治情懷使其溢出於東坡之外。尚且，真正的意義總是事過境遷以後發生於回顧片刻，鄭孝胥命名「海藏」別有用心，其實是在漫漫政治長路上逐步形構的自我技藝，實踐一系列「隱逸」的詩學。

## 二、避地待時之志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海藏樓詩》初刊於武昌。有趣的是，為之作序的顧雲（1845—1906）另有別解，以為「海藏」取自詩人欲藏樓於海，庚其「不食人間煙火之詩」。<sup>19</sup>只緣東坡印象如此深刻，論者可能不以為意，索然無味。<sup>20</sup>然而，顧雲與鄭孝胥互為知音的關係值得學界重視這份材料，尤其意會到了「海藏」背後可能存在一道理解詩人的私密進路。<sup>21</sup>顧雲的釋義欣喜「海藏」對應自己「藏書豈尚有名山」之感事，也提及了鄭孝胥「不食人間煙火」之詩的來歷：

<sup>18</sup> 鄭孝胥：〈東坡生日和仁先韻〉，《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477。

<sup>19</sup> 顧雲：〈海藏樓詩序〉，《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1。

<sup>20</sup> 龔鵬程：「《海藏集》初刻於武昌，上元顧雲（子朋）序之，故逞筆力，以自別於桐城文家，反不如陳石遺序之有味；且謂樓名海藏，乃欲『藏樓於詩度於海』之意，亦屬誤說。」見氏著：〈晚清詩話〉，收入王翼奇等著；劉夢芙編校：《當代詩詞叢話》（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頁528-529。

<sup>21</sup> 鄭孝胥與顧雲交情深厚，當時刊行之詩話多有記載。試舉狄保賢《平等閣詩話·卷二》為例：「上元顧子朋廣文雲，自號石公。嘗為僚左金和圃將軍順幕客，不樂仕進，歸隱盜山。酣飲吳節，生平未嘗至醉。每出行，携酒一壺，小憩園林，輒引觴自酌。有趨而過者，則飛觥強酌之，士夫、傭保弗擇也。人往往畏而避去，世目為酒狂。豐頤修髯，身裁中人，不修邊幅，衣冠敝壞。貧而好客，宴享必豐腆。性坦率，遇人有過失，指陳無所避。與鄭蘇龕廉訪最相友善。光緒丙午春卒（1906），年五十許。鄭公自龍州歸來已不及見，賦詩四章哭之……」收入張寅彭選輯；吳忱、楊煮點校：《清詩話三編》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7069。此處敘寫顧雲不為人親近之性格，恰好突出與鄭孝胥難得之情誼。

然而海不可樓，海中聞有三神山，樓之以度不食人間煙火之詩，儻亦其所，顧既刊不容藏，傳之天下，俾知五七言詩，故《三百篇》苗裔，推之至邇事父，遠事君，有生大倫，無能外也。

就字詞意義來說，《海藏樓詩》顯示一種矛盾的張力——既然決意離群索居，何以積極刊行於世？顧雲的序文則提出了解釋，巧妙消解讀者的疑慮：假若汪洋大海難以築樓乃既成現實，推至神話尚有其它的象徵意義可說，那些存放於海裡的「不食人間煙火之詩」無法與神山並存，權其輕重，驟然公諸於世。因而「海藏」名號像是一種「悖論語言」（Paradox），無論「海藏樓詩」甚或「鄭孝胥」都不能置身事外。換言之，鄭孝胥的詩作依然言志，還是屬於個人的私密紀事，但「海藏」似乎隱含了與人間世結合的脅迫力量，一切心緒必然向外界釋放——《海藏樓詩》的刊行彷若天之判定。如同《三百篇》與人間世的交會，鄭孝胥的詩彷彿具有文學初始的神聖意義，因其「海藏」不可得，而與人事相聯繫。於是乎，《海藏樓詩》在顧雲的評說裡，當是一部必須為世人所知的文學經典，而鄭孝胥的「詩才」從此創造了文學史的新頁，得以振起歷史陳跡、消弭離合之悲。顧雲如是評述：

心目中益時時有一開徑獨行之人之詩，將舉似於古，古亦不盡似，直蘇龕《海藏樓詩》而已矣。<sup>22</sup>

畢竟是一篇詩序，難免點綴了諸多溢美之辭，但從顧雲理解的「海藏」內蘊考慮其人，確實閱讀了鄭孝胥一些特別的面向。「海藏」隱喻詩集無法藏諸於海，與世間切割不斷的關係恰與詩人的生命經驗相應。誠然，顧雲的詩敘寫在《海藏樓詩》初刊本以前，未料鄭孝胥其後際遇變化如此多端。由此推想，「海藏」的命名行為其實隱含的正是詩人的性格及意圖，透過「海藏」確認了自己的位置，決然在世變之下收斂盛氣凌人的姿態。日記（1898年1月21日）記曰：

此一年中，棄江寧，就上海，實有避地待時之志。……然世局變態，思之已熟，尚不為造化小兒所給，況今日斗筲乎。<sup>23</sup>

1897年，鄭孝胥自南京之上海，日記末端已然表露深藏志向，即使參雜了一些事與願違的怨懟，將之轉化為一次通往政治道路的修行，安頓內在不得鳴放的情懷。

另一層閱讀來自林紹（1852—1924），同樣以自己的理解為「海藏」釋義。且從林紹對鄭孝胥的情感說起，既有詩名之崇敬，至於為人甚具感佩之情。且

<sup>22</sup> 顧雲：〈海藏樓詩序〉，頁1。

<sup>23</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638。

看陳衍（1856—1937）《石遺室詩話》的記載：

琴南號畏廬，多才藝，能畫能詩，能駢體文，能長短句，能譯外國小說百十種……而世人第以小說家目之，且有深詆之音。余常為辯護……然畏廬於陰柔一道，下過苦功。少時詩亦多作，近體為吳梅村，古體為張船山、張亨甫。識蘇戡後，悉棄去，除題畫外，不問津此道者殆二十餘年。庚戌辛亥，同人有詩社之集，乃復稍稍為之。雅步媚行，力戒甚囂塵上矣。<sup>24</sup>

林紓譯介外國小說的成就不只是文學史上的定位，在其活躍年代已然富有盛名，在詩話觸及的文學語境裡，多少有不入流之聲名。陳衍由此轉出，指出林紓亦有詩才且卓然自成一家。有意思的是，林紓「下過苦功」，盡其所能而後自歎詩藝未若鄭孝胥高明，致使決然盡棄其詩。這段記錄不全然為抬高宋詩派而收，試作一詩論解，尚可並觀林紓《畏廬詩存》的敘文：「余恆謂詩人多恃人而不自恃，不得宰相之寵則發已牢騷，莫用偷父之錢則憾人鄙嗇，跡其用心，直以詩為市耳，乃絕意不為詩……」可以想見，「詩」之於林紓其實別有意義，幾乎是完全私人的記號：「故余自遂己志，自為己詩，不存必傳之心，不求助傳之序。」<sup>25</sup>於此，讓林紓立意「不問津此道殆二十餘年」的緣由可能來自《海藏樓詩》惘然說盡了林紓心語？詩人的閱讀驅力取代了創作的理由，其後拾起詩筆，回顧時亦有豐沛的歷史想像：

望裏鍾山勢鬱蒼，卻從月下想濠堂。欲尋前跡無三里，別構高樓已十霜。  
溪水還留曾光影，櫻花久作避人香。善夫慣吐酸心語，那復酸心似海藏。

26

詩人於鄭氏寓居陳跡起興，風采感染了溪間半影與櫻木殘香。林紓想見其為人，只緣鄭孝胥內心流瀉的文字如此真誠而極致，其餘作詩只是重蹈相似的悲觀離合，發乎牢騷而已。

於此，林紓的眼光其實著眼於鄭孝胥之真情，因而相信他在立身處世上亦有獨到的見解。相對地，既然「海藏」取自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同樣名其樓曰「海藏」、集其所為詩曰「海藏」，自然有他深思熟慮的道理。林紓為之寫作〈海藏樓記〉（1904），恰似為鄭孝胥作傳，從「海藏」至「海藏樓」，細數詩人期間的政治紛擾，如何以海上為退隱之居所，決意實現「避地待時之志」：

<sup>24</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頁 110。

<sup>25</sup> 林紓：〈自序〉，《畏廬詩存》，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77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頁 685。（標點自注）

<sup>26</sup> 同前註，林紓：〈下關寓樓望鍾山隱然欲訪蘇戡故居未果即題其集〉，頁 693。

嗚呼！蘇堪老矣，堅欲自藏，而知者又堅欲起之，皆莫得其當。……蘇堪其將終於斯樓矣。樓居吳松江上，所謂人海甚於王城，而花竹水石之勝又為王城之所無。蘇堪本有自藏之志，依斯樓以終。

就林紓的理解，即使鄭孝胥有意「海藏」，諸多「知者」仍誘使其歸返俗世，即便「海藏樓」矗立海上，依然塵務經心，非有此身。然而，在「顧其為人」以後，林紓提出了一個歷史解釋，以為是鄭孝胥與生俱來的才氣無法不見於世，故有此際遇。且看顧雲評述《海藏樓詩》即言：「顧既刊不容藏，傳之天下……」，肯定了鄭孝胥不能消散的光采。林紓的觀察則進一步予以定論：

顧其文章，幹略節概，雖造物亦不能終闕之不泄於人間，又胡能聽蘇堪之終藏與？至於樓之成毀，又寧與於蘇堪。余既為之圖並識其後，不為樓記，以記蘇堪生平之可記者重於樓也。<sup>27</sup>

在「顧其文章」以後，為之作傳的林紓已然指出「海藏」名號其實暗示了「海藏樓詩」、「鄭孝胥」與人間世不得已的緊密聯繫，使得「萬人如海一身藏」終不可求，在鄭孝胥的生命經驗裡一再重演。

值得注意的是，林紓與顧雲的觀察主要來自《海藏樓詩》的閱讀。換言之，鄭孝胥的文字提供了解釋的路徑，其間潛藏一種微妙意識，存在隱逸與政治之間不斷纏綿的關係。無論是「樓之以度不食人間煙火之詩」，抑或「雖造物亦不能終闕之不泄於人間」，多少指出了詩人的想望——「避地」只是行為，核心總以「待時」思想為主導。即使鄭孝胥聲明以「海藏」名號束之高閣，等待鳴放之詩凝聚了躍然於世的政治預言。且看戊戌（1898）正月的試筆之作：

滄海橫流事可傷，陸沈何地得深藏？廿年詩卷收江水，一角危樓待夕陽。  
窗下孔賓思遯世，洛中仲道感升堂。陳編關係知無幾，他日誰堪比〈辨亡〉。

<sup>28</sup>

時局紛亂，詩句不見明朗的新年氣象，倒是推演了一場「深藏」儀式以安頓將來的布局。或許鄭孝胥正是此刻興起了構築「海藏樓」的念頭，開篇可以看見立意「海藏」的背景及思路。<sup>29</sup>相對於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的來歷，鄭孝胥「廿年詩卷收江水，一角危樓待夕陽」著實寫出了自己生命經驗的「海藏」，表明自己如何以「收」、「待」這般迂迴的方式推進自己的政治理念。

其次，典故的運用集中在對偶詩聯，援引兩個隱逸風範作為「海藏」標記，

<sup>27</sup> 林紓：〈海藏樓記〉，頁 635。

<sup>28</sup> 鄭孝胥：〈海藏樓試筆〉，《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80。

<sup>29</sup> 年譜記載：「海藏樓見於先生詩始此，讀之可得樓名命義所在。」見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 21。

恰當地表現詩人對世界的印象。「窗下孔賓思遯世」宛若天啟，歸隱的動力來自「夜忽窗中有聲呼曰」<sup>30</sup>的召喚；「洛中仲道感升堂」則是興發於人事，關切國家結構的問題。昔人歎曰：「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sup>31</sup>頗能暗合晚清動盪之時局，甚而呼應日記提及的「今日斗筲」。於此，二位逸民來自《晉書·隱逸傳》，恰逢亂世既有深藏之意，天意的知覺與人事的抉擇在頸聯形成巧妙的對比，終局化為道家之自然。如是揣想著鄭孝胥定名「海藏」的想像情境，以「永恆的原型」<sup>32</sup>作為理論的間架，雜揉著自我意識，逐步形構詩人的「隱逸」風格。

此外，詩作尚有一則隱微的典故可以細膩探求鄭孝胥的志向，即落在首聯的提問：「滄海橫流事可傷，陸沈何地得深藏？」《莊子·則陽》如是記載這樣一位「陸沈者」：「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sup>33</sup>這段假孔子聲口的聖人言說為隱逸形象增添了不少超然的氣息：「滄海橫流」指向了一個貧瘠時代，詩人以為即使「陸沈者」至此也無法從容其間。恰似一段有意的聲明，王朝的夜晚趨近黑夜，詩人選擇告別陸地、深藏於海，貫徹「海藏」之名，但求真正的汪然平靜。然而，詩人對「陸沈者」的作為有所嚮往，匿影銷聲而不改其志，內心的話語留存於適當的時刻或機會，並以凝寂無言的姿態安居亂世。

誠然，「隱逸」的觀念從來不是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是配合時機以行道於世。<sup>34</sup>鄭孝胥以三個典範人物確立自己在亂世的姿態，提筆於 1898 年正月朔，為「海藏」名號下了適當的註解。誠然，時局總是不肯輕易放過任何知識分子，鄭孝胥了然於胸，深切體會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因而「海藏樓」的設想非一閑居靜思之地，而是劃定與之對抗的位置。「廿年詩卷收江水，一角危樓待夕陽」，詩人將過去的文學成果存放於江水，冀以隔絕陸地，隱然覺察到政治土壤的鬆動，現實幾乎不能容許自由的心靈恣意顯現。類似的傷亂心情在

<sup>30</sup> 房玄齡等：《晉書·隱逸傳》，收入楊嘉駱主編：《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第 3 冊（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2456。

<sup>31</sup> 同前註，頁 2434。

<sup>32</sup> 詳見高友工、梅祖麟二位先生對「典故」的理解：「……當一個典故出現於詩中時，它所指涉的不僅是與之相似的過去或現在的事件，而且是永恆的原型。……我們可以說，人類的行為是在永恆的歷史背景上發生的，而且，正是這種背景給人類的行為賦予了道德意義。」見氏著：《唐詩三論：詩歌的結構主義批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194。

<sup>33</sup>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 年），頁 895。

<sup>34</sup> 王仁祥由《易》追溯「隱逸」之起源，指出君子的隱逸思想乃出處進退之學問，關涉個人對時機的判斷及道德修為，而「待時」則是第二層次：「但若才德已具，卻仍隱藏不出，此為何故？蓋因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此非君子仕進之時，故仍不仕也。」（頁 22）見氏著：《先秦兩漢的隱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 年），頁 13-28。

「晚清詩」的文學史脈絡裡多有發揮，但鄭孝胥的文字存有一種特別的情懷值得細想。學人以為「晚清詩人之哀殘陽」，而詩人此處以「待」字表明對時局的看法——落日終會消逝；<sup>35</sup>甚者，詩人尾聯彰顯了自我決斷的歷史意識：「陳編關係知無幾，他日誰堪比〈辨亡〉。」鄭孝胥彷若以理性的態度預示了王朝如何黯然終結。陸機（261—303）在〈辨亡論〉對吳國的鼎立有所稱頌，並慨歎敗亡的原因在於捨其「人和」也。<sup>36</sup>鄭孝胥慨然歎曰：「目中所見皆殘局中人，天下其無望復振乎。」病已成勢，只好歸返自身，相信「刻苦而有興會」，緣此發明「海藏」的技藝，不與「今日斗筲」為伍。<sup>37</sup>可以想見，從丁酉日記末端留下的歸去之辭至新年的〈海藏樓試筆〉，鄭孝胥「隱逸」行動絲毫沒有拋卻個人的政治想望，與時代仍有緊密的聯繫。而「海藏」蘊含的「避地」實有一種迎向「黑暗時期」（Dark Ages）的思慮，直到天明將近，詩人期望「待時」振起。

## 第二節 海藏：隱逸的政治

### 一、悲世之怨

詩人將自己放逐於海上，卻較以往深陷於塵務之中。回首「同光體」的歷史語境，詩學萌生於政治氛圍濃烈的武漢幕府，而詩人的「政客」性格與「性情」主張又擴大了原有的規範，獨見高標。朱大可（1898—1979）評曰：「從來詩人作聖賢語，或作仙佛語，或作英雄語，或作才子語，能作宰相語，惟荊公一人而已。海藏少負濟世之志，高瞻遠矚，不可一世，晚丁國變，我謀不用，憤慨益勝，故其所作，時有經濟之談。」<sup>38</sup>大抵明白鄭孝胥如何在「不專宗盛唐」的學術氛圍裡找到與自己性格相應的對象。有趣的是，荊公獨到之「宰相語」、「山林氣」，相互矛盾的風格竟在鄭孝胥規劃的「海藏」行動裡有了意外的傳承。

凝視了「海藏」的意念，持續求索的是鄭孝胥內心不斷琢磨的想法如何化

<sup>35</sup> 龔鵬程以「晚清詩人之哀殘陽」概括詩作的普遍氛圍：「晚清詩，所謂閏時傷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見氏著：〈晚清詩話〉，頁 526。

<sup>36</sup> 陸機：〈辨亡論下〉，收入氏著；劉運好校注整理：《陸士衡文集校注》下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頁 1010-1028。

<sup>37</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637。

<sup>38</sup> 朱大可：〈海藏樓詩之研究〉，《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634-635。錄自《小說新報》第 8 卷第 1 至 6 期〈藝苑〉。

為具體的詩學實踐？眼光必然落在詩人於「海藏樓」所見之風景。鄭氏一生為政治奔忙，來蹤去跡也收穫了不少結果，逐次劃分的歷史階段恰有固定的寓居可以對應，予之命名，表明自己當下的堅苦卓絕，自有獨到之處。拔可詩曰：「由來懷抱不同俗，鷗榭濠堂猶夢寐。」夜宿「海藏樓」遙想鄭氏行跡，湖北盟鷗榭、南京濠堂，分別記憶了不同時期的政治情境，而不同凡響之「懷抱」乃唯一主導，「三宿之戀，情見乎詞矣」。<sup>39</sup>輾轉回到了海上，鄭孝胥立意實現「海藏」情志，聯繫著過去建立的名望，隱逸的聲明似乎相當徹底。夏敬觀（1875—1953）即言：「蘇堪自龍州還，終慈禧垂簾之日，遂不復出。於海上築海藏樓，有終焉之志。前此雖有海藏之名，而未嘗有樓也。」<sup>40</sup>明白鄭氏對時局的敏銳觀察，「故其在龍州之詩，多牢騷抑鬱之辭」，就此退隱江湖；陳懋鼎（1870—1940）詩曰：「此來不謁海藏樓，為恐京塵污一邱。喚得淞濱作人海，魚蝦擾擾信同流。」<sup>41</sup>表露了他人對「海藏」的看法，淞江濱外不沾市塵，隱去世故與自然同樂的暢然，相對地，不忍俗客的面目為之汙染，突出了「海藏」之高潔。於此，思量「散原分散海藏藏」的共識，「海藏」之「藏」隱然是一種獨立於塵外的境地。

接續日記（1897）的尾聲，鄭孝胥在〈海藏樓試筆〉預示了「海藏」的樣態，即便歷史座標尚未出現，心裡的高樓已然悄悄動了土。年初，鄭孝胥於詩中又分別召喚了兩個奇特的典型：張玄（生卒年不詳）與郗超（336—378）。詩曰：

河南張處虛，禮辟不可致。涼州軍將行，被褐忽一至。邊章乃小醜，豈足煩至計。中官久無道，海內鬱怨氣。來朝平樂觀，祖道空府寺。車騎握六師，出言誰敢異？鳴金召軍正，酒半一揮禪。以次誅有罪，餘黨悉拘繫。摧山迴日月，事若反掌易。天地可再造，忠正各在位。何為不出此，震懾頓失次。豎子狃常情，輕語固傷智。悠悠魯陽山，翩然從此逝。<sup>42</sup>

<sup>39</sup> 王揖唐：「海藏官寧鄂最久。在寧時起濠堂，地在絲俠營。水木明瑟，可眺鍾山。在鄂則於漢上起盟鷗榭，君口占詩云：『風從金口來，入我盟鷗榭。欲尋半日閒，臥看斜陽下。』賢者所至，動留勝蹟，要皆藉詩歌以傳。君自龍州罷鎮後，則就滬築海藏樓，即今之南洋路厲宅也。有〈戊申過絲俠營故居〉詩云：『此地沉吟夢幾場，最難消遣是斜陽。濠堂已逐荒烟散，卻認鍾山作故鄉。』又題〈吳鑑泉鑑園圖〉：『我去復來如燕子，濠堂無處尋巢痕。喜君久為此園主，收拾世事歸詩篇。豈知興亡一彈指。故國安在園空存。』三宿之戀，情見乎詞矣。」見氏著；張寅彭、李劍冰校點：《今傳是樓詩話·海藏在寧鄂滬三地所建之堂榭樓閣》，《民國詩話叢編》第3冊，頁318。大抵明白詩人在「海藏樓」以前寓居的歷史景象，定為視角，關乎鄭孝胥前半生之行跡，甚或晚期在天津之夜起庵、滿洲國之柳下居，值得日後的細膩討論。

<sup>40</sup> 同前註，夏敬觀著；張寅彭校點：《學山詩話》，頁65。

<sup>41</sup> 同前註，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陳徵宇〈雜詩〉多有故事》，頁309。

<sup>42</sup> 鄭孝胥：〈張玄〉，《海藏樓詩（增訂本）》，頁80-81。

事蹟落在《後漢書》，鄭孝胥幾乎剪裁了這段歷史，並投入關懷的視角。<sup>43</sup>重述張玄的言說，筆墨多敘寫了張溫（？—191）的將才，卻是「何為不出此，震懾頓失次」，未能容納勸言，先前的描摹轉化為鮮明的諷刺，突出了張玄之識見。<sup>44</sup>誠然，鄭孝胥此處雜揉了現實的惆悵怨懟，同樣得不到理想的回應。回顧去年之總結：「然世局變態，思之已熟，尚不為造化小兒所給，況今日斗筲乎。」鄭孝胥退隱之情發端於此，以為得志小人正是時局混亂的禍首。有意思的是，類似的情緒日漸積累，在同年日記（8月13日）裡記載與張之洞的對話，彷若再現了張玄與張溫的歷史情景：

南皮邀入談，在抱冰堂。余極論宜及時破蠲積習以作天下之志氣，因言：  
「舉世方共保護積弊，非變法之世也。今京師元黃顛沛，是非溷淆，觀朝  
中士夫皆不足有成；兩湖，天下之中，亟當養士、勸商、興工、勵吏，以  
待北方之變。」又勸俟伊藤博文來華，可薦為客卿。南皮甚震其論而不能  
用也。<sup>45</sup>

鄭孝胥的建言延續了對「今日斗筲」的質疑，「中官久無道，海內鬱怨氣」儼然將張玄「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sup>46</sup>的問句聯繫今日時局，斥責朝中士夫，務必「及時破蠲積習以作天下之志氣」。有趣的是，鄭孝胥引薦伊藤博文（1841—1909）的想法，隱含了政治運作的實現，甚是一次「負氣」的凝聚。日記（1898年2月20日）記曰：

今中國事急，我輩匹夫雖懷吾有熱腸，勢不得展，固也，有機會於此，日  
本方欲聯中國以自壯，如令孝胥游於日本，歲資以數千金，恣使交結豪酋  
及國中文人，不過年餘，當可傾動數萬人，下能輔中原之民會，上可助朝  
廷之交涉。脫諸戎肆毒於華夏，則借日人之力以鼓各省之氣。興中國，強  
亞洲，庶幾可為也。昔漢高與陳平金三萬斤使謀西楚，張魏公假園中老兵  
數十萬金使賈海外，嗚呼，今不復有斯人耶？<sup>47</sup>

曾任駐日本使館書記官的鄭孝胥有意彰顯自己的優勢，文字遙想著中國如何

<sup>43</sup> 朱大可：「是作即取史傳中語剪裁而成，不蔓不支，真宛陵也。（案宛陵詠史僅資弔古，海藏詠史兼寓諷時，〈張玄〉一首尤得言者無罪之妙，讀者不可不知也。）」見氏著：〈海藏樓詩之研究〉，頁634。又證鄭孝胥詩法不止於宋詩之模倣，文字見真情，詠出了當世之「感覺」與不同俗之懷抱。

<sup>44</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641-642；詩集改作〈張玄〉，《海藏樓詩（增訂本）》，頁80-81。

<sup>45</sup> 同前註，頁671。

<sup>46</sup> 范曄：《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收入楊嘉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2冊（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頁1244。

<sup>47</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644。

強盛於亞洲，既有傳統土人面臨「天下」觀轉化的過程，甚是自許引線者，展示了自我的雄心。而今，「南皮甚震其論而不能用也」，鄭孝胥無法在張之洞身上持續盼得伯樂之顯影。猶記張玄說道：「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鼓掌之上矣。」張溫不能用，只能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於是乎，「悠悠魯陽山，翩然從此逝」，「隱逸」成為了張玄預示前途又無能為力的姿態。「海藏」有意擷取張玄提供的歷史經驗，隱約映照了詩人當前的處境。然而，鄭孝胥對政治的嚮往似乎無法輕易接受自己無力參與時局變革的現實，立名「海藏」，依然尋覓得以完成願景的政治居所，心裡的高樓還有待時間淬鍊的凝土逐步構築。<sup>48</sup>

另一方面，郗超在《海藏樓詩》的出現其實說明了鄭孝胥的「海藏」始終冀求知音的出現：

丈夫儼然如繫囚，自斷猶堪歸隱邱。人間郗超不再得，縱有高隱誰復收？  
當時戴公剗中宅，精整乃與官舍侔。辦資百萬意奇絕，未用夷跖窮推求。  
咄哉傅約隱不果，慎勿輕詆渠非優。從來酸寒痼山水，焉取名節驕王侯。  
士人粗願衣食足，鬼神斬汝寧相酬。嘉賓可作吾可隱，買山豈畏譏巢由。

<sup>49</sup>

典出《世說新語·棲逸第十八》：「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郗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sup>50</sup>詩人則慨歎：「人間郗超不再得，縱有高隱誰復收？」誠然，詩作敘寫的對象非自我投影，而是納悶著今日識者已不復見。鄭孝胥夜深感懷郗超之事，開篇直言：「丈夫儼然如繫囚，自斷猶堪歸隱邱。」飽受時局殘害，不如歸去以保全其身。聯繫「海藏」之用心，鄭孝胥有意導正這一違經背古的亂世，未見時機，暫且隔絕於此。郗超贊助的事蹟彷若一次次直接而具體的肯定，足以消除那些感於不合時宜的自擾情緒。其次，傅約（生卒年不詳）「隱事差互」未能得到饋贈，鄭孝胥則表示「慎勿輕詆渠非優」，不將「隱逸」視為物質欲望的捷徑。歷史解釋自有其關懷所在，鄭孝胥的評論透露了自己的「隱逸」的想法：「從來酸寒痼山水，焉取名節驕王侯。士人粗願衣食足，鬼神斬汝寧相酬。」著意以「酸

<sup>48</sup> 張之洞不符合期待的決定甚或影響了交情，鄭孝胥總以自己的政治期望為依歸。張之淦：「張南皮實為識拔海藏資其展布之機紐，端午橋亦彌寵遇提攜之。張端之逝，海藏日記私密紀錄中，曾無傷悼之語，且於張有微辭。蓋以其時徵召任用案八員之中，南皮刪去海藏暨王先謙湯壽潛之名飲恨故也。」見氏著：〈讀鄭海藏詩〉，《遂園瑣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94。有意思的是，1909年的〈海藏樓雜詩〉裡有三首詩憶及張之洞，鄭孝胥其實用自己的方式表示悼念。

<sup>49</sup> 鄭孝胥：〈郗超〉，《海藏樓詩（增訂本）》，頁81。

<sup>50</sup> 劉義慶等編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上冊（臺北：正文書局，1999年），頁602。

「寒」、「粗願」暗示士人歸隱應有的期待視野，越是平息歸去的輿論，郗超為他們「辦資百萬」的心理乃卓然「意奇絕」。鄭孝胥等候知交之心理如是強烈，為「海藏」設下了相當廣闊的政治空間：「嘉賓可作吾可隱，買山豈畏譏巢由。」於此，張之淦（1935—2013）先生評曰：「要之為一詩人而縱橫之士耳！凡其進退趨避取與，殆概可以『市道』目之。」<sup>51</sup>面對「今中國事急，我輩匹夫雖懷濟世之具，勢不得展」的場景，詩人不與巢由為伍，「海藏」匯聚的政治能量不得已突破了「隱逸」的表象，從未切斷人間世的聯繫，理論背後猛然有不斷更新的政治能量。

為「海藏」試筆之後，鄭孝胥絲毫未有歸去的念頭，依然呢喃著自己遠大的政治理想。日記記載了時人對政見的回應，也極力爭取參與政事的機會，言談之間，尚有舍我其誰的「負氣」，以為旁人「皆畏事者也」。<sup>52</sup>甚者，鄭孝胥以擬真之夢境娓娓道出心裡的憤慨。日記（1898年9月6日）記曰：

夢與人論新進之朝士：「以蕩檢逾閑為才氣，以奔競招搖為作用。試之以事，則歛怨紛騰；假之以權，則營私狼藉。跡其心術，則借本朝之榮寵以為號召徒黨之資；按其學術，則襲西國之皮毛以開空疏剽竊之習。小人量淺，易致驕盈；躁進不已，必至覆餗。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因噎廢食，禍延賢者。此大局之患也。」

朝政如此，詩人召喚張玄與郗超的典型就有了適宜的土壤。「海藏」可能來自於鄭孝胥難以接受才識在體制內不合理的落差：「今有數學子，視綱常名教為迂闊，裂冠毀冕，悍然不顧，究其實際，毫無根柢，可笑人也。此曹不能成氣候，而興亂則有餘。君其待之，胥當不幸而言中矣。」<sup>53</sup>尚且，前日才有機會召入見上，心情格外激動：「皇帝破資格，不忽一士微。何來江南丞，是日登丹墀。」<sup>54</sup>無奈的是，詩作寫在9月17日的深夜，回味之餘也悄然深化了內心盼不得實位的虛空。<sup>55</sup>可以想見，「海藏」的動機指向政治，即使目標仍圍繞在仕途的期許，鄭孝胥的願景在蓋棺論定之前有著無限延展的空間：

<sup>51</sup> 張之淦：〈讀鄭海藏詩〉，頁94。

<sup>52</sup> 1898年的日記滿紙皆是詩人對政治的渴求，私密記下了他人的稱許：「公真能斷大事，當急呼爾立樞商之」（2月17日）；自我的爭取：「如仲魯欲興此局，吾有熱腸，可以助之。公為我一詢之可乎？」（2月20日）且執著於承擔政治重任，對上位者的才識不以為然，「負氣」之情溢於言表。（7月18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643、667。

<sup>53</sup> 同前註，頁677。

<sup>54</sup> 鄭孝胥：〈七月二十日召對紀恩〉，《海藏樓詩（增訂本）》，頁88。

<sup>55</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681。

明朝四十矣，老不足恨，恨夙心未展耳。惟願我皇上聖躬無恙，或尚有報稱之日也。<sup>56</sup>

這是「海藏」名號正式確立且奉行的年末紀事，鄭孝胥頭年竟以「夙心未展」之「恨」作為結束，「負氣」之行事遭遇了情感的挫折，發言為詩：「志業區區漫愴神，行年四十老相親。」未有實績的鄭孝胥可能一如往常地自我期許，聊以解嘲。無奈「梅亭松柏風吹醒，猶是中宵飲泣人」，先考妣墓所在的場景返照了現實與志業的差距，還原了真實無依的自己。

甚者，詩人以另一段同題文字召喚了「永恆的原型」表明情志：

留楚逋臣黯不言，入江漢水夜逾喧。<sup>57</sup>

時在漢口，詩人懷想的是「哀故都之日遠」的歌者。「士階層」自漢代以來具備明確的權力位階，鄭孝胥未有重任，無所用其材的悲怨為導引，在浩瀚之載籍發現了屈原（343 B.C.—278 B.C.）。徐復觀（1904—1982）先生以為〈離騷〉在漢代文學發生影響在於當時知識分子「以屈原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的『怨』，象徵著他們自身的『怨』」，其與大一統政治體系帶來的壓力感有密切關聯，「甚至也是了解兩漢以後的思想史的前提條件」。<sup>58</sup>誠然，鄭孝胥遙思屈原大致延續了既有的文學傳統，只是身分並非如論者引述的材料，盡在朝政中心「哀眾芳之蕪穢」。時代經驗不同，難得親近聖上的士人，關切的問題不是材能價值的貶降，而是理想實現與否的個人感懷。於此，有所共鳴的是「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的期許，身不由己的「悲世之怨」。<sup>59</sup>然而，鄭孝胥的距離保留了更多的想像空間，特別是在天崩地解的時刻，一切秩序漸趨凋零，權力體系的崩毀卻也預示了轉化的可能。恪守武漢幕府的鄭孝胥汲取「新政」的思想，佔有當前改革的優勢位置，自然有了更多的激情，甚或建設政治藍圖的可能。質言之，鄭孝胥發乎性情，在漢口的招魂直接感應了屈原，相似的世變情景、比配的自負情緒，將政教思想等同於自我價值的思量，因而承受了自感性執著而來的「怨」，對應了鄭孝胥「夙心未展」

<sup>56</sup> 同前註，頁 712。

<sup>57</sup> 鄭孝胥：〈除夕〉，《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92。自注：福州西門梅亭，先考妣墓在焉。

<sup>58</sup> 徐復觀：〈兩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兩漢思想史·卷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頁 284-292。

<sup>59</sup> 顏崑陽：「然則，由屈原所形塑的『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其感情經驗特質即是『忠怨』。」（頁 232）將徐氏的提法加以理論化，細緻闡釋了知識分子面對專制政治的境遇：「因此，在屈原而言，即是性情即是道德。其個人性情之挫折，也即是世間道德之失落，而『悲己』的終極意義乃在於『悲世』。」（頁 234）見氏著：〈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頁 232-236。

之「恨」。於是乎，從「留楚逋臣」到今日國家與土人之間的聯繫，鄭孝胥盼求「知遇」，卻又無法消散時間的推移，終於化為「負氣」積鬱於內的悲怨，詩曰：「琴因感遇聲終歇，士有傷春淚不收。堅約蹉跎更乘興，中年存歿試迴頭。」<sup>60</sup>；「朱顏棄我去，繁花為誰妍？春來當自惜，莫惜買花錢。」<sup>61</sup>屈原與琴臺，或是花期的等候，典故及意象的綿密堆疊映照了詩人理想的凋落，仍不失內心對於自己材能的肯定與期盼。詩有言志：「莫道一生無際遇，靈脩瘦損記風儀。」<sup>62</sup>「靈脩」取自〈離騷〉：「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詩人懷想過去親炙「聖躬似頗瘦弱。余對時音吐稍響」之病體，「謙悒異常」，彷若大任之交託。<sup>63</sup>聖上既有此意，原有之政治構築就不輕易崩毀，惟「待時」而已矣。<sup>64</sup>

## 二、輕世肆志之學

現實壓抑了鄭孝胥的「政客」性格，陣陣感慨化為「海藏」的動能，發憤以抒情，漢口瀰漫著悵然的格調：

人生三十為一世，失卻少年安可悔。朱顏銷盡四十來，昔日風情竟何在？  
功名自是誤人物，敗德喪真作吾害。不妨小待老堪憎，付與世間償宿債。

詩人注意著年數的增長，有了「行年四十老相親」、「中年存歿試迴頭」的寬解，卻見「平生江湖思，中年去住心。孤帆向空盡，暮靄帶山沉」<sup>65</sup>的迷茫。依照鄭孝胥的說法，四十歲即稱中年，道之以情盡是「中宵飲泣人」的聲調：「去日總如夢，浮生徒自勞。樓頭夜深客，閨坐聽江濤。」<sup>66</sup>；「廿年藍縷規

<sup>60</sup> 鄭孝胥：〈正月十六日梁星海約遊琴臺〉，《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93。又見〈遊漢陽古琴臺〉：「古臺在斯實微阜，牙琴久絕音已希。我來撫膺坐還慨，小憩聊敵疲與饑。」（頁 90）詩人的傷感始終牽連著政治的見與不見。

<sup>61</sup> 同前註，〈買花二首〉，頁 96。

<sup>62</sup> 同前註，〈漢口春盡日北望有懷〉，頁 98。

<sup>63</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675。

<sup>64</sup> 張淑香以自傳寫作的特徵觀察屈原在〈離騷〉展現的「內美」：「所以〈離騷〉開場詩人自述的這個自我的誕生，由族系、生辰、命名，充滿儀式性的神聖暗示，處處顯示自我不同尋凡的秉賦，也徵示了他與楚王同根同源的命運繫結。從此在此一獨特的身份認同之下，生命也必然朝向它既定的軌道前行，決定詩人自我存在的樣態與他對於世界的視野與反應，以至於他的命運。」見氏著：〈抒情自我的原型——屈原與〈離騷〉〉，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2001 年），頁 51。

<sup>65</sup> 鄭孝胥：〈江樓雜作〉，《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95。

<sup>66</sup> 同前註。

殊遠，一老經營事已艱。」<sup>67</sup>詩人定義新的階段，回顧了前三十年的經歷，殘酷現實顯然未若「負氣」盈滿時的政治想像。詩作看似懊悔過去執著於功名的自己，消耗了原有的真性。

然而，下半聯呈現詩人心之所向，正是對政治事業不悔的追逐：

平生心得祇乘興，百折千磨終不壞。文字緣深豈易拋，色塵意起殊難戒。  
江山滿前花競發，性不能飲亦已醉。向來不信說天公，後世知音應有採。

68

中年的到來固然有時間流失之驚覺，詩人知曉追逐功名終將頽唐如玉山之將崩，執意乘興而起，深沉其中。「性情」先至，鄭孝胥將文人流連不已之文字、色相與功名並舉，甚言：「江山滿前花競發，性不能飲亦已醉。」在政海競逐裡尋得浸淫衍溢的樂趣，緣於「功名」在他心裡並非凡俗之事，而是極為崇高的政治事業。於此，從鄭孝胥對孩兒之期許可以見到詩人理想的自己與不足：

「男兒胸中寬，要作萬人豪。敬賢閔不肖，愛物隨所遭。寡欲自超然，富貴真鴻毛。汝父學孟軻，救時心徒勞。疇能繼我志，所願在爾曹。」<sup>69</sup>體悟了欲望與榮利的奢求不能成就自我，鄭孝胥上承孟子（372 B.C.—289 B.C.）的思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在動盪時代發乎不得已之鏘鳴。而今，鄭孝胥不為功名之虛幻所累，內心的悲怨實則來自政治現實與「政客」性格之違背，「負氣」於亂世不得其解，終歸徒勞而已。於此，「向來不信說天公，後世知音應有採」，體制的壓力感難以排遣，負氣的生成又源源不絕，時命如是，天公不聽，衝突就有待「知音」的消解。綜言之，詩作大抵顯露了鄭孝胥分隔功名的態度，政治上的追求乃「性情」之驅力。這似乎是傳統知識分子衡量平生功業的共同指標，聯繫法國漢學家于連（François Jullien, 1951—）省思歐洲宗教與政權關係時，如此描述中國的政治文化：「因為，在中國人們從來沒有設定獨斷的真理……還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參考因素能與政治因素相對衡，因為任何其他價值規則都沒有超越社會規則，政治世界成為全部境域……」<sup>70</sup>鄭孝胥辛勤奔波於士人價值的建立，甚而視為成就自我的志業。於是乎，「平生心得祇乘興」之「興」即是政治心態的躍動，順勢發生，「海藏」可以理解為一種召喚「知音」的策略。

觀察 1898 年日記吐露的心聲與歷史典型的疊合，鄭孝胥並未從「海藏」

<sup>67</sup> 同前註，〈八月六日攜炳垂二子登晴川閣〉，頁 99。

<sup>68</sup> 同前註，〈三月十二日作〉，頁 97-98。

<sup>69</sup> 同前註，〈示女景兒垂二首〉，頁 97。

<sup>70</sup> 弗朗索瓦·于連（François Jullien）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135。

之名決然退隱，持續留意政治參與的可能。其實在 1905 年「海藏樓」實體建築出現以前，鄭孝胥仍有明確的階層位置可以發揮才能。時居武漢幕府，嘆曰：「自至漢口，未嘗出遊，終日室中，過閑反疲。如檻猿籠鶴，唯以作字遣悶。」（1898 年 12 月 11 日）<sup>71</sup>縱有位階，內心仍有難以消散的抑鬱心緒，彷若困滯其中。在〈庚子日記〉尾聲亦有感懷：「余不喜武漢，久居頗鬱鬱。五六月間路工僅第一段未停。廣雅數有諮詢之務，夜談或至日高乃出。既使與聞營務，又令監操武建軍，累言以兵事相屬。余固辭之，恐久羈難脫也。」（1900 年 2 月 18 日）<sup>72</sup>可以想見，自「過閑反疲」至「數有諮詢之務」，閒暇與奔忙的日程皆不能調解鄭孝胥內心之悵然，無事常有於「偷生世界」<sup>73</sup>立待覆亡的生存憂慮，而瑣細的政務反覆抑止了「負氣」構成的浩然願景，積聚其中，才有羈遲不前的感受。同樣地，即使在龍州屯駐三年（1903—1905），屢建奇功，贏得「鄭龍州」美名，依然嘆息不已：「丈夫行藏不自主，坐使兒女悲別離。心知世事決難挽，拂衣當去何遲遲。」<sup>74</sup>由鄉愁興動的歸去之思，進退之間思量的還是自我於朝政的定位，今日政務終是徒勞，隱隱然體會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感覺。因而「終年無好懷抱，安得不老。」（1905 年 2 月 3 日）<sup>75</sup>似乎邊防的軍事成就也不符合鄭孝胥的内心志業。於此，「行歌具區藪，歸隱海藏樓」<sup>76</sup>，鄭孝胥決意告別龍州，儼然是將期望設想在既有階層身分之上，「海藏」名號的鑄造懷有鴻鵠之志，不止於一般仕途預想的遠方。日記（1905 年 2 月 5 日）記曰：

吾今年四十六，得棄官歸田，便可作一生收束，列傳、行狀皆可預作。從此以後，若中國迄無振興之日，則終老山林，不失為潔身去亂之士；倘竟

<sup>7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700。

<sup>72</sup> 同前註，頁 784。

<sup>73</sup> 同前註，頁 683。記曰：「閱上諭，言路復塞，罷官報，復通政使、詹事府等各衙門。又上諭：張蔭桓非康黨，著暫行看管。徐致靖等著軍機、刑部會審。餘為康所搖惑者，概不深究。哀嘆曰，從此又是偷生世界，亡可立待也。」（1898 年 9 月 26 日）詩人準確地捕捉了世變當前的時代氣氛。

<sup>74</sup> 鄭孝胥：〈子嗟〉，《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148。記曰：「日內未得滙電，頗懷憂疑……晨起，巡行房闈，立園中東廊下，望雲自西北起，排山倒海，如萬疊波濤，有鷹盤旋雲際，注目久之，曰，吾欲化鷹遠逝，不願返顧人世也。」（1905 年 6 月 2 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995-996。

<sup>75</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974。鄭孝胥龍州詩敘寫的「老」（字詞、狀態）大抵與「終年無好懷抱，安得不老」的慨嘆對應。且看「宿業堆山落極邊，風懷逝水送中年」（〈龍州歲暮〉）、「駐顏却老竟無方，被髮纓冠亦太狂」（〈世已亂身將老長歌當哭莫知我哀〉）、「才因老盡更誰知，祇借花枝寄所思」（〈顛齋海棠〉）、「三載邊愁元自老，一場春夢又須醒」（〈家人行後偶作破悶〉）、「老我無文身可隱，看君《旁記》日流傳」（〈答孟蘊孫見贈二詩〉）、「解兵如息陰，去官即飛舉。歸山養須髯，猿公是吾侶。」（〈偶作〉）等詩作。見《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146-149。

<sup>76</sup> 鄭孝胥：〈題孟蘊孫新著廣西邊事旁記〉，《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148。

有豪傑再起，必將求我。雖埋頭十年，至五十六歲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是吾以一世之人作兩世之事，豈不綽然有餘哉！<sup>77</sup>

以新年之戲語聯繫鄭氏歸返海上的決定，「海藏」蘊含的處世哲學容納了詩人強大的政治意識。「終老山林」的坦然說明了前半生建立的功業值得歷史的銘記，列傳、行狀已有足夠鋪寫的內容。這些功業絲毫不及鄭氏心裡凝鍊的奇想，依然等待「初日方升，照耀一世」的機會。然而，在得意非凡的事蹟之外，唯有「天下大事」可以真正照進理想深處，終將「負氣」凝華為獨到的「政治」事業。有情如是，告別只為了延續不朽的懷抱，鄭孝胥不惜抵抗時間的等候以張揚自我的執著：

士人坐為仕宦牽，出疆載質可笑人。畢生號呼冒憂患，苦用志業戕天真。  
十年養氣如磨劍，正欲一斬世事纏。玉人雕斲豈受教，服膺孟氏在此言。

78

將功業彪炳的龍州三年歸結於對朝廷政策的遷就，材能不為世用，「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sup>79</sup>？然而，詩人感於「如何一片功名興，不及江湖在眼前」<sup>80</sup>，即使邊防督辦非性情所為，仍有顯赫之軍事成就，甚能看出鄭氏精心積聚之「負氣」。詩人志不在此，多少立業只是「苦用志業戕天真」，與性格違背之政務，必然損耗了身心，終於離去了不屬於他的政治場景。由此看來，詩人「歸隱海藏樓」乃放心於工夫的實踐，甚是一項不得已的抉擇，只為成全自我凝聚之情志，必然有所作為，冀求階段性的轉向。於是乎，鄭孝胥記曰：「余四十六歲稱疾致仕，去家十六年，乃歸展墓，平生輕世肆志之學，至此施行。」

（1906年1月24日）<sup>81</sup>將前半生修為誇示以「輕世肆志之學」，有意區隔「去家十六年」的致仕時期，自覺政務的規矩已然限制了他的材能。鄭孝胥的離去有意為政治生命劃下一個段落，而「海藏樓」至此處在一個中介位置，鄭孝胥卸下了原有的外衣，通過「海藏」的儀式狀態，迴向性情，真正實踐「為己之學」。緣此，「海藏」理論內部保留相當複雜的情緒，政治現實卻迫使詩人游移在「隱逸」與「政治」之間，始終盼不到「豪傑再起」的時刻。鄭孝胥「必

<sup>77</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975。

<sup>78</sup> 鄭孝胥：〈懷歸篇〉，《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51。

<sup>79</sup> 典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見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1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979年中華書局影印阮元刻本），頁54。誠然，「孟子」甚是鄭孝胥思想的重要典型，其後發明的「夜起」、「王道」等一系列自我技術有密切的關聯，有待後續專文討論。

<sup>80</sup> 鄭孝胥：〈龍州歲暮〉，《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46。

<sup>8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1025。

然求我」的氣勢堅如磐石，立意擋下俗務，情志卻又擋淺於世，於是乎，「海藏」的背後潛在不得知音的慨歎，而「海藏樓」佇立似乎只是證實了詩人無止盡的等待。

依照文明的進程，朝廷付出了庚子拳亂（1900）的慘淡代價，決議「仿行憲政」，又一次重整旗鼓的改革運動。誠然，民國史製作的立憲運動（1906）自有保守與虛妄的標籤，鄭孝胥對此倒是有了嶄新的期望。同年9月16日，鄭孝胥應報館公會之請，至張園演說「預備立憲」，開場即言：「今日我等所處之地位與七月十三日以前已如隔世。真堪為中國賀，為諸公賀。」<sup>82</sup>鄭氏似乎有意將清廷規劃的「立憲運動」視為政治事業的真正開端。與張謇（1853—1926）、湯壽潛（1856—1917）在上海組成公會，定名為「預備」，諭旨明示：「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而政策的推行仍有待時間的調節：「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塗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職是，成效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奉行之憲法思想必須深入社會各層面，「以豫儲立憲國民之資格」。<sup>83</sup>鄭孝胥的演說亦提及：

然則此等人民誰為培養？誰為造就？若專候國家所辦教育發達以後，恐世變不能相待。區區之意，甚望我社會中自為培養、自為造就，務使此等人民於十年之內風氣漸成、資格漸深，庶令今日空言之立憲一變而為實行之立憲。<sup>84</sup>

內容詳論如何以學會的創設與報紙的宣傳達成國民素質的提升，大致延續了過去上海「憲政研究會」的宗旨，以籌備立憲事宜為中心工作。「預備立憲公會」乃當時立憲團體之領導，地位樞要。鄭孝胥的會長位置在1906年12月16日確立，歷時三屆，連選連任。其後，鑑於「凡團體職員如教育會、商會等會長，無有過於三次者」，決計辭職。<sup>85</sup>於此，大抵明白鄭氏在其中的參與程度，而憲政風氣養成的十年計畫，恰好對應了鄭氏「埋頭十年」的宣言日期，內心無不遙想「立憲運動」完成以後，得意出任「天下大事」的光景。日記（1907年2月12日）記曰：

<sup>82</sup> 〈鄭蘇庵京卿演說稿代論〉，《申報》（微縮資料）（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上海圖書館攝製），1906年9月16日。

<sup>83</sup> 〈宣示預備立憲先行釐定官制諭〉，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1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頁44。又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1055。

<sup>84</sup> 〈鄭蘇庵京卿演說稿代論〉

<sup>85</sup>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頁365-370

一生最奇之境莫如今年，吾之待己與待世者，皆開從古未有之新意。為特立獨行乎？為隨波逐流乎？曰，皆有之。<sup>86</sup>

料想不到，「待己」與「待世」在「歸隱海藏樓」的第一年就有所突破，「從古未有之新意」標示著鄭孝胥過去不曾經歷的感受，理想仿若指日可待。朝廷難得構想的「立憲運動」，在他心裡確實相信了轉折的可能。「待己」暗示了詩人依於「終年無好懷抱」離開龍州的抉擇，也是「海藏」行動一次收穫的成果，為「政治」的理想決定「隱逸」，卻又因為「隱逸」的決定更接近了理想的「政治」。至於「待世」，遙想鄭孝胥設想「海藏」的初衷：「然世局變態，思之已熟，尚不為造化小兒所給，況今日斗筲乎。」自己的思慮已然超越了政局固有的期待，只能退居幕後，等待將來世道的變化能與其接軌。如今，鄭孝胥見證了朝政的立憲計畫，決意參與其中亦不時自省：「為特立獨行乎？為隨波逐流乎？曰，皆有之。」鄭孝胥由「避地待時」轉向了對政策的認同，倒也不是棄守了原來的信念，「隨波逐流」並非同流合汙，其間「特立獨行」發揮於改革運動的主導意識，甚或思想原則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立憲運動的發生來得突然且前所未見，鄭氏有著相當高的期待，至於放棄了世俗嚮往的尋常道路，一次是安徽省的按察使，一次是廣東省的按察使，發言為詩：

棄官寧不遇，厭世始猖狂。欲老真甘死，難行却善藏。累心情略盡，用短巧何妨。此意將誰語，凭闌送夕陽。<sup>87</sup>

「棄官」即主流的分路，並非決然與世隔絕，倒是一種在「偷生世界」的存在方式。<sup>88</sup>而「厭世」表現了背道而馳的想法，或許一切的背反才能體現詩人以為的正道，調整了獨醒者的姿態，或是猖狂，或是海藏，丟棄原來是真正把握了自己的意念。想來，鄭孝胥的政治遠景在方法上必然有所歧出，立憲運動的萌發值得他細心冒險。於是乎，鄭孝胥改以「預備」的姿態跨入世道，為憲法原理及國民性的養成付出心力：

不問何人，但能稍得人心者，舉世之人即已傾心歸往，頌之曰聖，尊之曰天。所以歷世上英雄豪傑乘時得志者大抵看透此種人民之身份，利用其飢

<sup>86</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1076。

<sup>87</sup> 鄭孝胥：〈棄官〉，《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68。

<sup>88</sup> 「棄官」以「存在方式」稱之，旨在強調鄭孝胥對「偷生世界」的一種回應，無論介入的姿態為何，終將回歸政治現實，致力於朝政的改革，到底不脫傳統知識分子的宿命。且看1909年鄭孝胥哀悼光緒皇帝之嘵血詩：「龍飛三十四年春，識主何曾見一臣。持論遂令人掩耳，棄官誰信我忘身……」（〈高樓僑居歇浦戊申小春適鼎湖耗至海上訛言騰沸出門悵惆中信步至張園夕陽黯淡風葉翻飛車馬亦已闌珊逡巡間於塵轍中拾得殘紙書啼血三首字跡欹斜語意詭痛蓋攀髯墮弓小臣之辭也〉）以迂迴的方式進入了政治場域。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之手段，一面解其倒懸，一面制其死命。遂使全國人民皆為一人之私產，與牛馬奴隸無異。此等種因成果，皆由於千百年億萬之習慣，實無一人獨任其者。究其緣由，因無學問故無知識；因無知識故無預備。因此醞釀鍛煉以成今日中國人民一種之特質。此種特質有一最醜之名目，名曰苟安偷活四字。<sup>89</sup>

鄭氏回顧了過去家天下制度規定的國民性，可以看出其對立憲運動的支持隱然有所根源。此一國民性的改良論述與魯迅（1881—1936）、梁啟超（1873—1929）有些區別，鄭孝胥舊時代的道路走得澈底，肯定「乘時得志者」能夠把握人民的心態，威權的確立來自於他們的「苟安」臣服。今日盼求「國民性」之轉化，即以為此乃動搖制度之關鍵：「試問此數千年來苟安偷活之人民習慣性成，何所用其預備？」於此，立意以深化學問與知識為中國前所未有的「預備」，更新國民以符合將來推行之立憲。有意思的是，鄭孝胥申明了制度與國民之間的互動關係，言談間，內政外交與工商實業的革新皆是為了創建新興體制所需要的環境。如是宏大的建設，鄭孝胥承擔的正是不同以往的政務工作，其與朝政共鳴的信念讓他放心「隨波逐流」，內心悄悄執行著「特立獨行」的政治事業，負氣有言：「竊謂今日時局，外憂內患乘機並發，必有旋乾坤之舉，使舉國之人，心思耳目皆受攝以歸於一途，則憂患可以潛弭，富強可以徐圖。」（1908年6月27日）<sup>90</sup>於此，立憲運動的難能可貴，竟是解決當前政局的唯一路徑。此時的鄭孝胥隱而未見的是，鄭氏眼光投射於十年之後，直到「國民性」的製作逐漸完善，因而「所以歷世上英雄豪傑乘時得志者大抵看透此種人民之身份」，完成且把握了當下的政治情境，詩人在「海藏」行動裡凝聚的「避地待時之志」就有了實現的契機。

### 第三節 海藏樓：過渡儀式

#### 一、厭世

歷史的「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相當困難，明白鄭孝胥有意在「立憲運動」開展自己的政治事業，研究者已然預想了他將面臨失敗的收場。緣於近在眼前的是一場鄭孝胥難以想像的浩劫，為終結王朝體制排山倒海而來——

<sup>89</sup> 《申報》，1906年12月18日。

<sup>90</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1147。

—「辛亥革命」（1911）。「事件發展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是相反的，值得求索的是，鄭孝胥的「政治」開端如何回應革命的浪潮？一以貫之的「負氣」性格又如何自我合理化革命的震盪？前文且以「立憲運動」作為個人歷史的定點，主要透過鄭孝胥形塑的「海藏」意念，放置於武漢幕府至龍州三年的事件脈絡，探照其蘊含的政治詩學。換言之，陳述歷史行動者仕途升降的同時，仍要歸返作品本身，明白當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情感細節。

日記（1907年2月25日）記曰：

謀國之思慮須如時文家作小題之決：截上截下，必須認明來脈，眼光四照，然後手寫題中，而來脈之線索處處警策。今之言變法自強者，只是做爛墨卷，填腔調、堆字眼而已，於題理、題神毫無關涉，何益之有……<sup>91</sup>

想來，政治之於鄭孝胥，猶如文章一般得心應手。在他的理解裡，以「時文」暗示了中國匯流「現代」（modern）的過程，指出先前模倣、填充的姿勢過於僵硬，必須在既定的套式注入新意，尤其是思想的全面觀照。巧妙設喻，隱然申明了自己的決策暢行無阻，畢竟過去仕途已有成功的實例，然而，鄭孝胥在「預備立憲公會」並未稱心如意，若將此視為政治事業的開端，似乎無法完滿符合他的「負氣」。1907年3月3日，鄭氏「遂至立憲公會，到者才二十七人」，慨曰：「預備立憲公會者，非徒上應明詔，蓋將以轉移風氣耳。今日立憲之焰已熄，而吾黨亦將渙散；然則回思去歲開會之舉，殆為揣摩風氣，非欲轉移風氣也！」<sup>92</sup>公會實際的運作不如預期，「轉移風氣」的目標是不安於當前的景況，沒有改革的決心，只是淪為貧瘠時代的一項複製品。動員的困難也說明了他人並未如鄭孝胥這般重視立憲公會，不辭勞苦，將之視為個人志業的起始，一如電文的結尾敬詞：「當世雄傑，或聽斯言。不勝憂憤，伏祈鑒察。」（1908年7月10日）<sup>93</sup>最終，鄭氏依然是「獨醒」之人。

其次，既然決定在混亂的晚清政局裡有所作為，必然在改革的過程裡遭受質疑：「《時報》、《中外日報》因謗余借賑之議，大相攻擊，高嘯桐致書使余解之，乃作函與汪頌谷、狄楚青曰……」（1907年4月2日）<sup>94</sup>時人眾說紛紜，鄭孝胥甚言：「孝胥雖被眾舉，實不得已，非有所利於會長也。若謂會長以一人之意思強制全會之行為，則孝胥既聞此言，理合引退。」（1907年9月17日）<sup>95</sup>料想不到，阻礙著鄭氏開啟政治事業的還是「今日斗筲」。另一方面，

<sup>91</sup> 同前註，頁1078。

<sup>92</sup> 同前註，頁1079。

<sup>93</sup> 同前註，頁1149。

<sup>94</sup> 同前註，頁1083。

<sup>95</sup> 同前註，頁1108。

《新聞報》有〈憚毓鼎排擊清流〉一文記憚氏密折：「近日革命排滿之風潮，創於文人學士，而少年無識者群起而附和之。以致邪說深中於人心，為國家之巨患者，皆張謇、鄭孝胥等倡為學說有以階之厲也。」（1907年9月13日）<sup>96</sup>只是對鄭孝胥來說，種族問題顯然不是當務之急。無奈的是，私人與官方的責難相繼而來，詩亦言志：

一生走仁義，自謂性所有。未甘師古人，況逐筭與斗。戊庚逮今茲，躁進互擊掊。謬興種族論，國事迫解紐。惟予倡羣學，蕩蕩闢天牖。滔天幾漂山，終欲關其口。彼曹身倏滅，誣我冀不朽。甚黠亦可憐，笑罵顏孔厚。  
諸公工罔上，撫衷果安否？名德既不昌，彥回豈為壽！<sup>97</sup>

鄭孝胥發乎「性情」的「為己之學」貫徹於實際的政治行動。既然以積極入世取代了「避地待時」的「海藏」，或以為時機已然到來，詩人的復出意味著將經歷政局的不安，以及遭遇且周旋那些尚未隨時間湮滅的斗筭之人。鄭氏相當執著自己提倡的理念，化為真實政策依然堅定不已。「羣學」標示改革旨在滋長憲政風氣，範圍遍及社會群體，彼此皆是受益的對象。然而，「彼曹身倏滅，誣我冀不朽」，不解他們竟將如此良策誣陷為自身利益的奪取，褚彥回（435—482）典故的出現有意分別了他人的譏評與自己的無欲。誠然，詩人的文字維持一貫之的「負氣」，從「未甘師古人」至「笑罵顏孔厚」，率由「性情」出發，對「自我」的重視極為強烈：「一生走仁義，自謂性所有。」其儒家思想也經過了內部轉化，凝鍊一套自我的技術，「何當擲筆睨天際，胸無古人任自為」<sup>98</sup>，前篇引述的東坡典型亦是如此，內心常有如何超越的構思。於此，鄭孝胥對他人的貶斥不以為然，彷若質疑了孔顏一脈訴求平天下的理想，違背了體行的正道。

儘管鄭孝胥有強大的心理可以面對政治的得失，總有慨然長歎的時候：「獨往將安歸，釣名終不實。何如潛亭人，意中輕得失。」<sup>99</sup>；「彼曹能厭世，我乃未忘情。身外留文字，人間說姓名……」<sup>100</sup>隱約省思了自己的政治抉擇，似乎誤判了時機。日記記載了1907年的歷程：「老態已成，殊無生趣。厭世之意甚堅，棄官其餘事耳。恨無知者，可與深言，嗟夫！」<sup>101</sup>逐漸認清自己的決定只是情感的衝動，不免有歸去的想望。此刻的「厭世」與「性情」對立，

<sup>96</sup> 同前註，頁1107。

<sup>97</sup> 鄭孝胥：〈書日報後〉，《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71。

<sup>98</sup> 同前註，〈弢庵屬題董元宰書跡卷子〉，頁181。

<sup>99</sup> 同前註，〈弢樓屬題濟南十二圖〉，頁171。

<sup>100</sup> 同前註，〈又題金陵三羽士錄〉。

<sup>10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1126。

隱含塵寰出入的差別。詩亦有言：

殘歲每添懷抱惡，北風弄雪晚冥冥。捐書未必遂聞道，厭世何為空養形。  
歌哭聖狂喧海市，酣嬉醉夢祕雪屏。人間正有沉迷樂，莫信靈均說獨醒。

102

「懷抱」聯繫著「負氣」，政治事實無法比配於此，詩人常於心裡滋長相當沉重的懊悔，盡在回顧時發酵。詩作下半聯頽然將自我放逐於虛幻天地，以「人間正有沉迷樂，莫信靈均說獨醒」作結，直接地推翻了政治的信念。有意思的是，關聯詩人的「負氣」，這段文字便成了深刻的反諷，且看「捐書未必遂聞道，厭世何為空養形」，涵蓄已久的意欲如何真正歸去，顯然違背了內心的政治理想。全然棄絕聖智，未如莊子一般親近道理。況且，「十年養氣如磨劍，正欲一斬世事纏」，詩人為此準備許久，自然無法徹底「厭世」，儼然背離了自我。如此說來，詩作裡的「靈均」（屈原）又是鄭孝胥一次悲怨的不平則鳴，直到世人沉迷於「偷生世界」，獨醒者無助地說服了自己的主張，乘桴浮於海。

真正澆滅鄭孝胥熱情的終究還是清廷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頒布的〈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會奏憲法大綱暨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逐年籌備事宜摺〉，與「預備立憲公會」訴開國會的殷切期盼不同，甚或「對國民的輕舉妄動，頗不以為然」。<sup>103</sup>同樣地，鄭氏絲毫不能理解朝政的強勢態度：「舉國譁然，皆以朝廷為行詐，誠不知朝廷何以自明。內以激海內之不平，外以貽列國之笑柄。」（1908年7月26日）<sup>104</sup>無奈官方作風如此，鄭孝胥無言以對，内心再度有了「海藏」的思量：

吾儕各垂老，薑桂性愈辣。固知不可口，安得變甘滑。無言人已憎，何苦更強聒。此行君勿悔，惜玉寧避別。苟求心所安，得失等毫末。暫遊塵土中，益覺江海豁。天寒病初起，養氣幸勿忽。<sup>105</sup>

懷想高鳳歧（1858—1909）的經歷，詩人感同身受，不得知音的憂患存在許久，又一次化為「政治」的挫折。<sup>106</sup>鄭孝胥贈詩的第二首聯繫了彼此，以「薑」為

<sup>102</sup> 鄭孝胥：〈殘歲〉，《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75。

<sup>103</sup>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385。同時頒布之〈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論〉申明：「凡我臣民皆應淬厲精神，贊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會名義，藉端搆煽，或躁妄生事，紊亂秩序，朝廷惟有執法懲儆，斷不能任其妨害治安。」並有〈重申仍以宣統八年為限實行憲政諭〉的擬定，足見朝廷的堅定立場。見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頁54-69。

<sup>104</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1152。

<sup>105</sup> 鄭孝胥：〈贈高獻（嘯）桐〉，《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82。

<sup>106</sup> 高鳳歧功名在榜，然性格耿直，不為世用。林紓〈祭高梧州文〉：「廷試上上名，居王前，忌者譁起，咸不謂然，靳君入臺。君早知旨，吐發蕭閒，不置臧否……」見氏

喻，不改其志乃是臻至「性情」的表現，只有適應與否的問題，並未有隨時變化的可能。勸勉高氏看淡官場的得失，也不是一無所求，而是分明「政治」的層次，把握積聚一生的內在視景。有志者但求盡心，同時保全其身，「暫遊塵土中，益覺江海豁」，間隔的距離值得養精蓄銳，歸隱甚是一項發乎於情的政治選擇。退開一步回歸立定的初衷，鄭孝胥的「海藏」思維於焉顯現。

時過半百，亦是宣統元年（1909），是年始留鬚，而立憲運動之於鄭孝胥似乎不再具有關乎政治理想的意義，又一次調適了與現實間的差距，詩有回顧：

回思兵間日，身手絕精悍。乞歸三載中，花落雲雨散。當時若有斬，用意乃至淺。少年既坐誤，短景何足算。青山對滄浪，世態凡幾變。<sup>107</sup>

即便有所失意，鄭氏必須再次申明：龍州三年的成就固然風采，告別尚不足惜，始終相信自我的才性遠不止於此。然而，詩人承認了頓挫，保留過程的啟示，願意找尋另一個歷史節點，以「海藏」回應著一生積聚的「負氣」。同樣地，鄭孝胥的髭鬚彷若劃出了半生前後，「漢廷方用少，我意難詭遇。唯堪助苦吟，撲斷亦風趣」<sup>108</sup>，從鄭氏風趣的和詩大致明白新一年的期許，政治心緒暫不為時局所知。

相較於幾年前為立憲運動奔忙的激動情緒，政治還原為政務，鄭孝胥又一次私密地開啟了「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的等候，持續盼望符合懷抱的政治開端。此時並沒有深刻的政治作為，體現了熟悉的「海藏」工夫，叮噹作響的是「海藏樓」主人的不平之鳴。日記（1909年3月18日）記曰：

凡人胸有建功立名、安民濟世之志者，此如小兒帶有胎毒，將發天花，輕則傷面目，重則喪性命，惟有輕世肆志之學足以救之：此如西法種痘者，預收其毒，使不得發。吾已種痘，當可免矣。

鄭孝胥重申了「輕世肆志之學」，並視為面對官場的唯一回應方式，已然建構了一套自我技藝，設「西法種痘」之喻，政治心態的調適成為一種實踐哲學。這也是前半生的體悟，積蓄了一次又一次的「海藏」經驗，可以想見，鄭氏時有功名，卻以「避地待時」的作為放逐海上，豢養著「負氣」，延遲了心頭不能承受之輕。只因為滿目的「政治」願景引領向前，厚積而薄發，熬磨等候歷史的啟示。同日又言：

---

<sup>107</sup> 著：《畏廬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75冊，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頁602。（標點自注）鄭孝胥的輓詩也重申了存在於彼此身上相似的感受：「聞君憤慨傷時語，病骨全銷氣未銷。熱血一腔無地灑，英魂九死待誰招？」見氏著：〈輓高嘯桐〉，《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84。

<sup>108</sup> 鄭孝胥：〈留鬚〉，《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83。

<sup>108</sup> 同前註，〈幾道見和留鬚詩易韻答之〉，頁183-184。

生於今世紀而為亞洲人，宜通曉今世亞洲關於地球列國之趨勢，使我開通亞洲，只擇其大者急者扼要下手，則各國歷年所侵入亞洲，其經營之力皆不啻為我效力而已。<sup>109</sup>

將「海藏」期間的「負氣」發端於文字，可能經歷了立憲期待的落空，以及見證了列國勢力的日益壯大，這段時期的「海藏樓」常有變徵之音。甚且，不得知音的鄭孝胥，日記裡不時有了籌算政局的狂想，詩作亦如是：

狂癡不省生有涯，俯仰五十良可哀。一生到此小結束，置我何等猶疑猜。  
讀盡舊史不稱意，意有新世容吾儕。自憐伎倆止於此，聊借結習藏形骸……

<sup>110</sup>

縱有「是吾以一世之人作兩世之事」的「負氣」，時間仍然是「海藏」之大敵。鄭氏精明地算計年歲，多麼宏大的願景也禁不起無止盡的等候，內心總有動搖之時，茫然不知自我存在的位置。於是將文字組合詩人以為的未來，如何周旋於列國之間，留下了輝煌的史傳。然而，致力於建構也不能忘卻時間的流逝，必然遭遇絕望的反撲，意在言外，歸至「負氣」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失衡。

類似的心緒在這段時間一再翻起，篇篇凝重的自白也塑造了「海藏樓」的氛圍。陳三立詩曰：「士生恣所為，碌碌尸其用。此意跨宇宙，偶博知者痛。」大致敘寫了士人共同的悲怨，而「太夷齊隱見，身手併鑿空。歷塊睨都邑，轡勒自製控。割烹誠細事，莫發明王夢。齟齬千載胸，寧問吾從眾。」相當肯定鄭孝胥以「海藏」的方式回應了普遍命題，不願屈就現實的姿態使得「海藏樓」巍巍矗立於海上：

挂口海藏樓，突兀見高棟。花樹佔甌脫，風雨有帡幪。蛟螭不敢前，燕雀不敢共。宵吟蕩不還，微為魑魅重。吐景萬象過，杯外供一闋。我來欲與言，虧成恐聚訟。<sup>111</sup>

「甌脫」與「帡幪」屬於邊地的造景，彷若詩人匿居「海藏樓」仍然保持著戒慎的態度，蓄勢待發，不禁想起了鄭氏在龍州的偉業，積聚的不平之鳴勃然嚇阻了斗筲之人，「海藏樓」恍惚成為詩人表明「性情」的象徵——「輕世肆志之學」的修行場域。又，可能出於玩笑，陳氏提及鄭氏屏隱「海藏樓」的形象有些神秘，其觀察之微妙，陳衍同年之詩也有相似的描摹：

<sup>109</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181。

<sup>110</sup> 鄭孝胥：〈哀五十詩〉，《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86。

<sup>111</sup> 陳三立：〈寄題太夷海藏樓〉，《散原精舍詩續集·卷上》，收入氏著；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增訂本）》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77。

問君獨居意，魂魄析繚繞。有魄樓蠹蠹，有魂詩裊裊。身處魂魄間，暫與周旋了。<sup>112</sup>

詩注言「君眷屬不住樓中」，「獨居」的選擇隱然與世間有所對抗。鄭孝胥巧妙拆解出「魂」與「魄」，暗示了「海藏樓」與「海藏樓詩」乃當前之精神依存。思量「海藏」的用心，「獨居」即是在「偷生世界」的一種「獨醒」姿態，心緒與絮語在樓間不斷迂迴纏繞，「暫與周旋了」既是未有話語權的無奈，靜待時間的距離來自「意有新世容吾儕」的期盼。這是「海藏」的一貫作風，詩人在樓居與文字之間省思著政治的前途，陳衍明白他的決心：「嗟我乏靈藥，奔月妻忽杳。百尺棄不居，碧海沈沈曉。羨君學劉徹，脫屣志何慄」，為内心腫大的政治理想情願割捨一切且潛形於此，想來「海藏」的工夫乃精神上的凝鍊，故君子慎其獨也。

然而，陳三立的形容還帶有些許鬼趣，其實在不久的將來，鄭孝胥的確被迫沉浸於這樣的氛圍，且從「宵吟蕩不還，微為魑魅重」的夜半相處到「盍作已死觀，稍憐鬼趣美」的自我化身，「寂寞非寂寞，煎愁成沸湯」，彷若所有的政治理想轉瞬灰飛煙滅。<sup>113</sup>這是「辛亥革命」掀起的巨浪，鄭孝胥似乎真正體認到了「海藏」也無法消解的災難，時間以革命之名強勢介入了「海藏樓」的行動與儀式。值得求索的是，鄭氏設想在仕途道路上的隱逸思維，又如何處理革命的猝然而來？內心積聚的「負氣」經歷民國軍的激昂慷慨，在依存的詩文裡出現了什麼變化？新時代的喧囂早已滿城風雨，鄭孝胥授湖南布政使，預定於七月入京參與外官改制會議，革命的到來迫使內心升起的政治期望又一次落空，「民國乃敵國也」的宣言呼之欲出。誠然，論者指出此一名言並非直接肯認了鄭氏在政治上的遺民情結。<sup>114</sup>延續先前討論以著眼於「敵國」二字，由此觀察「海藏樓」主人面對改朝換代的心情：「負氣」至「余與民國乃敵國也」隱然有「性情」主導的轉化過程，不同於「海藏」的政治期望還有待另一段過渡時期的琢磨。

<sup>112</sup> 陳衍：〈題海藏樓〉，《石遺室詩集》，收入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上冊，頁 170。

<sup>113</sup> 鄭孝胥：〈答乙盦短歌二章〉，《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250。論者嘗以此為進路，探索鄭孝胥如何以「鬼趣」表明辛亥革命以後的悲怨之情。見鄭雅尹：〈論同光體詩人的鬼魅氛圍——以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為探討對象〉，《中極學刊》第 4 輯（2004 年 12 月），頁 113-115。

<sup>114</sup> 桑兵簡述鄭孝胥的前半生與清室及官場的淵源不深，至於張勳復辟時上諭見召也不被認同，因而鄭氏「民國乃敵國也」不能等同於清遺民的宣言，只是表明不與之為伍，內在自有面對革命的盤算。見氏著：〈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頁 74-75。原文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705。（1918 年 1 月 18 日）

## 二、獨居

鄭孝胥數次「歸隱海藏樓」的想法，其實都是調和理想與政治現實距離的決定。縱然歸去，依然與世事切割不開，其間的工夫實踐形塑了「海藏樓」獨特的內在風景。陳衍的題詩提示了此時文字之於「海藏樓」的重要意義，「魂魄」與「偷生世界」的相互感應，在在顯現了鄭氏千絲萬縷的政治意識。且看鄭孝胥在 1909 年為《散原精舍詩》留下的詩序：

往有鉅公與余談詩，務以清切為主，於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說甚正。然余竊疑詩之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萬變紛擾於外，心緒百態騰沸於內，宮商不調而不能已於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於辭，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於清也。思之來也無端，則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者，惡能使之盡合興之發也？匪定則倏忽無見、惝恍無聞者，惡能責以有說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於切也。並世而有此作，吾安得謂之非真詩也哉？<sup>115</sup>

前文討論大抵歸納鄭氏詩學務求抒發自我「懷抱」，發揮以「性情」為根基的「為己之學」。關注這份材料，除了胡適先生給予高於「宋詩派」的肯定之外，重要的是鄭氏寫於 1909 年的「海藏」時分，可以看出這段時期的詩學觀念——詩人如何正視「海藏樓」的魂魄？相對於主流的書寫，鄭孝胥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如是紛亂，已無法容納「清切」的詩句，「性情」所至，思慮過程必然受世變形塑的「感覺」影響。質言之，詩人今日身處在貧瘠時代，難以透過純然技藝去琢磨成詩，即使作為古典詩學精要之「興」，亦遭遇了不安穩的「當下」而漸趨模糊不清。<sup>116</sup>鄭孝胥「吾安得謂之非真詩也哉？」的宣告表明了在詩界成一家之言的位置，也證實了他貫徹到底的立場。

聯繫「海藏」的行動與儀式，這篇詩論尚有不同的理論意義值得探索。俞大綱（1908—1977）先生稱鄭氏在詩序以「莽蒼排奡」形容散原「可謂知言」，並言「固已闡發散原詩中之孤忠至孝處境，憂危之微旨，以闢廣雅談詩務以清切為主之謬見矣」。有趣的是，俞氏以為散原詩尚能等同於屈原「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心境，

<sup>115</sup> 鄭孝胥：〈散原精舍詩序〉，《散原精舍詩文集（增訂本）》下冊，頁 1530。錄自《散原精舍詩》宣統二年（1910）上海商務印書館刊本。

<sup>116</sup> 周策縱以「當下」說明中國詩歌主流的性質及其形成的原因。周氏考察歷史原典的應用，不只「即時」、「立刻」等短促時間之意，語意多有「空間」的內涵，相當於英文的「immediacy」，可以精準描述中國詩歌普遍具有的創作意識與美感。見氏著：〈詩詞的「當下」美——論中國詩歌的抒情主流和自然境界〉，《周策縱自選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249-286。

而鄭孝胥的評論亦作如是觀：「窺其意旨，何嘗不欲以散原比類於屈杜，故序文首云：『如伯嚴者，當於古人中求之也。』」<sup>117</sup>此一推想旨在標舉散原詩自辛丑（1901）至辛亥（1911）十年間的「勃鬱沉縵」之情，而鄭氏以為「真詩」的想法意味著類似的寫作意識其實也對應了他內在的「懷抱」，尤其詩人當前又一次經歷了「政治」理想的遙遙無期。<sup>118</sup>甚者，鄭孝胥知曉自己的詩名，欲將「詩」區隔於他人寫作，建立一種審視天下的經典尺度。在 1922 年為《散原精舍詩續集》的詩序裡有深刻的發言：

處亂世而有重名，則其言論予奪，將為天下視聽之所繫。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為尺寸之柄，彼亂臣賊子何懼於孔子？亦懼其名而已。今之天下，是亂臣賊子而非孔子之天下也。為孔子之徒者，其將以廋詞自晦，置天下之是非而不顧歟？抑將體《春秋》之微旨，以天下之是非自任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蓋《詩》之義婉而《春秋》之義嚴，此難於強通者也。散原使余刪其詩，余謂散原：「既有重名於天下，七十老翁何所懼？豈能以山川風月之辭與後生小子爭輕重哉？」使天下議散原之詩非詩而類於《春秋》，乃余之所樂聞也。<sup>119</sup>

鄭氏會心於散原詩，詩序將內心的情感傾瀉而出，巧妙指出了詩家在世變之中應有的位置。遙想孔子（551 B.C.—479 B.C.）承認了《詩》呈現的理想世界破滅以後，創建《春秋》的歷史筆法約束，迫使亂臣賊子懼。今日的混亂時代，讀聖賢書的士人也有所作為，鄭氏期許「詩」也能有《春秋》之「義嚴」，且以彼此之在詩界的威望，值得率先發揮，不作「山川風月之辭」，鄭氏顯然有意將評判的內容「強通」於詩，以一家之姿態重新擬定關乎文類的虛構契約。鄭孝胥以此為標準刪拾散原詩，相較於前一篇序文的閱讀心得，具有相當強烈的用世心理，在未有實際官業的情形下將僅存的詩文推至極致，且以詩名為基礎，採用另一種方式實踐內在的政治理想。於此，鄭氏以詩關切政治現實的做

<sup>117</sup> 俞大綱：《寥音閣詩話》，收入俞大綱紀念基金會主編：《俞大綱全集——詩文詩話卷》（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 年），頁 146-147。

<sup>118</sup> 鄭孝胥後來有詩敘及此事：「嘗序伯嚴詩，持論闡清切。自嫌誤後生，流浪或失實。君詩妙易解，經史氣四溢。詩中見其人，風趣乃雋絕。淺語莫非深，天壤在豪末。何須填難字，苦作酸生活。會心可忘言，即此意已達。」倒是以輕鬆的口吻解釋散原詩其實不難解，旨在為後輩欲學散原者提示明確的方向。然而，後四句又是一段真情流露，鄭氏明白詩藝的傳授只是形式，未能真正經歷陳三立的苦處，又如何完滿表現詩的艱澀？如此回應，大抵不離「世事萬變紛擾於外，心緒百態騰沸於內，宮商不調而不能已於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於辭」的看法，更為強調了詩人與世變之間的關係。因而「會心可忘言，即此意已達」成為了深刻理解散原詩的閱讀方式，鄭氏感同身受，緣於自己以為也有相似的際遇。見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九》，頁 130。

<sup>119</sup> 鄭孝胥：〈散原詩集序〉，《散原精舍詩文集（增訂本）》下冊，頁 1531。錄自《散原精舍詩續集》1922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法似乎與中國的「詩史」傳統發生關聯，而俞大綱先生以為鄭氏「以散原比類於屈杜」的說解，其實更多的意義是讀散原詩抒發的自我「懷抱」，無論「真詩」的主張，抑或「強通」於《春秋》，詩人感通於世變，理論的內容皆隱含了豐富的政治意識。<sup>120</sup>

兩篇詩序間隔了十多年的時間，正是鄭孝胥沈潛於「海藏樓」最為深刻的時期。可以發現，鄭孝胥在 1909 年的文章裡娓娓道出「世變」與「詩」的纏綿：「思之來也無端，則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者，惡能使之盡合興之發也？」誠然，鄭氏對「詩」的觀察來自於「世變」的敏銳，此刻仍以「避地待時」的「海藏」工夫消化一段不為世用的歲月，因而「世事萬變紛擾於外，心緒百態騰沸於內，宮商不調而不能已於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於辭……」內與外相互衝突，雜亂情緒聚積於心又不能有所作為。時至 1922 年，鄭孝胥賦予「詩」抵抗「世變」的具體內容，力求「體《春秋》之微旨」，不以「詩」為餘事，並言「以天下之是非自任」也。鄭孝胥在「海藏樓」凝想了「詩」的可能，多少無奈緣自不得知音的孤鳴，依存於「詩」慨歎，只能在「海藏樓」不斷用文字抒發情感，至於在有限的形式裡構想「懷抱」的模樣。誠然，這些材料成為了理解鄭孝胥心緒的妙門關鍵，尤其「辛亥革命」突如其来，清王朝命脈倏然斷絕的消息不斷迴盪在「海藏樓」，原有的修行與政治現實失去了平衡，詩人無法掌握情況，驀然發現唯一的出口僅存於「詩」。「海藏」的進程戛然而止，鄭孝胥的政治理想必然重新調整與修正，於是乎，「海藏樓」開啟了另一種形式的修行，期間凝鍊的文字放大且修補了傷害，詩人「負氣」之於「政治現實」的調節還有待細心疏理。

「海藏樓」的位置相當重要，承載了政治遠景的破碎與重建，鄭孝胥的沈潛彷若一場「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的舉行。<sup>121</sup>細緻的分別可以透過鄭氏寫於 1909 年與 1911 年、1912 年的〈海藏樓雜詩〉及〈續海藏樓雜詩〉、〈續雜詩〉得

<sup>120</sup> 值得注意鄭孝胥「刪詩」的舉動，不免想到孔子修正《詩》的說法，無論歷史事實與否，當時確實建立了一套《詩》的標準。詩序提及「為孔子之徒者」，加上鄭氏對散原詩的期許，隱約有類比的意念。然而，鄭孝胥對孔子的想法亦有詩曰：「孔子語聞道，乃曰夕死可。聞道知幾人，死者蓋已夥。讀之每失笑，求道計殊左。道自有生死，安之實在我。畏死而樂生，死遂為子禍。吾今伏孔子，敢死氣磊砢。彼云魂有靈，亦未脫韁鎖。」以戲謔的態度評述孔子的言說，顯然未有對聖賢的敬重，而是藉此申明自己為「道」而死的意念，不留任何餘地。於此，詩序同樣透過相關的言行來闡發自己的政治理想，比肩孔子又自成一家。見氏著：〈海藏樓雜詩·其二十八〉，《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194-195。

<sup>121</sup> 援引人類學「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的概念，強調鄭孝胥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後難以確認的生命階段，落在政治理想的失落與重建的時期。鄭氏的「海藏」意念為革命終止，從此閉門不與世事，直到 1923 年奉命入觀，可謂另一階段的開展——與「新身分」的聚合。於此，「海藏樓」位在理想與理想之間，凝鍊的詩文顯現了鄭氏「實際的分離」期間的情感變化。理論的說明見【英】利奇 (Edmund Leach) 著；郭凡、鄒和譯：《文化與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80-82。

到完善的理解。識者引述《文選》李善（630—689）注「雜詩」云：「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藉以闡發鄭孝胥從「賢臣」到「遺民」的感悟與思考。<sup>122</sup>暫且不論框架的設定如何成立，鄭孝胥確實經歷了不同身分的轉換，「遇物即言」的「雜詩」呢喃著一段茫昧而失序的過渡歷史，「海藏樓」則是確認這場儀式唯一的時空座標。〈海藏樓雜詩〉密集創作於1909年下半年，主題圍繞在「海藏樓」周邊發生的時事，一貫的「性情」為之串聯，反映了詩人當時的「海藏」的修行心境，檢視「輕世肆志之學」的實踐成果。<sup>123</sup>開篇即曰：

奮身欲何往，盤空殊未安。高樓一日成，截然如斷山。腳根愈監牢，世態愈等閒。羣鶩不易到，鳥語時間關。道人袖手人，所患猶多言。今年有新得，稍簡應對煩。獨居不負樓，種松待參天。妻子真我客，歡然來扣門。

<sup>124</sup>

儼然如詩序一般，申明了自己「海藏」的決心。詩人滿腔熱血，卻為時局逼得進退不得，「負氣」有所失落，截然以「海藏樓」封鎖之。「俯仰五十良可哀」的鄭孝胥有意在「海藏樓」的內部「獨居」修行，違背內在情感的衝動，劃定了層層束縛，既是身軀的限制，也有沉默的必須。詩人額外築立高樓，定名「海藏」，將魂魄安放在適切的位置，如此琢磨，依然與1898年「此一年中，棄江寧，就上海，實有避地待時之志」的慨歎相當，懷有不得知音的悲怨：

移櫻四十株，穠麗會成列。心知非我春，耿耿意不滅。當年空能狂，過眼纔一瞥。對花欲抉目，積恨誰與雪？猶餘惆悵味，老去未忍絕。刻意仿司勳，傷春更傷別。<sup>125</sup>

「海藏樓」的景觀也是詩人留心之處，無論植栽或是本地風光，諸如「樓東多裁竹，寄意在避俗。頗聞人驚嗟，新竹鬱已綠……」<sup>126</sup>、「叢蘭雖競開，微甘

<sup>122</sup> 黃小蓉：〈從賢臣到遺民——鄭孝胥「海藏樓雜詩」論析〉，《雲漢學刊》第21期（2010年6月），頁170。

<sup>123</sup> 〈海藏樓雜詩〉日記見1909年8月1日：「作〈海藏樓詩〉四首。」、8月8日：「作四詩，錄二首示皙子。」、8月20日：「晨，作詩一首，素心蘭初放一花，有絕世之標格。」、10月5日：「至海藏樓，蟄先、竹君來，云南皮已於廿一夜亥刻薨。夜，作詩二首。」、10月15日：「夜，潘訓初、王藹廬、趙文朗來，商辦旅滬學堂。作詩三首。」、11月7日：「夜，作詩二首。」、1910年1月18日：「作詩二首。」、1月24日：「作詩一首，甫畢，楊壽彤來，持錫帥致雲帥電，盼余即往。」、1月27日：「作〈海藏樓詩〉第三十五首。」詩作內容有贈答、論詩、傷逝、哲理、政事、感悟等諸多主題，「遇物即言」，敘寫「退隱海藏樓」之後的各種情景。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202-1226。

<sup>124</sup> 鄭孝胥：〈海藏樓雜詩·其一〉，《海藏樓詩（增訂本）》，頁189。

<sup>125</sup> 同前註，其四，頁190。

<sup>126</sup> 同前註，其三，頁189。

豈高味。幽尋入籬側，泠泠襲露氣……」<sup>127</sup>以及引文所見之櫻花成列，周圍的風景多少增添了「海藏樓」主人弔詭的抒情：深竹等待他人驚見其綠，幽蘭有意塵外卻盛放其香，詩人將「性情」交融於「物」，顯現一種離不開人間世的隱逸姿態。同樣地，穠櫻錯失季節仍不減其紅，過去的輝煌與今日的蒼涼匯流至「當下」，「此樓雖物外，傲物非崇德」<sup>128</sup>，「海藏樓」收納了鄭孝胥的「負氣」，難以排遣政治上的挫折反覆消耗了年歲，逐年積累，「積恨」似乎成為另一層次的情感狀態，尚未推至極端，卻也不同於「厭世」之惆悵。

「負氣」與「悲怨」的雜揉也聯繫了與張之洞的悼念之情，「南皮已於廿一夜亥刻薨」成為「海藏樓」的一個事件，鄭氏的回應離不開此刻「海藏」的心境：

湯趙走相語，南皮昨已薨。鬱鬱此老翁，其意寧樂生。一生抱忠節，舊學頗殫精。惜哉如紈扇，秋至難施行。公常稱我詩，謂非世士能。江湖雖浩蕩，隱愧知己情。年年泥憶雲，今日殊幽明。病中必見恨，此恨終冥冥。

129

追憶張之洞的生平，肯定其舊學邃密與忠節的處世態度。而「惜哉如紈扇，秋至難施行」構成一處轉折，完備的人格特質竟無法在合適的時機發揮作用。隨之返回自我，相當的才性也遭遇了相似的結果，鄭氏不免有所怨懟，「江湖雖浩蕩，隱愧知己情」，如今深藏不露的無奈，曾經的賞識也淪為空談。詩末想像著張之洞的遺憾：「病中必見恨，此恨終冥冥。」其實是「負氣」的高漲，更多的是詩人自身的悲怨。且看接續而來的詩意：

抱冰堂中飯，餘味猶在腹。別時恐遂絕，所欠惟一哭。棄官如棄世，用意固已毒。知公疾我去，積憤亦殊酷。偶然見其詩，失歎不自覺。却求爪雪卷，感念定何觸。功名果滅性，並世迷九曲。子期既云亡，高山欲誰屬？

130

張之洞的提攜實屬難得，鄭孝胥回顧了彼此的交遊往來，在「海藏樓」發言為詩，又一次召喚知音的到來。詩曰：「棄官如棄世，用意固已毒。知公疾我去，積憤亦殊酷。」可以想見，鄭孝胥「棄」的故事背後，總是期待著他人的不捨。其間巧妙設喻：「南皮見余〈題鄭子尹爪雪山樊〉詩，乃屬喬茂萱求其圖卷看之。」（詩注）言下之意，張氏總是透過他的眼光瞭然於世。如今，「功名果

<sup>127</sup> 同前註，其十一，頁 191。

<sup>128</sup> 同前註，其十六，頁 192。

<sup>129</sup> 同前註，其十九，頁 192-193。

<sup>130</sup> 同前註，其二十，頁 193。

滅性，並世迷九曲」，過往的珍視不能抵銷當前憂患，張之洞的形象彷若在鄭氏心裡劃分為二，知音的想像始終不敵名利充斥的現實。因而鄭孝胥哀悼的是「知音」的不可得。結尾化用經典：「子期既云亡，高山欲誰屬？」既肯認了張氏的識見，也再次申明了自己孤芳的境地。

### 三、積恨

1909 年寫作的〈海藏樓雜詩〉收入《海藏樓詩》共三十四首，「遇物即言」的各式主題可以提煉一種共同的情感。鄭孝胥有意識構擬一個規模宏大的組詩，想來這段「海藏」時日值得為之收藏。詩曰：「惜哉時無人，誰解賞雄概？樓頭意萬里，縮手久不快。倚闌更小留，安閒故常態。」<sup>131</sup>以「避地待時」為意念修行，「負氣」不斷化為無窮「悲怨」，「海藏樓」乃詩人魂魄所在，不得進退。然而，另外兩組雜詩寫於「辛亥革命」期間，題目為「續」，顯然有意連結在「海藏樓」決意「退隱」的記憶。換言之，一系列「海藏樓雜詩」確實標明了「海藏樓」在生命史的特殊意義。有意思的是，提筆延續「海藏樓雜詩」的鄭孝胥正遭遇了前所未見的歷史情境，此刻的心情已然失去了「避地待時」的「安閒」與「惆悵」，於是乎，在同一組而不同時空的「海藏樓雜詩」內部，「詩」轉變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向度。

「辛亥革命」的主戰事在 1911 年 10 月的武昌起義，思想的儲備及具體的社會運動已經醞釀許久，加上民族主義的助燃，可謂長期積累的歷史結果。<sup>132</sup>另一方面，「海藏樓」主人在半年起草了數則〈覘國談〉，思慮依然在政治遠景的構築上，既言伊犁、雲南之形勢，又論行政、養兵之無策，以亞洲視野思考綜論中國的自我定位，其曰：「悲夫，悲夫，所謂由人事之廢弛，遂使天然之形勢變遷以成新局。主客之形已易，攻守之勢已殊，而中國上自政府，下及國民，猶沉睡於閉塞之中，自稱為世界大國，而不知已失其立國之體格。」鄭氏直接指出了問題的癥結在「吾所見中國之謀國執政者皆若此殘子弟之類是矣」。<sup>133</sup>尚且，此一無關乎變法人士乃「守舊」或「趨新」，而是「其於下手施行之實際毫無研究，又果足以為救亡之策乎」，甚或「養兵」亦有「故今日中國欲求參謀本部之人物，誠恐尚未出世，殊不足以言海陸軍之國防也」。

<sup>131</sup> 同前註，其三十三，頁 196。

<sup>132</sup> 【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劉尊棋譯：〈辛亥革命的起源〉，《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 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頁 171-197。

<sup>133</sup> 鄭孝胥：〈覘國談一〉，收入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501。

<sup>134</sup>於此，鄭孝胥似乎將外交、行政、軍事的匱乏歸結於人事，日記（1911年7月8日）記曰：

余今年所作〈覘國談〉三篇，深心遠識，度國人必有讀而感之者。淺夫夢想不到，安能有動於其中哉。<sup>135</sup>

〈覘國談〉在批評之餘，盡力提供了朝政必須變革的方向，「時無英雄」的結論其實也暗示了自己的不得志。鄭氏指出具體的政策，意味著中國仍有救命之道，而「淺夫」構成了混亂的主因。由此聯繫「海藏」的初衷，「今日斗筲」一直是鄭孝胥悲怨的根源，日記援引柳宗元「以愚辱焉」（〈愚溪詩序〉）以自況，又一次表明與「偷生世界」的格格不入。<sup>136</sup>於是乎，一幅名為〈覘國談〉的藍圖即是鄭孝胥在「海藏樓」觀看世界的眼光，也是貫徹「海藏」意念而「獨居」修行的成果，一點一滴將自始至今的政治理想化為「借款造路」的實際行動。同日亦有詩曰：

玉皇頂上曉雲堆，海色山光滿眼哀。哀者不知心死未，更攜遠鏡看山來。

<sup>137</sup>

政治現實設玉皇遠景為喻，山頂佈滿哀愁，緣於悲怨性情為之著色，不信其為美；今日以不同的角度予以注目，雲淡風輕，原來的風景甚是清晰，傳達了一種近乎重生的意念。

此一政策的推行儼然是鄭孝胥離開「海藏樓」的計畫，在立憲運動的失敗以後，重新凝聚了政治的願景。其曰：「余既出任世事，當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損我哉。」<sup>138</sup>逐年積累的「負氣」已非高樓所能拘束之。日記（1911年7月19日）記曰：

吾今挺身以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攜炸彈而來，必先掃除不正當之官場妖魔，次乃掃除不規則之輿論煙瘴，必衝過多數黑暗之反對，乃坐收萬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觀其效！雖不免大言之謗，然其蓋世衝天之奇氣，終不可誣也。<sup>139</sup>

<sup>134</sup> 同前註，〈覘國談二〉，頁1502。

<sup>135</sup> 同前註，頁1331。

<sup>136</sup> 同前註。日記：「柳子厚自言『以愚辱焉』。反己而愚，吾將誰咎矣？何故妄用吾情，何故妄用吾信，又何故已覺而不能自遣，非愚而何？」於此可見鄭氏如何堅守自己的政治信念，因而深化了悲怨的張力。

<sup>137</sup> 同前註。

<sup>138</sup> 同前註。

<sup>139</sup> 同前註，頁1333。

「生番」道出了長久不與世事的草莽之人，孑然一身劃分且抵抗了「多數黑暗之反對」。而出自「海藏樓」的「蓋世衝天之奇氣」，其實就是「負氣」涵養已久的完滿狀態，「我有距川微願在，任他巢燕笑冥鴻」（1911年8月20日）<sup>140</sup>，鄭孝胥的政治性格一以貫之，終究以強大的自我意念步出「海藏樓」。

識者在近代史研究有所啟示：「對某一個定點上的歷史行動者而言，後來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擺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資源和不確定性，未來對他而言是一個或然率的問題，他的所有決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個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資訊、偶然性，夾雜著群眾的囂鬧之下作成的……」<sup>141</sup>縱然有近乎完美的構想，鄭孝胥的理想與行動將為「辛亥革命」強迫中止。這場天覆地滅的浩劫顯然在他的料想之外，真正的災難並非列強的攫奪，也不是朝廷內部的黑暗勢力，「推倒滿洲」的事實竟是革黨得志之時。鄭氏致力於朝政的整合，以為「故今日猶是改革行政之時代，未遽為覆滅宗祀之時代」，革命猶如迅風暴雨，鄭孝胥已不得不面對「清國遺老」的字眼。甚且，積聚數年再次步出「海藏樓」的「負氣」遭遇了沉重的打擊。日記（1911年10月27日）記曰：

時不我與，戢彌天於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猶能肆力於讀書賦詩以橫絕  
雄視於百世，豈能徜徉徙倚於海藏樓乎！樓且易主，而激宕悠揚之嘯歌音  
響乃出於何處矮屋之中，未可知也。

辛亥革命又一次抑止了內在的「負氣」，昔日鄭氏〈哀五十〉即言：「一聞楚歌氣欲盡，何異垓下悲重圍。」悲嘆化為殘忍的政治現實，相似的境遇至今依然訴說著「時不我與」的無奈。鄭孝胥自豪「海藏樓」終非久留之地，想像的政治詩學必須實踐為真正的政治事業。然而，革命的發生澆滅了原有的計畫，時局的重大轉變已非「避地待時」可以消解，只能慨歎：「官，吾毒也；不受官，安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飲鳩酒，飢渴未止，而毒已作。」面對朝政實位始終進退不得的鄭孝胥，只能在「隱逸」與「政治」之間苦痛掙扎，時局已不容等待。於此，面對不可知的未來，鄭孝胥失去了「海藏」的契機，「海藏樓」作為座標的過渡意義也不復存在，長期積聚的「負氣」又何去何從，成為鄭孝胥無法解決的難題，佛然進入了另一層次的昇華：

<sup>140</sup> 同前註，頁1338。

<sup>141</sup>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頁183。

魄之將狂，魂來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舉遠鏡，見玉皇頂峰巒千疊，皆積恨耳。<sup>142</sup>

火已及之，鄭氏「又舉望鏡」，難以相信經過數個月的玉皇山頂竟為截然不同的風景，而政治現場滿目瘡痍，至此「負氣」亦轉化為「積恨」矣。日記簡述：「午後四點至上海，歸海藏樓。」（1911年10月29日）對鄭孝胥來說已是無可如何的決定。持續寫道：「今日重九，登台憑眺，真欲發狂。與其坐以斷腸，無寧與匪決死。」（1911年10月30日）；「無明火燒世界，理不能喻，情不能感。必待糜爛之後，方有哀悔厭亂之日。」（1911年11月3日）「積恨」似火，沒有方向且無可名狀。革命之火灼燒世界，此刻「海藏樓」也為怒火吞噬，獨居修行之地已然成為閉鎖鄭孝胥的牢籠，失去了原有的面目。<sup>143</sup>

「海藏樓」在革命以後的寓居意義如此慘淡，盡是怒火焚燒的土灰。遙想1898年〈海藏樓試筆〉：「廿年詩卷收江水，一角危樓待夕陽。」或是1909年〈海藏樓雜詩〉：「獨居不負樓，種松待參天。」此時，鄭孝胥寫作〈續海藏樓雜詩〉，「高樓外無地，掩卷成獨語」<sup>144</sup>，內在情感全為「積恨」佔據：

黨人倡仇滿，屠戮及婦孺。享國誠有毒，無辜彼何與。凌弱而暴寡，不義我所惡。獨怪億萬心，亦有億兆詛。蒸民喪懿德，孰可以理喻？夷齊獨叩馬，忤世良弗顧。<sup>145</sup>

尤其敘寫民國軍的暴力，毫無理據，以仇視為旨，行血腥手段奪取政權，點燃了無明之火。而詩人其實也「理不能喻」，無止盡放大了「性情」的能量，推至極端乃成「積恨」，回報「惡」與「詛」之悲聲。除此之外，詩人的「積恨」也延燒至朝政人士，追究民國軍如此猖狂的原因，甚為重視他們在革命發生之後的仁義抉擇：

天下奇男子，惟有王保保。平生惜此人，豪傑盡推倒。誰能厲忠義，抗節誓不撓。萬人苟一心，羣孽豈難掃。丈夫縱失敗，善死固有道。首鼠深可憎，窟兔詛為狡？<sup>146</sup>

鄭氏依然保持傳統的倫理價值，深信其為國政之基礎，並斥責民國軍乃毫無操守之「失心瘋者」，無法真正實現「共和」的社會：「以利己損人久成習慣之社會，而欲高談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之效也，此

<sup>142</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3。

<sup>143</sup> 同前註，頁1353-1354。

<sup>144</sup> 鄭孝胥：〈續海藏樓雜詩·其四十一〉，《海藏樓詩（增訂本）》，頁221。

<sup>145</sup> 同前註，其三十五，頁220。

<sup>146</sup> 同前註，其三十六。

歲時人所能希望乎！」（1911年11月22日）<sup>147</sup>只要堅守忠義之正道，「萬人苟一心，羣孽豈難掃」，民國軍未必有革命的契機。無奈的是，類似的言論在「海藏」期間多有批判，「今日斗筲」揮之不去，已然定調了王朝衰敗的結果。事已至此，鄭孝胥在「海藏樓」保全其身，申明變局應有的處世態度：

君子尚不屈，尺蠖時求伸。欲伸而暫屈，此義難喻人。箕比行不同，所同在其仁。不仁辭必屈，安能掩其真？士窮見節義，顛倒非所聞。向來謬揚抑，嚼舌吾何云。<sup>148</sup>

將面對憂患的作為統歸於「仁」，其餘皆是「尺蠖」之行徑。有意思的是，不斷以詩文與民國軍對抗的鄭孝胥，似乎將自身展演的姿勢自許為世變之間的理想典型，隱然是命運對清王朝的無情，讓他不得已停留於「海藏樓」：

之官而北上，留京而南歸。屈曲使投閒，天歟非人為。功名與節義，時論方背馳。名教已掃地，何人能維持？指心許蒼天，一老乃慙遺。徐行萬馬中，舍我噫其誰？<sup>149</sup>

無法趕至歷史現場的鄭孝胥，只能睜眼看著一切政治危機的爆發，哀傷禮教的失序。由此可見，「積恨」著實由「負氣」發生，依然殘留「舍我其誰」的氣勢，而「噫」字流露了「時不我與」的遺憾，無法發揮今日「王保保」（？—1375）應有的忠義作為。

鄭孝胥逐漸為此刻身在「海藏樓」的自己找到了合理的解釋，可以盡情擴張「積恨」的邊界，「海藏樓」儼然又一次成為「負氣」的積聚場所。日記（1911年11月23日）

人生種因得果，類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樓，遂適為避世之地，此豈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樓中，昧爽即起，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運思操勞，絕非庸庸厚福之比；使余與聞世事，必有過人之處。蓋所種者實為用世之因，而所收者轉得投閑之果，可謂奇矣。

「積恨」如此，鄭氏設想歷史現場可能遭遇的百般情緒，盡力感同身受，甚或延續了「海藏」的初衷，將革命的變亂視為「避地待時」的關鍵事件，「海藏樓」的居留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sup>147</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8。

<sup>148</sup> 鄭孝胥：〈續海藏樓雜詩·其三十七〉，《海藏樓詩（增訂本）》，頁220。

<sup>149</sup> 同前註，其四十二，頁221。

余今日所處之地位，於朝廷無所負，於革命亦無所忤，豈天留我將以為調停之人耶？<sup>150</sup>

於是乎，「吾將訊之鬼神」，鄭孝胥預先寫下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將自己安排至劇情轉折處，提出近乎譖妄的故事與情節：

老夫生不辰，坐視國被竊。願為伍胥眼，更向城門抉。苟生誠可弔，囊底智未竭。萬一落吾手，猶得日月揭。惟道援天下，就之有不屑。放言自傾聽，又用自怡悅。<sup>151</sup>

鄭氏的荒謬自然有其根源：「負氣」一生的理想為革命終結，歷史現場的「缺席」甚是鄭孝胥無法平息的傷痛。〈續雜詩〉有言：「狂愚方得時，明哲當自竄。深居味此理，長歌白石爛。」<sup>152</sup>詩人只能付諸強大的自我臨現，以想像的「歷史」盡力填補，設法在清王朝的終局佔有一席之地。時至 1918 年，鄭孝胥懷想革命也未有事過境遷的心理，依然狂言，並鋪以細節：「我去長沙月餘日，武昌亂作如兒嬉。使我率師下金口，舉手撲滅何能為……」<sup>153</sup>可以想見，革命的陰影揮之不去，也許這部想像的歷史才能帶給鄭孝胥合理的解答。

以辛亥革命為樞紐，「積恨」成為「負氣」的變形，只有「魂」與「魄」相互依存，構成了詩人始料未及的「海藏樓」風景。1909 年〈海藏樓雜詩〉固然提及「積恨」，尚且「猶餘惆悵味」，詩人一如往常地以「海藏」修行平息內在的悲怨之情。然而，為革命催化的「積恨」猛然擴散，接續而來的「海藏樓雜詩」大抵維持了相似的調子。接續而來的自我對話以後，鄭孝胥在「海藏樓」再次確認了與「偷生世界」對抗的方式。詩曰：「惟應奮史筆，文獻徵宋杞。惡名彼何成，千秋誅豎子。」落筆於「是夜九點一刻，北京下詔遜位，並命袁世凱籌設臨時政府」（詩注）。<sup>154</sup>文字又一次擔任溝通「海藏樓」內外的唯一方式，而鄭孝胥立意以「史筆」在千秋之後彰顯善惡真相，如此變調也為「詩」引入了新的創作意識：「偷生日久空自恨，春秋不作宜無詩。」<sup>155</sup>於此，聯繫 1922 年的〈散原詩集序〉：「今之天下，是亂臣賊子而非孔子之天下也。為孔子之徒者，其將以廩詞自晦，置天下之是非而不顧歟？抑將體《春秋》之微旨，以天下之是非自任歟？」道不行，鄭孝胥彷若面臨了聖賢也曾經歷的困境。如何在貧瘠時代真正實踐內在的政治理想？孔子「《詩》亡而後《春秋》

<sup>150</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358。

<sup>151</sup> 鄭孝胥：〈五十三歲生日狂言〉，《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225。

<sup>152</sup> 同前註，〈續雜詩·其四十三〉，頁 224。

<sup>153</sup> 同前註，〈答余堯衢〉，頁 288。

<sup>154</sup> 同前註，〈十二月二十五日鑑泉示生日詩〉，頁 223。

<sup>155</sup> 同前註，〈答余堯衢〉，頁 288。

作」，在破滅的理想世界裡以「史」捍衛僅存的正道。又一次天崩地解，鄭氏則以「詩」補償了應有的歷史，革命以後乃不聞世事，依然以相當「負氣」的形式延續了「避地待時之志」，保有「海藏」之初衷。



## 第四章 夜起

### 第一節 位置

#### 一、從「海藏」到「夜起」

「海藏」成就了鄭孝胥（1860—1938）前半生的行跡，樓閣矗立於海上，以「隱逸」的姿勢周旋立憲運動（1906）與辛亥革命（1911）之間，懷想「避地待時之志」。<sup>1</sup>誠然，「海藏」的結果似乎不符合鄭氏的期待，1912年「海藏樓雜詩」續篇已言：「狂愚方得時，明哲當自竄。深居味此理，長歌白石爛。」<sup>2</sup>胸懷大志的鄭孝胥進退不得，「海藏樓」從一過渡修行之場域，轉型為詩人發憤著「詩」的居所——「非詩而類於《春秋》」。<sup>3</sup>內在的懷抱尚未實現，革命的倏忽到來使鄭孝胥逐漸遠離了「海藏」的初衷。

另一方面，與「海藏樓」遙遙相對的「夜起庵」，標示了鄭孝胥不同階段的精神構築，甚是生命晚期又一次朝向政治理想的追逐。同樣地，相對於「海藏」的底蘊，轉換身分與背景的鄭孝胥，重新拾回了「夜起」的習慣，並予以理論的高度。論者已然指出鄭氏「夜起」的行徑：「集中以夜起之義為題者甚多，以跡言，則海藏每中宵不寐，夜起吟哦或看月坐雨；以心言，則『心火方自燃』，遂不免任偽職矣。」<sup>4</sup>心火不得排悶，隱然有強大的政治動能促使鄭孝

<sup>1</sup> 日記記曰：「此一年中，棄江寧，就上海，實有避地待時之志。……然世局變態，思之已熟，尚不為造化小兒所給，況今日斗筲乎。」（1898年1月21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38。

<sup>2</sup> 鄭孝胥：〈續雜詩〉，《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24。

<sup>3</sup> 鄭孝胥於1922年為《散原精舍詩續集》作序，援引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的構思，以為今日詩作亦復如是：「既有重名於天下，七十老翁何所懼？豈能以山川風月之辭與後生小子爭輕重哉？」鄭氏避世「海藏樓」緣於意料之外的革命，「詩」的「言志」功能在詩人無可奈何之時有了巧妙的轉化。見氏著：〈散原精舍詩序〉，收入陳三立著；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增訂本）》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530。錄自《散原精舍詩》宣統二年（1910）上海商務印書館刻本。

<sup>4</sup> 龔鵬程：〈晚清詩話〉，收入王翼奇等著；劉夢芙編校：《當代詩詞叢話》（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頁542-543。

胥必須有所作為，尤其經歷了「革命」與「政變」的擾動，由外而內的天崩地解，「士階層」常有的悲怨化為「積恨」，出任滿洲國似乎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決定。於此，過去初步的討論欲將「辛亥革命」的創傷與「北京政變」（1924）的震盪分明，歸結為鄭孝胥在天津重新來過的「夜起」，嘗試劃出「清遺民」特殊的晚期風格，指認一個通往滿洲國以前的過渡時期。<sup>5</sup>詩人不舍的懷抱與政治訴求大致說明了又一次「夜起」的契機，有待求索的是，「夜起」的理論性質與思想資源如何理解？「夜起」的技術和技巧的論述，到底是工夫論？還是詩文的技藝？

如同「海藏樓」的聲名遠播，天津的「夜起庵主人」也似一則公開的宣言。王揖唐（1877—1948）《今傳是樓詩話》記載了朋輩為詩如何多及此事：

猶憶癸亥十二月十八日，海藏將南歸，秋岳與沈彥侯兄弟凌晨為具帳飲，歌者程郎亦至，霜蘇瞰動，意氣如神。秋岳詩云：「一世沉沉戀夜行，朱門凍骨對縱橫。獨呼卯酒先羣動，要遣人間識啟明。」「瞳旭窺窗酒半酣，未應末座得何戲。坐中卻有貞元士，解作開天菊部譚。」此一事也。<sup>6</sup>

友人欲拜望鄭孝胥，時常相約晨間。黃濬（1891—1937）的詩作道出了一位夜行者的形跡，只是鄭孝胥並非執守著黑夜，執意流連於拂曉時分。據《鄭孝胥傳》附〈軼事〉記載：「先生生平，自奉簡樸，其暮年生活，尤有規則，蓋自追隨行在移居津沽時，即開始夜起習慣……所謂戌時（午後九時）就寢，丑時（午前三時）起床，蓋紀實也。」<sup>7</sup>可以想見，這是鄭氏刻意維持的生活習慣，時間如是分明，詩曰：「獨呼卯酒先羣動，要遣人間識啟明。」看似違反常規，卻有意先行感悟不同的境地，琢磨獨有的識見。

另一首詩則隱約暗示了「夜起」的話題，劃出了一道鄭氏主導的言論空間。「何戲」的典故引自劉禹錫（772—842）〈與歌者何戲〉：「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戲在，更與殷勤唱〈渭城〉。」<sup>8</sup>大抵敘寫詩人重來京師而舊人唯一樂工的慨歎，頗有撫今追昔的意味。有意思的是，鄭孝胥的身分疊合了二者：時至天津歸來，得到溥儀（1906—1967）的賞識，無論個人

<sup>5</sup> 請見拙著：〈殘夜不須眠——論鄭孝胥晚期的政治詩作〉，《中國文學研究》第42期（2016年7月），頁79-118。

<sup>6</sup> 王揖唐著；張寅彭、李劍冰校點：《今傳是樓詩話·諸家題贈海藏者》，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420。

<sup>7</sup>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收入周谷城主編：《民國叢書》第1編88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滿洲圖書株式會社1938年版影印），頁149-150。（標點自注）

<sup>8</sup> 劉禹錫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786。

或是殘留的「士階層」群體都是相當大的激勵。<sup>9</sup>同時，清曉的相聚又是一次故國的追憶：「坐中卻有貞元士，解作開天菊部譚。」戲曲的玩賞一直是鄭孝胥與友人的樂趣，從社會文化史上的意義來說，其間豁顯的審美意識與晚明以來的「遺民」傳統也有所聯繫。<sup>10</sup>延續了前文的語境，詩人設想唐代貞元（785—805）年間的歌者談論開元（713—741）與天寶（742—756）的遺文軼事，在晨間展演了一次又一次的歷史回顧，而「開天」即是唐代歷史的轉折處，末代士人深切回望，他們圍繞的話題儼然持續探求著王朝由盛轉衰的緣由。經歷辛亥創痛的鄭孝胥不斷求索著事件的變遷與革命的本質，詩學亦轉向了「激急抗烈，指斥無留遺」<sup>11</sup>，甚有「抑將體《春秋》之微旨，以天下是非之自任歟？」<sup>12</sup>的省思。此外，當時交遊圈周圍點染了「復辟」的氣氛，機會始終存在，卻是曇花一現，反覆面臨挫敗的收場。失落的老輩在黑夜與白日的間隙辯證歷史的癥結，而鄭孝胥身體力行，在革命以後刻意地直面每一處陰影，以「夜起」探測寂寞的邊界，盡在月落日昇之時。

丁卯（1927）年末，曹經沅（1891—1946）未明即往，又一次共享「夜起」的時辰。鄭孝胥有詩記曰：

中夜起待旦，初非欲人知，好我且信我，可感孰若斯？昧爽聞叩門，是子  
決不疑。歡笑苦未足，促坐同啜糜。我室雖云邇，里許勞奔馳。來時肝肺  
熱，去時懷抱怡。氣類喻針芥，聖者難言之。持此默自訟，無端殆兒嬉。  
豈同訪戴人，興盡情遽移。<sup>13</sup>

詩作簡要敘寫當晚情景，也提起了「夜起」的執著。畢竟是鄭氏默默實踐的工夫，友人為此夜行，自會珍重這般情誼。「歡笑苦未足」淡淡地提示了各自在

<sup>9</sup> 1923 年的日記有意記載了溥儀的肯定之語：「上問胡（琴初）曰：『曾見鄭孝胥否？』對曰：『見之。』上曰：『鄭年幾何？』對曰：『六十餘。』上嗟嘆曰：『亦六十矣！』胡復對曰：『其人甚壯，僅若五十耳。』」（8月7日）；「……談昨日上語弢庵：『鄭孝胥殊不老。聞其言論，使我氣壯。吾目中未嘗見如此人，惜不能常見之耳。』」（8月24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1958、1960。

<sup>10</sup> 論者嘗以「遺民」為進路，描述觀賞者如何從戲曲感受了亡國的哀淒。請見李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2008年），頁112-118。此外，鄭氏日記寫道：「陳希容邀至春和觀富連成，皆科班之初成者，年未及冠，頗有穎出之質。復至奎德社觀演〈江城〉。謂孫女蟲夏曰：『戲劇有復興之象，天下其將平乎。』」從渭城殘曲至科班的編練，彷若對應了時局的變遷。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325-2326。

<sup>11</sup> 陳三立：「自辛亥之變興，流人類於滻瀆……偷活劫爐，所不能已於詩者，稍多及太夷及余。余與太夷所得詩，激急抗烈，指斥無留遺……」見氏著：〈蒼虬閣詩集序〉，收入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487。

<sup>12</sup> 鄭孝胥：〈散原精舍詩序〉，頁1530。

<sup>13</sup> 鄭孝胥：〈曹鑾衡昧爽見訪〉，《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350-351。

辛亥以後承擔的艱難，儼然是「清遺民」逐漸習慣的問候，而穩定了政治方向的鄭孝胥，欲將他們庸碌的身體予以奮勉的心懷。曹氏的和詩如是感佩：

海上始識君，心敬固已久。蘇州與柳州，是我南遷友。威弧竟弗神，九州成解紐。高樓萬首詩，餘事已不朽。平生薑桂性，到老更難揉。枕戈欲何為，志在掃羣醜。江湖未忍歸，閒却垂釣手。願持却老方，更益斯民壽。

14

一樁革命，不同的歷史現場，被拋擲的清遺民多少懷有或隱或顯的歷史傷痛，似乎可以在鄭氏的言行裡得到平靜。鄭孝胥前半生行跡建構的形象相當鮮明，不止於詩學的成就而已，曹氏即有詩曰：「盛名豈以詩人重，大節寧容世論猜。」<sup>15</sup>可以想見，鄭孝胥正視現實的神色為人敬重，自言：「吾儕各垂老，薑桂性愈辣。固知不可口，安得變甘滑。」<sup>16</sup>非時局所用仍不改其志，行藏於海上，任「海藏樓」成為隱逸的座標。

自辛亥之變興，鄭氏展現的名節深化了「海藏」作為「士階層」群體面對鼎革躬先表率的姿態，甚或一項安置自我或出或處的技藝。時至丙寅（1926）年，曹經沅表露了長期以來的觀察：

巖棲何地覓王官，如此神州袖手難。出岫當為天下雨，垂緺偏耐海濱寒。  
行藏幾輩知孤尚，哀樂中年有萬端。珠氣瑤光甘自閟，世人早作一星看。

17

任職於溥儀在天津租界的小朝廷，鄭孝胥往來「海藏樓」與「夜起庵」之間。曹氏在其間的行跡發現了有趣的對照：一是強以高樓安置不得鳴放的悲怨；一是在政治現場力圖振作的雄心。「巖棲何地覓王官，如此神州袖手難」寫出了鄭孝胥在貧瘠時代的作為，歸隱並非全然割捨與政治的聯繫，進退自有妙理，「覓」字則拈出了「海藏」的動機，貫徹著「避地待時」之志。而「夜起庵」的築立確認了鄭氏的際遇如此難得，當是時雨化之，扶助王朝復興。無論如何，鄭孝胥在感受革命震盪以後，依然恪守與民國的對立位置，一貫之的態度其實在當時「士階層」不得已的抉擇裡總是猶疑。<sup>18</sup>於此，「珠氣瑤光甘自閟」，

<sup>14</sup> 曹經沅：〈未明訪太夷，辱贈長句，次韻奉答二首〉，收入氏遺稿；王仲鏞編校：《借槐廬詩集》（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頁88。

<sup>15</sup> 同前註，〈太夷七十生日〉，頁72。

<sup>16</sup> 鄭孝胥：〈贈高獻桐〉，《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182。

<sup>17</sup> 曹經沅：〈賦答太夷即用其由滬赴津詩韻〉，《借槐廬詩集》，頁60。

<sup>18</sup> 周明之以西方保守者時常缺乏「有實際內容的理想」（a substantire ideal）的論點評述清遺老面對「復辟」的普遍心理，而「遺老之中，只有鄭孝胥有一些計劃」，最終體現在滿洲國的政策發想。見氏著：《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94-95。

世人早作一星看」稱許鄭氏已構成北斗星之一，前導帝車，以齊七政。「海藏」從未退去政治的懷抱，真正體現了他人臨淵羨魚的想望。

曹氏題名「即用其由滬赴津詩韻」，對應的是鄭孝胥同年 11 月 30 日所作的〈將赴天津〉：

羈旅心知異守官，暫歸猶覺別家難。看花隔歲休驚老，投袂臨歧敢避寒？  
婚嫁粗完身可去，兵戈間阻事無端。小窗短榻裁容膝，誰作高樓百尺看？

19

詩人的親身經歷甚是道出了為延續懷抱的艱難，覓得「王官」，情願捨棄日常經營而斡旋於政治場域，事皆立辦。有意思的是，不只驚覺時間的飛逝，鄭孝胥亦適應了空間的轉換，意會到「海藏樓」與「夜起庵」的分別：「小窗短榻裁容膝，誰作高樓百尺看？」兩者劃出一些巧妙的對立：「上海／天津」、「歸隱／出仕」，甚或在寓居的格局標示了鄭孝胥的境況。且看一則日記（1926 年 3 月 3 日）載錄的紀事：

午後，張園忽來電話，云「上欲來廣東路」，懇陳「室小不潔，求勿臨幸」。  
復電云：「已出矣。」有頃，乘輿至宅，從者唯日本警官一人。孝胥跪迎門內。上至樓下，云：「住樓上否？我欲登樓。」遂從上登樓，至書室小坐，進茶。上諭云：「聞所居至狹隘，特欲臨視。上海屋頗佳，乃能羈棲於此，真可謂臥薪嘗膽矣。由此觀之，張園尚太好也。」<sup>20</sup>

溥儀臨時的探訪正好揭示了兩者的分別，相對於「海藏樓」的富麗堂皇，「夜起庵」顯然褊小不少。「臥薪嘗膽」看似一句笑語，倒也符合鄭孝胥在天津期望引領小朝廷完成的使命。「小窗短榻裁容膝」縱然不見「高樓」，需要幾分妥協，而鄭孝胥甘之如飴的情懷背後，有相當細密的自我技術作為調節之道：

昧爽趨行在，二年如一日。我心非有求，吾道貫於一。持是將安窮，前途黑如漆。暗飛能自照，宵行亦奚失。<sup>21</sup>

「昧爽」即場景，通向皇城，以「行在」為鍛鍊的終點，日復一日，在天津謹守如是簡明而嚴整的「夜起」程序。緣於「前途黑如漆」的認知，鄭氏擬定的工夫始於薄曉，靜待天明的儀式彷若盼求著王朝再次升起。尚且，鄭孝胥自覺「夜起」是持續且全心投入的修行，經營一場又一場無止盡的自我對話，在重整的思想道路以內在的「高靈」（Great Man）正視了「陰影」（shadow）的存

<sup>19</sup> 鄭孝胥：〈將赴天津〉，《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338。

<sup>20</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090。

<sup>21</sup> 鄭孝胥：〈夜起庵雜詩·其二〉，《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340-341。

在。<sup>22</sup>有為者潛行黑夜，「臥薪嘗膽」乃「道」之歸旨，逐次匯聚充分的動能以映照前途，為鄭孝胥的晚期思想確立了具體的理論內容，故君子慎其獨也。

## 二、從「滿洲國」到「夜起」

汪辟疆（1887—1966）述及「夜起」的緣由，可以發現一道私密的歷史軌跡：

吾嘗見孝胥為其姪孫彥綸書箋一詩云：「山如旗鼓開，江自南塘下。海日生未生，有人起長夜。」此為其早年居福州南臺山之作，凌厲無前，寄意深遠。細細味之，頗有劉越石聞雞起舞之意，而其人之不甘寂寞，低首扶桑，真可以窺其隱微矣。此詩未收入《海藏樓集》，蓋不輕示人也。<sup>23</sup>

「夜起」在鄭孝胥前半生即有發明，據汪氏的評述，肯定他及時奮起的意向，卻又不免將如是慎重的工夫與出任滿洲國總理的決定聯繫——「夜起」的執念終於「不甘寂寞」，聽任歷史的後見之明顛覆了鄭孝胥可能投入的無限心緒。誠然，類似的論斷在學界的研究多有發揮，顯現一種「知人論世」的難題。面對「集政客與文人身份於一體的個案」，欲擺脫「民族主義」及「勝利者史觀」的干擾，將現有材料的縫合趨近歷史事實，而古典詩詞的「言志」傳統得以進一步探照詩人在蓋棺論定以前的情志表現。<sup>24</sup>汪氏別處亦有評論：「此詩太夷甚自負，以為有英雄氣也。鄭在滬時，嘗自署名為夜起，本此。」<sup>25</sup>於是乎，「夜起」的工夫淪為得意忘形的舉措，忽視鄭氏其間匯聚的動能及有所指涉的政治想望。

值得求索的是，作為一生奉行的原則，鄭孝胥為何在天津時期尤其重視

<sup>22</sup> 瑪莉一路易絲·弗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有時候，一個英雄式的決定或許有助於遏止它們，但是，只有內在的『高靈』（Great Man）（即「本我」（Self））幫助個體徹底去實踐時，這種超人式的努力，才有可能達成目的。然而，陰影含有不可抗力的衝動、壓制一切的力量，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這種驅力應該施以英雄式地壓抑。有時候，陰影也很有力量，因為『本我』的衝動與它指向同一個目標，因而，人們不知道究竟是『本我』，抑或是陰影隱藏在內在壓力的背後。」見氏著：〈個體化過程〉，收入卡爾·榮格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臺北：立緒文化，1999年），頁207。

<sup>23</sup> 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收入氏著；張亞權編撰：《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24。

<sup>24</sup> 近年來，學界逐步展開相關的省思，尤其是戰爭前後時期的文人／政客以古典詩詞為載體得以傳達的各種心緒：「不但可以看做政治處境下自我生命狀態的抒情表述，也是對政治局勢與現象的某種投射。」請見高嘉謙：〈家國零落餘此身：梁鴻志通敵前後的憂患與風雅〉，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古典文學新視境」學術研討會，2016年4月，頁247-249。

<sup>25</sup> 汪辟疆：〈讀常見書齋小記〉，《汪辟疆詩學論集》下冊，頁446。

「夜起」？換言之，在生命晚期重拾「夜起」的意義又如何理解？「英雄氣」的評論來自鄭孝胥在詩文裡不斷張揚的性格，弦外之音則是出任「偽」職的決定誤了晚節——「英雄」只存在勝利者編寫的情節裡，「負氣」徒為「自負」而已。另一方面，辛亥以後面對相似境遇的陳衍（1856—1937）如是評述「夜起」：

清季國事日非，蘇戡中宵即起，托詞鍛鍊筋骨，備萬一起用上陣，實就其妾宿也。為妻所破，詬諱之聲，聞於戶外。蘇戡大言欺世，家之不齊，安能救國乎！<sup>26</sup>

錢鍾書（1910—1998）案語提及鄭孝胥為京劇女伶金月梅（1878—1924）一段情緣創作的香艷詩，曾刊載 1916 年的《大中華雜誌》。陳衍將此事聯繫「夜起」，揶揄鄭氏夜半不眠乃就其妾宿，言下之意，即是斥責其作為非「救國」之道也。有意思的是，陳衍的偏見有脈絡可循，且看 1902 年〈和蘇戡雙清館詩〉：「老去風懷久不提，因君回首暫尋思。堂堂百事從耽閑，碌碌雙鬟孰可兒。準擬閑情編語錄，斬新色界裊游絲。齊紈尺素狂言在，祇算清狂抑算癡。」

<sup>27</sup> 「雙清」乃鄭孝胥為月梅之命名，取「梅月雙清」之意。<sup>28</sup> 陳衍早年的和詩倒是從鄭氏的交往發生聯想，追憶當年「閑情」得失，亦是惆悵且清狂。然而，《石語》表露的態度截然不同，以為鄭孝胥的行徑早已預示了政治的終局。究其道理，陳衍即言：「近來行為益復喪心病狂，余與之絕交久矣。」言論發於 1932 年陰曆除夕，錢鍾書亦有案曰：「時一二八滬戰方劇。」<sup>29</sup> 同年三月，滿洲國成立，鄭孝胥出任國務總理，自是陳氏以為「喪心病狂」之貌。且看陳衍如何借李宣龔（1876—1953）輓詩「生憎虎豹當闌（關）惡，轉覺麒麟臥地安」（〈輓弢庵太傅〉）評述一齊身在東北的陳寶琛（1848—1935）：「蓋滿洲為保護國，弢老絕不與其事也。」<sup>30</sup> 可以想見，對於出任要職的鄭孝胥，陳衍不能苟同其作為，二老竟作絕交矣。

甚者，陳衍在 1934 年重新編寫的《續石遺室詩話》論及嚴復（1854—1921）詩作展示的公理與人道主義，其間引述一則嚴氏對王安石（1021—1086）批評子貢（520 B.C.—456 B.C.）的批評。王氏詩曰：「一來齊境助奸臣，去誤驕王

<sup>26</sup> 陳衍說；錢鍾書記：《石語》，收入氏著；陳步編：《陳石遺集》下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185-2186。

<sup>27</sup> 陳衍：〈和蘇戡雙清館詩〉，《石遺室詩集·卷三》，《陳石遺集》上冊，頁 119。

<sup>28</sup> 斗山山人著；齊思整理：〈記女伶金月梅母女事〉，收入章伯鋒主編：《近代史資料》總 75 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66。

<sup>29</sup> 陳衍說；錢鍾書記：《石語》，頁 2183。

<sup>30</sup> 陳衍：《續石遺室詩話·卷六》，收入氏著；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673。

亦苦辛。魯國存亡宜有命，區區反覆爾何人。」（〈子貢〉）嚴氏如是回應：

意云子貢不宜設機詐，如戰國策士之所為，其陳義可謂高矣。雖然，果如荊公言，則孔子且無所逃責。子貢之出，孔子之使也。顧不知子貢所為，有大異於戰國儀、秦諸策士者，策士志在權利，而子貢則存魯而外，無他圖焉。機詐豈非所污，而宗國不可以不救。今人動言愛國，至於謀國專對，則瞻徇毀譽，愛惜毛羽，而置宗國利害於不顧。

申明「存魯」是子貢自始至終的追求，不以權利為念。於此，話鋒轉向了今日，在救亡圖存之時，依樣劃分了「策士」與「子貢」，前者心中已然不見「宗國」，徇顧私情而已矣。又言：「余嘗謂孔門賢才，以子貢為第一。苟利國家，生死以之，豈能以鄰國之君之不義，而效陳仲子之不食不居乎？」在「義利之辨」的論題標舉「義」與「存魯」的聯繫，而宗國不可以不救。有意思的是，陳衍順著嚴復的言說，表述對今人「愛國」的看法，內容直指鄭孝胥的政治情操：

〈題吳觀岱松風圖〉云：「去年蒼柏曾吾壽，此日青松又入圖。好著茅亭覆岱阮，山河無地覓黃墟。」句如〈寄蘇戲〉云：「李白世人皆欲殺，陶潛吾駕固難回。」下句是海藏執拗真相。上句則詩讖應於今日矣。<sup>31</sup>

嚴復於 1921 年逝世，不見鄭氏爭議的政治抉擇，陳衍則以「詩讖」召喚回來，解析嚴氏的詩作如何預示今日命運，時間的跳接其實隱含的是自己的評判。嚴復與鄭孝胥在辛亥以後不主共和的立場相當，堅守朝廷，自言：「或詢其素主新學，何為居腐敗政府之下而不去耶？答曰，嘗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況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黨未必如湯，吾何能遽去哉！」（1911 年 12 月 22 日）<sup>32</sup>於此，以典故敘寫鄭孝胥「吾駕不可回」的心聲，嚴復也是感同身受。然而，這些材料在《續石遺室詩話》有所發揮，展現陳衍以意逆志的閱讀。取用另一首詩起興：「好著茅亭覆岱阮，山河無地覓黃墟。」嚴氏觀圖自得，盡是竹林賢士的夢往神遊，企盼相同的胸懷以動身追尋棲遁的樂土。陳衍則以為句若〈寄蘇戲〉：「李白世人皆欲殺，陶潛吾駕固難回。」投以特別的角度，分別對應不同的指涉，倒果為因，直言：「下句是海藏執拗真相。上句則詩讖應於今日矣。」上句的典故來自杜甫（712—770）深深同情：「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不見〉），彼此不見十六年餘，即使李白（701—762）入永王幕府牽連「從逆」罪名，名節不再，杜甫仍憐惜其才性。嚴復原詩或有此意，陳衍則攫取表象發散的輿論，借喻鄭孝胥加入滿洲國的叛逆行徑，何以得不到同輩的諒解。因而「詩讖」便由字面意義說解，暗示鄭氏確實如同嚴復的詩句，

<sup>31</sup> 同前註，頁 678。

<sup>32</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373。

遭遇「世人皆欲殺」的景況；下句則聯繫了陶淵明（365？—427）的志向：「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通過設問以表明與世隔絕只為成全自我的心意，嚴復詩作寫在 1914 年，為鄭孝胥閉門「海藏」而發。陳衍卻不過問「疑我與時乖」，描述鄭氏一意孤行的面目。同樣地，「好著茅亭覆茆阮，山河無地覓黃壚。」亦作如是解：喜好與竹林賢士神會的情景顯得矯情立異，暗諷了鄭孝胥出任偽職與隱逸宣言之間的矛盾——「海藏」的終點竟是滿洲國的總理位置；下句敘寫當鄭氏尋遍不著來者懷想前賢的黃公酒壚，「海藏」不能，彷若注定了與避世背離的結果。陳衍有意的誤讀不符合原作者本意，在詩話的體裁契約裡，以嚴復的詩回應「子貢／策士」的義利之辨，而今日鄭孝胥即是主要標的。

滿洲國的政治抉擇成為二老交惡的主因，陳衍的言論無限膨脹，將鄭孝胥形塑的風格誇辯為非言，帶有相當強烈的私人情緒。尤其是「夜起」，陳衍的評判並不一致，晚期的譏諷語詞顯然針對鄭氏近來「喪心病狂」之舉。且看 1919 年，陳衍嘗以鄭孝胥與沈曾植（1850—1922）全然不同的作息為題：

海藏早睡習為常，海日談深愛夜涼。不道近來稱寐叟，南樓閑卻幾胡牀。

海藏早起先朝曥，我亦晨光入望微。欲以曉行償夜坐，一吟披草露霑衣。

33

〈其一〉悄悄為沈氏翻越了「寐叟」的名號，似乎有不得已的心緒隱隱作痛。於此，與鄭氏的「早睡」彼此相對，放置於辛亥以後的時空，陳衍便在〈其二〉申明自己欲「曉行」而不可得的緣由——「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二〉）的典故標示了隱逸者的姿態，不願面對神州陸沉的事實，一次次無能為力的追憶，終是夜不成眠。陳衍前日亦有詩曰：「夜色朧朧最有情，月華纔吐薄雲生。盆蘭荔子皆鄉物，故國樓臺夢不成……」<sup>34</sup>詩人如是執著於「夜」，遙想著不復存在的故國。誠然，被拋擲的「土階層」在租界頻繁往來，承載著共同的歷史傷痛，凝聚成詩。有意思的是，陳衍詩作延續了時代命題，提出的解釋倒也不是發乎情志的遺民心聲。《石遺室詩話》即曰：「自前清革命，而舊日之官僚伏處不出者，頓添許多詩料……故今日世界，亂離為公共之戚，興廢乃一家之言。」<sup>35</sup>慘淡的景況給了詩人豐沛的材料，陳衍有意探測詩學在革命以後的轉向，不受制於傳統的遺民框架。於此，且不論其在政治現實的出處進退，詩作起於鄭孝胥的「早睡」與「早起」，歸結「夜坐」之必然，大抵明白此一作息乃行藏於世的技藝，即是鄭氏承受歷史興替的一種

<sup>33</sup> 陳衍：〈早睡早起二首示海日海藏〉，《石遺室詩集・卷九》，頁 280-281。

<sup>34</sup> 同前註，〈拔可園中夜坐與蘇戡言詩〉，頁 280。

<sup>35</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九》，《陳衍詩論合集》上冊，頁 132-133。

方式。同年，陳衍的詩作依然有所聯繫：

又到將詩換菊時，依然無菊采東籬。  
難從鄭圃分盈把，也向吳園乞數枝。  
浥露遙知常早起，餐英直欲告朝飢。  
靈均靖節皆無俚，何似攜壺杜牧之。

36

詩注提及「去年在上海以詩向君乞菊」的雅趣，鄭孝胥當時的回應為動盪政局影響顯得有些頹喪：「故人苦憶故山青，拋却東籬祇獨醒。病起吟箋能小草，夢回叢菊在雙瓶。客中欲問愁何味，晚景相看鬢已星。且約窗間常促膝，海天寒雨任冥冥。」<sup>37</sup>如今，陳衍的回憶落在「東籬」，取自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的典故，而「依然無菊」道出了處境仍舊艱難，不見望南山之悠然，徒留屈原（340 B.C.—278 B.C.）「獨醒」之悲怨。同樣地，陳衍又一次說到了鄭孝胥的「早起」，遙想著隱逸者的心理：「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離騷〉）這次卻打破了對話的慣習，不再張揚遺民的話題，詩曰：「浥露遙知常早起，餐英直欲告朝飢。」恰似一則歸返生活的啟示，黃花使人憔悴，孑然一身的終場惟有寂寞而已。陳衍又作乞菊詩，想是再回應去年鄭孝胥的和詩，欲消除對方心頭揮之不去的愁緒，又言：「靈均靖節皆無俚，何似攜壺杜牧之。」冀望解散隱逸之典型，重拾「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杜牧〈九日齊山登高〉）的常足心境。

綜言之，陳衍 1919 年以「夜起」發想的詩作，將鄭孝胥的行徑聯繫至清遺民的重重心事；1932 年的《石語》則給予了不同的詮釋，因小見大，改口說道：「蘇戡大言欺世，家之不齊，安能救國乎！」究其原由，投靠日本的決定乃顛倒形象之關鍵。論者以為陳衍的評價「存勢利之心」<sup>38</sup>，甚或「陳氏則倡國府不用鄭孝胥遂有瀋陽事變之謬論，而其徒黃濬、梁鴻志則為出賣民族之罪人」<sup>39</sup>云云，既不站在遺民的立場，也不張揚民族大義，其評斷是非主要來自個別的觀感。另一方面，汪辟疆在「夜起」探測的「英雄氣」淪為「只緣英氣平生誤，未信寒蛟竟可置」，並曰：「蓋以自托殷頑，而不知受庇倭人，於清室為不忠，於民族為不孝。」<sup>40</sup>嘗以相當平穩的民族史觀，嚴詞否定了鄭孝胥的遺民行徑。值得注意的是，程千帆（1913—2000）先生的校注引述其父為鄭

<sup>36</sup> 陳衍：〈寄蘇戡〉，《石遺室詩集·卷九》，頁 287。

<sup>37</sup> 鄭孝胥：〈叔伊以詩索剪菊插瓶〉，《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288。當年，陳衍乞菊詩曰：「連朝看徧菊花堆，客舍羌無隙地栽。尊酒已孤重九節，瓷瓶纔寄一雙來。折枝聊欲分盈把，數朵還期帶半開。少損東籬黃紫色，愧無以報小詩裁。」見氏著：〈向海藏乞菊數枝插瓶〉，《石遺室詩集·卷八》，頁 262。

<sup>38</sup> 劉夢芙：〈《石語》評箋〉，《二錢詩學之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7 年），頁 207。

<sup>39</sup> 汪辟疆：〈評方回《桐江續集》〉，《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頁 384。

<sup>40</sup> 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新校本）》，《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頁 69。

孝胥作的輓詩，提供了不同的觀點：

高名一代海藏樓，晚節千秋質九幽。片語救亡臣有策，終身為虜我何憂。  
寧將國命酬孤注，未必行藏不贅疣。誰識南台起長夜，陸沉久已志神州。  
(〈哀鄭重九〉)<sup>41</sup>

汪辟疆只取用「片語救亡臣有策，終身為虜我何憂」二句，旁證原文的論斷，以為鄭氏束手為俘虜即失去了對家國的憂患意識，利益終為外敵佔有。而程康的詩作未有先入為主的評判，留待陰世予以詰問。下半聯的緬懷倒是貼近了鄭孝胥內在的想法。「寧將國命酬孤注」標示了鄭孝胥的方向，「行藏」與「起長夜」都有明確的政治動能。無論「神州」落在何處，詩人依然敬重鄭氏延續王朝的決心，且投入了長期的準備，待機而發。於此，回顧「夜起」，值得細心探討鄭孝胥內在的政治動能如何透過規律的作息，蓄精蓄銳地想像「神州」的面目？有意思的是，在時間的齊整之外，「夜起」的內蘊相當豐富，匯聚了前半生的學養及觀測事物的看法，與文化傳統的滋潤亦有脈絡可循。鄭孝胥在生命晚期自成一家的風格如是顯現，具體的內在理路還有待完善的求索。

## 第二節 革命

### 一、無明火

「夜起」圍繞著時人的後見之明，關於鄭孝胥的建設及內心獨白則未有太多的認識。詩人在黑夜的行蹤看似詭譎怪誕，亦有推向「神祕主義」的解釋。《鄭孝胥傳》記載：「先生生時，太夫人夢見一鶴翩飛，疑為鶴之轉世，先生行步坐息，亦咸具鶴形，每當雜行人眾中，真有昂昂然如出羣之鶴之概……」<sup>42</sup>於此，識者聯繫「鶴知將旦，鶴知夜半」(《淮南子·說山訓》)的文化傳統，將「夜起」理解鄭孝胥附會轉世的隱祕情結。<sup>43</sup>另一方面，「夜起」可以追溯至光緒十六年（1890）的「夜坐」詩，即是「士階層」面對王朝逐漸凋零，表現在鄭孝胥身上作為憂心國事的某種象徵。<sup>44</sup>甚者，身分的轉換與調適在鄭氏 1926 年築立的「夜起庵」也有拾回初衷之想望，遭遇敗挫卻無能為力的「英雄氣」需要一道整備的

<sup>41</sup> 同前註。

<sup>42</sup>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 147。

<sup>43</sup> 張榮明：〈「鶴知夜半」：鄭孝胥的隱祕情結〉，《從老莊哲學至晚清方術——中國神祕主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84-285。

<sup>44</sup> 張煜：〈重九與夜起——鄭孝胥詩歌初探〉，《同光體詩人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229-230。

過程。<sup>45</sup>無論如何，「夜起」到底是鄭孝胥發明的技藝，關乎自我如何安頓歷史喧囂的心法，在外緣的推求之餘，也不能忽略了內在建構「夜起」的儀式規劃與漫流其間的政治意識。

陳衍於 1919 年以「早睡」與「早起」為題的詩作，鄭孝胥即有回應：

寐叟深言夜坐非，石遺極道曉行奇。海藏夜夜樓頭坐，卻是晨鐘欲動時。

聞雞待旦已為常，早睡翻成減睡方。記與壺公論夜色，四更霜月抱冰堂。

<sup>46</sup>

兩首詩區別了自己與沈曾植和陳衍的作息，既非「寐叟」，也不執著於「曉行」，而是「減睡」起於黑夜結束之際，獨自等候天明的到來，構成了一種奇特的修行模式。標舉「夜起」的殊別，藏有鄭孝胥以為的哲理，有意思的是，〈其二〉遙想過去「夜起」常與張之洞（1837—1909）談天論地的時光。可以想見，「夜起」乃鄭氏長久以來的習慣，尤其感念武漢幕府時期的際遇。如今，「抱冰堂」已是歷史記憶，鄭氏在陳衍為故國哀歎的情緒裡召喚過去的場景，構成了最近「夜起」的思想內容。甚且，前文引述了鄭孝胥「拋却東籬祇獨醒」的心理，而「夜起」即是現實情境一種「獨醒」的荒涼：

前身為老卒，夜夜登戍樓。一生看太白，不知春與秋。今我復何為，山川  
非昔遊。杜門獨長嘯，兵戈送白頭。夙根殊未忘，聞鷄如有求。終年起殘  
夜，哀思變明幽。世亂須至人，安知非楚囚？<sup>47</sup>

此詩寫作於 1918 年，敘寫鄭孝胥「夜起」時的片段追憶。開篇懷想了昔日功業，「老卒」與「戍樓」、「山川」意有所指，「鄭龍州」的名號歷歷在目，那些日子的「夜起」有政治上的恣意，無論時間的推移，察日行以處位。<sup>48</sup>同樣地，鄭氏與陳衍唱和的「抱冰堂」，其中「夜起」則朝向了張之洞的「夜談」

<sup>45</sup> 陳仕軒：〈殘夜不須眠——論鄭孝胥晚期的政治詩作〉，103-106。

<sup>46</sup> 鄭孝胥：〈石遺示早睡早起二詩〉，《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292。

<sup>47</sup> 同前註，〈雜詩〉，頁 286。

<sup>48</sup> 鄭孝胥在龍州的邊防經歷琢磨了自己以為可以成就的政治事業，日記之外的第一手材料請見孟森：《廣西邊事旁記》，收入氏著；孫家紅編：《孟森政法著譯集刊》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3-44。值得注意的是，鄭氏在龍州三年績效斐然，內心卻有遭時不遇之思，自言：「邊事將誰語？勞人失自謀。平生江海思，坐覺負扁舟。」（〈勞人〉）甚者，有詩題曰「余去年與人書有曰以詩人而為邊帥俗子或疑邊帥之貴余乃解之」，開篇即言：「高樓先生耽苦吟，廿年來往江之濱。何曾夢見煙瘴地，蠻荒一落顏為黔……。」類似的心緒常以「夢」為指引：「迷魂飄蕩觸鷄鳴，枕上驚回已四更。往恨新愁紛入夢，雨聲蟲語驟難明。才華負汝休論命，憂患磨人轉畏名。百倍近來情緒惡，欲從底處換無情。」（〈枕上〉）終年無好懷抱，決意離去，夢境已大過現實情景的求索：「我雖敦詩書，何嘗習為將。事急適無人，馬箠偶一仗。瓜時當受代，豈免懷怏怏。登樓發長嘯，遮眼憎疊嶂。濠堂與鷗榭，恍惚夢欲忘。」（〈十月十七日奏辭督辦邊防〉）見鄭孝胥：《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136-141。

邀約，得以長篇闡論、侃侃而談。<sup>49</sup>今日鄭孝胥在辛亥革命以後的「海藏樓」無人問津，依然「夜起」卻又大不相同的心情體現在詩作裡的轉折：「夙根殊未忘，聞鶴如有求。」細數過去輝煌，即使沒有精確的工夫進程，黑夜正是鄭孝胥為政事運籌帷幄的背景。直到民國軍的壓境，打亂了王朝及自身維持已久的秩序，「夜起」竟是一種「有求」的姿勢，懷想往日光采，為了覆滅的政治理想起身招魂。於是乎，理想與現實的失衡化為悲怨，積聚的情感在「海藏樓」悶悶不已，詩人以為「明幽」的釋然心理，在結尾處止不住一生負氣：「世亂須至人，安知非楚囚？」深信自己仍是逆轉時局的最佳人選，何如抱守危樓獨自長嘯？

鄭孝胥「終年起殘夜」的儀式，經歷早年「夜坐」，抑或武漢幕府出席南皮的「夜談」、龍州三年之「枕上」，而辛亥革命撕毀了預期的政治藍圖，「夜起」常規也隨之變化，有著不同的顯現與樣態。1911年12月7日，一封自稱革命團的來函，內緘《中外日報》、《晚報》二紙，其中《晚報》一則敷衍了袁世凱（1859—1916）特商鄭孝胥控制報館機關的故事，鄭氏的形象在紙上有些深奸巨滑，呈現了一代老臣的保守面目：

當到滬之次日，鄭、孟（昭常）即邀同某某數報主任飲宴。席間，孟賊即盛稱袁世凱之奇才，並反對共和政策，其言語頗有不堪入耳者。鄭賊反對尤甚，口口大罵「小孩子們何能成大事」，言語之間若有不勝其憤怒者。

甚且，二人致袁氏的英文密電疑似為人揭發，曝光了鄭孝胥的政治意圖：「此電稿紙，鄭賊所用之海藏樓詩草箋，其電文中『幸蘇龜力成』五字系鄭賊親筆自添者。」另一份《中外日報》則作為旁證，加以民國軍欣喜的口吻：「揭發漢奸隱私，熱血義憤，欽佩莫名。」<sup>50</sup>當時袁世凱確實是鄭孝胥在政局動盪之際依賴的軍事勢力，無論議事內容如何，大抵是協調與應對的手段。而民國軍的戲謔加強了彼此敵對的張力，類似的聲明屢傳不絕，脅迫的言論將鄭氏澈底捲入革命的氛圍，深化了反動的立場。其後，孟昭常（1871—1918）告白於《民立報》，聲稱「無從有商買報館及帶款來滬之事」，駁詰《中外日報》之偽作電文。如是澄清，竟然得到民國軍「以刀筆破壞革命」的回應，革命時刻的交鋒幾乎一觸即發。（1911年12月10—13日）

<sup>49</sup> 武漢幕府時期，張之洞時常邀約「夜談」，鄭孝胥自是座上賓，也是政見的引導者。且看日記一則完整的「夜談」過程：「廣雅傳見，遂入署，候至四點，始令過仲弢（黃紹箕），夜間俱入談……晚飯後再入署，共仲弢談至十二點，仲弢倦臥，余獨坐閱《陸純伯日記》。一點半，廣雅始邀入內室，手書小札令察鋼藥廠情形，四點半乃退。過江，天已明。」（1901年3月3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786。

<sup>50</sup> 同前註，第3冊，頁1366-1367。

有意思的是，鄭孝胥的「夜起」悄悄舉行，卻是一次次沉痛的醒覺。1911年12月4日，首次收到革命團的印刷傳單，題曰：〈請看漢奸〉，意在恫嚇。當晚，鄭氏遣人輪番守夜，半夜三點也自起察看。每晚不斷投書，鄭孝胥「夜起」依然如故，且12月30日記曰：「夜，月明。頭癩頗劇，未能起巡。」<sup>51</sup>可以想見，這段時期密集的「夜起」，關聯著革命團威脅帶來的警覺意識：

樓前夜色暗屯兵，雨猛風饕正四更。呵壁問天終不測，枕戈待旦獨難平。  
寇讎土芥成酬報，猿鶴蟲沙孰重輕？剩約毘陵子陸子，陽狂被髮送餘生。

52

詩人心神疊合了屈原「問天」的意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深夜時分，面對社會的動盪也不能有絲毫鬆懈，內外衝突不斷，鄭孝胥滿腹牢騷難以平息。下半聯悲歎已然顛倒錯亂的秩序，革命如是針鋒相對，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時至「失心瘋」者奸巧取得不屬於他們的歷史，假以共和取代正統，原有的道德倫常盡為覆滅。<sup>53</sup>避居「海藏樓」也無能為力，鄭氏遙想陸爾奎（1862—1935）面對「惡國人之不義，欲被髮陽狂以終老」的決心，或許不滿於「偷生世界」的唯一抉擇。

隨之而來的警戒心理，鄭孝胥倦累「夜起」，身處「海藏樓」進退不得，只能反覆辯證清王朝崩落的政治現實。日記（1911年11月23日）記曰：

而余獨袖手海藏樓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競爭之局者。在湖南則驅之至北京，在北京則驅之至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張是？人生種因得果，類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樓，遂適為避世之地，此豈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樓中，昧爽即起，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運思操勞，絕非庸庸厚福之比；使余與聞世事，必有過人之處。<sup>54</sup>

時局的騷動，鄭孝胥總是不甘示弱，「海藏樓」束縛了行動，也給予更多想像的空間。「避世」絕非「避居」，鄭孝胥的「夜起」自然未有「海藏」的快活，且以文字構築清王朝錯過的現實。日記寫著近來「夜起」的過程，追根究柢，

<sup>51</sup> 同前註，頁1376。

<sup>52</sup> 鄭孝胥：〈十月二十八日夜起〉，《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22。

<sup>53</sup> 日記記曰：「南方士大夫毫無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於共和實無所解，鄙語有所謂『失心瘋』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損人久成習慣之社會，而欲高談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之效也，此歲時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擾亂天下，能發而不能收，其禍可勝言乎！」（1911年11月22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8。於此，鄭孝胥「寇讎土芥成酬報」即有劃分「共和／王朝」立場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鄭氏並未全然否定共和，只是為輕視提倡者與附和者之智識而鳴。

<sup>54</sup> 同前註。

「運思操勞」緣於民國軍的侵擾與毫無操守之士大夫，鄭氏則直言盡意：「使余與聞世事，必有過人之處。」圍繞「夜起」的「英雄氣」依然強盛，凝結為自身對此刻仍在「海藏樓」的質疑。誠然，狂言過後，藏不住的還是不及實現的悲怨，任黑夜安排與自己的陰影遇會：「少年南北行萬里，銷盡雄心最可悲。今日滄桑千萬恨，高樓涼雨夜談時。」<sup>55</sup>歷史重新定位，時代的面目逐漸清晰，鄭孝胥細心檢索不同時期的政治光譜，感慨著今日「海藏樓」的袖手旁觀，過程的起落儼然是一種消耗，家國不在，昔日的榮耀亦不復在。

詩文充滿了面對革命時不我與的惱悔，日記也對戛然而止的政治前途感到疑惑：「蓋所種者實為用世之因，而所收者轉得投閑之果，可謂奇矣。」<sup>56</sup>回首來時路，鄭孝胥不解付出的心思總為現實牽累，有意無意之間，千迴百轉還是來到了作為「避世之地」的「海藏樓」。這次清王朝為革命逼向終局，鄭孝胥選擇「避不見客」，似乎找不到凝聚精神氣力出走的理由。<sup>57</sup>鄭氏有詩表明自己的決定：

宴居何所念，一坐歷千劫。半年不出戶，世變方岌岌。……彥回故名士，垂老乃被脅。我曹宜深戒，晚節且孤立。<sup>58</sup>

「海藏樓」周邊危機四伏，未有從前「避地待時」的愜意。相對地，鄭孝胥不得已避居於此，無奈的心緒只能自我封鎖於高樓，與世隔絕，任「無明火」燒毀一切，終至引火自焚。<sup>59</sup>然而，面對民國軍的橫蠻無理，鄭孝胥自言：「與其坐以斷腸，無寧與匪決死。」（1911年10月30日）<sup>60</sup>高樓不得排悶，過去的「海藏」技藝已不能解釋王朝覆滅之後的政治現實，還需要不同的調整方式。作為避難居所的「海藏樓」失去了初衷，鄭孝胥選擇不只是當前凶險的應對，也思量著生命晚期的出處進退。下半聯援引褚彥回（435—432）的典故，張貼一則為政治妥協而賠上名節的警示。意識到決斷的必然，「避不見客」仿若停止了歷史的進程，鄭孝胥執意在「海藏樓」延遲著紫禁城的黃昏。

日記留有〈偶占〉一首，詩曰：「杜門便似龍蛇蟄，北去真疑掩耳雷。猶

<sup>55</sup> 鄭孝胥：〈四月十八夜示中照〉，《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27。

<sup>56</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8。

<sup>57</sup> 胡思敬：「予既蒞滬，則從陳考功伯嚴訪故人居址。伯嚴一一為予述曰……又曰『蘇庵居海藏樓，避不見客。……』」見氏著：〈吳中訪舊記〉，《退廬文集·卷二》，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宣統甲子刊本），頁216。（標點自注）

<sup>58</sup> 鄭孝胥：〈張讓三聞余不出枉視相唁且求作詩〉，《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25-226。

<sup>59</sup> 日記詳實記述著外界紛紛亂事，鄭孝胥即言：「無明火燒世界，理不能喻，情不能感。必待糜爛之後，方有哀悔厭亂之日。」（1911年11月3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4。

<sup>60</sup> 同前註。

有嬋娟憐晚節，萬重雲海伴歸來。」（1912年9月4日）<sup>61</sup>平衡避居與赴國的心理，事過卻未境遷，「海藏樓」的過渡位置為鄭孝胥提供一個支點，可能也是政治生涯最後一次標註的起點。於此，期間持續不斷的「夜起」，將是一段關於晚期風格的修行。詩曰：

幽思破殘夜，禁寒彌憎悽。野蒼霜氣白，窗曙月痕低。我倦不能寢，鷄鳴真欲啼。旁皇殊未已，覓句奈無題。<sup>62</sup>

日記記載：「夜月徹曉，挾霜俱曙。」（1913年11月15日）<sup>63</sup>寒氣襲來，催化了內在騰騰不已的悽怨。「夜起」的內容為革命的威脅佔據，日夜難以分明，等候不著邊際，失去了原本從容自若的境地。「無題」的焦慮，詩人的書寫朝向深處求索，散亂的詩句湊合成章，釐清現實情景，亦有測量晚期姿態的弔詭，盡在「夜起」時分：

曉霧殊未明，墜月欲無焰。樓頭彈指人，忽有山河念。<sup>64</sup>

以「夜起」的風景起興，殘月隱沒茫茫朝霧之中，倖免為日焰灼身。情志引領景物的流動，在日夜的交替之間，欣羨於墜月的安適。詩人的感悟如是發生：現實的動盪尚未平息，混沌的日夜是愁緒的攬動，同時說明了歷史的轉側不安。鄭孝胥日復一日分疏王朝的終局，解釋的突破來自「海藏樓」不曾止息的政治期望。於此，定位晚期還是離不開政治的思量：「樓頭彈指人，忽有山河念。」由高處俯視，琢磨了不同的角度，詩人猜測時局可能的變化，忠憤之情溢於言表，撥開雲霧，悄然覺察時間的飛逝，並深入了它的隙縫，意圖探照未來的一切可能。

## 二、易代之辨

鄭孝胥與革命對抗，甚是與自己的對抗，在「海藏樓」判別情勢，前途未卜，停止的腳步或進或退，難有定論。有意思的是，樓間迴盪的千萬恨意、尚未殆盡之雄心，不會輕易追隨「遺民」的腳步，承擔歷史的責任，倒是遙想楊家將「也烈士暮年、英雄氣短之慨」，詩曰：「暮年楊業竟輿屍，雲代威名自一時。破敵不殊逐雉兔，望風曾說避旌旗。失塗供奉成遺老，垂死英雄有駿姿。」

<sup>61</sup> 同前註，頁1431。

<sup>62</sup> 鄭孝胥：〈幽思〉，《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51。

<sup>63</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490。

<sup>64</sup> 鄭孝胥：〈七月十七日昧爽〉，《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59。

霜月滿天冰作涕，暗嗚猶繞李陵碑。」（1912年12月25日）<sup>65</sup>將「遺老」與「英雄」並立，鄭氏以為「遺民」只是一個選項，且容納了「失塗」及「供奉」之人，真正得以成就生命晚期的作為，有待延續昔日之威名。無奈「李陵碑」常在，英雄難逃一死，不肯屈就於現實，也明白徬徨歧路的困境，只能化作游魂，在時代的接合處徘徊不定。<sup>66</sup>

另一方面，執著於「謁崇陵」<sup>67</sup>的林紓（1852—1924），鄭孝胥雖然體會，依舊延續一致的立場。日記（1914年7月3日）記曰：

〈謁陵圖記〉拜讀，悲愴不已，輒題一詩奉呈。古者，忠臣孝子常恥於自言，不忍以性情不幸之事稍涉於近名故也。兄雖忠烈，亦宜試味此言。人生大節，且待他人論之可矣。胥甚惡國人之不義，又嘆士大夫名節掃地，不能使流俗有所忌憚。生於今日，潔身沒世已恐不易，何暇與時人辨是非乎？兄如以我為偏，幸有以正之。<sup>68</sup>

林紓恪守「遺民」身分及作為值得敬佩，從〈謁陵圖記〉的情感來看，盡是遍地哭聲，了卻餘生志向：「圖付吾子孫，永永寶之，俾知其祖父身雖未仕，而其戀念故主之情，有如此者。」<sup>69</sup>鄭氏予以提醒，放任「性情」氾濫未必是當前最好的收場，何況林紓的文字多少有些誇誕的成分，推至極端的說詞似乎棄絕了可能的出路。<sup>70</sup>誠然，林紓的做法，倒是當時多數「土階層」的抉擇，竭

<sup>65</sup> 鄭孝胥前日觀蓋叫天（1888—1971）演《李陵碑》，有感而發。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446-1447。

<sup>66</sup> 同前註，頁1452。日記記曰：「張堅伯（1875—1945）語余曰：『去年能死，亦可保全名節，然心頗不甘；今年乃追悔其不死，奈何！』余曰：『子盍作已死觀？今日遊魂為變，亦足樂也。』」（1912年2月5日）面對類似的遺民心態，鄭孝胥的寬解落在1912年除夕，彷若定調了自己在革命之後身分的游移不定。

<sup>67</sup> 1913年光緒忌辰，陵墓竣工，二謁崇陵，繪製《謁陵圖》，隔年亦有〈謁陵圖記〉記之。林紓有言：「嗚呼，唯先帝神聖，力圖憲政，乃見沮於群小。孝定皇后，心恤黎元，不忍塗炭，讓政一舉，超軼古今。帝后之仁，被及萬裸。臣紓不肖，未與仕版，然戀恩之心至死不泯。祇謁崇陵，至是為第三次矣。既慶陵工之竣，二聖永安。臣紓果不就委溝壑，歲必一來，用表二百餘年養士之朝，尚有一二小臣，匍匐陵下也。」見氏著：〈三謁崇陵記〉，《畏廬續集》，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7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頁638。（標點自注）

<sup>68</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521。

<sup>69</sup> 林紓：〈謁陵圖記〉，《畏廬續集》，頁637。（標點自注）

<sup>70</sup> 林紓〈謁陵圖記〉：「嗚呼！滄海孤臣犯雪來叩先皇陵殿，未拜，已哽咽不能自勝。九頓首後，伏地失聲而哭。宮門二衛士，為之愕然動容……」（頁637）如是堆疊場景的殘酷、自己的情緒與旁人的感觸，林氏的「遺民」形象隱然有意而為之。又見陳寶琛的壽序：「國變後始盡棄所事，而以賣文鬻畫自給……嘗盡所評《左傳懶華》，上讀而善之，詢君行誼風貌，知其善畫，君因恭繪兩筆以進，上親書『烟雲供養』四字賜之，并時出內府名畫俾縱觀，君狂喜，以為三公不是過。觀君倦倦於在三之義，則向之不應特科，亦非以不仕鳴高矣。」見氏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林君畏廬七十壽序〉，《滄趣樓詩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346。大致可以掌握

力昭示著「遺民」的聲明。<sup>71</sup>而鄭氏羞與為伍，執意歸返自身，有節制地迎向革命帶來的變化，以身作則，以「名節」捍衛「士階層」的典型，表現在顯隱之間。隔年日記（1915年8月6日）亦有重申：

惟名節久而後定，非標榜一時之事。律人宜恕，自律宜嚴。抱不屈之志者，豈必區區求諒於世耶！天下亂猶未定，似不可以易代論。<sup>72</sup>

即是閱讀章梗（1861—1949）〈答金雪孫前輩書〉的心得，並將全文抄寫至日記，內容檢視了兩代遺民的出處，各得其所，自有風采，反駁「遺老流連詩酒，太不雅馴」、「臨死含笑，大非所宜」之說。<sup>73</sup>鄭氏大抵同意章氏的論斷，拒絕一切哀悼及懺悔的姿態。甚且，「天下亂猶未定，似不可以易代論。」亟欲確立的是革命以後如何自處，而非自憐；易代尚未成功，鄭孝胥在「海藏樓」停滯了時間，暫不向前，亦非哀傷於過去。

未若其他「士階層」接受革命的結果，相對於政治身分的「遺民」，鄭孝胥「遺」失的是不及發酵的政治理念，殘「遺」了積聚於胸的「英雄氣」。<sup>74</sup>生於「今日」，鄭孝胥區別「忠臣孝子」以為的「名節」，似乎有意為「士階層」重新形塑不同的典型。然而，多少雄辯只能束之高閣，「海藏樓」從來不是鄭孝胥現時預想的終點。早年「避地待時」的意念為之定調，作為過渡位置，鄭孝胥的停留都是凝聚又一次的政治追逐。革命前夕，鄭氏為此憂心如醒：「時不我與，戢彌天於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猶能肆力於讀書賦詩以橫絕雄視於百世，豈能徜徉徙倚於海藏樓乎！樓且易主，而激宕悠揚之嘯歌音響乃出於何處矮屋之中，未可知也。」（1911年10月27日）<sup>75</sup>懷抱不得施展，「海藏樓」卻成為鄭孝胥「遺民」活動的範圍，如是真誠而寂寞，期間的「夜起」也就有了自憐的慨歎：

---

林紓在革命之後的「遺民」心理。學界對此亦有發揮，請見司徒允：〈林紓晚年的「遺老癖」〉，《書屋》總87期（2005年1月），頁40-41。

<sup>71</sup> 論者指出清遺民接受了前代遺民的風采，表現的行為像是一種展演，沿襲著過去的套路：「不妨可以假設，清遺民當時所在意的只是一種象徵的身份，一種易代之際被格式化了的姿態而已，或者說只是在政局未定的非常時刻選擇的全身遠禍的手段與藉口。」見王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民初上海租界中的清遺民〉，《中國近代史》第7期（2006年7月），頁71。

<sup>72</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573。

<sup>73</sup> 同前註，頁1572-1573。

<sup>74</sup> 王德威先生為構思「後遺民」的可能，釋放了原有「遺民」論述的多重向度，指出「『遺民』的遺字可以有數解：遺是遺『失』——失去或棄絕；遺也是『殘』遺——缺憾和匱乏；但遺同時是遺『傳』——傳衍留駐。」見氏著：〈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36。

<sup>75</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3。

曉色微茫霧未收，夜珠鬱鬱對銀鈎。殘宵誰待東方白，祇有幽人獨倚樓。

76

日夜交替之際，朝霧瀰漫，仿若尚未分明的山河，懸而未決。「夜珠」與「銀鈎」遙遙相望，光輝閃耀在「海藏樓」的內與外，即將隱去了蹤影，縱使詩人把持著黑夜，也待不過拂曉之必然。於是，詩人「夜起」，守著最後一寸黑夜，在「海藏樓」獨自告別，靜靜等待歷史的更迭。

空間注定了面對革命的遙不可及，時間則預示了面對時局的無能為力，鄭孝胥不只經驗了王朝衰落的日復一日，最為深刻的是，真正意識了晚期的蒼涼。而「夜起」承載了未完成的理想，相伴殘宵，望向一片月落星沉：

霏霜蝕月月魂寒，可奈當頭隔霧看。宮闕天高歸已晚，江湖夜永夢將殘。

未斜何礙懸銀漢，自轉休疑失玉盤。白髮丹心人漸老，繞枝烏鵲待誰安？

77

「海藏樓」有「夜珠」守望，樓外亦有「月魂」相映。兩者並起於黑夜，在詩人情感的投影之下，相知且相惜，靜候將來的殘落。開篇發出了對明月的關切，也是來自遠方的繫念。故國如殘月，逐漸凋零，無法親歷革命現場的遺憾，注定了理想的匱乏，唯有「海藏樓」以間接的消息拼湊史實，不著邊際，「可奈當頭隔霧看」，揮之不去的迷霧，纏繞心間，不能成眠，構成了「夜起」不得已的緣由。下半聯領會到殘月只是運行軌道的常態，自有圓缺變化。鄭孝胥以知識切斷了原來的連結，象徵換作對比：若殘月將有盈滿之時，詩人又如何感物？無奈的是，月有陰晴圓缺，年華卻不復返。漫漫長夜，情景不能交融，倒是深化了詩人在晚年難以解決的矛盾。<sup>78</sup>時至 1922 年，消耗多少光陰也換不得理想的解釋：

十年幾見海揚塵，猶是登高北望人。霜菊有情全性命，夜樓何地數星辰？  
晚塗莫問功名意，往事惟餘夢寐親。枉被人稱鄭重九，更無豪語壓悲辛。

79

鄭氏明白十年「避不見客」的一事無成，已不見初始高吟「科頭直上翠微亭，

<sup>76</sup> 鄭孝胥：〈十月二十六夜作〉，《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274。

<sup>77</sup> 同前註，〈詠月當頭〉，頁 298。

<sup>78</sup> 如何自我定義「晚期」，一直是鄭孝胥自革命以後不斷求索的疑問。日記收錄一則為重九日填寫的〈水調歌頭〉，下半闋即曰：「夜枕戈，朝運甓，暗思量：八年面壁不出，萬事付蒼蒼。還我高秋雲物，哀汝名園士女，偶出更須狂。照影吾欲去，相惜鬢霜白。」（1919 年 12 月 6 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1807。大抵歸納了這段時期在海藏樓「避不見客」，必須獨自整理的心緒。

<sup>79</sup> 鄭孝胥：〈九日〉，《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306。

吳甸諸峯向我青」的豪氣，登高淪為慣例，未有「叩蒼冥」的想望。<sup>80</sup>試想餘生去就出處何如？文字只是流連於思親的套路。而秋菊有對抗寒霜的本領，詩人頻繁的「夜起」，無所作為，又如何在天崩地解之後保全其身？鄭孝胥向晚期的歸處不斷探問，盡是覺察了時間惘惘的威脅。

桑兵（1956—）先生如是評說鄭孝胥經歷辛亥革命的心理：「其實，要說鄭孝胥對清室忠貞不貳，的確有些勉強。他之所以堅決與民國為敵，將自己牢牢綁在清朝的沉舟之上，與個人的抱負野心不無關係。」<sup>81</sup>其實一切無關「遺民」，故國亦是泡影，鄭孝胥正視現實，尤其與自我的聯繫，因而「夜起」儼然是一場又一場向深處掘取的修行，遇會了真實的自己。誠然，革命之後，在政事的處理辦法自有積極的面向，理論的重整上，亦有「海藏樓」獨自對革命的創造詮釋、想像的歷史。如今，鄭孝胥不斷探問自身的晚期風格，驀然回首，唯有歸返「政治」才能消解積累已久的憤恨，意義才會發生。有意思的是，「夜起」銘記了這段時期的惶惶不安，多少夜語在「夜起庵」築立後，化為新興的思想資源。

### 第三節 小朝廷

#### 一、歸返

鄭孝胥慎思革命的前因後果，而有晚期思想的萌動，隨著移居天津的機緣有了實現的機會。過去的討論業已指出了「夜起庵」在鄭氏生命歷程的位置：自許最後一次的政治追求，「夜起」一以貫之，從私人的儀式到公開的名號，設想一座通向王道樂土的烏托邦。<sup>82</sup>1924年3月3日，鄭孝胥奉諭為總理內務府大臣，得到「小朝廷」的重用。溥儀以「為謀恢復，必先整頓」的雄心招募了許多「遺老」，經由陳寶琛和莊士敦（1874—1938）的引薦，鄭孝胥盼到了

<sup>80</sup> 鄭孝胥：〈九日獨登清涼山〉，《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2。「鄭重九」名號其來有自：「……先生有詩云：『洞口掃花人，安知即風漢。』蓋以飯依東坡自喻也，並戲語陳蒼虬先生曰：『予每年九月九日，必有詩，他時當呼作鄭重九。』蒼虬先生遂贈以詩云：『諸天龍象表璘珣，洞口蘇龕寂寞身。絕代崎嶇鄭重九，不應來作掃花人。』先生評曰『那得便真相喚，愧愧。』一時傳為西湖佳話。」見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134-135。鄭氏聊以自娛，而陳曾壽的詩亦帶出了「鄭重九」自是不同凡響。

<sup>81</sup> 桑兵：《走進共和：日記所見政權更替時期親歷者的心路歷程：1911—1912》（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47。

<sup>82</sup> 陳仕軒：〈殘夜不須眠——論鄭孝胥晚期的政治詩作〉，頁103-112。

離開「海藏樓」的時機。溥儀如是記述民國十二年（1923）初見面的情景：

他從盤古開天闢地一直談到未來的大清中興，談到高興處，眉飛色舞，唾星亂飛，說到激昂慷慨，聲淚俱下，讓我大為傾倒，我立時決定讓他留下，請他施展他的抱負。

自革命以後在「海藏樓」不問世事，回憶的場景可以明白鄭孝胥積聚了多少政治情懷，甚或製作一套史觀，對清王朝的發展有自己的理解脈絡，而詩文的顯影與「夜起」的儀式，盡是等候以「政治」賦予晚期意義的機會。但是，不經事的溥儀對「遺老」沒有太多區別，只知道「紫禁城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條辮子」，當然不懂鄭氏這段時間的沉潛：「我那時認為他現在放棄了功名利祿前來效力，可見是個難得的忠臣。」自傳還引述了期間職守的「夜直」詩，聲稱「鄭孝胥得到了我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作了兩首詩。」<sup>83</sup>

檢閱同時的「夜直」詩作，鄭氏固然有重拾朝政的感懷：「天命將安歸，要觀人所與。苟能得一士，豈不勝多許……」<sup>84</sup>想像的政治場景絕不止於「內務府」而已，詩作更多的是面對「今日斗筲」的忿懣，以及牛驥同一皐的鄙厭。且看〈夜直雜詩〉系列直陳而綿密的心緒：

亂後離形更絕蹤，倚樓惟覺海吞胸。如何束縛酬知己，便向人間事董龍。

猶記得海上的避居時光，勃騰的恨意不斷填充心裡的空洞，氣憤難平。後半句竟以趨奉小人作為消解的方式，切斷悲怨的來源。如是反諷，似乎暗示自己歸返的處境，人事不齊，不應是過去韜光養晦的結果：

補履千將敢自珍，卅年養氣刃如新。淮陰未合尸無賴，孰視真為胯下人。

鄭氏以己為貴，回溯三十年前在武漢幕府的政治起點，已是歷練之才。由地方到中央，與「淮陰侯」韓信（230 B.C.—196 B.C）「其志與眾異」的形象相當，鄭氏持續表明脫穎而出的雄心，總有「忍辱懷憂志久違」的煩慮：

高鳥猶難避網羅，營巢幕燕意如何。宮中莫愛魚龍戲，四面宵來是楚歌。

85

「高鳥」與「干將」的自我欣賞，反覆悲吟屈就現實的無奈；「高鳥」也是清王朝走向「小朝廷」的妥協，各自為營，不見遍地江山。鄭氏的警語指出虎落平原必須貫徹的心理，隱隱然也有引領其收復失土的想望，豈以整頓內務為餘

<sup>83</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4年），頁121-124。

<sup>84</sup> 鄭孝胥：〈三月初十日夜直〉，《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318。

<sup>85</sup> 同前註，〈夜直雜詩〉，頁317。

生？

「夜直」成為鄭孝胥晚期政治參與的第一步，看似告別了「避不見客」的原則，得到的位置卻不能符合過去朝思暮想的政治期望。詩作嘆息著王朝的凋零，如今身在「小朝廷」，愁緒不減當年，建立的願景卻因為頻繁的公務漸漸失落。於此，自「海藏樓」的「夜起」到「內務府」的「夜直」形成了有趣的聯繫，真正參與歷史現場的鄭孝胥沒有倒果為因的理由，內在的悲怨也尋不著出口：

十丈紅塵日暮時，敝車羸馬欲安之？年來已自耽岑寂，却為聞歌更惹悲。

86

見證了王朝的西山日薄、人臣的逢君之惡，「夜直」則限制鄭氏的權力範圍，不及原來預想的身分，「夜起」的養精蓄銳受到了正面的考驗，又一次遭遇現實與理想的失衡。而「夜直」詩借喻的「楚歌」不分內外，使「小朝廷」瀰漫危機感，詩人的沉沉寂寞，突顯在成群斗筲之中。<sup>87</sup>相對地，「夜起」的自憐與獨醒在「海藏樓」得到了無邊無際的想像空間，此皆天之未定者也。如今，「夜直」讓鄭孝胥正視了政治環境的艱難，盡力調適其間的差異：「初月猶依魄，虛衙欲斂陰。星河天脈脈，宮禁夜沈沈……」<sup>88</sup>「夜直」難以體會黑夜的廣闊，悲從中來，竟不得排悶。然而，詩作顯現的過程約略可見，鄭氏期望在歸返「政治」以後，延續「夜起」的清明與從容：「苑樹宮牆返照黃，小窗淨几味偏長。銷磨一日吾何惜，便借衙齋作道場。」<sup>89</sup>「內務府」的任期不長，倒是有了熟悉政務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道路漸趨穩定，在「小朝廷」開掘得以深耕的土，「夜起」也改變原來了形態，虛空的填補轉向丹心的淬鍊。一切始料未及，伴隨溥儀逃離紫禁城以後，鄭孝胥的晚期風格卓然顯現，在「夜起庵」的小窗短榻不斷整備，深怕蹉跎了殘餘的年歲。

王揖唐（1877—1948）《今傳是樓詩話》記載一段交遊，側寫了鄭孝胥晚年重返政治的心境：「北戴河海濱，為東亞北部這暑勝地。余於己未（1919）秋初來遊，其時於役滬上，未及信宿。甲子（1924）以後，每歲必至，野服徜徉，秋盡始返。閒中風月，消受獨多，亦近年差為適意之事。」<sup>90</sup>「避世」自

<sup>86</sup> 同前註，〈四月初五日夜直〉，頁 318。

<sup>87</sup> 「夜直」詩常見「楚歌」，描述的危機感卻不限於外敵。詩曰：「主辱臣不憂，或乃以為快。盜臣猶稱臣，大盜不以械。楚歌殊逼人，耳熟亦無怪。忍能扼其吭，毒蠍過蜂蠻。遠臣來禁近，力抗甚矣憊。夢中天壓己，無助理當敗。」（〈三月初十日夜直〉）國難如是，人臣製造的混亂使鄭孝胥對「小朝廷」的局勢失去信心。

<sup>88</sup> 同前註，〈二月初五日內務府夜直〉，頁 316。

<sup>89</sup> 同前註，〈四月初五日夜直〉，頁 318。

<sup>90</sup> 王揖唐著；張寅彭、李劍冰校點：《今傳是樓詩話·北戴河海濱與海藏贈答》，頁 310。

然是「清遺民」在革命以後的選項，王氏心嚮往之，並親身實踐，而詩話呈現與鄭氏的贈答，形成了對立的兩極。有趣的是，從詩作的提問可以發現，王氏也表露了對於晚期出處的疑惑：

濠堂鷗榭渺前塵，搖落江山幾鳳麟。善飯挽強渾易事，最難養氣尚如新。

「濠堂」與「盟鷗榭」是舊時寓居，標誌著前半生的成就，王揖唐驚奇鄭氏有意在晚年經營另一場政治事業。廉頗（327 B.C.—243 B.C.）的典故並非稱許一片雄心，而有輕視鄭氏決定的用意。革命帶來了體制的崩解，又如何在極為不利的情勢保持初衷？甚且，「小朝廷」擴張的問題不只外患，還有層層內憂：

國門重入十三年，辛苦孤臣拜杜鵑。底事推枰仍袖手，蛾眉謠誣古今憐。

重拾政事不容易，鄭氏目前的位置卻有志難伸，完備的理想只是高談大論。王氏的推論表明了自己「避世」的態度，無奈讒言的無所不在，難以突破，亦不舍價值惟有自我肯定的悲憐，詩曰：「駿骨千金世豈知，看天忍淚又移時。神州來日方多事，出岫閒雲未是遲。」退出歷史現場，不與之對抗，但求明哲保身之道。

看似明確的決定，其實是震盪於革命的一種消解的方式，詩曰：「看罷繁櫻已倦遊，閒身更為海鷗留。年來詩思頽唐甚，那有雄心到九州。」可以想見，「世變」為主導的時代氣氛感染了王揖唐，與世浮沉，失去政治的執念。然而，鄭孝胥自有一套對「世變」的理解，面對不同立場的質疑，維持一貫「獨醒」的姿態。贈答詩不見深處的情感，顯示了鄭氏歸返以後，面對政治現實的面目：

讀書不樂更論兵，廣武區區易得名。誰見龍川新句就，卻將經濟歎生平。

在今日延續阮籍（210—263）在廣武的慨歎，依樣悼念歷史分合的無常，暗示政局的紛擾是自己過去的缺席：「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魏氏春秋》）下半句則是疊合了陳亮（1143—1194）的氣魄：「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宋史·陳亮傳》）正史通篇以「龍川先生」的政論總括其名，巍巍成就不朽之盛事，何以慨歎其貧寒出身？陳亮亦言：「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鄭孝胥欲以典型的召喚申明歸返「政治」的意氣風發，隱藏當前束手無策的窘境。有意思的是，鄭氏援引「廣武嘆」給予「豎子成名」的歷史解釋之外，可能也接受了蘇軾（1037—1101）的閱讀：「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東坡志林》）歷史的慨歎也是現時的慨歎，悄然排遣了不得志的心緒。而鄭孝胥本有意於世，亦有入列楚漢人物的氣概：

虎擲龍據徧九州，英雄誰肯死前休。功名無與夷齊事，薇蕨空山又一秋。

猶如活水源流，持續不斷的意念引領著前進。詩作巧妙回應了閒適之人對鄭氏晚期出處的疑惑：「功名」與「隱逸」並不衝突，只是「英雄」的道路總有不同，仿若天命所歸，注定了一生的奔波辛苦。質言之，鄭孝胥的回應預斷了高下，緣於前半生的追逐已然定調自己的志業，且看過去「海藏」近似歸隱的姿態其實隱含著「避地待時」的政治情懷，即使在革命以後，避居「海藏樓」都是不得已的困滯，盡是無法抒放的「英雄氣」。甚且，在鄭氏的思維裡，「隱逸」從來不是動盪之際的應對手段，與生俱來的危機感無法割捨，惟有化為陣陣積恨，已非「薇蕨空山又一秋」可以消解。<sup>91</sup>誠然，鄭孝胥還是肯定了歸隱的高潔：「振衣千仞氣堂堂，濯足扶桑意豈狂。今日望公應卻步，只堪居士號清涼。」王揖唐在詩話特別註記「韓蘄王晚年自號清涼居士，海藏蓋隱切騎驢故事也。」南宋武將韓世忠（1089—1151）戰功彪炳，晚年有感於朝廷為小人主和，而「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宋史·韓世忠傳》）如是了卻塵世，不減當年雄姿英發，「隱逸」亦有道。<sup>92</sup>然而，鄭孝胥還是堅持貫徹「英雄」的本質，面對王氏的提問，贈答詩作已展示了迎向晚期的雄心。

有趣的是，王揖唐直言：「善飯挽強渾易事，最難養氣尚如新。」時年 65 歲的鄭孝胥執意奮起，經由「夜起」提煉而來，隱然有深思熟慮的工夫與處世的哲學以整備一切的思想行動。歸返「政治」，從理想的重鑄到付諸實踐，鄭氏如何在「小朝廷」回應自我的期許，有賴於夜深人靜的一切自我對話：

四更月方午，寒彩怯舉首。太空洞凝碧，粲粲著星斗。人間在睡鄉，獨起吾何有。稍憐東方白，世事信難久。啓明爾何疑，光影且相守。<sup>93</sup>

顛倒了時序，星月交輝照映一片生氣蓬勃的景象，儼然是潛藏在現實背後的烏托邦，而「夜起」導引詩人來到理想國，目前空無一人。鄭孝胥拉開了與塵世的距離，獨處在寂靜的時空。詩作嘗以理性克制情感的衝動，似乎不舍抽離於此，對黑夜的眷戀突出了疲困現實的憔悴：

<sup>91</sup> 「海藏」作為一種方法，標誌了鄭孝胥在「士階層」體制內游移的哲學，「隱逸」即是通向「政治」的技藝，迂迴地進入。在革命以後，王朝全然崩解，「海藏」失去重心，深深體認了面對現實的無能為力。日記記曰：「蓋夷、齊扣馬之日，若非太公相救，故已被戕於左右之兵下，雖欲為首陽餓夫，亦不可得矣。」（1911 年 12 月 18 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372。

<sup>92</sup> 上述鄭孝胥與王揖唐贈答詩均見《今傳是樓詩話》，鄭氏「振衣千仞氣堂堂」又作「投荒逸氣自堂堂」，收入梁如冰、馬國華編：《海藏樓散佚詩輯錄》，《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505。內文提示詩作同樣錄自《今傳是樓詩話》，可能存在版本差異，暫且不論。有趣的是，《海藏樓詩集》全本只收錄前二首詩，似乎留下了一些自我判別。（頁 320）

<sup>93</sup> 鄭孝胥：〈九月二十日殘夜〉，《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321。

缺月餘半規，爛爛猶至晝。玉玦俄成鉤，翻出太白後。殘宵袖手人，不與世競走。先登徒取敗，無繼欲奚就？<sup>94</sup>

日記抄寫著馮玉祥（1882—1948）第三次通電欲擬定的《建國大綱》，軍閥割據牽連國體的搖晃不定，清王朝淪為刀俎。無能為力的鄭孝胥，在「夜起」創造一處批評空間，立足「殘宵袖手人」的評論姿態，以為馮氏先一步召開和平會議以解決軍閥爭端的想望不切實際。（1924年10月25日）<sup>95</sup>鄭氏的立場自然不會希望時局的動盪有「復辟」之外的統一機會，且馮玉祥對苟存的清室尚有「優待條件」頗有不滿，多少評判都不是從「內務府」退回「懋勤殿行走」的遺老可以發聲。於此，詩人依賴「夜起」，時至「人間在睡鄉」才有背離現實的可能，理想得以擅自接軌。

持續以「夜起」排解在「小朝廷」的不遇，彌補「海藏樓」的假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無論沉寂何處，黑夜還是熟悉的背景，「夜起」養氣自守，詩作亦保持著「英雄氣」。拂曉時分，起興於政治的悲涼，卻又注入了抵抗的表述，鄭孝胥小心維護著初衷，熬過起初的艱難。這些不成眠的詩作，顯現了如何定位歸返政治現場的「夜起」：

柝聲極分明，冒寒行且擊。不疾亦不徐，遠去入寥闊。何人為注聽，冥漠自效力。萬死趨功名，未若抱關客。

柝聲不絕於耳，詩人獨醒於黑夜，以「聽覺」聯想一個身影：巡夜人自在於凍寒之苦，依循固定的節奏為世間打響寧心的訊號，漸行漸遠。這可能是「夜起」常見的情景，而鄭氏嚮往逐夜守衛的信念，卻失落於無人知曉的寂寥。攫取「巡夜人」的印象，其實映照的是自己的境遇。「人間在睡鄉」而「夜起」，鄭氏擊著復興的金柝，為黑夜隱沒。詩作又非自嗟自嘆的語調，無奈「小朝廷」對「柝聲」的理所當然，不見軍閥標舉除舊更新的政權。縱使「抱關擊柝」覺察了山雨欲來之勢，也是屬於黑夜的呢喃細語，惟有詩人獨醒：

蘭若初鳴鐘，三杵輒小止。忽催東方白，百餘猶未已。來日行自來，爾意豈難俟。牛鳴著盞中，宮聲頗盈耳。繁霜被屋瓦，欠伸我欲起。<sup>96</sup>

接續而來，第二首詩仍是黑夜突出的聲音，為告別漫漫長夜，急躁地不安規矩作響。如是不符合「夜起」的意趣，寺院失序的鐘聲襯出了詩人在黑夜的閑適。有意思的是，詩作其實接續前文，劃分了「萬死趨功名」與「抱關客」的兩端，以「來日行自來，爾意豈難俟」的徒然往返作為轉折，結果已在冥冥之中，進

<sup>94</sup> 同前註，〈二十七日殘夜〉頁322。

<sup>95</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021-2022。

<sup>96</sup> 鄭孝胥：〈十月初四殘夜〉，《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322。

一步申明「夜起」的不疾不徐：「繁霜被屋瓦，欠伸我欲起。」鄭孝胥自始至終致力於一種細膩穩定的生活狀態，不辭寒霜，不為物累，內外都有嚴謹的思想予以調節。「抱關客」只是暫時的選擇，不減滿腹懷抱，「臣在閑散之列反便於進言」<sup>97</sup>，因而下半聯援引東坡「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聽賢師琴〉）的典故，詩人卻言「牛鳴著盎中，宮聲頗盈耳」，暗示「聽賢師琴」未若「牛鳴」，自我欣賞一切渾然天成的音調。

閱讀了相繼發生在 1924 年 10 月的「夜起」詩作，意圖理解鄭孝胥重返政治現場以後的心境。過程難免遭遇許多波折，倉皇之際，總是能以「夜起」調適失落的心緒，涵養「英雄氣」。於此，政事的紛擾不斷，「夜起」逐漸脫離了革命期間逆發的警覺意識與「避不見客」的沉思，而是延續了「海藏」「避地待時」的理論資源，黑夜取代了「海藏樓」——「人間在睡鄉」的居所，容納鄭氏不得已的批判與抒情。

## 二、獨立

這些詩作寫在「北京政變」前夕，內容雖有提及軍閥情勢的緊張，料想不到的是溥儀必須訣別紫禁城，歷史的變動如此猛烈，千年帝制可以在一夜之間完全終絕。<sup>98</sup>「小朝廷」的遷移使遺老焦頭爛額，已無暇顧及內部的鬥爭，鄭孝胥卻也在一片混亂之中得到了夢寐以求的位置。且看日記（1924 年 11 月 29 日）如何戲劇性地敘寫溥儀如何逃離國民軍監禁的北府，稱疾移入德國醫院，轉往日本使館：

於是大風暴作，黃沙蔽天，數步外不相見。余至醫院，慮汽車或不聽命，議以上坐馬車；又慮院前門人甚眾，乃引馬車至後門。一德國人持鉗，從一看護婦，引上下樓，開後門，登馬車。余及一僮駒乘。德醫院至日使館有二道，約里許，一自東交民巷轉北，一自長安街轉南。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館！」御者利北道稍近，驅車過長安街，上驚叫曰：「街有華警，

<sup>97</sup> 溥儀的回憶錄則記述了當時內務府大臣的諸多不滿，而「這時，鄭孝胥『肯請開去差事』的奏摺也到了。」見氏著：《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126。質言之，鄭氏以舊疾復作奏請開缺，自有一套處理政爭的方式，不影響自己的政治抱負，奏云：「今所擬緩減辦法乃不得已之策，若有機會可乘，仍請乾斷施行，臣在閑散之列反便於進言。伏望聖躬以憂勤惕厲自處，使人心漸歸，則天命自集矣。」（1924 年 6 月 28 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005。

<sup>98</sup> 沙培德（Peter Zarrow）：「但是，這最終且無以借鑑之中國帝制歷史的一頁，卻是辛亥革命未竟事業的一個必要的收場。」見氏著：〈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文化與歷史記憶：溥儀之逐出紫禁城〉，中國近代史學會、中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辦：「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15 日，頁 2。「北京政變」也許是「清遺民」真正意義的改朝換代，感受了民國的到來。

何為出此！」然車已迅馳。余曰：「咫尺即至。馬車中安有皇帝？請上勿恐！」既轉南，至河岸，復奏上曰：「此為使館界矣。」<sup>99</sup>

這段經歷在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關鍵，史家直言：「向使當日鄭氏未到，或其策不為溥儀所納，則溥儀歷史固當重寫，而偽滿『康德』皇帝之一名詞，即可能存在。」<sup>100</sup>正是鄭孝胥「英雄」般的登場，保存了清王朝的一線生機，而救援的結果也真正迎來晚期政治實踐的開端。誠然，一進一退之間，詩亦言志：

簷角長庚出未高，半規霜月見秋毫。胸中已是無波井，却為雞聲起怒濤。  
人間倚伏可推尋，急劫翻騰理最深。石爛海枯誰不滅，為君細說落星心。

101

詩作寫在 11 月 17 日：溥儀被押進北府以後，逃入日本使館之前，透露了遭遇政變的心境。鄭氏欲以平生所就之工夫面對此一「急劫」，未有多餘的情緒，靜心探究歷史的面目與意旨，依然展示了拔高的境地：「胸中已是無波井，却為雞聲起怒濤。」有意思的是，揚起波濤的「雞聲」可能是包圍紫禁城的國民軍，或是爭論溥儀出路的王公大臣，無論如何，以「雞」為喻，儼然標示了「鶴」的孤高自許，觀看事件的角度、哲理的提煉，自然不同凡響。

從詩人前半聯觀測的天象來看，構思於傍晚時分，卻以「石爛海枯誰不滅，為君細說落星心」歸結詩作展示的思想。隱而未見，「落星心」正關聯著鄭氏持續不斷的「夜起」，盡是經年累月沉澱的道理。詩作並列不同的時間，其實「夜起」已朝向一個通往理論化的過程：

鶴待五更能一叫，鶴知夜半不須眠。沈吟送盡西窗月，回首東方白竟天。

102

「雞」與「鶴」在深夜的對照可以看到「夜起」如何為詩人珍視，獨立於塵世之外。前者以「待」遵循既有的規律，被動地回應時間的常理；後者則是以「知」溝通自我，主動地拓展時間的範圍，也擁有了獨處的空間。

1925 年，溥儀採納羅振玉（1866—1940）的建議來到天津日租界，鄭孝胥應召前往，清王朝又延續了它的命脈。溥儀憶起這些日子：「我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這是我在各派遺老、各種主意之間

<sup>99</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030。

<sup>100</sup> 梁敬鑄：〈記偽滿「康德皇帝」〉，《傳記文學》第 14 卷第 2 期（1969 年 2 月），頁 54。

<sup>101</sup> 鄭孝胥：〈二十一夜〉，《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322。

<sup>102</sup> 同前註，〈十六曉月〉，頁 329。

搖擺的七年。」<sup>103</sup>而鄭孝胥也在漩渦之中，競爭「小朝廷」的主導權。只是情況有所不同，鄭氏收獲「北京政變」的政治籌碼，周旋於各派人士，暗自統合自己的主張。<sup>104</sup>《我的前半生》記述天津的「行在」時光，留存一則「鄭孝胥的理想」，直言：「他與我的關係已達到了榮祿和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打動溥儀的正是鄭氏屢屢提及的烏托邦：

……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動心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以至聲淚俱下。有一次在給我講《通鑑》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長安，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說時是禿頂發光，唾星四濺，老淚橫流。<sup>105</sup>

淪為「平民」的溥儀在天津日租界莫知所為而舉棋不定，鄭孝胥一貫之的信念猶如「先驅者」的想像，感染了溥儀，確定「小朝廷」共同的施政方針。<sup>106</sup>然而，溥儀也明白：「他並不是把日本當做實現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列強共管』。」<sup>107</sup>此時，鄭氏政治理想已然有了具體的構思，提煉為當時著名的「三共論」。有意思的是，日記（1925年11月16日）的記載，可以進一步發現理論的歷程：

晨起，忽念近事，此後剝極而復，乃乾旋坤轉之會，非能創能改之才，不足以應之也。如袁世凱之謀篡，張勳之復辟，皆已成而旋敗；何者？無改創之識，則枘鑿而不合矣。「昨戲語人：共和生子曰共產，共產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復昌。此圖讖也。」<sup>108</sup>

<sup>103</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154。

<sup>104</sup> 同前註。溥儀：「後來又回到我身邊的鄭孝胥，起先並不屬於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張他都贊成過，也反對過，他更提出過任何一派不曾提過的如所謂『用客卿』（外國人）、『門戶開放』（向每個肯幫助復辟的國家勾結）等主張，因而也受過各派人的反對。但是，當他後來一拿定了投靠日本這個主意，一切反對派就都不成他的對手了。他不但勝過了他們，而且連他的老對手、『聯日派』的老首領羅振玉，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又被他將多年經營來的成果，輕輕攫取到手。」這份材料說明鄭孝胥在天津展現了與過去不同的位置，可以獨立於各派意見之外，最終「小朝廷」的航向也是依循他的想法，悄悄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期望。

<sup>105</sup> 同前註，頁190。

<sup>106</sup> 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佔主導地位的烏托邦常常是作為某一個人的願望和幻想首先提出的，只是後來才被合併為更廣泛的群體的政治目標。……即使在一個似乎孤立的個體賦予其群體的烏托邦形式，說到底，也可以正確地把這歸於那個群體，因為他的成就符合群體的集體衝動。」見氏著；黎鳴、李書崇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211。

<sup>107</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190。

<sup>108</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072。

鄭孝胥自認「復辟主義」<sup>109</sup>，還是將「皇清復昌」視為終極理想。無論「稱帝」或「復辟」，回顧的歷史關聯著帝制的重生，盡是近在咫尺的遺憾。而鄭氏的修正在「能創能改之才」的出現，連結自己在「小朝廷」的蒸蒸日上的情勢，儼然有舍我其誰的意味。甚且，遙想一座政治烏托邦，鄭孝胥的想望已非清遺民訴求「復辟」的「意識形態」（Ideology），承認了「列強共管」是必須的路徑，著眼在改變現實的秩序，遵循明確的「三共」路線、進化的過程，「皇清復昌」才有實現的可能。

同樣地，「夜起」見證了鄭氏政治的得失，銘記著理論前後的存在感受，而過去多少不得已的悲怨，終於在天津拾回了原有的「英雄氣」：

海上有孤月，流光遍人寰。世人不知敬，謂月光以寒。獨有愛月者，中宵起盤桓。願從月入海，萬頃輕波瀾。月光受之日，造化良無端。乘時復為日，舉世方驚看。哀彼無知子，狂迷在其肝。孰能迴日月，愚智還相安。

<sup>110</sup>

相同的政治判斷，詩作卻以不同的心緒回應了「小朝廷」在天津的處境。設「孤月」為喻，緣於世人的無知與無情，詩人為此「夜起」，欲澄清「小朝廷」滂浩的本質。「月光受之日，造化良無端」巧妙形容了寄居租界的現實，卻又放言高論：「乘時復為日，舉世方驚看。」詩語言聯繫了「共管」論述，正色預告「小朝廷」的前途。日記（1927年6月23日）記載一則奏疏：

今乘輿狩獵於天津，皇帝與天下猶未離也，中原士大夫與列國人士猶得常接，氣脈未寒。若去津一步，則形勢大變，是為去國亡命，自絕於天下。……自古中興之主必藉兵力，今則海內大亂，日久莫能安戢，列強逼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業，他日，非為中國置一賢主則將啟爭端，其禍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圖中興，不必待兵力也，但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必有人人以為君之日。<sup>111</sup>

大勢所趨，鄭氏以為「列強共管」是王朝復興唯一的路徑，且「小朝廷」必須有所準備，提議五年之內設置責任內閣、借款包工的鐵路政策、官辦商辦事業等。面對溥儀的提問，依舊呢喃著：「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密如蛛網，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sup>112</sup>持續規劃的是理想的藍圖，直到列強在中國各有一席之地，「皇清復昌」就成為他們維護利益與和平的共識。

<sup>109</sup> 同前註，第3冊，頁1747。日記：「柏原文太郎來，談至午乃去，聞其人為國民黨，乃犬養毅之徒也。然介紹者為森茂，知余為復辟主義。」（1918年10月7日）

<sup>110</sup> 鄭孝胥：〈十月初十日貴州丸舟中夜起〉，《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327。

<sup>11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149。

<sup>112</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193。

於此，「共管」牽動著「小朝廷」的命運，鄭氏區別了過去的「復辟」心理，遠離「海內共尊立一帝」的觀念。從「天下」到「國際」，清王朝需要認同，鄭氏的立場不同於各派遺老，因為「共管」暗合了內在的烏托邦想像。「哀彼無知子，狂迷在其肝」，傳統的「復辟」已然無法解決當前的爭端，抑止不了列強的謀算，鄭氏的「復辟主義」依然以「清」為名號，而思想卻與時俱進，在在顯示了政治理想於其間不斷的流轉。

預言了烏托邦在現實發生的可能，「夜起」一直是鄭孝胥身體力行的證明，未完成的藍圖在黑夜反覆的建設與辯證，且將天津的住處命名「夜起庵」，標示了晚期的開端與意旨。詩曰：「海上無山可似歸，登樓詩卷暫相依。投閒轉覺憂危集，行意誰令去住違……」<sup>113</sup>告假回海上卻拋不去滿身沉憂，與過去長居「海藏樓」的心境大不相同。直面晚期的蒼涼，任愁緒佈滿寓居，才是「夜起庵」獨有的氣息。日記（1926年11月2日）記曰：

五鼓，作〈殘月詩〉：「清光銷不盡，殘夜與誰看。天外一分白，樓中五點寒。落星空共影，幽思杳無端。世事須臾耳，祛除直是難。」<sup>114</sup>

詩人相伴「殘夜」與「殘月」，細數不同的「殘景」，偏嗜著時間的殘餘。而「夜起」本是鄭氏有意的劃分，「世事須臾耳，祛除直是難」也寫出了執著的理由，如何對抗一切事物終將消逝的道理：黑夜、清王朝，還有垂老的自己。「夜起」作為工夫的操練，意圖打破自然的通則，相信道德主體可以超越固有的限制，成就自我，而歷史的興衰、推移的悲哀，鄭氏亦設法突破既定的邊界，探測其他可能。

鄭孝胥 1926 年寫作一系列的〈夜起庵雜詩〉<sup>115</sup>大致容納了這段時間的政治懷抱，多少難以成眠的理由促成了「夜起」的舉行：

望前及望後，未曉見月落。明鏡斜入窗，可愛伴寂寞。連宵光漸縮，半規尚抱魄。一瘦成蛾眉，悄然傍簾幕。吾齋不施燈，幽若在巖壑。夜起定何心，無心亦無著。

時間由「月明」至「月落」，形體從「明鏡」至「蛾眉」，行蹤由「斜入」至「悄然」，大篇幅的敘寫構成了「夜起」的內容，詩人平靜觀測月亮的動態，卻言：「夜起定何心，無心亦無著。」似乎整個黑夜只有詩人與月，對比月亮的變化萬千，詩作的經營突出了不同於自然的工夫意識，「夜起」簡單而平實。〈其二〉即申明「夜起」此刻的重要價值：「持是將安窮，前途黑如漆。暗飛

<sup>113</sup> 鄭孝胥：〈海藏樓夜集〉，《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333。

<sup>114</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122。

<sup>115</sup> 鄭孝胥：〈夜起庵雜詩〉，《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340-342。

能自照，宵行亦奚失。」鄭氏如是珍視「夜起」，相信此一通往烏托邦必須經歷的儀式過程。有意思的是，〈其三〉與〈其四〉溯及過往，改寫了不同的歷史解釋：

息庵阿所好，賦詩必龍州。龍州我方壯，短後經三秋。邊民幸安枕，將士知無尤。興學乃吾罪，肇亂終難收。彈指二十年，滄海方橫流。所學作何用，徒為知己羞。

以當前的結果來看，多少功業也無助於改變清王朝的終局。此時，鄭氏懷想龍州三年，這段過往不再意氣風發，對於他人習以為常的迎合也感覺不安。只緣「彈指二十年，滄海方橫流」已然說明了這些政績的徒勞無益，於是否定了引以為傲的過往：設立的制度、將士與邊民，一切「肇亂終難收」。質言之，鄭氏真正意識了自己在萬里江山幾乎未有一席之地。<sup>116</sup> 革命亦若是，詩人的「夜起」又一次浮現當年的慘景：

曉出雪猶微，須臾飛漸密。仰觀若塞空，橫鋪路欲沒。樓臺頃自明，高下同一潔。旋風俄焉起，眩轉益飄忽。浮浮儼簸揚，作勢穿牖闔。向晚如小衰，竟夕乃愈烈。詰朝互傳語，尺許久無匹。宣統三年春，元旦差相埒。中間十五載，喪亂鮮可悅。意者其休徵，相看還咄咄。

鄭氏對辛亥革命一直有獨特的理解進路，緣於事件爆發的不在場，只有存在「海藏樓」的自我辯證。詩作以雪為喻，「微」而「密」，旋風而起，片刻瀰漫眼前。這幅景象聯想了「宣統三年春」——革命爆發的 1911 年，不只是場景的相似，乘風的騷動凌亂成災，「浮浮儼簸揚」甚或「作勢穿牖闔」，一如革命的發生始於末節，革命黨本不足道也，而是形勢的推波助瀾，終成大局，難得紛飛的雪景牽連著多少不堪的回憶。<sup>117</sup> 通過「夜起」剪輯歷史片段，不見龍州的威風，猶存辛亥的餘悸，而儀式終將喚起鄭氏直面現實的能力：

<sup>116</sup> 「龍州三年」一直是鄭孝胥自豪的功業，尤其在革命以後避居「海藏樓」時期，曾書一聯：「健者六旬，正添鶴算；悠然二老，閑話龍州。」（1915 年 8 月 5 日）甚且，鄭氏嘗以自己在龍州的政績批判當權者處理革命的缺失，日記記曰：「革命黨人果無一解事者。吾之率師二千餘人以入龍州也……吾從容調遣，邊亂遂定。今袁世凱死，南方攻袁者宜亟以電告黎元洪、段祺瑞等，歸罪於袁氏一人，而責其開誠布公，集天下之賢者共議善後之策，則北方人人自安，南方之猜嫌釋矣。不知出此，乃嘩噪欲廢新約、懲禍首，黎、段縱願息事，其力皆不足以辦此，南方亦無實力足以逼之，進退維谷，為天下笑，不亦呆乎！」（1916 年 6 月 25 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571、1616。

<sup>117</sup> 同前註，頁 1400。日記記曰：「孝欽后初反對立憲，庚子後乃為假立憲。慶邸、攝政王承其宗旨，遂成革命之局。然中國人無真面目，作偽乃其天性，自今以往，當有假統一、假共和之現象，拭目以觀之可矣。」（1912 年 2 月 21 日）鄭孝胥以為革命的形成來自立憲運動反覆失敗的過程，而革命黨的行動亦終將失敗，緣於清王朝與民國都不採取理想的變革。於此，中國的前途無望，即天性使然，「受弔不受賀也」。

淳于諷子輿，嫂溺援以手。避嫌忍坐視，毋乃君子咎。以道援天下，其義在不苟。徒手將何施，行權豈可狃。枉尺而直尋，逆取而順守。本原既不端，詎免天下詬。

前半生的成就至今慚愧無地，深化了詩人對晚期的追求，〈其五〉歸返政治現場，提醒自己在當前情勢的判斷。詩作參照孟子的邏輯：「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上》）趙岐（108—201）注曰：「權者，反經而善也。」<sup>118</sup>而「小朝廷」處在危急時刻，鄭氏以「權」為援天下溺之「道」，與其坐而待斃，未若一反常法而行。因而下句「枉尺而直尋，逆取而順守」也就未必遵循原來「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說法，今日情境已然失去了一般定名為「禮」的法度規範：「本原既不端，詎免天下詬。」於此，孟子不願「枉尺而直尋」，以為「以利言也」；鄭氏支持「逆取而順守」，旨在一片混亂之中不擇手段以恢復秩序，重建正道固守之。在「小朝廷」的「夜起」預想著未來「帝國」的準則，〈夜起庵雜詩〉延續「雜詩」「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李善注《昭明文選》）的體裁契約，其實內在的烏托邦完整且有建設的程序，規律的「夜起」反覆整理詩人的思緒，在回顧歷史的時刻、政治得失之間正視了理想的距離。

胡適（1891—1962）寫信祝賀鄭孝胥 70 歲生日，特別提到了「夜起」，日記記曰：「他每天早晨四點起來，晚九點睡；早晨寫一早晨的字。身體健壯，望之如五十歲人。」寫於 1929 年 4 月 21 日，鄭氏時在天津以「夜起庵」為名號，「夜起」幾乎是一則公開的聲明。甚且，從回覆的詩作可以理解鄭氏何以在這個階段標明「夜起」：

俯仰漏將盡，踽踽獨夜行。夜行何時息，所期晦復明。友朋頗見哀，賦詩勉艱貞。用意雖淵默，動天如雷聲。願君莫輕言，相忘實與名。<sup>119</sup>

鄭氏向胡適表明自己立意的動機，詩作豁顯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前引詩曰：「昧爽趨行在，二年如一日……」在天津的「小朝廷」，「行在」即「夜起」的終點，而「小窗短榻裁容膝」的「夜起庵」儼然是一處苦行勵己的寓所。於此，「夜行何時息，所期晦復明」，鄭氏的設問也是期望，「夜起」關聯著「小朝廷」從黑夜朝向天明的意義。而「艱貞」的反面是「見哀」，道出了處境的艱難，鄭氏則以為「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莊子·宥在》），亟欲申明「夜起」既是養生之道，亦有為天下的懷抱，故寂而動。雖然胡適信件的內容

<sup>118</sup>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 1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1979 年中華書局影印阮元刻本），頁 204。

<sup>119</sup> 胡適：〈日記 1929 年〉，收入氏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 31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369。

今日不得而知，從鄭孝胥慎重的解釋可以明白「夜起」現時承載的重量。

且看一首題名為〈夜起庵〉的詩作，鄭孝胥意圖以「夜起」定義在這段時期的挽留：

一別高樓寄此庵，五年況味更誰諳？枕堪待旦天難曉，薪已將然臥豈酣。

滄海徑歸真上策，舊京入夢奈空談。丹青自寫靈臺狀，莫信人誇蔗境甘。

<sup>120</sup>

常以「海藏樓」對比，「夜起庵」的築立隱然有迫切的需求。「海藏」遙想未來的政治風景，暫時的退場以等候時間的過渡；「夜起」欲實現可能的政治願景，必須直面現實，隨時警覺亦難以預料，充斥著追趕時間的焦慮。詩作持續並列不同的情況：行動、思想與天命，突出「夜起」的緊張不安。「枕堪待旦天難曉，薪已將然臥豈酣」寫出了世變當前的危機感，「夜起」是難眠與不眠之間的抉擇，將被動地擺佈轉向主動的探求，「所期晦復明」。其次，「舊京入夢」到底是詩人無法「滄海徑歸」的原因，「夜起」如常舉行，不顧長夢成酣，幻想未若現實動情。而「丹青自寫靈臺狀，莫信人誇蔗境甘」表達了為自己作傳的意念，從夢境的「舊京」到理想的「新京」，內在的烏托邦終歸實現。有意思的是，詩注曰：「相者謂余當有晚遇。」鄭氏的「夜起」反求諸己，術正而心順之，詩作巧妙以幻夢與卜算的違背以突出主體的自我認知與實踐。即使不久以後的「滿洲國」承載了「小朝廷」的所有想望，首都又名「新京」（長春），一如相者預言。然而，這些也是歷史的後見之明，在真正的意義上，正是鄭孝胥收獲了「夜起」的最終成果。

---

<sup>120</sup> 鄭孝胥：〈夜起庵〉，《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381。



## 第五章 復辟

### 第一節 樂土

#### 一、滿洲國的願景

依照〈日滿議定書〉（1932）的規定，日本確認滿洲國是根據當地住民意志自由而成立獨立國家之事實。然而，片面的協議引發了國際間的爭議，影響至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以後的史觀建構，今日仍莫衷一是。檢索相關論著，中國本土與中華民國（臺灣）企圖以「偽」字掩息東北淪陷的事實；英語世界常以「傀儡國家」（puppet state）一詞標示日本的殖民手段，仿若延續了史汀生主義（1931）與國際聯盟在1933年2月24日對滿洲國決議案的否定。於此，諸多論述分明了史觀的異同，直到思想資源不斷更新，和平換來了解釋的空間，滿洲國有不同的研究進路及評價的可能。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1950—）嘗以「東亞現代」（East Asian modern）肯定滿洲國具有相當難得的多元文化主義，長久以來的東西文明衝突為「王道樂土」的理想包容，進而提出國家主權根基於「文化的本真價值」（cultural authenticity）的思索。<sup>1</sup>誠然，觀念的建立延續著過去民族認同與話語關聯的思索，以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領土性的主權形式是由全球性的民族國家體系及其話語所組成的」，識者洞見了歷史語言不斷置換與剪裁，製作一幅又一幅的民族圖景，國家的興起巧妙複製著「現代」的成果。<sup>2</sup>而滿洲國的個案展示了西方

<sup>1</sup> Prasenjit Duara（杜贊奇），*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現代）（Lanham & 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2004）。有意思的是，陳永發先生指出：「杜贊奇的真正興趣，與其說是在研究滿洲國本身的歷史發展，不如說是探討滿洲國爭取國家主權策略背後的思想背景。」（頁178）大抵掌握全書要旨，同時提醒作者的同情不應模糊日本於理想口號背後欲壯大自身帝國主義的事實，尤其對舉了孫文（1866—1925）與日本的「王道」觀念，字裡行間似乎維護著中國對滿洲國的固有評價。見氏著：〈關於滿洲國之建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2004年6月），頁177-184。

<sup>2</sup>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72。

物質文明與東方精神價值的融合，杜贊奇肯認其朝向獨立國家的目標，從滿洲國的政治認同說起，似乎暗示以自身理想打破民族國家範式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論斷有助於學界在滿洲國固有的「偽國」、「傀儡」與「殖民」的標籤之外，重新認識此一神秘的國度，識者的觀察隱然在多年之後以史家的視角延續了滿洲國獨有的「願景」（vision）。

無論是建國初期設定的「大同」世界，或奉行「大東亞共榮圈」的指導原則，滿洲國一直承載當時多數人的政治期望（political expectation）。只要翻閱1932年發布概要建國理念的文件：「建國宣言」、「執政宣言」與「關於建國的對外通告」，可以發現日本如何給予滿洲國成立的正當理由：除了仗義驅逐張學良（1901—2001）軍閥政權，還給當地人民生存自由之外，日本甚以「王道」思想延伸的順天安民、民本主義、民族協和等理論對比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申明真正完善的政治體制如何可能。「建國宣言」即言：「則當惟禮教是崇，實行王道主義，必使境內之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東亞永久之光榮，為世界政治之模型。」<sup>3</sup>有意而為，旨在修正中華民國的缺失，創建以東方文明為主導的國家。

近年來，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山室信一（1951—）先生試著釐清文件背後的真相：「滿洲國的建國理念隱藏著各種意圖，以實行王道主義、實現王道樂土等各種不同說法流傳於世，並被宣揚為創造滿洲國的革新政治理念。但是，與其說這些主張是為判明世界政治現狀而創造出的新構想，毋寧說是為了對抗中國政治勢力及其政治主張所提出的相對命題。」即便如此，作為建國必須的政治宣傳與意識形態（Ideology）的確立，滿洲國達成的效果又不得不承認為「現代」思維釋放樂觀與進步的特質：

然而，無論當時的建國理念根藏了多少種意圖，仍有不少人認為這個高舉道義立國大旗的建國行為，可以說已經達成了他們的理想。他們把這個初期的建國理念當作「真摯夢想」加以接受，為此而散落殉國於北方大地的人也不在少數。<sup>4</sup>

論者指出了今日處理滿洲國最為重要的問題意識：「研究滿洲國與其他歷史的

<sup>3</sup> 〈滿洲國建國宣言〉，收入吉林省圖書館整理：《偽滿洲國研究資料：滿洲國現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932—1933年版），頁37。

<sup>4</sup>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頁128-129。作者亦援引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1900—1983）〈滿洲國的夢不會消逝〉一文：「我們當時的青年，充滿熱情地奔向滿洲國，只為了在滿洲這片大地上建設理想的國家。……民族協和的理想，將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益發地發揚光大吧。世界若缺乏這種理想，恐怕將難以擁有長久的和平。在此意義下，滿洲國建國的理想將永遠活在青史之中。」（頁266）指出持續主張滿洲國理念的人不在少數。可以想像，滿洲國具有的理想性植根在當時參與建國人士内心。

決定性差異，極高的可能在於滿洲國歷史的思想及倫理次元所涵蓋的意義比重」，於是在內容上盡力揭示滿洲國塑造政治意識的各種手段，突出了官方澈底「對他人無意識過剩」的事實。<sup>5</sup>然而，拋卻歷史的後見之明才發現，不只是官方標語，滿洲國冠冕堂皇的政治形式與不斷膨脹的建國理念無論在日本或滿洲當地，其實一直順利地取得共識。除了當局的文官武將表達建設的決心，山室教授亦有舉證：無論是在滿蒙居住逐漸感受排日運動威脅，面臨生存危機而成立的「滿洲青年聯盟」，訴求「滿蒙是日華共存之地」意味著期許一個「民族協和」的國家；還有潛心佛教的右翼思想家笠木良明（1892—1955）以「復興亞洲」為號召的「大雄峯會」，將滿洲國視為「大乘相應之地」，建國的追求既是精神、倫理，甚是偉大的宗教運動等。<sup>6</sup>於此，關聯民族、階層與「東亞現代」的命題，「王道」總是找得到對應方針，吸引了他們的目光。滿州國的出現應和有志之士排除當前一切混亂的「烏托邦」（utopia）構想，不同的政治期望可以寄放於此，雖然實際執行情況難以預料，滿洲國的「願景」已點燃了青年的懷抱。

另一方面，為「願景」感染的不只是日本境內，青年溥儀（1906—1967）也在滿洲國的設計方案裡看到了家族的榮光。如是回憶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1883—1948）的邀請：

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也得到了滿意的答覆。我問道：

「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不，」我堅持地說，「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就去！」<sup>7</sup>

暫且不論接收的是一紙謊言，只想當「皇帝」的溥儀，經過「帝國」與「復辟」的反覆確認，在滿洲國確定了念念不忘的理想圖景——「後清」。誠然，日本明白這些詞語已不符合時代潮流，滿洲國並非依允清朝的重生，只是關東軍

<sup>5</sup> 同前註，頁359-361。

<sup>6</sup> 同前註，頁92-106。

<sup>7</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4年），頁220。

為避免國際輿論，意圖以建立新國家的方式延續佔領滿蒙的野心。於此，溥儀坦然一句：「總之，我認為完全沒問題了。」似乎是不顧後果的決定，任皇帝的幻象凌駕於當前一無所有的現實。有趣的是，一直以來教授溥儀英文及西方思想而有「帝師」名號的外籍「蘇格蘭老夫子」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 1874—1938）以「龍歸故里」回憶了溥儀的決定：

他（溥儀）始終希望，中國能恢復她健全的理智，一切都將好轉。但是，現在這希望破滅了。當我再次前去拜訪他時，他的思想已有了非常大的轉變。在我看來，他彷彿曾與長眠地下的祖先們進行過一次精神溝通，他們催促他趕快離開曾使他和他們蒙受恥辱的國家，趕快把目光轉向三百年前他們曾為他奠下強大基業的那塊土地。<sup>8</sup>

這是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在結局留下的伏筆：「真龍天子回到了他的故鄉。」可以想像，字裡行間小心維護著溥儀僅存的帝王尊嚴。回憶錄於 1934 年出版，為之作序的溥儀也依循既有的安排登上了滿洲國的皇座。有意思的是，日本的謀算與戰爭的結局只是後話，文字敘寫皇帝的成長，回到故鄉，復興的偉業已然有了順理成章的動能，而眼前的機會恰似一則啟示，滿洲國的地緣條件吸引溥儀歸返家族的起始點，拾回滿人崛起的初衷。莊士敦的猜想與溥儀的幻想都是事過境遷以前的材料，悄然迎合了滿洲國提供的「願景」。

其次，關東軍決定以溥儀為滿洲國元首，主張「復辟」且與日本頻繁往來的清遺民自然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自從北京政變（1924）迫使「小朝廷」遷離紫禁城，溥儀經由日本協助，順利避至天津租界以後，促成此一決定的清遺民隱約明白了「復辟」的期望必須與日本在東亞勢力的擴張過程有所聯繫。尤其以羅振玉（1866—1940）為首的「出洋派」（或稱「聯日派」），主張「非外遊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謀恢復」<sup>9</sup>，為政治角力不斷誇耀著與日本的關係。在他們的認知裡，滿洲國的建立幾乎是日本直接地幫助在租界束手無策的「小朝廷」重返中原的機會。於此，羅振玉不得不向關東軍提議以溥儀為國家元首的辦法，在事後的追憶可以看到他如何把握當下焦急的心緒，推進不同形式的「復辟」：

又三年，衰年聖治之心日迫，私意關內麻亂，無從下手，惟東三省尚未甚糜爛，莫如籲懇我皇上，先拯救滿蒙三千萬有眾，然後再以三省之力戡定

<sup>8</sup> 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著；陳時傳譯：《紫禁城的黃昏》（臺北：博雅書屋，2009 年），頁 401。

<sup>9</sup> 引文是廣東一位遺老陳伯陶（1858—1930）呈上的奏摺內容。見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157。

關內。惟此事非得東三省當道有勢力、明大義者，不能相與有成。……又以東三省與日本關係甚深，非得友邦諒解不克有成。故居遼以後，頗與日本關東司令官相往還。力陳欲謀東亞之和平，非中日協力從東三省下手不可。欲維持東三省，非請我皇上臨御，不能洽民望。友邦當道聞之頗動聽。及是年秋，奉天兵事起，乃六次渡遼與熙君（熙洽）及友邦軍部協商，遂決迎駕蒞東之計。復詣天津行在面奏，請旨得俞允。是年冬，聖駕遂由天津至營口，暫駐蹕湯崗子而至旅順。<sup>10</sup>

羅氏 1928 年以軍閥與邪說的「不忍見聞」而避居旅順，東北的土地滋潤了原有的政治情懷。有趣的是，敘事的視角關切王朝如何興起的問題，相信皇上仍具有「拯救」的本領。權以東三省為開端，終於歸返中原，大一統的保守心理不為亞洲情勢變化干擾，與關東軍的談話意在主張而非附和：「欲維持東三省，非請我皇上臨御，不能洽民望」，盼望以清日合作的模式達成「東亞之和平」。可以想見，滿洲國的建立同樣牽連著清遺民的政治期待，為民國以來斷斷續續的「復辟」行動注入新的能量。

回顧 1917 年 7 月，張勳（1854—1923）提出的正式宣言為段祺瑞（1865—1936）組織的「討逆軍」遏止，溥儀與「小朝廷」成為談判的籌碼，苟活在軍閥勢力的拉鋸之間，多數清遺民已然不敢奢求「復辟」，只是穿衣吃飯，放任民國時間的侵蝕。然而，滿洲國以軍閥的暴政與中華民國不順禮義的政治結構劃出了新興國家建設的空間，以及「建國宣言」細密闡發的歷史緣由與王道精神，聯繫了清遺民欲取而代之的心聲：

惟視內顧中原，自改革已還，初則群雄角逐，爭戰頻年；近則一黨專橫，把持國政，何曰民生？實置之死；何曰民權？惟利是專；何曰民族？但知有黨！既曰天下為公，又曰以黨治國，矛盾乖謬，自欺欺人，種種偽詐，不勝究詰。此來內訌迭起，疆土分裂，黨且不能自存，國何能顧？於是赤匪橫行，災寢薦告，毒腹漁內，民怨沸騰，無不痛心疾首於政體不良，而追思曩昔政治清明之會，直如唐虞三代之遠，不可幾及，此我各友邦共所目覩，而同深感歎者也。夫以二十年實驗所得結果以至於此，亦可廢然返矣，乃尤諱疾忌醫，帖其舊惡，藉詞民意從違未遏抑，然則從其所之，非漫至於共產以自陷於亡國滅種之地而已！<sup>11</sup>

1931 年 3 月 1 日，滿洲國政府正式頒布「建國宣言」，內容以不少篇幅斥責中華民國的建國程序與理念，甚而分別指出三民主義的弊害，歸結於「以黨治

<sup>10</sup> 羅振玉：〈集蓼編〉，《集蓼編（外八種）》，收入氏著；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 11 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78。

<sup>11</sup> 〈滿洲國建國宣言〉，頁 37。

國」，且經過「促進全滿建國運動聯合大會」等機關的輿論操作，「即日宣告與中華民國脫離關係，創立滿洲國」。日本在東三省的實際行動給予清遺民再次尋求「復辟」的機會，特別是宣言文字直指軍閥與中華民國，欲在清王朝的故土——「滿洲」，以國家的名義與之對抗。於是乎，清遺民的理想即設法延續溥儀的幻想，相信滿洲國將是歷史的轉折處，時任第一位國務總理的鄭孝胥（1860—1938）在日記（1932年10月6日）如是記載：

德國記者芬紐爾來訪，詢滿洲國初無獨立之意如李頓所云者；對曰：「執政與總理視中華民國為敵。今滿洲人民迎而奉之，此非獨立而何？」又曰：「滿洲立國宗旨對於國聯報告書有須聲辯者乎？」曰：「執政、總理為大清國君臣，今疾民國之暴亂，欲整紀綱、恢道德、復故國而已。國聯憤憤，徒為境土離合之語，此乃微末小節，何足辯乎！」<sup>12</sup>

李頓（Victor Bulwer-Lytton, 1876—1947）為「九一八事變」（1931）進行的調查報告，說明了國際聯盟如何看待滿洲國的出現。雖然承認了日本長期在東三省的收穫，卻也以為過度的參與逾越了一般的國家獨立運動模式——滿洲國的政權與日本的預謀密切關聯。誠然，日本選擇在調查團到來之前頒布「建國宣言」及一系列慶祝活動，確實有意強行製作滿洲國的既成事實。<sup>13</sup>而鄭孝胥在調查報告發表以後的回應未必知曉日本的動機，為國家的定位直言：「執政與總理視中華民國為敵。今滿洲人民迎而奉之，此非獨立而何？」可以明白，一心盼求「復辟」的清遺民遙想滿洲國可能的「願景」，東北三千萬民意並非國家建立的基礎，倒是對中華民國的強烈敵意促成了滿洲國必須正名的理由。甚且，鄭氏進一步「聲辯」立國宗旨：「執政、總理為大清國君臣，今疾民國之暴亂，欲整紀綱、恢道德、復故國而已。」李頓的調查報告必須考量國際情勢，關切的是滿洲國如何體現日本的動向；鄭氏截然將滿洲國定位在「復辟」，不只回應了報告未盡之處，並強調為人淡忘的「君臣」身分，但求「復故國」而已。

於此，滿洲國意外地延續了清遺民「復辟」的想望，羅振玉與鄭孝胥在「小朝廷」始終對立的關係也因為關東軍「保護日本的利益」的安排有了共識。前者帶來一封熙洽（1883—1950）的書信，轉述了關東軍的「仗義協助」；後者則攤開數篇登載著「各界準備迎立前清皇帝」與「民國之不足信任」的報紙。種種的政治操作與國際輿論暗示了「復辟」的指日可待，溥儀回憶當時由他們告知滿洲等待「光復」時的心情：「在回園去的路上，我心裡盤算著『復位』

<sup>12</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414。

<sup>13</sup>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118。

的時間，想像著『登極大典』的場面，越想越高興，渾身的血液都像沸騰了起來。」<sup>14</sup>然而，共識之中仍有分歧，清遺民感染了滿洲國散發的「願景」，內心的千迴百轉還是關乎個人政治理念的完成。溥儀如是說道：「最重要而激烈的，還是發生在鄭、羅之間的鬥爭，這是這對冤家最後的殊死戰，因此都使用出了畢生的力氣。」<sup>15</sup>誠然，追隨溥儀前往東北的清遺民只是少數，對於日本應許的「復辟」一直抱持半信半疑的悲觀態度。<sup>16</sup>革命至今二十餘年，羅振玉與鄭孝胥自「小朝廷」不斷展開的勾心鬥角，如今垂垂老矣，在滿洲國迎向各自的終局。

## 二、鄭孝胥的理想

不可否認，觀測清遺民在滿洲國的活動，眼光不免落在鄭孝胥身上。鄭氏一直以「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自居，最終順利得到了國務總理的位置，確實將「復辟」與「滿洲國」發生關係，即言：「意大利必將成為西方一霸，大羅馬帝國必將再興，與未來的大清帝國，分霸東西，其天意乎？」<sup>17</sup>狂妄的預言在日記多有發揮，即使在生命晚期仍然積極構想著帝國的模樣，如是區別了同樣懷想「復辟」的清遺民，羅振玉與溥儀亦不能比擬。有趣的是，鄭孝胥「復辟」的想望雜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顯示一種晚期意義的追求，溢出了清遺民共同的「願景」之外。溥儀憶起鄭氏面對滿洲國成立的心理：

鄭孝胥知道，這次瀋陽之行是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鍵。因為關東軍在拿出所謂「國體」問題的定案，叫「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之前，要最後排定「開

<sup>14</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210。

<sup>15</sup> 同前註，頁 232。

<sup>16</sup> 周明之閱讀陳曾壽（1878—1949）與陳曾植（？—？）日記合編的《局外局中人記》，對於前者參與滿洲國的謹慎態度如是評論：「在極端的道德主義之下，遺老只推敲動機，而極少在動機以外有所分析。復辟既是天經地義之舉，所以日本縱有利害之心，也只需『酌讓』中國的權益便能將之安撫。其餘的，陳曾壽都寄託在日本『推誠相助』、『開誠商議』的動機上。當然這都是陳的願望，而不是經過理智推論出的結論。我們試將陳的見解和鄭、羅作一比較，實在找不出任何有意義的區別。」見氏著：《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09。顧及清遺民服膺傳統的意識形態，以為「復辟」乃天命所歸，即使察覺日本可能的企圖，亦轉為對清室有利的解釋。論者從日記的文字閱讀了陳曾壽渴求「復辟」的心理，悲觀的態度顯示的是自身對「復辟」行動的無能為力。然而，鄭孝胥同樣承受了類似的思維，值得注意的是，積極參與滿洲國的建設逼近了自己導出的解釋，顯現的競爭意識不只是共同的「復辟」願望，對自己晚期政治理想的定義與實踐構成了主要動能，也是本文持續求索的主題。

<sup>17</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211。

國元勳」們的位置。因此，他在動身之前，對我的意思盡量表示順從，以免引起我對他發生戒心，不讓他去瀋陽。等到他的目的已達，再從瀋陽回來，他就不管我這一套了。<sup>18</sup>

這是溥儀事過境遷的感悟，回憶錄亦援引了鄭氏日記的文字。顯然，鄭孝胥「復辟」的準備工作有不同的次序，期望滿洲國的出現也是自我的登場。溥儀堅持的「這一套」也就是王朝體制不變的「正統」觀念，始終反抗日本將滿洲國定位為「共和國」的決定。鄭孝胥當然也有類似的言論：「今東三省事實惟在開放門戶、地方自治二事，宜用簡單辦法。共和之制斷不可行，假共和則尤不可。」（1932年1月29日）<sup>19</sup>只是與日本商榷「國體」問題沒有絲毫談判的餘地，改曰：「極言當借力試行……」（1932年2月23日）<sup>20</sup>如是分別了清遺民「復辟」的願望與鄭孝胥的目的。

「國體」爭論的具體情形在日記裡有詳細的敘寫，鄭孝胥深切明白從「小朝廷」提升至「滿洲國」不是溥儀與清遺民天真的「復辟」情懷可以完成。甚且，獨立國家與中原王朝亦有區別，國際情勢的變化直接將他們恪守的天命思想列為管窺之見。鄭孝胥的選擇違背民族大義，其實是考量了一切情況而有的價值判斷。日記（1932年2月24日）記曰：

板垣（征四郎）所示立國制度名曰民本制，國曰滿洲國，君主曰臨時執政，年號曰建國；上留民本制及臨時執政二事未答。板垣又示〈滿蒙人民宣言書〉底稿及擬上〈即位宣告文〉，此文草草，不可用，為之擬稿曰：「滿蒙人民，困於虐政，倒懸之急，孰能解之！予以不德，膺茲世亂，雖有弔民之懷，苦於援溺之術。今為人民擁戴，辭讓不獲，勉徇再三之請，且以一年為期。必當竭愚昧之誠，求賢智之助，除其疾痛，登之衽席。天日在上，咸使聞知！」大七赴旅順，使代奏曰：「與日本司令部所請制度不必爭辯，俟人民表至再定行止之略。」……大七（鄭垂）自旅順歸，云：今早使萬繩栻往告板垣以不允民本制及臨時執政二事，板垣仰天不答久之。鄭垂九時半至行在請對，力請勿駁；同對者羅振玉、商衍瀛、萬繩栻皆不敢言，惟陳曾壽力言非君主不可。鄭垂復引少康邑綸、庖正，辨難久之，上乃決，復命萬繩栻往召板垣，遂改「一年」句為「暫時維持」四字。板垣退而大悅。昨日本庄（繁）兩次電話來詢情形，板垣今日十一時當去。暫許之議，十時乃定，危險之機，間不容髮。蓋此議不成，則本庄、板垣皆當引咎辭

<sup>18</sup> 同前註，頁236。

<sup>19</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362。

<sup>20</sup> 同前註，第5冊，頁2367。

職，而日本陸軍援立之策敗矣。雖曰集權制度，觀其事勢，未能驟集，猶待外得日本、內得人民乃可為也。<sup>21</sup>

面對日本強勢的安排，鄭氏簡單寫下了溥儀的沉默與妥協。然而，溥儀當時不能理解的憤恨心緒在回憶錄有更為完整的還原：回顧與關東軍代表板垣征四郎（1885—1948）的談判過程，特別在意對方表情與聲調的變化，恍然顯露了自己的不安。聽聞滿洲國將以「執政」取代「皇帝」，冠以「閣下」的稱號，溥儀只能暗地叫喊：「在我的心裡，東北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萬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聲『陛下』呀！」<sup>22</sup>日本以清王朝的亡鄉與失土作為條件，親自卸除皇帝的龍袍，換上了陸海軍大元帥服。溥儀只能在祭天敬祖的時候穿上它，淪為儀式用途的裝飾。不只如此，板垣異常冷靜的態度帶來的壓力感，溥儀深切覺察到自己的無能為力：「我原來以為，土匪出身的張作霖和我這『自與常人殊』的『龍種』按理不能並列，不過誰知現在日本人的心裡又是怎麼樣的呢？」<sup>23</sup>當外在的服飾與內在的血統不為外國承認，溥儀震驚於禮儀與倫理的全面崩解，儼然是一次現代性（modernity）的衝擊。直到日本堅決實行民本制及臨時執政的體制，溥儀無從反抗，只能接受「皇帝」在滿洲國成為形式化的存在，援引山室信一教授的評論：「是龍截斷了自身的腳和四肢。」<sup>24</sup>溥儀才能延續自己與清王朝的殘夢：「我看實在沒辦法爭了，才又有點清醒過來，明白了皇帝的稱呼本是人家賞的，再爭下去說不定連皇帝也當不成了，也只好答應下來。」<sup>25</sup>

日記的材料也提及了板垣承受的壓力，溥儀的同意關係著關東軍在亞洲的戰略。鄭孝胥明白雙方的難處，慮事一直擺盪在現代與傳統思維之間：「雖曰集權制度，觀其事勢，未能驟集，猶待外得日本、內得人民乃可為也。」又見鄭氏重新起草的〈即位宣告文〉，「予」的主詞承認了「皇帝」到「執政」的改變，亦同意「一年為期」改為「暫時維持」，不去執著溥儀的正名。面對清遺民的反對聲浪，鄭氏日記即言：「魯昭公困於公徒，終不得復國；今之從者，皆昭公之公徒也。」（1932年2月28日）<sup>26</sup>將他們的成見視為溥儀入內的阻礙，不與之為伍。由此可見，追求「復辟」，計畫的步調確實與其他清遺民截然不同，鄭孝胥欲將滿洲國定位為「大清帝國」，而帝國聯繫自我理想，建設一座政治烏托邦，映照了對於晚期意義的迫切求索。鄭氏如是回應溥儀對滿

<sup>21</sup> 同前註，頁2367-2368。

<sup>22</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239。

<sup>23</sup> 同前註，頁240。

<sup>24</sup>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150。

<sup>25</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278。

<sup>26</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368。

洲國的提問：「毋失日本之熱心，速應國人之歡心。此英雄之事，非官吏、文士所能解也。」（1931年11月6日）<sup>27</sup>以為「英雄」當把握日本與國人的支持。有趣的是，日記顯示鄭氏私下與日本的往來，「英雄」的標記不只是激勵溥儀的言辭，也暗示了自己的政治期望。<sup>28</sup>其實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鄭孝胥就預告了「復辟」可能的方向：「佟楫先來，自言欲赴奉天謀復辟事；余曰：若得軍人、商人百餘人出任倡議，脫離張氏，以三省、內蒙為獨立國，而向日本上請願書，此及時應為之事也。」（1931年9月21日）<sup>29</sup>觀察日本在東三省興起的軍事行動，即以為「復辟」必須得到國人與日本的支持。有意思的是，鄭氏開始構想「獨立國」需求的建設背景、國際情勢與思想內容，似乎有意將「九一八」事變視為「大清帝國」出現的契機。日記（1931年10月7日）記曰：

今年為民國之二十年，今日為陽曆十月七日，更三日則彼所謂「雙十節」。彼以「雙十」為國慶，適二十年亡矣，此誠巧合，天告之也。民國亡，國民黨滅，中國開放之期已至。誰能為之主人者？計亞洲中有權力資格者，一為日本天皇，一為宣統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開放之議，各國聞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議，安乎，不安乎？若宣統皇帝則已閒居二十年，其權力已失；正以權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議之資格，以其無種族、國際之意見，且無逞強凌弱之野心故也。吾意，共和、共產之後將入共管，而不能成者，賴有此一人耳。此事果成，誠世界人類之福利，種族、國際之惡果皆將消滅於無形之中。視舉世之非戰條約、苦求和平者，其效力可加至千百倍。孔孟仁義之說必將盛行於世。願天下有識者撫心平氣而熟思之。此語已語莊士敦、吳藹宸，惟弢庵（陳寶琛）聞之謂為慷慨他人之慨。弢庵八十四歲矣，固宜為此語，正以他人徒有慷慨而不能自為故耳。<sup>30</sup>

開篇以歷史的弔詭暗示了中華民國的終局——國家起於「雙十」，國祚亦是「二十」。縱然有「民國乃敵國也」的私人情緒不得排解，鄭孝胥深信獨立國的建

<sup>27</sup> 同前註，頁2350。

<sup>28</sup> 同前註，頁2351、2355。日記藏有一則紀事：「上來室中密語，云工藤（忠）聞其友齋藤（實）語云：日本舉國幾乎一致主張滿蒙獨立之策，讀共產黨欲謀暗害，謂乘輿不宜輕出。余意此語既傳播，則非甚密，我亦不必代彼秘密也。」（1931年12月20日）鄭孝胥原本保守的秘密可能是日本朝野對東三省建國的看法，資訊的掌握顯然在溥儀之前。此外，日記亦提及鄭氏與遊走在日本朝野間的浪人太田外世雄（？—？）有細節的討論：「草〈願學會大綱〉十二條與太田（外世雄），太田示所擬〈建國大略說帖〉。」（1931年11月14日）鄭氏的謀略始終在暗地生長。

<sup>29</sup> 同前註，頁2342。

<sup>30</sup> 同前註，頁2344-2345。

立必然依循自己設想的「三共」路線：「共和—共產—共管」，文明進程的終點則是「共氏遂亡，皇清復昌」。<sup>31</sup>民國的滅亡才有「中國開放之期」，由列強瓜分利益、推舉共主，清楚判別當時的國際情勢，悄悄挪出了「復辟」的位置。於此，鄭氏進一步說明宣統皇帝具備的條件如何穩定「共管」的局面：「皇帝則已閒居二十年，其權力已失；正以權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議之資格，以其無種族、國際之意見，且無逞強凌弱之野心故也。」與日本天皇對照，「九一八事變」的聲訴與處理持續進行，輿論不會希望日本直接取得滿洲土地；相較之下，「小朝廷」的浮沉與溥儀的閒居成為絕佳人選：清王朝隱沒而未能理解列強動向、皇帝緣自中國亦不會影響種族偏見。話鋒隨即轉向了溥儀登位之時，不只解決列強爭端、消弭種族衝突，加上「共管」期間持續宣揚的孔孟仁義之說，「大清帝國」主導的風氣可以引領列強凝聚和平之共識。

溥儀追憶天津「小朝廷」時期，特別撰寫「鄭孝胥的理想」一節，如是形容鄭孝胥與他人的區別：「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有些老古典，而他卻常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里尼創了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sup>32</sup>回憶錄的例子分別了鄭孝胥與一般清遺民的不同，正是傳統與現代的分野。鄭氏的理想根植於現代，至於溥儀聯想他描述未來「大清帝國」的場景，「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動心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以至聲淚俱下」，讓「小朝廷」持續在天津租界等待時機。甚且，相對於陳寶琛（1848—1935）的「忠心」與羅振玉的「躁進」，鄭孝胥的「信賴」著實感染了溥儀<sup>33</sup>。尤其是「三共論」的見識，在其他清遺民手足無措之時，鄭氏的眼光已投向了「列強共管」：

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的

<sup>31</sup> 同前註，記曰：『昨戲語人：『共和之子曰共產，共產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復昌。此圖讖也。』（1925年11月16日），頁2072。「三共論」是鄭氏在革命以後多次提及自己對中國前途的設想，而「九一八事變」帶來獨立國成立的希望，鄭氏的想法一以貫之，細心遵照「復辟」的程序。

<sup>32</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190。

<sup>33</sup> 溥儀在回憶錄介紹、評述與之親近的清遺民形象：陳寶琛、羅振玉與鄭孝胥在天津時期對「小朝廷」的前途有不同的思考。陳寶琛是溥儀認為最忠心的人，只是對任何決定都極為慎重，與列強的合作幾乎表明反對的立場；羅振玉的形象多少來自鄭孝胥的讒言，溥儀便帶著偏見指責羅氏急於聯日的想法。然而，描述「鄭孝胥的理想」即以陳、羅二人對照鄭孝胥的作為，忠心而慷慨激昂，決策亦未有躁進之舉，日益增長的信賴教溥儀不得不說：「如果可以這樣比擬一下的話，他與我之間的關係，已達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頁190）。

技術，西洋的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帥。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裡，「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毀滅。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復辟成功，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託在「共管」上。<sup>34</sup>

溥儀的說法是考據鄭孝胥、羅振玉二人與日本人的往來，後者「眼睛裡就只有日本人」，鄭孝胥則關注「列強」的行動，判別整體的國際情勢——日本只是列強之一。設想「列強共管」乃中國之前途，即是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正統，視之為「亂黨」、「亂民」。而民國以來的動盪不安說明了政權難以持久，「共和」只是作為「共管」的起點，滿足「皇清復昌」的條件。鄭孝胥的理想未曾陷入清遺民表現自我政治認同的迴圈之中，倒是展望「未來」，盡力構思一則又一則的想像與預言。

近年來，王汎森（1958—）先生試著描述晚清以降知識分子對「未來」諸多正面的、樂觀的想像，以為他們提出的理論向來具備主觀能動性，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餘論指出：「各種歷史哲學或階段論，往往強調亡國滅種的危機與充滿希望的『未來』在同一條發展脈絡中，既揭露了現在的落後不堪，也保證努力之後可以達到無限樂觀的『未來』。」<sup>35</sup>場景的動力來自「現代主義」的「共時」的時間性，某些特殊行動者在意義危機之中發明了「未來」。<sup>36</sup>一定程度汲取現代資源的鄭孝胥亦復如是，由此分別了遙想「黃金古代」的清遺民，相信大清帝國的「未來」必須朝向「世界」。溥儀的回憶錄記載鄭氏非凡的理想：

有一次，在給我講《通鑑》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長安，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說時是禿頂發光，唾星四濺，終於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sup>37</sup>

史書記載過去帝王得失、國家興替，而鄭孝胥遙想「未來」，閱讀一則想像的歷史，極為樂觀地描述未來的帝國榮景。尤其帕米爾高原位在亞洲中部，延續絲路的軌跡，溝通西方，立足世界。

「三共論」指向中國的前途，以「共和」與「共產」總結民國的所有挫折，

<sup>34</sup> 同前註，頁 191。

<sup>35</sup>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探索與爭鳴》第 9 期（2015 年 9 月），頁 70。

<sup>36</sup> 黃錦樹：〈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劃？〉，《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臺北：麥田出版，2003 年），頁 23-26。

<sup>37</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190。

「列強共管」指日可待。受到鼓舞的溥儀如是說道：「我和他共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我的寶座，繼續大清的氣脈，恢復愛新覺羅宗室、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sup>38</sup>只是鄭孝胥的理想更為遠大，期盼的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規模。日記（1932年3月13日）記曰：

至國務院，草佈告國內文曰：「土地、人民、政事，合之而成國家。政事廢弛則人民凋敝，人民凋敝則土地荒蕪，此即今日國內之景象也。國家之患莫大於排外。有土地之富而不能自營，寧聽其荒曠不許外人之合作，因此而開兵端，因此以致內亂，猶憤憤曰：『他人欺我！』豈知據萬里之沃壤而閉塞之，此乃天道之所不容，其不能自保，決矣。為今之計，唯有開放門戶，招來合作，為立國之本策，使吾國每年可集數千萬之資本，每年可增數百萬之人民，盡棄猜疑，盡除阻梗，則天開地闢之變化，不出數年，必成為富麗莊嚴之世界。杜甫詩曰：『將回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唯畫地。』國有賢達，其亟圖之！」<sup>39</sup>

鄭氏從日本看到了「列強」對中國完全的主導：「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個『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點，也可以說是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開放門戶』請的第一位客人。」<sup>40</sup>如今得到土地與人民，滿洲國的成立正好凝聚了列強的關注，鄭氏草擬的公文意在確立國家的走向，以「開放門戶」為立國之本策，欲將理想化為現實。於此，面對「共管」的「未來」，溥儀低頭思念「舊日光景」，而鄭孝胥眺望遠方的「富麗莊嚴之世界」。意念相互調和，文末引述的詩句恰好歸結二者之想望：「將回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唯畫地。」<sup>41</sup>無論重返清王朝的榮耀，或是規劃新興帝國版圖，終於在滿洲國有了實現的機會。<sup>42</sup>

<sup>38</sup> 同前註，頁193。

<sup>39</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頁2371。

<sup>40</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194。

<sup>41</sup> 詩句出自李賀（790—816）〈榮華樂〉，日記誤作「杜甫詩曰」。

<sup>42</sup> 溥儀如是回憶在滿洲國成立之初，積極宣揚「共管」理念的鄭孝胥：「這猶如給強盜做底線的僕人，打開了主人家的大門，放進了一幫強盜，當了一幫強盜的大管事，猶感不足，一定還要向所有各幫強盜發請帖，以廣招徠。這自然就惹惱了已經進了門的強盜，一腳把他踢到一邊。」見氏著：《我的前半生（全本）》，頁196-197。這是溥儀經歷滿洲國解體、第二次中日戰爭至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自傳，顯示了「後見之明」的觀點。當時日本的想法未可知曉，值得探究的是，鄭孝胥如何期待滿洲國的成立可以真正實現「共管」的理想。

## 第二節 英雄論

### 一、妖狐之露尾

雖然「鄭孝胥的理想」卓然不群，「復辟」依然是所有論述的終極關懷，延續著清遺民的時代命題。而鄭孝胥自言奉行「復辟主義」<sup>43</sup>，作為一切思想活動與政治意識的主導，構思的場景與具體可行的建設也都有直接的考量。不可否認地，「復辟」自張勳發動的政變（1917）稍有規模之外，沒有太多顯著的成果，清遺民只能退守政治的邊界，面對或出或處的現實困境。<sup>44</sup>當時鄭孝胥閉居「海藏樓」閱天下事，縱使沒有實際的政治作為，奮然在日記抄寫「復辟」相關的資訊，留下許多評論文字。革命中斷了鄭氏的仕途，開始琢磨後半生的理想，「海藏樓」容納歷史的破碎與傷痛，想像激盪在民國政權曖昧不明的時候，而「復辟」提供了重構的可能。看似紙上談兵，直到確認了滿洲國的位置，投入政治現場將革命以來積聚的靈感付諸行動。值得注意的是，鄭孝胥過去日記對「復辟」的想法一以貫之，滿洲國儼然是實現理想的最佳舞台。於此，「海藏樓」時期關切「復辟」的來龍去脈，最終轉化為成就鄭氏晚期政治意念的資源。

不願接受「遺民」稱號，辛亥革命（1911）發生以後，效忠清室的人往往顯示敵視民國的態度，而鄭孝胥斥責為亂黨國慶日祝賀者乃「真醉生夢死之徒也」<sup>45</sup>，而清醒之士陸續謀劃王朝復興，直言期待眾望所歸的「英雄」出現。日記（1912年3月4日）記曰：

蓋蜀亂未定，川人旅滬者欲舉眾望所屬以平其亂耳。合群之學自崇拜英雄始，蓋知其能而委任之，而服從之，而後舉群受其益。夫英雄所見必有異

<sup>43</sup> 記曰：「柏原文太郎來，談至午乃去，聞其人為國民黨，乃犬養毅之徒也。然介紹者為森茂，知余為復辟主義……」（1918年10月7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747。

<sup>44</sup> 學界的研究多匯流於此，探索清遺民在革命以後延續的日常生活，如何以詩文、書畫、衣著、居所等「儀式」（rites），形塑共同的「遺民」表述。其中，林志宏的歸納嘗試討論清遺民的經營如何標記各自的政治抉擇，並指出「張勳復辟」為他們調適改朝換代帶來的影響。請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年），頁73-130。

<sup>45</sup> 記曰：「是日，十月十號，亂黨號為『雙十節』，謂之國慶日，市居頗有休業者，學生舉行提燈會，真醉生夢死之徒也。」（1916年10月10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629。

於庸眾，若但媚世阿俗，安得謂之英雄。今之國民，既無知人之明，而專譽徇己者，此乃好諛說佞之社會，惡能得人以自治哉。<sup>46</sup>

民國軍假大規模的民意宣告革命成功，反對者則為當前混亂而束手無策。鄭氏由此延伸，特別留意反抗民國政權的呼聲，盼求「英雄」的見識。「真醉生夢死之徒」緣於社會風氣的感染，唯有「英雄」能不為所動，推群獨步以開創不同的情勢。鄭氏的想法可以推至過去參與「立憲運動」的「預備」思維，革命可謂「苟安偷活」之「國民」顛覆了「歷世上英雄豪傑乘時得志者」維持的天下制度，清王朝則承受了改革失敗的後果。<sup>47</sup>同時，鄭孝胥也相信今日革命帶來的動盪將為「英雄」終結，在「海藏樓」心繫國事，眼光投向了期間為復興王朝頗有積極作為的人選：袁世凱（1859—1916）、升允（1858—1931）。

張玉法（1936—）先生以為辛亥革命收尾於袁世凱獲取政權，指出了他當時的關鍵位置：「清廷希望他能平定革命軍；革命軍因袁為漢人，希望他迫清廷退位。列強見清廷已無能為力，希望袁能與革命軍議和，共同恢復中國的秩序，以免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及商業受損。」<sup>48</sup>鄭孝胥在革命爆發時也期待著袁世凱的出面，日記（1911年10月27日）記曰：「此時以袁世凱督湖廣，兵餉皆恣與之，袁果有才破革黨、定亂事，入為總理，則可立開國會、定皇室、限制內閣責任，立憲之制度成矣。」<sup>49</sup>相信袁世凱有足夠的能力扭轉頽勢，順著革命帶來的天崩地解，引領清王朝走向立憲體制。甚且，不在歷史現場的鄭孝胥，猜想袁世凱的動靜，不自覺以為一切政治行動將依循自己的想法前進：「袁世凱之意似欲保存皇室，否則決戰。如能挾外交之力，抱尊王之義，誠今日之正論也。」（1911年11月6日）<sup>50</sup>並在日記寫下可能實行的手段、舉措曲直，幾乎是將自己的政治意念放置在袁世凱身上。鄭氏持續以日記（1911年12月24日）介入議和過程：

報言，袁世凱仍主君主立憲，且云：「議和不就，惟有辭職」。今為袁計，有路三條：守君主而戰，一也；辭職避居他國，二也；漫應總統之舉以圖後日之反正，三也。然第三條詭譎太甚，亦極危險。<sup>51</sup>

誠然，這些判斷是以袁世凱完全支持清王朝為前提，在「海藏樓」設想議和過

<sup>46</sup> 同前註，頁1403。

<sup>47</sup> 鄭孝胥參與「立憲運動」的演說以教化國民、轉化社會風氣為主旨。見《申報》（微縮資料）（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上海圖書館攝製），1906年12月18日。

<sup>48</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上冊（臺北：東華書局，1977年），頁69。

<sup>49</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2-1353。

<sup>50</sup> 同前註，頁1355。

<sup>51</sup> 同前註，頁1374。

程可能遇到的難題，提供錦囊妙計。第三條是回應張元濟（1867—1959）、張謇（1853—1926）「為皇室計，不必爭此虛位以致奇禍」的說法，若是妥協了革命軍要求的總統制，將會造成無法預測的結果。鄭氏直言：「縱以『危行言孫』為主，辭不就可矣，何用鼓吹遜位之說以媚亂黨耶。」（1911年12月23日）<sup>52</sup>原來效忠清室的人紛紛變節，鄭氏擔憂的正是國體的搖晃不安，即便「漫應」革命黨的安排，局勢依然難以控制。於此，只能相信袁世凱的調解，鄭氏在閱讀西方報紙對清廷代表議和的唐紹儀（1862—1938）投奔民國並擔任內閣要職的報導，案曰：「袁不能辭委任非人之咎；撤銷所議，猶可收之桑榆。」卻不理會西人懷疑「袁世凱似在愚弄政府」的態度。（1912年1月4日）<sup>53</sup>甚且，時任兩廣總督的岑春煊（1861—1933）亦有背離王朝體制的說法，與袁世凱通信說道：「今日國民多數均以共和為目的，朝廷既有召國會決政體之諭，自系採取多數。我皇上之從民所欲，不私天下，以堯舜之心為心，為海內外所共見。民軍感於朝廷禮讓為國，罷戰息民，故亦眾口一辭，必以尊崇皇室為報。上下相交，各盡其道，為世界歷史開一未有之局，誠吾國之光榮也。」鄭氏如是回應：「岑豈亦被逼而發此電耶，抑已降於革黨耶？怪哉！天下好名譽必讓袁世凱一人做盡，南方士大夫真不值一錢也。」（1912年1月10日）<sup>54</sup>將岑氏的言論歸結為「南方士大夫」普遍的操守問題，唯有袁世凱可以順利解決爭端，堅守清室之龍脈。<sup>55</sup>

無奈的是，袁世凱的抉擇未若眾人之料想，終究還是碰觸了鄭孝胥亟欲保衛的國體，展開由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到洪憲帝制的狂想。可以發現，袁世凱毫無立場，只有自己的政治野心，邁進共和之路，卻也不為體制所限，決然稱帝。疑惑皇帝遜位漸漸成為議和必要的過程，鄭氏說道：「既云召集國會公決政體，何為先自遜位？吾所不解。復辟甚難，豈非自困，或袁勸為此舉，以激怒將士耶？然亦太冒險矣。」（1912年1月22日）<sup>56</sup>難以評斷直取國體的作

<sup>52</sup> 同前註。

<sup>53</sup> 同前註，頁1377。

<sup>54</sup> 同前註，頁1380。後續仍有評論：「岑避地滬上，本可不發一語；今一開口而肺肝盡露，原來亦是主張推翻王室之宗旨，平日聲明掃地。此與自投糞坑何異，其愚至此，豎子真不知君臣忠義為何語。」（頁1381）。

<sup>55</sup> 鄭孝胥對「南方」頗有異議：「南方士大夫毫無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於共和實無所解，鄙語有所謂『失心瘋』者，殆近之矣。」（1911年11月22日）；前引文「不值一錢」的說法源自嚴復（1854—1921）對革命的看法：「經此事變，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見矣。南方學者，果不值一錢也。」（1911年12月21日）。持續不斷的憤恨亦牽連了南方人民：「革黨允退位後於四十八點鐘內解散臨時政府，再謀統一之法，或孫文入京，或項城（袁世凱）來寧。此說恐未必行；如果行，則國會非在北京召集不可。南方人民懼革黨之恫喝，終不能抱定主見耳。」（1912年1月26日）顯然不指望南方人民之意向能為議和帶來完善的成果。

<sup>56</sup> 同前註，頁1386。

為，不相信袁世凱亦是叛逆作亂之徒。直到輿論指出了真正的意圖，赫然發現正在政治現場最前端的人並非「英雄」。日記（1912年1月23日）記曰：

報言……又云，北京某要人之信件論袁世凱之真相，略曰，「項城並不堅持君主政體，惟所處地位斷不能直截了當宣布共和。南中輿論每不諒其苦心，疑忌甚深，不無誤會。某微窺其意，蓋始終不願以兵力從事……項城入京以來，其眼光所注，全在外交及親貴，故其布置亦惟對於此二者著著進行，卻未曾留意其部下之軍隊有反抗之舉動……」等語。察此函似系實狀，吾以君子之心度項城，若果若此，真爾朱兆之類，吾言不幸中矣。<sup>57</sup>

報導為「共和」發聲，揭露袁世凱議和真相，內容呈現的主角幾乎顛覆了鄭孝胥的預期，不只意在共和，一切行蹤也有跡可循，謀求外交與親貴保全自己在新體制的位置。而鄭氏憤慨的閱讀來自袁世凱真實的形象與想像的差異，之後在日記抄寫《時報》十六日（1912年2月4日）刊載〈袁世凱奏請收回封爵成命及瀝陳大局情形折〉：「……臣入朝之初，抱定君主立憲宗旨，冀以挽救大局……民黨堅持共和，毫不通融……仰蒙慈聖召王公大臣，詢謀僉同，遂奉『召集臨時國會公決國體』之旨。臣之初志既已背馳，然尚望國會開成，或不至偏重共和，尚存君憲之望……」回顧自己如何信任袁世凱的決心與能力，鄭氏說道：「余所錄者，皆望袁以臣節終始之意，儻果負朝廷，則我為不智矣。」（1912年2月7日）如是失望的語氣，感嘆「英雄」即「妄奴」，真相竟是「妖狐之露尾」。<sup>58</sup>甚且，鄭氏將「英雄」破碎的心理與革命現實連結，預示中國前途的黯淡無光。日記（1915年2月26日）記曰：

國亡矣！將來政黨與外人為敵，勢必日孤。袁世凱之命運將隨滿洲以俱盡。華人盡化為南洋華僑及海上買辦之性質。立國之思想殆如死灰之不復燃，然則溺之而已。公等將何以救之！哀哉！<sup>59</sup>

不是「英雄」，卻在辛亥革命收穫最多實質的政治利益。清廷、革命黨與列強原本期望可以在革命的爭端找到最佳辦法，袁世凱盡是將清王朝收歸己有，與各方為敵。於此，自成一家必然面臨孤力難為的情況，只能眼睜睜看著妄奴與江山灰飛煙，殘忍地回應了鄭孝胥對「英雄」的求之不得。<sup>60</sup>

<sup>57</sup> 同前註，頁1386-1388。

<sup>58</sup> 同前註，頁1422。記曰：「袁世凱電告天下，自言『束髮讀書，心敬唐虞。二帝為世勤勞，不為己利。乃有疑其欲為第二之拿破崙者，皇天后土，可鑒此心』等語。真妄奴也。曹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所謂妖狐之露尾。」（1912年6月27日）

<sup>59</sup> 同前註，頁1551。

<sup>60</sup> 「妖狐之露尾」畢竟是鄭孝胥站在清王朝立場的情緒用詞，平心而論，倒也不能僵化袁世凱的形象，或是誤會了鄭氏的政治判準。近年來，日本學者岡本隆司教授回顧當時的政治情境，有此評價：「如此一來，讓當時實力最堅強的人物掌握政權，令南北

## 二、謀夫之不臧

此外，鄭孝胥以為逆轉現實情勢的另一位「英雄」即是升允。時間已經進入了「復辟」階段，未曾變節的清遺民力求回歸王朝體制。鄭孝胥在日記提及升允在革命以後的行蹤。日記（1912年3月14日）載其電曰：

鄙人此次督隊剿匪，系奉朝廷諭旨及內閣命令。用兵數月，無日不在冰雪干戈之中。軍至之地，長幼歡迎，此非升允所自謂也。又因軍糈無出，允即罄家室之所有以助軍用。允之此舉，蓋欲以死報國家也。世界共和，迫於時勢，允何敢獨違。第此時允受兩方面之欺迫，實覺憤不欲生，事既如斯，非達目的不可。蓋初時系為剿張鳳翽而用允，今則共和甫布，忽又飭張鳳翽督軍以討允。昔視曰賊，今反為正大之師；昨日勤王，刻反為悖逆之輩：試問天下五洲，有此公理乎？允固不才，尚不至早秦暮楚如□□然。今允之志決不與共和為難，亦決不傷害百姓，獨張鳳翽以大總統命令而來討允，□□□□實不甘心……如果允死張存，或亦天命、人心之公道耶。一息尚存，誓不兩立。軍書旁午，枕戈陳情，尚求矜察。

電文內容確實表達了升允欲解決的私人恩怨，只是敵我關係的置換已然指向了改朝換代的政治現實——「朝廷諭旨」改為「大總統命令」。鄭氏閱讀了升允的不甘心正是王朝崩解的後果，即便還不明白他是否意識到當前危機乃「共和」勢力之脅迫，依然肯定致力追求公理之作為：「為升允計，宜力戰直前，俟必不能支，則以奔俄為末路，使志趣大明於世界，亦可為滿洲生色矣。列國必敬重其人。千載而下，不愧王保保也。」（1912年3月14日）<sup>61</sup>寫在日記的回應設想了可能的結局，亦將自己的政治意念投向升允身上。尚未確定「決不與共和為難」本意，鄭氏私自理解升允的處境便是「王朝」與「共和」的對立。於是，預斷升允的失敗以符合王朝之景況，僅存的「志趣」務求流布於世界，使列國敬重其苦心，進而關切中國之前途。隔日，鄭孝胥得知「升允欲興復清室，仍稱宣統四年」，確認了升允反對「共和」的決心，持續追蹤後續的消息。日記（1912年3月17日）記曰：

---

和解，並防止政權分裂，也許是唯一的一條路，而這號人物，也非袁世凱莫屬。這一股客觀的趨勢，彷彿是黑暗中的一線光明，是不論國內外任何人都明白的方向。外國人為什麼會稱袁世凱為『Strong Man』也是不難理解。與其說他是抱持著強大的野心、玩弄權謀，不如說是眾望不約而同地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見氏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新北市：八旗文化，2016年），頁206。前文引述張玉法在通史的寫作上亦有類似的論斷，在中國近代史的關鍵時刻，袁世凱的行動若是無法對自身陣營有所助益，期待的崩落自然會有相對的惡聲出現。

<sup>6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404-1405。

《時事日報》載〈升允到潼之確信〉云：「升允反對共和，早為人所共和（知）……十五日趙（倜）因升允反對共和，誓之以死，無論如何決不曲從，趙力勸無效，即行回潼。……聞升允之意，擬請前清太后、清帝一同到秦為偏安之計。趙協統聞知此信，已密行告知袁總統。」<sup>62</sup>

升允並未有轉圜之意，在陝西的軍事行動其實是為了爭取可以庇護清室的地點。鄭孝胥對此另眼相看：「升允能如此，可為忠臣義士吐氣。」仿若在「好諛說佞之社會」獨醒，發現了不同的聲音。

升允的政治行動持續不斷，儼然是「復辟」的一聲巨響。1913年6月23日，《民立報》載曰：「哈爾濱函，刻有升允在哈爾濱俄報館名腰洼印子那刷印〈檄告天下文〉一千張，攜赴蒙古，欲遍貼通衢以惑人心。」升允提供了數則檄文，報紙亦有收錄，將「復辟」的想法變作具體的聲明。回應「共和」已非「迫於時勢」：

群無知惡少年喜為平權自由之說者爭附之，以謂此後得遂所欲，是甘心從無父無君之教者也。豈知不忠於君未有能信於友者，不孝於親未有能悌於兄弟者，亦終受其禍而已矣。

試以傳統的倫理思維解構「平權自由」的想法，斥責「奸人」（孫文、袁世凱）宣揚「邪說」。然而，正是綱常倫紀的失落，清王朝的存在甚為重要：「清室存，則堯舜以來三綱五常之道借以不墜；否則，自今以往，堂堂華夏長為無父無君之國，豈不哀哉！」<sup>63</sup>「君」牽連一切的社會階層結構，至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於此，捍衛清室也是存續中國文化的用心，必也正名乎。

其次，《民主報》登升允第二篇檄文，探索「共和」之起源，直指今日「邪說」如何蠱惑天下：

袁世凱假共和之名以盜天下，號稱民國，其意蓋托古昔周厲王之時與美洲華盛頓之世也。夫厲王出居於彘，其大臣為共和之政，後奉宣王以中興。是共和者因國中無君而調護之之謂，非有君而攘奪之之謂也。華盛頓草昧初開，未有君臣上下，故創為選舉總統之局。此可行之美洲，曾不宜於歐、亞，況中國乎！<sup>64</sup>

歷史的「共和」有二說：周厲王的殘暴凝聚了國人共識，而有共伯和行天子事，最終歸正於宣王；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未有綱常思維，

<sup>62</sup> 同前註，頁1406-1407。

<sup>63</sup> 同前註，〈升允檄文一〉，頁1469。

<sup>64</sup> 同前註，〈升允檄文二〉，頁1470。

開創新制以行之美洲。中國的例子是以「中興」為結局，成就美德而不直接威脅君主的位置。換言之，「共和」只是王朝體制應變的政治機制；西方的例子有自身的文化脈絡，當前並沒有其他的適用的情況可以並舉。升允簡要的考證維護了中國的倫理規範，而孫文的「辭而弗居」與袁世凱的「躬行篡奪」說明了民國再三強調「共和」一類的「新名詞」，只是私人奪天下的手段。

無論如何，民國的政權已是事實，清王朝也為「優待條件」綁架。升允明白他們必然面對艱難的政治抉擇：

幕府才弱力薄，不堪負重，寧身沙漠，影只形單。知己親朋，風流雲散，或暫居散職，或已解兵符，或委蛇以待時，或躊躇而欲試，或屏息山林，放懷詩酒，行藏異趣，悲憤同情。更有改節易操，屈就偽官，得之傳聞，將疑將信。豈李陵降虜，將得當以報漢歟？抑揚雄仕莽，終作賦以美新歟？此幕府欲為將伯之呼而又興〈谷風〉之嘆者也。亦有未曾識面而但相知名，既懷報國之忠，愿結同盟之好。或蠟書而遞信，或驛使以通誠。據險嬰城，不妨撥趙幟而立漢幟；反戈倒戟，何嫌引外蛇以鬥內蛇。我軍入衛於楓宸，公等皆錫之茅土。監視在上，無有食言！古人云：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若常人所不能為者而亦弗為焉，則亦常人而已矣。勉旃自愛，時不再來！<sup>65</sup>

引文大致列舉清遺民的動向，尊重各自的決定。而升允在革命以前即奉朝命成立幕府督辦陝西軍務，過程正好經歷了朝代的更迭。無奈餉械不足，忿曰：「明知禪魏文實出子桓之手，安能隱忍不與較量也哉！」似乎難以忍受民國自導自演的「共和」戲碼，又沒有孤注一擲的資本。明白了局勢的艱難，升允仍堅持「復辟」，期許自己：「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若常人所不能為者而亦弗為焉，則亦常人而已矣。」拔萃出群，在困境琢磨「英雄」之見識。

鄭孝胥將升允的檄文完整抄寫在日記，即曰：「往時端午橋極讚吉甫之賢，今觀所為，誠賢者也。惜以無助，恐難成功。然亦今之王保保矣。」（1913年6月24日）<sup>66</sup>有意思的是，又一次以元末奮力抵禦新興政權的蒙古將領王保保（？—1375？）稱許之，極為肯定升允報國之忠。聯繫鄭氏過去一首頌揚王保保的詩作：

<sup>65</sup> 同前註，〈升允檄文三〉，頁1471-1472。

<sup>66</sup> 同前註，頁1472。

天下奇男子，惟有王保保。平生惜此人，豪傑盡推倒。誰能厲忠義，抗節誓不撓。萬人苟一心，羣孽豈難掃。丈夫縱失敗，善死固有道。首鼠深可憎，窟兔詎為狡？<sup>67</sup>

情志落在革命前夕，尚不知曉升允的心意，詩人對「王保保」的遙想是感慨於時局的動盪不安。詩作來自「海藏樓雜詩」組詩，承載著一系列綿密而沈鬱的「積恨」，「王保保」的顯影，既是詩人在世變之下自我安頓的方式，也隱含了「英雄」的想像與期待。於此，升允的宣示暗合了鄭氏自「海藏樓」積聚的懷抱，詩曰：「平生惜此人，豪傑盡推倒。誰能厲忠義，抗節誓不撓。」王保保勝過千萬豪傑的理由在於「忠義」，而「萬人苟一心，羣孽豈難掃」又一次申明了鄭氏的「英雄」論：「合群之學自崇拜英雄始，蓋知其能而委任之，而服從之，而後舉群受其益。」如何拔新領異、教化風氣將是抵禦革命軍的關鍵。甚且，堅守「忠義」何其珍貴，「丈夫縱失敗，善死固有道」，以生命可以顯現的價值為依歸，延續著士人追求不朽的信念與命題。

升允的行蹤與檄文聲明意外滿足了鄭孝胥的想像，如何幫助升允全心投入「復辟」行動，便是自身對「英雄」的期許。日記（1916年5月24日）記曰：

余與許魯山曰：「升吉甫逃竄亡命，奔日年餘，而日人舉國重其忠義，稱其道德，今乃借其政府之力，歸圖復辟。孰謂中國無人！是亦少解袁世凱之穢矣。」日人自謂，贊助復辟之舉乃道德干涉，非權利干涉也。余謂，華人宜有一部自倡道德主持，則彼不能不受道德之拘束力，以義始者，必不至於利終矣。<sup>68</sup>

鄭氏一直以來觀察革命的走向，以為新興政權即使成立亦不能穩定局勢，日本及列強必然瓜分中國。<sup>69</sup>升允「復辟」的路線轉向親近日本，且「忠義」的態度亦為之稱道，兩者的互動朝向了鄭氏復興王朝的理想規劃。「孰謂中國無人！」肯定了升允取得「復辟」的最佳時機；「是亦少解袁世凱之穢矣」即是在「二十一條」（1915）的恥辱以後，重新與日本締結良好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是不同的身分，區別了堅守傳統的士人與散播「邪說」的「奸人」。

<sup>67</sup> 鄭孝胥：〈續海藏樓雜詩·其三十六〉收入氏著；黃坤、楊曉波點校：《海藏樓詩（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20。

<sup>68</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611。

<sup>69</sup> 同前註，頁1353。記曰：「使革黨得志，推倒滿洲，亦未必能強中國；何則？擾亂易而整理難，且政黨未成、民心無主故也。然則漁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國力不足以舉此九鼎耳。必將瓜剖豆分以隸於各國，彼將以華人攻華人，而舉國糜爛，我則為清國遺老以沒世矣。」這是革命前夕的預想，鄭孝胥相信列強佔領中國的想法至王朝滅亡未曾改變，其後的「共管」理論亦一以貫之。於此，「清國遺老」只是想像的身分，鄭氏始終觀察列強的動向，不斷調整自己的政治路線。

甚且，「華人宜有一部自倡道德主持」，倫理綱常的道德乃不可動搖之規範，約束自己也制約他人，得以在文化脈絡中確認彼此的共識，亦是「共和」不可為也。換言之，日本肯定升允「忠義」，以「道德」名義支持「復辟」，關係的建立並非利益考量，而是依循兩者共同奉行的理念。於此，一切「復辟」行動有了合理的依據，亦得到列強的承認，升允的位置尤其重要，增加了不少復興王朝的信心。

鄭孝胥以為升允的「忠義」精神誠然可貴，不過「惜以無助，恐難成功」，軍事實力始終薄弱。但是，過程之中持續展現的激情，感染了日本，鼓舞了其他清遺民。升允隱然回應鄭氏發乎日記的期望：「使志趣大明於世界，亦可為滿洲生色矣。」只要得到列強的注目，「復辟」仍然有良好的前景值得等待。於此，鄭孝胥依然保持樂觀，恣意想像王朝復興的過程與帝國的規模。且看鄭氏閱讀升允檄文公告不久，在日記（1913年6月27日）抄寫了《老殘遊記》第11回的一頁情節：

夜，觀《老殘遊記》，所言「北拳南革」，頗驗。略云：北拳之亂，所以漸漸逼出甲辰（1904）之變法；南革之亂，所以逼出甲寅（1914）之變法。

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銷滅。魏真人《參同契》所說「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屬土，萬物生於土，故甲辰以後為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坼（坼）甲，如笋之解籜。其實滿目所見者皆木甲、竹籜也，而真苞已隱藏其中矣。十年之間，籜甲漸解，至甲寅而齊。寅屬木，為花萼之象。甲寅以後為文明華敷之世，雖燦爛可觀，尚不足與他國齊趨並駕。直至甲子（1924），為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

然後由歐洲新文明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駿駿進於大同之世矣。<sup>70</sup>

書中人物黃龍子描述清朝「轉關甲子」的意義，從同治三年（1864）開始，以為「六十年中要將以前的事全行改變」。<sup>71</sup>有趣的是，《老殘遊記》刊載於1903年，至1904年1月共13回。黃龍子的言論是取材現實片段的想像文字，而鄭氏「頗驗」的心得是來者的檢視，也相信會是一則未來的預言。且不論內容與史實的差距，以「三皇五帝舊文明」的更新與復興為下一個甲子的場景，革命軍將逼出甲寅之變法，其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銷滅」，正是鄭氏期望先一步與列強和解之情境。於是乎，雖然王朝的終結在小說家意料之外，現時者得以重新詮釋自己的經歷，單純將這一場革命視為通往「大同之世」以前的混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歷史依樣標記皇清之紀年。

升允的赤誠熱情固然感動清遺民失落的心緒，而「復辟」行動遲遲未有明

<sup>70</sup> 同前註，頁1472-1473。

<sup>71</sup> 劉鶚著；徐少知新注：《老殘遊記新注》（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頁198。

確的進展，鄭孝胥亦有所顧慮。緣於當前革命只是暫時的混亂，王朝的復興指日可待，深怕其他人趁機取得優勢，影響人事的布局。與此同時，張勳如火如荼地策劃「復辟」，各不相讓，內部的權力鬥爭也是「復辟」必須處理的問題。1917年4月14日，升允至徐州見張勳，聽聞劉廷琛（1867—1932）諧言：「日人已聞借德款事，將出干涉，恐姚（文藻）洩之於日人，子宜勿行。」誠然，張勳一方有意阻止升允與德國往來，同時私下亦與日本協議，不讓他有機會親自接觸。面對惡意的設計，升允竟是不知所措而返回青島，為之忿忿不平。鄭孝胥得知此事，直覺升允「呆不至此」，亦在日記辨析他如何頓悟自己為人所給。（1917年4月14日）<sup>72</sup>然而，升允並沒有如此精明，日記（1917年4月23日）記曰：

王叔用自青島返，攜來升吉甫手書，云：「此物棄之誠可，服之必致病，寧坐以待時，毋自蹉跌也。」此次吉甫與一山同行，至徐，為他人恫喝，遂懼而歸。乃徐州沮之使不得起事耳。旁觀者清，吉甫終不悟，或亦內慚而護己短耶？<sup>73</sup>

書信依舊繫念著諧言所指的變動，擔憂列強無法給予幫助，日本的干涉可能影響了向德國借款一事，心灰意冷，決定暫緩「復辟」的計畫。鄭氏才發現升允未能知言，因小見大，進而懷疑他的信念與材能。<sup>74</sup>年初尋求外援時，鄭氏嘗有贈詩注曰：「匱齋（端方）嘗語余：『友朋中惟升吉甫異於眾人。』」<sup>75</sup>今日見到升允愚昧的判斷，過去的稱許似乎言過其實。

升允的計畫得不到列強支持而停滯，張勳貿然的宣言亦以失敗告終。實際行動屢屢挫折，不免反省「復辟」思想的劣敗。他人歸咎於「人心之壞」，鄭孝胥則直言「謀夫之不臧」（1917年9月15日）。<sup>76</sup>升允的怯弱自不待言，對於張勳的強勢行動，鄭氏始終保持「靜觀其變」的態度：「所求復辟苟可達，當再圖其後耳。」（1917年1月13日）<sup>77</sup>直到辯軍大敗虧輸，情勢已去，鄭氏偶然在報紙閱讀張勳的電文（1920年7月24日）：

<sup>72</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656。

<sup>73</sup> 同前註，頁1658。

<sup>74</sup> 同前註，頁1659。記曰：「宗方（小太郎）作書與升吉甫，深咎其暗於事理，且曰：『借德款可自主之，無害於日本，日人何為干涉乎！』」（1917年4月26日）可知升允手書原意，而鄭孝胥在日記特別記載此事，想法與宗方的回應相同。細部的歷史過程請見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178-182。

<sup>75</sup> 鄭孝胥：〈送升吉甫東行〉，《海藏樓詩（增訂本）》，頁276。

<sup>76</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683。

<sup>77</sup> 同前註，頁1641。

……勳則以於夙志為已償，於君恩為已報，成敗利鈍，不以尤人。自知眾意所趨，更非一人所能拂。勳年將七十，但得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賜，於願已足，尚復何求！<sup>78</sup>

日內各報皆載曹鋗（1862—1938）、張作霖（1875—1928）皆通電宣言無「復辟」事，此時《新聞報》正好刊載了張勳的聲明，應是出自民國的偽造。鄭氏明白軍閥操作輿論的可能，卻又不禁說道：「若果本心，真奴才也！」電文內容是張勳直接剖析自己的內心，以為一人之政治號召終不敵眾意所歸，大勢已去，既有所為已無愧於心，樂意在「共和」盛世作「太平之民」。鄭氏為此氣憤不平，緣於張勳貴為「復辟」之代表，幡然為「共和」收編，荒唐自覺「於君恩為已報」。如是變節言論刊登於世，無疑是給予清遺民的重擊。值得注意的是，並觀允與張勳的作為，鄭孝胥的評論落在領導者的思慮，一切政治行動無關民意趨向，盡是「謀夫之不臧」。誠然，追求「復辟」的有志之士各有千秋，不可諱言地，面對實際的政治抉擇、思想價值的堅持，他們漸漸背離了鄭氏心目中的「英雄」。

### 三、安知非楚囚

復辟失敗以後，鄭孝胥持續尋求聲勢再起的可能，設想的辦法還是一貫之的「英雄」論。日記（1918年3月28日）記曰：

章行嚴（士釗）來，言「頃遇康長素（有為），聞復辟之論，似亦有理。」余為言國內已亂，唯尚兵力，法律、公論，皆無可言。非得賢能專制之政府，不足靖亂息爭。如君主立憲政體，則廿年可成；必欲為共和政體，數十年未必能成，且與專制抵觸太甚，恐求治者反為天下所不許矣。章問，如何能成事實？余曰：「苟無取天下之力，則唯有負重望者立於局外，先布治法，使天下皆知，以俟厭亂之日，或為中外所推舉耳。」<sup>79</sup>

鄭氏的烏托邦依然穩固，重申中國需要一個「賢能專制之政府」，以「君主立憲政體」的形式解決革命以來的變亂。有意思的是，聲稱「共和」將為「天下所不許」，此處「天下」即否認了當前的公論，而是過去清王朝治理下的民意，今日仍生活在想像的理想國之中。如何能成事實？鄭氏期許一位「負重望者」的出現。這位「英雄」必須冷眼立處在時局之外，公開一套治理原則，直到內亂力乏兵衰、厭舊貪新，得由中國與列強共同推舉共主而平息。這段訊息雜揉

<sup>78</sup> 同前註，第4冊，頁1835。

<sup>79</sup> 同前註，第3冊，頁1720。

了鄭孝胥諸多政治思想，「英雄」必須要脫離當前的框架，展望不同情勢的到來，悄然延續了早期在「海藏樓」積聚的「避地待時」之志，遁世而無悶，潛藏以俟時。<sup>80</sup>其次，「以俟厭亂之日」顯示了歷史階段論的跡象，「中外所推舉」的方式是訴求中國與列強的共識，解決暫時的紛爭亦規劃了長遠的治理方針。此刻，鄭氏對和平的期待可以在晚期的「共管」思想裡找到完整的論述，歷史進程推展至此：「共氏遂亡，皇清復昌」，預言的「大同之世」亦不遠矣。

意料之外，袁世凱與升允分別擊碎了「英雄」的幻想，張勳的失敗深化了「復辟」的困境。經過理想與現實的挫折，鄭孝胥仍相信唯有「負重望者」才能引領中國的前途。誠然，依照 1931 年「共管」理論的脈絡，可能的人選是「日本天皇」或「宣統皇帝」，而後者「以其無種族、國際之意見，且無逞強凌弱之野心」更具資格。有趣的是，鄭孝胥的「英雄」論在革命爆發以後萌生，至「復辟」失敗的 1917 年仍有想望，幾乎是這段時間主要的政治意識，時常可以見到鄭氏如何把握實踐的機會。日記（1918 年 3 月 9 日）記曰：

森茂偕其友新橋榮次郎來訪。新橋詢：「中國南北約有四派，究以何派為有信用，可望統一？」四派者，謂馮、段、孫、陸也。余曰：「彼等皆偽共和，決無統一之日。」問：「必若何而後可以統一？」余曰：「非兵力不能。以兵力偽共和，依然不能。惟挾兵力而行復辟之事，名正言順，亂者自滅。且必以專制之政行之十餘年，憲法根基既定，然後可言統一。」問：「兵力雖足，而無人主張復辟，奈何？」曰：「明目張膽斥共和者為亂臣賊子，則吾能為之，惜無力耳。」問：「公不甚出力，力何自而生，此公之責也。」曰：「使日本能助我軍械、兵費，則吾力可以漸展。然觀於升允久居日本，而日政府淡漠視之，故度其不能助我也。」問：「升允太守舊，恐不能定中國之亂。日政府究不知中國主張復辟者更有何人，何以助之？」曰：「此我之責也。伺機會生時，吾當求助於日本。雖無濟，亦不以為恥。」新橋乃曰：「善。吾當往廣東，歸國之日，當為公覓機會。可乎？」余曰：「感子厚意，毋忘今日之言！」<sup>81</sup>

首先否認了軍閥訴求統一的可能，問題不是軍事實力的多少，而是指導原則的謬誤。鄭氏嘗言：「以利己損人久成習慣之社會，而欲高談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之效也，此歲時人所能希望乎！」（1911 年

<sup>80</sup> 鄭孝胥以「海藏」為名號，體現在早期的政治活動。記曰：「此一年中，棄江寧，就上海，實有避地待時之志。……然世局變態，思之已熟，尚不為造化小兒所給，況今日斗筲乎。（1898 年 1 月 21 日）」今日，鄭氏對「英雄」的期許依然如此，不為亂臣賊子所謀，退徙三舍，靜待下一個階段。關於「海藏」豁顯的政治意識，請見論文第三章。

<sup>8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716。

11月22日)<sup>82</sup>理解體制的本質與「兵力」背離，並分析中國環境的不可為之，軍閥勢力無法真正推動「共和」，只是各據一方、粉飾太平，難以達到統一的終極目標。然而，「兵力」確實是解決爭端的直接方法，配合「復辟」則「名正言順」，恢復「專制」而行立憲制度，「統一」即指日可待。鄭氏的論說大抵延續了過去等待「英雄」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進一步探問號召復辟的人選，卻言：「明目張膽斥共和者為亂臣賊子，則吾能為之，惜無力耳。」這一次似乎有意親自承擔「英雄」的責任，其後的對話盡是滿載的政治期望傾瀉而出，以為「使日本能助我軍械、兵費，則吾力可以漸展」，並將升允的失利引咎責躬，乞求日本之外援。於此，對照上一則引文的描述，隱然覺察「負重望者」的關鍵位置可謂鄭孝胥的自我期許，深信「必有實力以伸張正義，而後天下歸之。」（1918年3月13日）<sup>83</sup>至此掛上「復辟主義」的稱號。於此，在清遺民的政治行動告一段落，鄭孝胥在「海藏樓」積聚已久的政治意念才真正開始。

孟森（1868—1938）對鄭孝胥在面對世變或出或處的選擇上有相當精確的描述：「海藏謂出處之故，情隨境變，未可執也，獨負氣不自瘳耳。」<sup>84</sup>這是1937年《海藏樓詩》最後一次出版的詩序，時間也來到了鄭氏生命晚期。從孟森引述的話來看，鄭氏將自己的政治經歷分別不同的階段，始終以「負氣」調適當前的情境，幾乎是一生奉行的宗旨。於此，當一切「復辟」行動陷入絕境，鄭孝胥在「海藏樓」甚是坐立難安。見識了袁世凱的真面目、升允的力不從心，張勳的起事掀起了反對的聲浪，鄭氏的袖手旁觀似乎背離了「向來盛負氣」的心緒，情隨境變，其實也是一次「避地待時」的思量：

婺源一敗得死所，至剛塞天世誰伍？怪公結習殊未忘，意定神閒視千古。  
知不可為而為之，厲叔不平猶報苦。吾儕忍死欲何為，手捧奎章愧吾主。

85

這是寫在《石齋逸詩》的題詩，時間是與章士釗（1881—1973）談論「負重望者」隔一日。<sup>86</sup>此時，鄭孝胥有了「英雄」的自覺，決心規劃又一次的「復辟」行動。詩名「題黃石齋手書詩冊卷首有御題英光浩氣四大字」，不只是景仰詩人的風骨，也閱讀了清朝皇帝的題字。黃道周（1585—1646）的抵抗而有「死得其所」之節義，知不可為而為之，臨刑前揮毫長松怪石的愜意，贏得身前身

<sup>82</sup> 同前註，頁1358。

<sup>83</sup> 同前註，頁1717。

<sup>84</sup> 孟森：〈海藏樓近刻詩序〉，《海藏樓詩（增訂本）》，頁7。

<sup>85</sup> 同前註，鄭孝胥：〈題黃石齋手書詩冊卷首有御題英光浩氣四大字〉，頁285。

<sup>86</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720。

後名。下半聯轉入了現實情境的對照，未有慷慨赴義之氣節，不見「英光浩氣」的千古名聲，苟活於世又有何為？「忍死」即是對王朝的復興有所期待，此一政治抉擇必然有相當的作為。因而鄭氏自許「復辟主義」，聯繫了自我懷抱，相對於黃氏的不朽，唯有「皇清復昌」才能成就「舉世無雙」的追求。<sup>87</sup>

這是鄭孝胥堅持的理由，遊走在「殉清」與「遺民」之外，由「負氣」引領，直接走向「復辟」的道路。回顧前一章論及「夜起」援引的詩作：

前身為老卒，夜夜登戍樓。一生看太白，不知春與秋。今我復何為，山川非昔遊。杜門獨長嘯，兵戈送白頭。夙根殊未忘，聞鶴如有求。終年起殘夜，哀思變明幽。世亂須至人，安知非楚囚？及我老未衰，為君著兜鍪。

88

時間亦是 1918 年，依樣規律的「夜起」，鄭氏對立了以前在龍州的戰功彪炳與今日的杜門株守。「長嘯」是「海藏樓」止不住的「負氣」，不曾到過歷史現場，詩人只能承受著革命的影響，無處排悶。下半聯的詩句集中在「夜起」的思想過程，儼然是對時局的呼喚。鄭氏於民國情境固守本源，「未忘」而「有求」，獨自辯證現實與理想的衝突，留下了「世亂須至人，安知非楚囚？」的結論。在「復辟」的失敗以後，「英雄」難尋，鄭氏在「海藏樓」的聲聲呼喚，終於疊合了積聚已久的「負氣」心理。「楚囚」化用戴著故鄉頭冠的戰俘形象，暗示潛居於樓閣的自己，至此有了「英雄」的期許。鄭氏以為的「負重望者」是「立於局外，先布治法，使天下皆知」，因而「及我老未衰，為君著兜鍪」想像了一幅挺身而出的畫面，洞察情勢，引領「豪傑」突破困局。詩作既說明了鄭氏的「夜起」因為革命有了不同的形態，作息的反覆如常琢磨的是不及實現的政治期望。類似的心緒在這段時間多有體現，發言為詩：

蒙難靈脩久苦辛，玩時憫日坐諸臣。一為孤注機旋失，再卜中興義未申。  
江左夷吾虛想像，黃圖赤縣付何人？楚囚君子吾何敢，深覺新亭愧伯仁。

89

開篇即言君王如何為了諸臣的起事而失去中興的時機，暗示當前無所適從的困境是張勳貿然行動造成的後果。畢竟溥儀也為此來到了太和殿，詩人以「靈脩」借代之，儼然將自己不得志的情感匯流至屈原（343 B.C.？—278 B.C.？）

<sup>87</sup> 「舉世無雙」是溥儀依照鄭孝胥的意思贈送給墨索里尼的匾額，當時的義大利同樣為復興「大羅馬帝國」努力。而鄭氏自許「大清帝國」的墨索里尼，「舉世無雙」的名號也是自我面對「復辟」行動的期許。見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211。

<sup>88</sup> 鄭孝胥：〈雜詩〉，《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286。

<sup>89</sup> 同前註，〈消寒會示同坐〉，頁 294。

「離憂」場景與「騷言志」的傳統，發憤以抒情。在背景建立以後，下半聯召喚「潛有興復之志」王導（276—339），歷史情境的錯置說明了詩人的有意為之。「江左夷吾」是王導的布局與思量，化解了溫嶠（288—329）晉室南遷的憂慮。有意思的是，鄭氏以為兩人的「共談」只是空泛的理想，「屢求反命，不許」（《晉書·溫嶠傳》），多少完善縝密的規劃又「付何人」？史書記載王導的言說：「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晉書·王導傳》）由此聯繫前一首〈雜詩〉的詩句：「世亂須至人，安知非楚囚？」鄭氏似乎在與王導言行的辨明之間凝聚參與實際政治行動的動能。結尾處：「楚囚君子吾何敢，深覺新亭愧伯仁。」王導以「楚囚」形容周顥（269—322）的「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的感懷，鄭氏亦不同意，相當珍視「新亭飲宴」瀰漫感時憂國的情調。王導致力中興的形象如是堅決，拔新領異，似乎是可以改變局勢的「英雄」。然而，以「楚囚」自許的鄭孝胥，覺察了舞台上的「英雄」橫衝直撞，沒有切實的作為，未若「楚囚」對故國的殷殷期盼。甚且，周顥「言導忠誠，申救甚至」，才是真正解決危機之人，鄭氏巧妙突出了王導的不識起倒。於此，「安知非楚囚」是鄭孝胥在參透「英雄」面目而有的政治意念；「黃圖赤縣付何人」的提問亦有取而代之的用心。「楚囚」具備了濃厚的家國情懷、切至的言說與行動，未嘗不是真正可以改變局勢的人選。<sup>90</sup>

無論成功或是失敗，「復辟」的過程對於鄭孝胥是別具意義。雖然視線所及只是「海藏樓」周邊的風景，在他的生命歷程有著承先啟後的位置。自辛亥革命至逼迫溥儀離開紫禁城的北京政變，清遺民的激情與茫然構成了中國近代史的一頁篇章，而鄭氏的想法也是經歷千迴路轉的自我辯證，眼前的道路才逐漸清晰。值得探究的是，從鄭氏持續操練的技藝可以明白思想主旨的一以貫之，或是「海藏」，或是「夜起」，歸結在日復一日的詩作與日記。面對天崩地解的時刻，這些技藝又是如何調適、穩固「負氣」，在危機之中重新建立自己的價值。然而，「復辟」作為一次關鍵的事件，鄭孝胥的失誤其實也是重大的醒悟，真正意識到「楚囚」即「英雄」，讓六十歲的老輩立意歸返政治現場：

生我定何為，於世無寸效。不辰空怨天，所恥伍羣盜。胸中差了了，將智且未耄。八年坐面壁，一靜却眾躁。種松待聽濤，日夜某之禱。微聞世人譏，舍竈反媚奧。親交頗相閔，欲諫奈自暴。蒼蒼豈無意，留此時未到。  
廉頤得趙卒，妖孽猶可掃。<sup>91</sup>

<sup>90</sup> 時至 1926 年，詩曰：「蘇齋卷中衣冠客，誰信新亭似楚囚。」（《郭侗伯招集寒碧簃為東坡生日分韻得遊字》）從「蘇齋圖卷」映照自身所處的「小朝廷」，「新亭」已然指向清遺民慨歎「山河之異」的空間，自我聯繫「楚囚」的形象。

<sup>91</sup> 同前註，〈六十感憤詩〉，頁 290。

這是鄭孝胥的「六十感憤詩」，開篇即是對人生的質問。時間與空間皆不留餘地，竟讓自己陷入夾縫之間，進退不得。「八年坐面壁，一靜却眾躁」，細數自革命以來的抵抗，如今「胸中差了了，將智且未耄」，經過長期的凝想與整備，一切就緒，鄭氏卻沒有舒展才能的機會。詩作寫在 1919 年，「復辟」失敗又一年，既言「感憤」，必然有所觸動，為熬磨的日子作一總結。詩人此刻明白政治抉擇必須依循自己的本性，終於有了「負重望者」的責任，甚是「英雄」的期許。從此以後，鄭孝胥為世事琢磨不同的眼光：「蒼蒼豈無意，留此時未到。廉頗得趙卒，妖孽猶可掃。」相信時機會隨著適當的援助出現，「則吾力可以漸展」，保持歷史階段論的展望。甚且，鄭氏的慨歎也不盡相同，紓解的是不得其時的無奈：

寥寥詩卷寄平生，慚愧才人意盡傾。已迫晚年成定論，那堪低唱換浮名。  
彌天縱有逢辰恨，倒海難為變徵聲。誰惜英雄袖中手，枉教弄笙掣長鯨。

92

詩作乃回應周達（1879—1949）的感懷：「……鐵函緘史心何苦，石室藏詩計未遲。我已瓣香逾十載，平原欲綉愧無絲。」（〈與莊呂塵談海藏樓〉）<sup>93</sup>遙想宋末元初鄭思肖（1241—1318）將詩文封至鐵函以明志的作為，娓娓道出一系列的哀悼「儀式」，將自己編列為「遺民」身分。然而，鄭孝胥委婉的回應並非附和類似紀念的心緒，詩曰：「彌天縱有逢辰恨，倒海難為變徵聲。誰惜英雄袖中手，枉教弄笙掣長鯨。」再次劃出了界線，以為「遺民」的遺憾只是徒勞，詩人關切的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困境。顯然，鄭氏的想法是以「英雄」的自覺感憤當前的情勢，句句盡是「留此時未到」的無能為力。

1921 年 3 月至 7 月，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受大阪每日新聞社委託到中國遊覽，特地拜訪了閉居海上的鄭孝胥，言談間，論及當時的中國問題。芥川氏激切地說出自己的茫然與不安，鄭孝胥亦感慨著時局的變化，恰似為自己冷眼旁觀的一連串「復辟」行動定下了暫時的結論：

鄭孝胥氏在政治方面，對現代的中國非常絕望。中國只要實行共和制就永遠擺脫不了混亂的局面。然而，即使是施行王政，要克服當前的困難局面，也只有等待英雄的出現。而那位英雄，又不得不同時身處利害關係錯綜複

<sup>92</sup> 同前註，〈答周梅泉〉，頁 462。

<sup>93</sup> 記曰：「周梅泉來訪，不遇，留示二詩，一為哀張園之作，一為〈過莊呂塵談海藏樓〉……」（1921 年 1 月 7 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1854。

雜的現代國際關係之中。這樣看來，等待英雄的出現也就無異於等待奇蹟一般。<sup>94</sup>

鄭氏的「英雄論」悄然迴向主體，堅定了「負重望者」的自許。雖然未有明確的聲明，芥川氏的記錄可以想見鄭孝胥「等待英雄」的過程，收束了諸多失望的心緒，才明白「奇蹟」的微乎其微。

### 第三節 復辟主義

#### 一、製作「史略」

時代不斷地推進，似乎不容許保守主義的激進行動阻擾了向前的腳步。胡平生（1945—）先生在《民國初期的復辟派》一書，以史家筆法總結了當時一系列的「復辟」活動：

民國六年（1917）丁巳復辟失敗後，復辟派便一蹶不振，漸趨沒落。民國十三年（1924）發生馮玉祥驅逐遜帝溥儀遷出宮禁事件，民國十七年（1928）又發生東陵被盜掘事件，使溥儀及復辟派大受刺激，而甘為日人所利用。民國二十一年（1932）三月，溥儀在長春就任『滿洲國』執政，至此，復辟派步入歧途，全然變質。<sup>95</sup>

胡氏將張勳的「復辟」宣言定調為清遺民政治活動的終結，其後發生的歷史事實只是後續，走向滿洲國成為不得已的「歧途」。綜觀全書結構，張勳復辟以後的事件均列入「復辟派的沒落與變質」的終章，大致明白此一事件之於現代中國的意義。然而，若是回到歷史現場，測量「英雄」崛起的背景，鄭孝胥的行動其實展現了另一種積極的政治意識，而日本扶持成長滿洲國並非「小朝廷」毫無辦法的選擇，可謂費盡心思才有的機會。<sup>96</sup>

<sup>94</sup> 【日】芥川龍之介著；秦剛譯：《中國遊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2-33。

<sup>95</sup>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頁355。

<sup>96</sup> 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也試著說明：辛亥革命以後，清王朝仍以優待條件牽連著國民政府，兩者相互談判、衝突而僵持不下。對清遺民來說，促成溥儀離開紫禁城的「北京政變」或許才是真正的改朝換代，其後，「小朝廷」在天津租界苟活，失去了發言權，等待著歷史的審判。見拙著：〈殘夜不須眠——論鄭孝胥晚期的政治詩作〉，《中國文學研究》第42期（2016年7月），頁96-100。沙培德（Peter Zarrow）對「北京政變」的評價亦有總結的意味：「這最終且無以借鑑之中國帝制歷史的一頁，卻是辛亥革命未竟事業的一個必要的收場白。」見氏著：〈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文化與歷史記憶：溥儀之逐出紫禁城〉，中國近代史學會、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辦：「一九二〇年代的

1905年9月簽訂的樸資茅斯(Portsmouth)和約為日本帶來了遼東半島與南滿州鐵路沿線地帶的控制權，設置關東都督府，作為日後非望東亞的重要據點。滿洲國的建立即是第二階段的擴張，中國東北(Manchuria)正式進入日本總體帝國(total empire)的一環，主要目的在於確立獨立國家的形式脫離關係，取得國際輿論支持，讓南京政府自然而然放棄對滿蒙的一切主張。山室信一教授為此提出質疑：

滿洲國對內為了使「國民」接受此種觀點，透過表達建國動機與理念的方式，強調與中華民國之間的異質性和對立性；相反的，對外則著眼於必須獲取國際承認及確保日本既存權益，因而又無法否定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國家繼承關係」(succession of states)。為此，對於中華民國不得不採取兼具斷絕性和連續性的相悖立場，而這種被視為滿洲國「誕生」時獨具的特徵，也徹底侷限了滿洲國的建國理念和國家體制。

論者肯定滿洲國不斷擴散的吸引力，只是國家的建立不得不克服當前的國際情勢與政治現實。「因此，就在中華民國主權下的中國東北地方創建新獨立國家而言，有關國家的願景擘劃，從最初便受到極大限制。」<sup>97</sup>然而，滿洲國依然奇特地出現在東北，不免好奇其間意識形態的建構過程，山室氏便化用希臘神話的「奇美拉」(Chimera)比喻滿洲國，難以想像，如是獅頭、羊身、蛇尾的勘合體怪物，竟然真實存在於地表。<sup>98</sup>

誠然，山室氏針對建國初期公開的文書有著細膩的討論，尤其關注滿洲國自中華民國領地增生的事實，以為理念的形塑必然設法取代三民主義與國民黨教條，建立國家正當性和存在意義。<sup>99</sup>接續而來，建國理念也深入普及教育的編制。康德元年(1934)，由滿洲國文教部發行的歷史教科書，首次出現了「國史」的名目，周婉窈教授(1956—)疏理不同時期的教科書，發現了滿洲國有意為之的歷史建構：

---

中國」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15日，頁2。

<sup>97</sup>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119-120。

<sup>98</sup> 同前註，頁19-20。本書原名即稱：「キメラ 滿洲国の肖像」，以「奇美拉」的形象作為探索「滿洲國」的視角。方法論其來有自，山室氏進一步說明：「英國政治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用《舊約聖經·約伯記》中的大海怪利維坦(Leviathan)比喻國家的『人造』性質；美國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則用沙漠怪獸貝比摩斯(Behemoth)比喻納粹第三帝國，我也仿照他們的做法，在此以奇美拉比喻滿洲國。奇美拉是隻獅頭、羊身、蛇尾的勘合體怪物，獅子象徵關東軍，羊象徵天皇制國家，蛇則象徵中國皇帝或近代中國。」以神話的怪物為喻，意味著描述對象的奇異，幾乎沒有可以對應的現實。

<sup>99</sup> 同前註，頁125。

……滿洲的歷史和中國史「劃清界限」，完全獨立成一個單位，且明顯可以看出采用以地理空間界定歷史的新奇作法，也就是把曾經在滿洲這個地區活動的族群看成同一「民族」在不同階段的組成分子，而其活動也就構成整個歷史的內涵。<sup>100</sup>

如是作法實踐了「民族協和」的建國主旨，形塑一種新興論述，讓日本關東軍的征服與統治轉化為致力於民族國家的追求。

有意思的是，在官方的訴求與政策之外，鄭孝胥也有類似的作法，以自己的學術訓練完成了一次歷史建構，表露內在對於滿洲國的定位與期許，其思想內容定名為《滿洲建國溯源史略》（以下簡稱《史略》），聯繫了滿洲的歷史，意圖指出今日滿洲國成立的正當性。<sup>101</sup>這份材料不為學界重視，大抵與滿洲國的印象相關，即使有所注意，難免對鄭孝胥的理論不以為然，認定是一種牽強「尋根」的手段，尋求不切實際的民族認同，美化了日本殖民的歷史事實。<sup>102</sup>然而，鄭孝胥並非單純為日本的軍事計畫發言，字裡行間其實隱含了私密的政治動能——過去「海藏樓」不斷調整的姿態，經由「夜起庵」的頤養精神，鄭氏深信滿洲國將是「復辟」的起點，亦是一生政治理念的終點。

這份誠意其實在〈建國宣言〉的字句就可以看到類似的痕跡，前文引述的文宣巧妙對應了鄭孝胥的理論，在抵抗民國政權的同時，意味濃厚的是清遺民的疾呼與「英雄」對主義思潮的判斷，「共產」將取代實驗所得結果失敗的「共和」，「而追思曩昔政治清明之會，直如唐虞三代之遠，不可幾及，此我各友邦共所目覩，而同深感歎者也」。甚且，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展演的帝國姿態，為鄭氏的歷史進程增添信心。只要滿洲國的建立得以劃清界線，「其有志願投資於我新國境內，創興商業，開拓利源，無論何國，一律歡迎，以達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實際」，國家富強便無平均貧富的需要，直到中國開放之期已至，閑居二十年的宣統皇帝即可歸返中原，主持大局。<sup>103</sup>

於此，鄭孝胥的《史略》自是國家成立初期「共同體」論述，也是清遺民

<sup>100</sup> 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2012年），頁291。

<sup>101</sup>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1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年），頁459-481。

<sup>102</sup> 今日學界的討論不多，強烈的批判觀點亦稱鄭孝胥「史略」的製作不過是「虛像的共同體」，證成了滿洲國從屬、傀儡的國家性質。請見陳秀武：〈《滿洲建國溯源史略》的思想史解讀〉，《外國問題研究》總197期（2010年），頁3-8。

<sup>103</sup> 〈滿洲國建國宣言〉；至今難以確認此一官方文件為誰執筆，材料也僅有提示而未有直接的記錄。可以確定的是，鄭氏參與其中，宣言文字幾乎表露了清遺民來到滿洲國的心聲。又一歷史證據請見鄭孝胥、鹽谷溫等著；滿洲國政府刊布：〈滿洲國建國宣言〉，收入鄭孝胥原著；野村瑞峯譯解：《孔教新編枳義》（東京：深川母子園出版部，1934年），頁91-95。

的願望和幻想，相對於學科建制與官方公告的參與，更是聲明了自己執意滿洲國的緣由，成為理解鄭氏晚期行動不可忽視的材料，從中覺察「我心非有求，吾道貫於一」的「復辟主義」：

大清入關二百七十餘年，賦稅之輕，刑罰之慎，仕途之清，教化之重，武功文德之盛，無權奸，無奄禍，幾於文武成康之治，非徒遠過於元明而已。元首重起於滿洲，方將振興舊邦，以為舉世之樂國。此書略述前代顛末以間執謗者之口，近事不遠，父老具在，豈待於多言哉。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書。<sup>104</sup>

《史略》簡要的序文散發著不減當年的「負氣」，值得注意的是，鄭氏以為滿洲國將是「共管」局勢的節點，周旋於外國之間。論述的開場必然以一個「現代國家」的身分自我定義，行文間，舊語詞與新概念有了巧妙的對應，即鄭氏高呼「大清入關二百七十餘年」作為盛世的回顧，正是說明了清朝一直以來具有建設「國家」的基本條件：經濟、司法、行政、教育，維持著悠遠而穩定的結構。畢竟，思想根植於老中國，鄭氏不輕易遠離「傳統」，自始至終保衛著搖晃不安的「中體」，因而盛世的規模可以往上聯繫「文武成康之治」，中國歷史堪與「列強」並駕齊驅，「我主江山」只需要「開放門戶」、「招來合作」，誠如溥儀見證的肺腑之言：未來京都將落在北京、長安與帕米爾高原，兼容古今，為各國「共管」之樞紐。於此，「復辟」既是恢復熟悉的政治環境，同時也向世界敞開。難以想像，鄭孝胥的烏托邦如是堅固，等待重生的姿態又絲毫不減主宰「現代」的帝國雄心。

甚且，鄭氏宣稱「此書略述前代顛末以間執謗者之口」，有意為之，力求形塑「龍歸故里」的正當性。縱然滿洲國給予失落的一代美好的願景，「宛然如大旱之望雲霓」<sup>105</sup>，同時也帶來相當沉重的輿論，尤其清遺民在幾次激情的「復辟」行動以後，不堪承受失敗的痛苦。<sup>106</sup>而《史略》製作目的兼具二者，等候「共管」，消弭雜音，更是一則私人紀事，緣於過往的「復辟」沒有「英雄」，為此確信了投入滿洲國的決心，舍我其誰。

全書意圖舉行一場「歷史」的辯證，將時人對滿洲國的認識歸咎於國民政府的引導。開篇「滿洲國之建設」即言「至新國家之建設，基因於滿洲人民發露自主之精神」，大抵與〈建國宣言〉的主旨相同，只是滿洲國的真相為人欺瞞，有了迫切解釋的必要：

<sup>104</sup>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頁 460。（標點自注）

<sup>105</sup> 同前註，頁 463。

<sup>106</sup> 林志宏嘗以多項史料簡述清遺民對滿洲政權的不同態度，請見氏著：《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 322-327。

最近據南京方面消息，國民政府當局，以滿洲新國家之建設，認為係對中國之叛逆行爲，公言討伐，或在北平之張學良一派，仍然眷戀東北之舊地盤，公言奪還滿洲計劃。用惡逆無極之陰險手段，企圖擾亂滿洲各地方，為明瞭事實矣。然而此事基因於國民政府及張學良等不解時代之趨勢，對於滿洲認識之不足，仍然以滿洲認為中國領土之錯誤也。

今日滿洲的混亂緣自軍閥和國民政府的誤會，鄭孝胥感慨「現代之中國人，已不知己國之歷史」，於是「闡明妥當且公正之理由」，從頭說起，證明不可動搖之歷史事實：「滿洲者，古來不能發見隸屬中國為其領土之事實也……有被統治之歷史而已。」<sup>107</sup>於是乎，鄭孝胥遙想上古秦漢時代，舊稱肅慎國，引《魏志》說明當時中國人「未詳知彼等居住之地方及其民族之性質」，時至秦始皇帝統一中原，萬里長城劃分了華夷境界，視滿蒙為夷狄蠻奴而已。<sup>108</sup>

不止於開端的建立，鄭氏意圖強調滿洲「建國」之歷史事實，並在歷程的回顧予以當代的注目：無論是「壓迫侵入遼東之漢朝勢力」的高勾麗（37 B.C.—668）、與日本「持續親善關係」的渤海國（713—926），至於順利「侵入中國本部」的契丹（907—1113）、「形成空前之大版圖」、「佔據中原之先驅者」的女真（1115—1234），滿洲印象幾乎是與中國呈現對立的兩極，且與日本親近自有歷史因緣，讓今日滿洲國的建立自有它的道理，符合文明發展的軌跡。有趣的是，唯一承認的「統治者」是「漢人之所謂東胡鮮卑契丹系統之異民族也」的蒙古（1279—1367），滿洲全境為其歸屬。而明代成了「侵入者」，這段時間（1368—1616）的滿洲「反抗明軍，持續獨立狀態」，佔據元朝之遺臣；後期則「全係女真民族」，明朝威令與懷柔政策「不過糊塗表面而已」，竟歸失敗。其後，混亂的割據時代當由「天命」終結，清太祖奴兒哈赤（1559—1626）<sup>109</sup>「發揮女真民族本來之面目」，完全統一，「當是時，滿洲為愛新覺羅氏之一私有領土」，特別說明：「與居住漢民族之中國本部，形成別個之獨立國家也。」同時，鄭氏申明清王朝「保存滿洲」之用心，立國政策上是為統治漢民族移往中國本部，「然而清朝尊崇滿洲為祖宗發祥之故地，且以失敗統治中原之場合，為退據地之目的」，勵行封禁政策，壓制漢人進入，證成「滿洲在清代之特異性也」，完全截斷了彼此的關係。<sup>110</sup>

<sup>107</sup>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頁 463-465。

<sup>108</sup> 同前註，頁 465-466。

<sup>109</sup> 甘德星以康熙、乾隆年間史料為「努爾哈赤」正名，並指出「奴兒哈赤」多見於非清人所記之史料。見氏著：〈「正統之源」：滿洲入關前後王權思想之發展與蒙藏轉輪王觀念之關係考辨〉，收入汪榮祖、林冠群主編：《民族認同與文化融合》（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 年），頁 119。本文則依循《偽滿洲國史料》所見版本原貌，亦可旁證甘氏說法。

<sup>110</sup>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頁 466-472。

《史略》立論的觀點不同於過去漢民族的歷史話語，從邊緣出發，頗似今日「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亟欲探求的道理。<sup>111</sup>然而，鄭孝胥正在歷史現場，寫作目的是為了迎接滿洲國的到來，使之通行無阻，抵抗民國史觀，以「還原」真相，形塑「滿洲人之滿洲主義」，拒絕一切思想的干擾。誠然，如是展演新興的歷史眼光，多少也遺漏了縫製的痕跡：

雖現代稱呼滿洲或蒙古，無一定之境界，此間錯綜複雜滿漢蒙三人種之居住地，由歷史的及地理的觀之，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惟古代已無滿蒙之區別，況由民族分布上論之，總稱謂滿洲國，認為妥當且適切之結果而已。

論述的過程刻意忽略了滿蒙之間的差異，劃為一體，站在漢民族的對立面。鄭氏舉出至今佔據滿洲建國之各民族，除了蒙古是布里雅特種，亦有與日本民族同樣隸屬通古斯種，「皆均與漢人種全然相異之民族」。<sup>112</sup>如此說來，誠如學界對滿洲國「歷史建構」的探討：曾經在滿洲活動的族群都是「滿洲人」，構成了歷史的內涵。誠然，教科書作為歷史記憶的形塑相當重要，必須服膺於國家的意識形態（ideology），滿洲國密集的修訂與印行說明了國家凝聚民族意識的迫切行動。

同樣地，《史略》也期望達成相同的效果，在歷史的進程發明以後，製作屬於滿洲國的史觀：「滿洲與中國本部之關係，始終維持對等的地位，未曾有一度被漢民族佔據，或被統治之事實。」只是成書於建國之初，鄭氏面對的是漸趨穩定的國民政府，在人民、領土與主權等「國家」基本要件的爭論上必須採取激進的做法，捍衛滿洲國的登場。重要的是，鄭孝胥的本意是將滿洲國視為清朝的延續：「今疾民國之暴亂，欲整紀綱、恢道德、復故國而已。」<sup>113</sup>於此，製作的歷史才聲明「清之統一滿洲」，並指出過去主張滿洲為中國領土的思想來自「中國人不知清朝建國本義結果之錯誤」：

原來滿洲因被清太祖及太宗完全征服，為屬於愛新覺羅氏一族之一私有領土，迨清廷乘勢入關，底定中原，君臨中國本部，於是愛新覺羅氏所私有之滿洲領土，與新征服之中國本部，一併歸入大清帝國之版圖矣。當是時，其大版圖上之滿洲地位，為領有中國本部之主人翁，則中國本部，被滿洲

<sup>111</sup> 「新清史」的討論已有重要匯編，見劉鳳雲、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史略》以一個漢人的身分疾呼「滿洲人之滿洲主義」，顯然是個有趣的材料。而本文將其導向為滿洲國出現的歷史建構文本，爭取溥儀出山的合理性，切合自己的復辟主張。

<sup>112</sup>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頁473-474。

<sup>113</sup> 即便《史略》聲稱：「然而溥儀氏此次就任滿洲國執政，非清室之復辟，亦非自動之行動，純係滿洲人民多數懇請之結果。」（頁479）日記及其他材料明顯可見鄭孝胥參與滿洲國是一生最完整的「復辟」行動，無所不用其極。

人征服，中國人對於滿洲人之君主，北面臣服，故是時之滿洲，非中國人主張之中國領土，中國反為滿洲之領土者也，即滿洲與中國本部之關係。

民國乃敵國也，鄭氏的說法完全翻轉主客關係，顛覆了一般以為定論的歷史觀念。依時間序列來看，愛新覺羅氏率先統一滿洲，視為私有領土，此時中原仍奉行萬曆年號，各自為政。而清王朝的建立是愛新覺羅氏進一步的征服行動，從滿洲出發，統一中原，故「中國反為滿洲之領土者也」。同樣地，西洋人於清朝直接認識「中國皇帝」，自然不能理解歷史的序列，鄭氏亦以耶穌會見聞《韃靼戰記》、《韃靼旅行記》等材料舉出他們過去的中國經驗：「以滿洲決無稱中國者也。」又證「滿洲自古以來為獨立國」之事實，而過去歷史與地理的認知都是「異常錯誤」。<sup>114</sup>

鄭孝胥在破除民國史觀的同時，亦設法建立「清朝」的主體性，聯繫「滿洲」，著眼於「帝國」而非「中國」。於此，溥儀的歸來也是論述的重心，另立一節「溥儀氏出山的意義」闡明己意。有意思的是，《史略》的溥儀形象始終保持著相當的氣度，足見帝王之勢。面對日本的邀請：「溥儀氏最初固辭，嗣鑒於該代表等之熱忱懇請，與先人故土之現狀，慨然允許出山，挺身就任滿洲國執政……」<sup>115</sup>，昔日窘迫的遜位與離開紫禁城的倉皇已不復見，倒是呈現一種潛龍寢息的姿態，為感念先祖之霸業，終於「龍歸故里」。如今，對照溥儀追憶過往的材料，可以想像，溥儀的形象也是《史略》製作的用心所在。且從鄭氏辨析革命真相的舉證來看：

就溥儀氏與滿洲國之關係，譬如有一老商鋪，其主人始而係幼弱之孤兒，因不能經營家業，結果對於其隣人，以一定條件，讓渡其商鋪之權利。然該隣人其後違反誓約，全不履行，且強奪其本家；對之隱忍多年之孤兒，已達成年時期，決然奮起，斷然膺懲不法之隣人，奪還其祖業之一部，躬親處理其業，有何不可？以國民政府當其隣人，溥儀氏當其幼主，則溥儀氏復歸先人之故土，就任元首地位，為當然之歸宿，則滿洲今日之形態，不過復歸二十年前（辛亥革命時）之形勢而已。<sup>116</sup>

幼時為人欺負的「孤兒」有所忍，成年則有所為也。有趣的是，潛行的歷程可以對應鄭孝胥貫徹一生的思想技藝，《史略》的溥儀依循這般步調以成就共同的志願。可以想像，鄭氏幾乎將自己過往的生命經驗投射在紙上的溥儀，標示自己的「決然奮起」。然而，時間不斷推進，從孤兒至成年，通過「海藏」與

<sup>114</sup> 同前註，頁 474-477。

<sup>115</sup> 同前註，頁 463。

<sup>116</sup> 同前註，頁 479。

「夜起」的熬煉，脫離隱逸姿態的鄭孝胥以「英雄」自許，引領現實的溥儀完成未竟之業。

誠然，鄭孝胥認定的真相是為滿洲國的出現披荊斬棘，在澄清了滿洲歷史以後，回首辛亥革命的意義，不禁慨然說道：

當是時，若有洞察大局之大政治家，嘉納宗社黨一派之進言，交還政權之範圍，限定為中國本部，仍然保持其滿洲之主權，毅然表明，以退據滿洲故土之意思，對於革命軍，交還中原統治之大權，然後奉戴宣統皇帝離京出關，回返遼東故土，維持東北偏安之清國，以統治滿洲，清朝雖衰頹之餘，尚有三百年霸業之餘威，且擁有相當之實力，在滿洲存續清朝之社稷，決非難事。<sup>117</sup>

只要堅定滿洲自古以來為獨立國的事實，宣統三年不會淪為一場「革命」，而是單純協議的結果。清帝交還曾經征服的中國本部，退據滿洲故土，彼此禮義相待，好聚好散。無奈「清廷當局不採取此種政策，極度信任革命軍之誓約，竟爾全然放棄政權矣」，正是缺少「大政治家」的視野。明顯地，鄭孝胥延續「英雄論」的思路，張揚不可一世的「負氣」。遙想革命發生時，避居海藏樓的不平之鳴，鄭氏以文字構成了一篇篇想像的歷史，無止盡地補償了自己的缺席。<sup>118</sup>如今《史略》檢討王朝覆滅的關鍵時刻，其實也是一次修正、改寫歷史的作為，成全自己「滿足的經驗」（experience of satisfaction）。然而，「英雄」沒有出現，導致了最壞的結果，何況革命軍單方面破棄當時的誓約條件，「年來不交付優待年金，且褫奪其尊號，並由宮闈驅逐等之暴戾的行動」，於情於理都不會「全然放棄政權」，慘變收場。鄭氏亦有狂言：

假令溥儀擁有重兵，對於國民政府，以不履行誓約之理由，要求反還政權，開始積極的行為時，國民政府尚得以之為叛逆歟？無如溥儀氏無意於此等要求耳，國民政府能不向溥儀氏表示謝意者乎？

為二十年前的歷史加入大量的幻想與假設，即使不願意面對，辛亥革命確實是一切變化的關鍵。鄭氏始終以對等的立場思索彼此關係，依然不肯承認改朝換代的事實，巧妙的是，滿洲國的出現正好彌補了革命留下的空白，以《史略》倒果為因，聲稱清王朝有絕對的理由在故鄉延續它的命脈，革命只是議約的過程，終於歸還中國本部矣。同樣地，今日滿洲國乃溥儀假外力、民意的積極行為，「對於國民政府，以不履行誓約之理由，要求反還政權」，言之成理。

<sup>117</sup> 同前註，頁477。

<sup>118</sup> 鄭孝胥在革命時避居海藏樓的心境相當重要，詩作與日記文字積聚了無用武之地的「負氣」，相關材料與論證請見論文第三章。

《史略》的內容構想了一部滿洲史，也是鄭孝胥的「當代史」，字裡行間隱含了強烈的思想與行動。誠然，類似的著作在現代國家成立時出現，多少有「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的用意，自覺或不自覺凝聚了想像的共同體。<sup>119</sup>於此，值得與之對照的是德富正敬（1863—1957）在1940年出版的《滿洲建國讀本》（以下簡稱《讀本》），依樣聲明：「中國人原來雖將滿洲視同一家，但自有史以來滿洲全部並未曾全入中國人手。……有史以來，滿洲有時支配中國，而中國並未支配滿洲。」<sup>120</sup>澄清了滿洲與中國的關係，也是歷史建構的產物。不同之處，德富氏加入了日本的角度，既強調與滿洲不可切斷的歷史關係，矛頭則指向軍閥亂政：「張氏父子係以搆取為目的者；日本係以有無相通為目的者。」《讀本》的文字訴諸絕對的軍威，暢言「互利厚生」之必要，視滿洲國的出現為「天意」、「世界史上之一大奇蹟」，挑戰國際聯盟的體制，隱然是向現實秩序的一場宣戰。<sup>121</sup>然而，在「滿洲建國及其理想」一章，德富氏劃出了更明確的界線：

……然推戴前宣統皇帝，毫無清朝復辟之意味，滿洲國亦曾聲明也。滿洲帝國乃受我八紘一字之皇謨而發祥者，乃負有興亞大業使命之新帝國也。皇帝為此理想新國家之皇帝，與舊清朝，在國法上，固不待言，即在思想上亦全然無涉……即皇帝為前宣統皇帝，又純係滿洲人，因為滿州國皇帝之最好條件，然決非清朝之復辟也。

1934年，滿洲國年號由「大同」改為「康德」，雖然流於形式，溥儀還是喚回了「皇帝」的名號。這個歷史事實也讓以「建國」為主旨的《讀本》不得不有所回應，申明「理想新國家」的概念乃接續日本天皇精神而來。而溥儀的重要性為《讀本》澈底簡化，毋須關注其「出山」之意義；甚且，提及昔日國務總理鄭孝胥發表帝制實施之聲明已有「附記」：「如以帝制之實施誤認為清朝之復辟，終於建國理想與使命之政府斷乎不取」云云，顯然與《史略》在建國初期的構想不同，只是妝點即位過程，敷衍苦難經歷，絲毫不在意溥儀回歸滿洲的理由與革命的真相。<sup>122</sup>

<sup>119</sup> 「官方民族主義」為賽頓—華生（Seton-Watson）的命名，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之理解為「一種同時結合歸化與保存王朝的權力，特別是他們對從中世紀開始累積起來的廣大、多語的領土之統治權的手段……」見氏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136。本文欲談論的是《史略》的弦外之音——鄭孝胥以「史」成全「復辟」行動合法性的手段與用心。

<sup>120</sup> 德富正敬：《滿洲建國讀本》，《偽滿洲國史料》第20冊，滿洲國通訊社發行，頁16-17。（標點自注）

<sup>121</sup> 同前註，頁23-24。

<sup>122</sup> 同前註，頁27-29。

《讀本》的刊行是滿洲國趨於穩定以後，重新修正的「建國」論述。鄭孝胥 1938 年逝世，在紙上以「純臣」的姿態追隨著溥儀，努力於滿洲國的建立。此外，德富氏假借了他們的聲口，在「皇帝陛下」一章記載了溥儀第一次訪日歸來的心境，馴服其成為感佩明治天皇（1852—1912）大德之人，「躬行日滿一體一德一心精神之極致矣」；鄭孝胥亦附和之：「與天皇陛下及其重臣御懇談之結果，信賴日本之正義，在帝慮愈深，為鞏固將來永久兩國不可分之關係，相與提携，應發揮東方精神結晶之道德真義之帝慮已定……」兩者的言論交織成「回鑾訓民詔書」，德富氏稱為「建國精神之經典」：

……在滿洲國為千古不磨之詔書，亦即建國精神之經典……全係滿洲國皇帝御親裁制者。此詔書有如日本之教育勅語，現在滿洲國學校及其他重要式典時，必捧讀之，以銘示建國精神及日滿一德一心之根本精神。<sup>123</sup>

詔書頒布於康德二年（1935），《讀本》放置卷頭，意味著滿洲國真正的建國宗旨來自「日滿一德一心之根本精神」。直到詔書普及於民間，國人時刻捧讀之，滿洲國的歷史建構也進入了平穩的階段。重要的是，不同於《史略》凝聚的期待，《讀本》將重點確立在日本與滿洲的關係，而溥儀回鑾的思想完全敬奉天皇旨意，在形式上也解決了潛藏在滿洲國內的「復辟」難題。

溥儀在回憶錄承認訪日的行為舉止都以一種「巴結」的心情，飄飄然感受著「皇帝」的分量：「天皇與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國的地位。日本人對我，當如對其天皇者同。」<sup>124</sup>他也不諱言自己受到了日本嚴密的言論控制與形象製作，「詔書」即是最直接的方式：

這種「詔書」，不但是進行奴化思想宣傳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來鎮壓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據。東北人民任何一種即使是消極的反抗，都可以借口違犯了「詔書」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sup>125</sup>

雖然在 1934 年改稱「皇帝」，離「復辟」的理想卻是越來越遠。此時，滿洲國的歷史建構已然成形，配合著政策平穩地推進，從《史略》與《讀本》的差

<sup>123</sup> 同前註，頁 56-60；「回鑾訓民詔書」：「朕自登極以來，亟思躬訪日本皇室，修睦聯歡，以伸積慕，今次東渡，宿願克遂……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爾眾庶等，更當仰體此意，與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頁 5-6）。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稱「詔書」由鄭孝胥起草（頁 291）；《鄭孝胥日記》則記載：「阪谷、白井來，言回鑾後賜宴及天長節親賀事，擬令佐藤知恭試草〈回鑾詔〉。」（1935 年 4 月 21 日）無論作者為何，本文嘗試將「回鑾詔書」的內容以及溥儀、鄭孝胥的參與視為日本對「建國」論述的重新確立，排除了初期的「復辟」情懷。

<sup>124</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280。

<sup>125</sup> 同前註，頁 291。

異明顯可見日本的野心有明確的藍圖，必然排除「大東亞共榮圈」以外的其他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完備的政治論述需要新興的行政人選，「詔書」頒布不久，滿洲國也將迎來第一次的內閣改選。然而，鄭孝胥似乎覺察了日本的不懷好意，毅然決然離開了國務總理的職位，日記（1935年5月21日）記曰：

吾憶平生：辭邊防，裁督辦，抵上海，一樂也；以上出德醫院，入日本使館，二樂也；今建滿洲國，任事三年，辭總理，三樂也。從此以後，終不入官，樂亦足矣。<sup>126</sup>

不止於政治的成就，鄭孝胥的樂事一向發乎於主體性情的自由，出處進退盡是「負氣」的顯現。尤其落在「辭」的抉擇上，「鄭龍州」與「滿洲國」各為不同生命階段的指標，鄭氏卻表現了立功立事卻不棧戀的姿態，為自己的傳奇故事留下餘地。前者是滿懷遠大的政治理想而離去；至於滿洲國的際遇則留下了「建國」的風采，在想像幻滅之前退去已不屬於他的重擔。年末有寄予胞弟稚辛（1863—1946）：

父兄持我來京日，屈指騰騰七十年。果見興亡真脫命，偶全名節豈違天。  
餘生已置浮雲外，空手曾趨白刀前。剩與樂城期對榻，看山聽雨儘華顛。

<sup>127</sup>

日記亦留下尾聲：「力主訪日之行，決辭政府之任，此今年大事記也。」<sup>128</sup>「力主」與「決辭」依樣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如今，懷想告別的情緒，真正回首七十年的政治生涯。中間二聯凝想清王朝覆滅以後的種種作為，全力以赴，換得人生樂事。有意思的是，鄭孝胥執意離去，滿洲國的繁榮昌盛似乎與「復辟」的理想越來越遠，且看日記（1935年2月3日）記曰：

滿洲建國三年。上皇帝尊號，此世界變局之張本也。務修內政，使天下歸仰，足矣。說者謂宜有進取之計，蓋非策士所能知矣。<sup>129</sup>

溥儀在回憶錄自嘲日本人批准的資格不過是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義更省事地統治滿洲國而已。<sup>130</sup>鄭孝胥則認為「皇帝」的尊號相當重要：「此世界變局之張本也」，甚是通往「共管」的重要一步。可以想見，鄭氏的烏托邦不曾崩落，亦不隨著日本的政策有所變化，而是專注於思想風氣的養成，迂迴地在滿

<sup>126</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頁2583。

<sup>127</sup> 鄭孝胥：〈乙亥除夕〉，《海藏樓詩（增訂本）》，頁434。

<sup>128</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頁2614。

<sup>129</sup> 同前註，頁2568。

<sup>130</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278。

洲國生長。言談間，「說者」與「策士」的對舉有了「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萬章上》）的「負氣」，發揮在念茲在茲的「王道」裡，指向「復辟」的前景。

## 二、迴向「王道」

「王道」貴為滿洲國的思想主導，即是考察一切政策、制度，至於文化建設不可忽視的理論思維。「王道」源自儒家經典：「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尚書·洪範》）進一步的闡釋則是《孟子》，在當時「以力假仁」的「霸道」面前，標舉「以德行仁」的政治理想。有意思的是，這個概念在千年以後為知識分子召喚，成為了各自描述心中一座政治烏托邦的關鍵詞。無論是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或者日本漢學家聯繫「皇道」的思路——具體表現在橘樸（1881—1945）與關東軍的交會，取其「易姓革命」的內涵，激起民間人士（于仲漢、袁金鎧）的反抗，推翻軍閥。<sup>131</sup>而滿洲國的結果意味著「皇道」終於含攝「王道」，在「順天安民，五族協和」的「樂土」裡，化為理想的政治形態，暗示日本才是真正繼承了孔孟言說的「道」。<sup>132</sup>

質言之，儒學在東亞形成的傳統幾乎「無時間性」，不同時期對經典的闡釋反映了他們作為歷史存在的意義。此時，不止於純然的義理辯證，近現代的知識分子對「王道」有所執著，多少具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在五四截然斷開與傳統的聯繫之後，他們的用心也有「創造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的意味。

<sup>133</sup>尤其滿洲國提供完滿的烏托邦想像，縱然以「王道」為框架，凝聚國家認同，卻是調和了各自的政治情感，輻射出不同的詮釋意義。山室氏如是說道：

但是，仁愛和王道到底有著什麼樣的內容，又獲得什麼樣的實現？這個部分就算在建國文書當中，也是極為抽象且隱諱的……才能讓每個人都產生一種編織各自夢想與理想的共鳴。儘管大量論述都直指所謂的王道概念與

<sup>131</sup> 駒込武以「滿洲國建國之前置工作」描述橘樸等人以「王道」為號召的軍事行動：「尤其是當關東軍因標榜皇道，以致稍不留意就易於顯露出他們將滿洲視為『第二個朝鮮』的態度時，更需要巧妙地加以掩飾。」（頁270）見氏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263-273。

<sup>132</sup> 陳瑋芬細數近世日本漢學家對「王道」的看法，總結他們企圖將日本思想作為東亞之主導的論述與實踐。見氏著：〈「天道」、「天命」、「王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繼承和轉化——兼論中日帝王的神聖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9月），頁252-258。

<sup>133</sup>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滿洲國建國有著緊密聯繫，但我們可將其視為一種言語象徵，經常因為論者不同，而產生同床異夢的情況。<sup>134</sup>

橘樸的「實踐王道之自治」固然是重要的論述，符合滿洲國營造的理想。<sup>135</sup>同樣地，鄭孝胥的「王道」也不能輕易等同於滿洲國的「王道」，論述形成過程之中迴旋進退的神思才是統其關鍵所在。

誠然，鄭孝胥的「王道」論述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討論的內容大致與滿洲國的思想建設有緊密的聯繫。論者嘗評述滿洲國詮釋儒家傳統的效益在配合民族主義潮流，將儒家視為普遍適用之「道」轉變為民族文化界限，並取代天下概念。而鄭孝胥、袁金鑑（1870—1947）等境內有志之士的企圖「立意與五四進步的中國知識分子並無二致」，無奈理性思辨能力不足，安於個人親屬模式，無法滿足滿洲國之於現代社會的期待。<sup>136</sup>另一方面，學界亦有聚焦鄭氏個別思想的討論，發現了其與滿洲國建國論述的矛盾：

鄭孝胥希望藉由王道精神，強化和形塑整個國家、人民的道德；擴而大之，相互連結世界上具有共同志趣的國度，一起合作。但是，法西斯和日本的武力擴張之舉，均與鄭氏強調的道德精神產生矛盾。為了自圓其說，鄭認定更應普遍推廣王道學說；在他的心目中，維護王道口號，日本毋寧只是提供武力基礎，以防制西方列強勢力，但中國則貢獻了思想內容。<sup>137</sup>

識者以「概念工具」與「思想資源」的方法論為進路，劃分了鄭孝胥與滿洲國闡釋「王道」的差異。如同「共管」的等候，鄭氏相當明白內心的「王道」理念必須經過滿洲國的包裝，「概念工具」得以順利地傳播出去。<sup>138</sup>這是建國初期不可避免的宣傳方式，於是她致力於孔學會與書院的推廣，即使在離去要職以後，仍透過教育以深化自己的「王道」理論。

前文提及，《史略》內容與製作動機表明了鄭孝胥與日本的政治路線不能

<sup>134</sup>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 129。

<sup>135</sup> 滿洲國的研究無法迴避橘樸的思想，學界多有討論。野村浩一總結橘樸的一生評論其「王道」論述的奇怪形式，只是「勉強打開的政治突破口」，直言：「這是橘樸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機，一個決定性的轉換，是他的研究對象——『中國問題』反過來以一種恐懼的姿勢向他重壓過來時作出的選擇。當然，這一轉機，把橘樸的思想和生涯引向了難以名狀的矛盾之中了。」見氏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210。或者可以說，橘樸僅存的政治期望是依賴著滿洲國釋出的願景而有進一步的追求，理論即使不切合實際也有實踐的必要。

<sup>136</sup> 劉恆興：〈大道之行也——「滿洲國」大同時期王道思想及文化論述（1932-1934）〉，《漢學研究》第 30 卷 3 期（2012 年 9 月），頁 323。

<sup>137</sup>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 346。

<sup>138</sup> 方法論的指引請見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2003 年），181-194。

一概而論，即使對「王道」的新氣象心嚮往之，到底是同床異夢，各自盤算。再論一則《史略》的建國敘事：

則凡在滿洲居住人民，合作一團，異體同心，渾然融和，舉共存共榮之實，期望新國家之健全發展，基於莊子天地篇「不同同之謂大」之意義，所以將滿洲國之年號定為大同，亦存有此點。故滿洲國倣唐代在滿洲所建之渤海國王朝，保持完全之一大獨立國，採取文化的和平的政策，西與唐朝修交，東與日本國使節往來，持續親善關係，亘二百十餘年之久，形成燦然之文化。<sup>139</sup>

年號定為「大同」，識者必然直接聯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的儒家政治理想，體現完滿的烏托邦形構。<sup>140</sup>雖然不見得符合關東軍的戰略考量，模糊的題目也促成了知識分子論述的大鳴大放。有意思的是，駒込武（1962—）先生肯定鄭氏發揚治者教義的朱子學，在儒教的框架裡，闡釋「大同」作為「秩序的原理」的原則。<sup>141</sup>甚且，鄭氏於《史略》又進一步設「大同」為「不同同之謂大」（《莊子·天地》）的意義，並稱「亦存有此點」，以文化傳統的關鍵詞消弭族群的界線。可以想見，鄭孝胥巧妙把握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為滿洲國鋪設了「傳統」的背景，從「王朝」至「國家」，形成一種延續的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彼得·伯克（Peter Burke, 1937—）評述文化史一系列的「文化建構」現象，特別提醒「發明」的概念不能完全取消「傳統」的價值，亦指出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最初的討論已然申明了「真正的傳統所具有的力量和適應能力」，不該同發明混為一談。<sup>142</sup>於此，無論「大同」還是「王道」，相較於激烈的革命主張，或作為日本「皇道」的掩飾，鄭孝胥的重點實則落在「傳統」，而不止於「發明」。字詞的探索不得不回到「士志於道」的文化脈絡，聯繫其生命歷程。《史略》展示了為建國初期建構的歷史背後隱含了強烈的情感衝動，如今身在日本鋪設的「樂土」，圍繞著已然失去的傳統碎片，鄭孝胥深信滿洲國存在「復辟」的資源；同樣地，唯有「復辟」才能拾回傳統的話語，相互配合，旨在「共管」時日平衡各國利益。誠如林志宏（1970—）先生的識見：

<sup>139</sup>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頁480-481。

<sup>140</sup> 儒家思想如何匯流至烏托邦，從頭說起，學界已有簡要的歸納，請見陳弱水：〈追求完美的夢——儒家政治思想的烏托邦性格〉，收入黃俊傑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一：理想與現實》（臺北：聯經出版，1982年），頁211-242。

<sup>141</sup> 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頁291-294。

<sup>142</sup>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蔡玉輝譯：《什麼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98-99。

推行王道思想的動機，除了有維護秩序、強調恢復帝制的正當性外，它同樣也是一面用來抵抗西方文明價值和體制的盾牌。這個武器既是區別東—西方的差異，還要拿來回擊 1912 年後效習「西化式民主體制」的民國。  
當然，重新復興傳統，賦予意涵，也成為追求王道理想的另一種使命。<sup>143</sup>

「王道」幾乎總結了鄭孝胥至今的政治理念，除了清遺民基本的訴求、與民國為敵的憤懣，還有著復興「傳統」的堅持。質言之，過去積累的「思想資源」是區別於當時知識分子國家論述的重要因素，在滿洲國擔任要職的鄭孝胥，其學思到底來自最為悠遠的士人經驗，有別於以留學生成群形塑的五四話語。縱然是政治上的謀略，論者把握了鄭氏推廣「王道」的諸多舉措，探討當時在王朝政權終結以後的「新道統」現象。然而，「王道」如何成為鄭孝胥晚年念念不忘的道理，在「復辟主義」的中心代表什麼位置，化為具體的政治行動？於此，從「復辟」到「王道」的聯繫相當重要，避免後者只是當時的口號，淪為日本與滿洲國的裝扮；相對地，聚焦在鄭孝胥的生命經驗，可以發現「王道」到底是不悔的追逐，遙想的烏托邦世界。

---

<sup>143</sup>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 348。

## 附論 殘夜不須眠—論鄭孝胥晚期的政治詩作\*

### 第一節 引論

1935年5月28日，鄭孝胥（1860—1938）將詩作寄示胞弟稚辛（1862—1946），自評個人出處境況乃「皎然進退自分明，中止休疑業未成。天道從來看後起，祇將白髮待還京。」<sup>1</sup>明月依時變化，圓缺自成道理。詩人有他長遠的眼光及理想，不為外在喧囂劫奪一生執守的政治態度。鄭孝胥一生最具爭議之處在於1932年3月出任「滿洲國」<sup>2</sup>國務院總理，無論本意是否出自延續清朝國脈，此舉一般認定是「親日」行動，有違民族大義。陳灝一（1822—？）如此評述：「鄭孝胥之得名也，不以書，復不以詩。世獨以美書工詩稱之，斯固然矣。而於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數數預謀，實一政客也。」以鄭氏政治作為排除「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創作，徒留一般形式主義的「美書工詩」技術。<sup>3</sup>即使過去與鄭孝胥親近的同光體詩人也有所慨歎，一如陳衍（1856-1937）「鄭海藏詩實有動人處，近作漸就枯窘，或身世使然」<sup>4</sup>之語，同樣無法輕易原諒鄭孝胥晚期的仕途抉擇，進而否決了後來的創作。於是乎，學界既有的討論彷彿延續前輩學者的論斷，讓鄭孝胥的晚期詩作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鄭孝胥貴為同光體詩派魁首，其詩作在晚清民國的詩學語境裡一直具有相當份量。汪辟疆（1887-1966）以「玉麒麟」定名，自是肯定鄭孝胥的才性：「若就詩論詩，自是光宣朝作手。海藏一集，難可泯沒。孔子不以人廢言。」學人以為「詩」依然留有一塊純粹「論詩」的淨土，只是士人的抉擇時常挑起了晚清民族主義思潮的敏感神經。而汪氏處理「近代詩學」的歷史脈絡，當然

\* 本文初稿刊載於《中國文學研究》第42期，當是筆者探索同光體詩人研究之初心，修正若干材料與文字錯誤，附論於此。

<sup>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584。

<sup>2</sup> 從「清遺民」的角度作「理解之同情」，未必需要註明「偽」字。

<sup>3</sup> 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收入氏著；張亞權編撰：《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22。

<sup>4</sup>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收入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019。

無法迴避同光體詩人的學術貢獻，只是在評選「鄭孝胥」時，自身彷彿陷入某種焦慮，始終遠離了詩學話語的討論，未若陳三立（1853—1937）「天魁星及時雨宋江」之盛讚。而《光宣詩壇點將錄》以詩學成就排名鄭、陳二人應無爭議，評述鄭氏的內容卻是「急功名而昧於去就」，並將批評工作交由歷史：「茲仍舊錄，而並為著錄於此。」<sup>5</sup>即是給予鄭孝胥的詩學地位，卻未留下什麼說明文字。

陳衍雖多有微詞，亦直言鄭孝胥對詩界的影響相當可觀：「近來詩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奧衍，學詩者不此則彼矣。」<sup>6</sup>對於技法的評論則言：「沈摯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sup>7</sup>陳衍與鄭孝胥論詩已久，儼然成為同光體的重要傳統。但陳衍的評論其實止於早年詩學：「鄭蘇戲專作高腔，然有頓挫，故佳。而亦少變化，更喜作宗社黨語，極可厭。近來行為益復喪心病狂，余與之絕交久矣。」<sup>8</sup>這段文字收錄在錢鍾書（1910—1998）的《石語》，記載內容是與陳衍在 1932 年陰曆除夕的對話。而鄭孝胥同年 2 月赴奉天，與日本密商滿洲國事宜，想來陳衍對鄭氏的不滿正在其親日作為。

顯然，詩人的志向與學人言談間的歷史形象有所衝突，而鄭孝胥一以貫之都是政治道路的追尋。其實在當時的學術社群裡也不乏鄭孝胥的支持者，不只是詩文的推崇，還有給予政治性格上的肯定。且看一則日記（1926 年 10 月 31 日）材料，鄭孝胥偶然發現報紙上刊載的一首詩作：

於《東方日報》中見趙堯生一詩，題曰，〈憑石遺寄海藏樓〉：「前歲曾吟鄭君裡，櫻花紅白閉禪關。悠悠世事凭翻覆，落落詩流倦往還。誰識心雄萬夫上，無窮事在一樓間。未來天地從君卜，大海潮頭壁立山。」題一絕於詩後云：「欲將孤憤傲群賢，人定何堪說勝天。自是衰遲偷生者，汗顏翻為一詩傳。」<sup>9</sup>

趙熙（1867—1948）曾為他們在辛亥革命（1911 年）以後的境遇有此慨歎：「故人各各風前葉，秋盡東西南北飛。今日長安餘幾個，前朝大夢已全非……」<sup>10</sup>濃厚的敘別話語暗示了清遺民在新紀元的離散。由群體至個人，趙熙分別以詩寄至他人抒發感懷，其中一封請陳衍寄至「海藏樓」。詩作內容顯示趙熙對

<sup>5</sup> 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新校本）》，《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頁 68-69。

<sup>6</sup>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十一》，《陳衍詩論合集》上冊，頁 450。

<sup>7</sup> 同前註，卷一，頁 9。

<sup>8</sup> 陳衍說；錢鍾書記：《石語》，收入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下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183。錢氏案曰：「時一二八滬戰方劇。」

<sup>9</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122。

<sup>10</sup> 趙熙：〈讀石遺室詩話寄慨〉，收入氏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349。

鄭孝胥人格與詩格的感念：即使遭逢世變也能屹立不搖，以為無人知曉鄭氏的雄心與他所自願擔負的歷史責任。當篇從海藏樓論詩的回憶寫起，「詩」與「事」相生、相感，表露了鄭孝胥的才氣以及作者的仰慕之情。<sup>11</sup>然而，鄭孝胥卻是在 1926 年得見此詩，<sup>12</sup>回應之「題後」詩已非「使人意激」<sup>13</sup>，詩人羞慚地回顧過去自己的性格、處事何以敵不過命運的安排，而「孤憤」至「衰遲偷生者」的轉變，道出了鄭孝胥近來的沉鬱。此刻在報刊上讀到趙熙的詩，心情不似當年「向來盛負氣，不自謂我非」<sup>14</sup>的傲氣，顯現一種「垂老從亡者，知為舉世非」<sup>15</sup>的頽喪。<sup>16</sup>有趣的是，鄭孝胥並未耽溺於「衰遲偷生者」的生命姿態，心裡仍有些許微亮的政治願景，由此定調了詩人的晚期風格。不久以後，時年 67 歲的鄭孝胥將赴天津，以「夜起庵」為屋舍之名，隱喻又一次政治理想的構築。

鄭孝胥一生與政治有著緊密的聯繫，屋舍往往伴隨理想築造於此，成為標明自我的歷史記號。從上海的「海藏樓」、天津的「夜起庵」至於長春的「柳下居」，正是展現了詩人不同時期的政治追求與實踐。本文欲探索鄭孝胥的晚期思想，著眼於一場在「滿洲國」抉擇以前舉行的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夜起庵」時期（1926—1932）。這是一段值得重新探勘的斷代，至今尚有諸多歷史問題等待討論。過去學界對清遺民的研究必然注意兩個關鍵時刻：辛亥革命（1911）與滿洲國成立（1932）。但是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場意外在心裡難以抹滅，即是發生在 1924 年的「北京政變」，又稱「溥儀出宮事件」。原定的「清室優待條件」保留清王朝的主權在紫禁城運作，但是 1924 年宣佈的「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則堅決廢除溥儀（1906—1967）皇帝尊號且以國民身分視之，從此清王朝轉向歷史而非當代政治。<sup>17</sup>辛亥革命殘留的傷痕未曾癒合，

<sup>11</sup> 趙熙對鄭孝胥的追尋亦有〈訪太夷〉一詩為證：「所居相距五千步，獨自尋君獨自還。一院春風乾淨土，櫻花紅處似僧關。」見《趙熙集》上冊，頁 282。結尾處對海藏樓周圍的景物描寫彷若指向鄭孝胥其人，與歷史建構的形象截然不同。

<sup>12</sup> 據王仲鏞主編《趙熙集》記載，〈憑石遺寄海藏樓〉為趙熙 1914 年所作（頁 36）；鄭孝胥「題後」詩寫於《鄭孝胥日記》1926 年 10 月 31 日。就日記內容來看，應是初見此詩。

<sup>13</sup> 沈其光《瓶粟齋詩話》：「讀樊山詩，使人意懌；讀海藏詩，使人意激；讀散原詩，使人意潔，讀紺綺詩，使人意謐。」見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第 18 冊，光緒宣統朝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12938。

<sup>14</sup> 鄭孝胥：〈送裡弟入京〉，收入氏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8。

<sup>15</sup> 同前註，〈行嚴揖唐纓衛次公見和重九詩〉，頁 337。

<sup>16</sup> 昔日嚴復（1854—1921）傳來詩人榜排名之事，鄭孝胥欣然留存於日記（1908 年 6 月 23 日）裡：「夏劍丞邀至九華樓，又陵、伯嚴皆至。又陵言：叔伊在京出詩人榜，無第一，以余為第二。評云，『恨無長篇，否則可為第一。』伯嚴第三，伯潛第四，易實甫第十，余人不能詳……。」如今，鄭孝胥看到自己在報上為人稱賞，心情判然有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1146。

<sup>17</sup> 沙培德（Peter Zarrow）：「但從中國政治文化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溥儀之被逐出紫禁城、清朝儀典的停擺、以及皇帝紀年的廢止，在在都標示出帝制的終絕。」見氏著：

「北京政變」無疑是清遺民又一次重大的傷害——至少對鄭孝胥來說別具意義。若以《鄭孝胥日記》標示的一般時間劃分，「夜起庵」時期當以「將赴天津」的決定為起始，日記寫於 1926 年 11 月 30 日。<sup>18</sup>但是鄭孝胥生命歷程的序列暗示其移居的動機及築造「夜起庵」的情懷牽連著那一年的「北京政變」作為歷史見證者的直接經驗。試想鄭孝胥告別「海藏樓」的決定如何艱難？太多無法承認的歷史現實逼迫詩人的離去；辛亥革命的傷痛難以排遣，鄭孝胥在天津重鑄政治理想又是基於什麼原因？再說，「夜起庵」與「海藏樓」遙遙相對，另一個空間的構築及命名行動即象徵詩人欲通往目標必須實現的自我承諾。意料之外的是，鄭孝胥的烏托邦想像竟是透過一系列嚴整的技術鍛煉而築夢踏實。由此展開的討論，「夜起庵」時期之於詩人的生命意義卓然顯現，可以視為理解鄭孝胥晚期風格的重要進路。

## 第二節 積恨：革命／遺民敘事的辯證

王汎森先生（1958—）提醒我們「事件發展的邏輯」時常與「史家的邏輯」相反，需要「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才能對歷史產生比較新的了解。<sup>19</sup>鄭孝胥一生歷經多少波折、成就多少志業，恐怕也是他自己始料未及。尤其是晚年接受了滿洲國總理的職務，批評者不得已將其放置在歷史的對立面，由此詮釋鄭孝胥過去行跡，彷彿一切作為都與最後的政治抉擇相關。誠如錢鍾書所言：「言固不足以定人，行亦未可以盡人也。……自非『知言』若孟子，亦姑且就事論事，斷其行之利害善惡，不必關合言行，追索意嚮，於是外之外，別求真偽，反多誅心、原心等種種葛藤也。」<sup>20</sup>閱讀鄭孝胥的詩文、日記，嘗試擺落成見、遠離評價之難，以求理解字裡行間透露的心跡。由此開啟對話的可能，並非決然「翻案」歷史對鄭孝胥之公論，而是「還原」其人一生為晚年

---

〈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文化與歷史記憶：溥儀之逐出紫禁城〉，中國近代史學會、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辦：「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15 日，頁 2。

<sup>18</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125。

<sup>19</sup> 王汎森：「對某一個定點上的歷史行動者而言，後來歷史的發展的結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擺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資源和不確定性，未來對他而言是一個或然率的問題，他的所有決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個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資訊、偶然性，夾雜著群眾的囂鬧之下作成的，不像我們這些百年之後充滿『後見之明』的人所見到的那樣完全、那樣透明、那樣充滿合理性，並習慣於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邏輯將事件的前因後果順順當當地倒接回去。」見氏著：〈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第 14 卷 4 期（2003 年 12 月），頁 183。

<sup>20</sup>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502-503。

政治抉擇「遮蔽」之處。這份「遮蔽」來自「知人論世」的解釋傳統，或有「民族主義」的歷史傷痕，其間意義相當複雜，不可避免地成為一道難題。

辛亥以後，大清皇帝宣布「贊成」共和國體，得到了「優待清室條件」。時至「北京政變」以前，民國政權仍由前清大臣官吏把持，他們對於清朝依然眷戀不已。殘酷的是，紫禁城已非正統王朝，無能為力的清室成員也將為「遺民」，只能依憑契約關係以維持現狀。<sup>21</sup>而多數清遺民在民國軍得勢後離開朝廷中心，選擇隱居上海、港澳、青島等地，基本上已不問政治。但從他們坐落的地點（租界）、留辦的行為來看，拒不承認民國正統的意向是相當明確。<sup>22</sup>清遺民驚覺於辛亥革命的爆發，守舊的生活模式也有適應新時代的用意。若從歷史意義來說，一般認為辛亥革命的價值來自「共和國觀念從此深入人心」，這個說法已非學界共識，權以「未完成的革命」定名之。<sup>23</sup>事實上，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1948）即指出這場革命其實並未對階級結構以及產權制度發生明顯變化，甚至政治影響也是相當有限。<sup>24</sup>他們的討論聚焦在今日中國的規模如何完善繼承辛亥革命的成果，不約而同地給予「未完成」的評斷——既是批判也是期待。但「清遺民」的存在恰好證明了共和的理想絕非辛亥革命所能完成，租界彷若虛幻空間，儼然將這個「失語」群體排除現實之外。<sup>25</sup>因而「未完成的革命」的提法從清遺民的心態觀察其實相當準確，他們理解的「民國」即是「敵國」，將其包括在外的「共和」則未有實現的可能。據此，「辛

<sup>21</sup> 胡平生對清遺民與「清室優待條件」的關係有詳盡的敘寫，特別著重以「復辟」為政治訴求的心理。清遺民在民國初期的政治活動，胡氏指出：「民國七年十月至十一年六月，是徐世昌任民國總統時期，徐為著名的復辟派分子，即使做了民國總統，對於清朝、清帝仍眷戀不已，在他任內，優待清室條件自然得保無虞，更不會有促使溥儀遷出宮禁的舉措。」（頁 387）見氏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382-388。

<sup>22</sup> 辛亥以後，清遺民在租界的活動成為研究的熱門課題。無論是作為古典文化的最後守望、文學為宗旨的結社活動，或是各自生活的經營模式等，不同的切入角度均帶來豐富的研究成果。相關研究參楊萌芽：《古典詩歌的最後守望——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2010 年），頁 115-132；朱興和：《現代中國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年）；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5-59 等論著。

<sup>23</sup> 章開沅對辛亥革命帶來「共和國觀念」的繼承有所評判，言談間存有「未完成」的期待。見氏著：〈辛亥百年遐思〉，收入周言、方墨編：《未完成的革命——辛亥革命論壇演講錄》（臺北：秀威資訊，2012 年），頁 18-20。

<sup>24</sup> 同前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周言、邱婕譯：〈不確定的遺產〉，頁 5-9。

<sup>25</sup> 羅志田：「民初多半生活在上海的所謂『遺老』，其實就自成一『世界』。他們當然也不滿意時代的發展，但除少數認真捲入清朝『復辟』活動者外，多數人實際已不問政治，而過著一種帶有『大隱在朝市』意味的世外桃源生活。這些人的文酒過從之中當然有大量的牢騷不平之語，但其所嚮往的目標、競爭的成敗，以及關懷的事物，其實與這一『世界』外的人頗不相同。」見氏著：〈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8。

亥革命」與「清遺民」之間的關係及相關個案討論可以幫助學界回歸歷史自身去尋求其它解釋的路徑。

據《鄭孝胥傳》編訂的年譜來看：「八月武昌事起，先生急馳回任，途次上海，長沙已失，道梗不行，遂留於滬，隱居海藏樓，有續雜詩八首志感。」<sup>26</sup>無法即時趕到歷史現場的鄭孝胥，只能將內心的情感化諸文字，幽居「海藏樓」並自我辯證著革命的真相。鄭孝胥前半生積極參與政治，雖然在「立憲運動」裡未若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二人的成就，但是從「預備立憲公會」的組織、號召過程裡，仍可以感受到鄭孝胥主張改革的激進態度。<sup>27</sup>當革命消息從四面八方傳來，鄭孝胥的文字充斥無法在場的忿氣。且看日記（1911年10月27日）描述輪船駛往煙台時的心境：

政府之失，在於紀綱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痛天下，暴虐苛政，則未之聞也，故今日猶是改革行政之時代，未遽為覆滅宗祀之時代。彼倡亂者，反流毒全國以利他族，非仁義之事也。<sup>28</sup>

既是憲政改革的參與者，多少承認了清王朝的缺失，但鄭孝胥以為內部狀態尚未達到革命之時。民國軍的做法無法使中國富強，還有危害國土的危險，外族亦將趁虛而入。於是在清朝體制以外的改革，鄭孝胥甚以「失心瘋」論之：「以利己損人久成習慣之社會，而欲高談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爭，群而不黨之效也，此歲時人所能希望乎！」（1911年11月22日）<sup>29</sup>如此沉痛的言詞直指整個社會，始終無法理解這樣的理念竟是由「提倡革命，附和共和」的人來完成。

鄭孝胥慨歎一場不合時宜的事變倉促到來：「而舉國糜爛，我則為清國遺老以沒世矣。」（1911年10月27日）<sup>30</sup>至於個人的出處進退，鄭孝胥的一生總是盼望著時機。「海藏樓」的構築有其「避地待時之志」<sup>31</sup>，如今再次歸返上海，恍然覺察到歷史對自我意志的違逆，日記接續寫道：

<sup>26</sup>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收入周谷城主編：《民國叢書》第1編88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滿洲圖書株式會社1938年版影印），頁28。

<sup>27</sup>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頁169-181。

<sup>28</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2。

<sup>29</sup> 同前註，頁1358。

<sup>30</sup> 同前註，頁1353。

<sup>31</sup> 同前註，頁638。記曰：「此一年中，棄江寧，就上海，實有避地待時之志。……然世局變態，思之已熟，尚不為造化小兒所給，況今日之斗筲乎。」（1898年1月21日）

時不我與，戢彌天於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猶能肆力於讀書賦詩以橫絕  
雄視於百世，豈能徜徉徙倚於海藏樓乎！樓且易主，而激宕悠揚之嘯歌音  
響乃出於何處矮屋之中，未可知也。

面對民國軍的猖狂亂行，鄭孝胥不願「海藏」於此。文字的留存可能讓百世之人知曉他的心境，卻難以解決當前的困境，且革命掀起擾亂一切秩序的風暴，縱有詩名也是徒然。「海藏樓」作為理想的標記，鄭孝胥的政治期望卻因為革命面臨到延宕、銷毀的可能。火已及之，詩人憂慮的心緒化為陣陣恨語：「魄之將狂，魂來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舉遠鏡，見玉皇頂峰巒千迭，皆積恨耳。」<sup>32</sup>只能透過資訊傳播得知革命消息的鄭孝胥，不敢想像清王朝的帝國洪業已然飄零。

事已至此，鄭孝胥自稱遁世離群，返回「海藏樓」展開隱逸、論詩的生活。閱讀詩文透露的「遺民」聲明，鄭孝胥隱然對於新的身分感到不適。當時局勢未定，他對孟森（1868—1938）說道：「世界者，有情之質；人類者，有義之物。吾於君國，不能公然為無情無義之舉也。……吾為人臣，惟有以遺老終耳。」（1911年11月14日）<sup>33</sup>「世界」與「人類」以「情」、「義」相互感通，放置在士人的現實處境即是強調「君國」與「吾」同樣有著難以割捨的道德情感。這段敘述指向了中國悠遠的歷史傳統，鄭孝胥知曉此刻士人應該擔負的倫理責任。<sup>34</sup>但「遺民」畢竟是新時代尚未掃除的餘燼，鄭孝胥始終不與為伍，持續對抗著它。世變當年即有詩曰：「已坐虛名人欲殺，真成遺老世應忘。」<sup>35</sup>直言「遺民」的身分將帶給他更多的困難，不會是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辛亥以後，不同時期的詩文常能見到鄭孝胥對「遺民」辭彙操作、接受的過程。一如「空將節義比斯人，竟作遺民有餘愧。」（1915）、「老夫雖遺民，未死火在炭。」（1916）、「流芳與遺臭，理欲方交戰。」（1917）「日者橋邊休縱語，命中終恐是遺民。」（1922）、「老夫未合稱遺老，待撥江山反少康。」（1929）等，詩人晚年赴任滿洲國總理，亦有「劫後遺民吾尚在，卻看孤塔過遼陽。」（1932）的懷想。<sup>36</sup>另一方面，鄭孝胥不願接受「遺民」稱號的原因還有對新時代的憤恨。尤其王朝的傾崩由民國軍主導，「新時代」即「民國」

<sup>32</sup> 同前註，頁1353。

<sup>33</sup> 同前註，頁1356。

<sup>34</sup> 鄭孝胥在日記多次談論「明遺民」的相關話題，深知遺民傳統的形成，以及應該具備的道德作為。相關討論參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47-155。

<sup>35</sup> 鄭孝胥：〈危樓〉，《海藏樓詩（增訂本）》，頁222。

<sup>36</sup> 鄭雅尹嘗以「遺民自畫像：多重自我」為題，討論鄭孝胥與遺民身分的互動。見氏著：《幽靈·風景·現代性：同光體個案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頁94-97。

也，鄭孝胥心情是「與其坐以斷腸，無寧與匪決死。」（1911年10月30日）

<sup>37</sup> 甚而在日記裡發憤寫下一則歷史預言：「無明火燒世界，理不能喻，情不能感。必待糜爛之後，方有哀悔厭亂之日。」（1911年11月3日）<sup>38</sup> 鄭孝胥以為民國軍不能了知國勢走向，以「革命」為號召的行動終將無法成就「共和」的理想。<sup>39</sup> 再說，民國軍驟然打亂了鄭孝胥的歷史藍圖，王朝末日在在他原先構想的發展史裡並不存在，於情於理也找不到合適的解釋。因此，「余與民國乃敵國也」的想法呼之欲出，拒絕承認民國的情感基底「積恨」而來，隱喻著鄭孝胥未來的政治想像。

辛亥革命難以說服清遺民接受改朝換代的事實，顯現革命「未完成」的一個面向。朱興和（1976—）先生指出鄭孝胥在海藏樓隱居時期對於袁世凱（1859—1916）政治意圖（1911—1912）和一戰即將結束時的戰局判斷（1918）有一系列的失誤，評曰：「鄭孝胥本來沒有高超的政治才能，卻對自己缺乏清醒的認識，這是他後半生政治失足的重要原因。」<sup>40</sup> 暫且不論其政治才能如何，約略可知鄭孝胥此時仍具有強烈的政治關懷。滿腹牢騷的鄭孝胥在索居期間並未獲得真正的平靜，只因革命的情勢不斷更新，自己卻置身事外：「天下多事，能者自見之秋……而余獨袖手海藏樓上，似有天意不令人競爭之局者。」積恨如此，鄭孝胥在危樓裡揣想政治形勢，試著釐清歷史的面目，日記（1911年11月23日）記曰：

人生種因得果，類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樓，遂適為避世之地，此歲豈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樓中，昧爽即起，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運思操勞，絕非庸庸厚富之比；使余與聞世事，必有過人之處。<sup>41</sup>

「海藏樓」的構築本為「避地待時之地」，劃分鄭孝胥前半生政治理念與實現，既是結束也是開始。無奈時局難料，突如其來的革命限制了鄭孝胥其後可能的政治行動，違背「海藏」本意。即使身在「異托邦」（heterotopias）<sup>42</sup> 也無法切

<sup>37</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4。

<sup>38</sup> 同前註。

<sup>39</sup> 同前註，頁1359。記曰：「有自稱『民國團』投書毒詈者，亂黨之鄙野如此，於共和何望。」（1911年11月25日）；「革黨反對君國，於外國則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於外人之現象也。嗚呼，亡矣！」（1911年11月29日）

<sup>40</sup> 朱興和：《現代中國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研究》，頁277-278。

<sup>4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8。

<sup>42</sup> 吳盛青：「從實際生存狀態來看，遺民在租界中的園林游冶與樓居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做是異托邦的存在，它們與大上海的綺麗繁華以及斬釘截鐵大步向前的現代社會有天然的反抗與角力關係，在政治與文化意味上與民國主流社會壁壘分明。」見氏著：〈亡國人・採珠者・有情的共同體：民初上海遺民詩社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4期（2013年4月），頁51。「異托邦」（heterotopias）源自米歇·傅寇（Michel Foucault）的界定，有別於「烏托邦」（utopia）的虛構特性，指同時與

斷與現實空間的聯繫。時人所稱：「蘇庵居海藏樓，避不見客。」<sup>43</sup>鄭孝胥的思慮不能張揚，受困於過去作為理想標記的「海藏樓」裡，心情格外壓抑。無止盡的自我對話取代了基本的生活機能，其關切的不只是革命的動盪，亦從歷史的幻滅省思自己的處境：

蓋所種者實為用世之因，而所收者轉得投閑之果，可謂奇矣。……余今日所處之地位，於朝廷無所負，於革黨無所忤，豈天留我將以為調停之人耶？窗外陰雲甚黑，吾將訊之鬼神。<sup>44</sup>

面對已然變調的歷史，影響了自身的政治鴻圖。時局與個人生存的劇烈變動，鄭孝胥對革命的緣由提出近乎譫妄的歷史解釋：「使余與聞世事，必有過人之處。」狂言似地聲明民國軍的難以捉摸，關鍵在於自己的缺席。鄭孝胥以為「海藏樓」非久留之地，革命的後果還是等待「調停之人」的善後。且看「我去長沙月餘日，武昌亂作如兒嬉。使我率師下金口，舉手撲滅何能為。」<sup>45</sup>辛亥革命是一次又一次殘忍的回顧，歷史本不應該如此發展。往昔的幽靈被召喚回來，詩人開始幻想、造作，成為征戰的領袖。「以詩存史」的內容受到「情」的干擾而擴大了敘事空間，可以想見，鄭孝胥的獨白未盡於呢喃細語，詩文間流露的情懷已然超越了傳統對於「遜清遺老」的期待，不止於朝向滿清的眷懷繫念而已。<sup>46</sup>無論戰事如何發展，他都渴望參與其中，不以避世為樂，甚或相信自己是亂世的終結者。又言：「出奔歇浦實異國，七年相見嗟子遺。偷生日久空自恨，春秋不作宜無詩。」鄭孝胥的敘別話語透露了自己現時的焦慮，而詩文對「歷史」的拆解儼然揭露了詩人無法面對「現實」的癥狀。在內心「積恨」

---

現實空間並存的另一個真實存在的空間。據此，學界研究有將位在租界的遺民生活圈以「異托邦」的概念聯繫的說法。又見王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民初上海租界中的清遺民〉，《中國近代史》第7期（2006年7月），頁70-79；理論出處參米歇·傅寇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Text/Contexts of Other Spaces），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頁399-409。

<sup>43</sup> 胡思敬：「予既蒞滬，則從陳考功伯嚴訪故人居址。伯嚴一一為予述曰……又曰『蘇庵居海藏樓，避不見客。……』」見氏著：〈吳中訪舊記〉，《退廬文集》，卷2，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宣統甲子刊本），頁216。

<sup>44</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8。

<sup>45</sup> 鄭孝胥：〈答余堯衢〉，《海藏樓詩（增訂本）》，頁288。

<sup>46</sup> 胡平生：「所謂遜清遺老，絕大多數是漢人，僅有極少數的漢軍旗人。民國初年，他們都抱亡國之痛，散居於全國各地……。悲憤的程度不下於喪失『祖業』的滿洲人，對於清朝眷懷繫念，無以復加。」見氏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頁53-54。

不已的「遺民」敘事裡，鄭孝胥有意汲取時間與記憶的資源，醞釀下一階段的政治行動，藉以恢復原有的歷史。<sup>47</sup>

### 第三節 負氣：歷史現場的見證與歸返

朱大可（1898—1979）如此評述鄭孝胥在辛亥以後的悲憤之音：

辛亥以後，激昂愈甚，蓋其眷懷君國，俯仰身世，皆有不能已於言者，固與江湖羈旅韋布憔悴之士異其旨也。<sup>48</sup>

「海藏樓」自始得不到安寧，詩人反覆進行「民國／敵國」、「革命／共和」的自我辯證，如此「遺民」情境顯然存在一種張力。相對於其他遺民的憔悴心理，鄭孝胥尚有用世之心，最終抉擇是在 1924 年 3 月出任內務府總理大臣，追隨清朝殘存的小朝廷，正式介入復辟政治活動。<sup>49</sup>由此推想，「海藏樓」不符合當前的政治期望，無法裝載鄭孝胥的「積恨」與「負氣」，而這些情感卻是他一生政治行動的重要動能，孟森如是記述：「海藏謂出處之故，情隨境變，未可執也，獨負氣不自瘳耳。」<sup>50</sup>鄭孝胥手筆規劃的歷史藍圖總為世變所累，這些記錄成為他不能洗淨的污漬。詩人的性格在日記裡如實地呈現，可以規劃一條政治情感的軌跡作為參照。有趣的是，鄭孝胥一直毫不掩飾地表露宏大的政治期望。且看日記（1905 年 2 月 5 日）的自白：

<sup>47</sup> 從鄭孝胥在辛亥以後的敘事來看，單以「遺民」二字似乎無法凸顯詩文裡流露的情感。王德威有感於「後殖民」論述（post-colonialism）的新興霸權而自鑄「後遺民」（post-loyalism）一詞，其目的亦有從遺民論述的窠臼解放之義。背景的建立著眼於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王氏指出遺民在應該肩負的倫理承擔之外，更為複雜的是面對失落的欲望主體可以具備的生命姿勢以及如何將之內化、錯置、恢復的手段。見氏著：〈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 年），頁 23-70。

「後遺民」一詞的出現可以幫助學界釐清過去「遺民」論述可能的限制、正視清遺民身處在現代情境的「震驚」（shock）程度。據此觀察，鄭孝胥與「遺民」的聯繫似乎不能簡化，值得學界進一步探索。

<sup>48</sup> 朱大可：〈海藏樓詩之研究〉，《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650。

<sup>49</sup> 記曰：「詣弢庵，弢出示錄諭，云：『宣統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欽奉諭旨：特派鄭孝胥為總理內務府大臣，畀以全權，以資整頓。欽此。又欽奉諭旨：鄭孝胥加恩賞戴頭品頂戴。欽此。』……」（1924 年 3 月 3 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1987。

<sup>50</sup> 孟森：〈海藏樓近刻詩序〉，《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7。

從此以後，若中國迄無振興之日，則終老山林，不失為潔身去亂之士；倘竟有豪傑再起，必將求我。雖埋頭十年，至五十六歲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sup>51</sup>

國勢如此，時年 46 歲的鄭孝胥寫下了疑似棄官歸田的想法，其實是對自己功業的肯定。此時鄭孝胥的眼光已然投射到十年以後，確信還有「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的結果。然而，56 歲的鄭孝胥竟處在革命殘留的創傷裡，意料之外的歷史事件不斷考驗著詩人負氣的心理。前文所述，辛亥革命在他眼中儼然是一次不完整的歷史：當「改革」為「革命」取代，詩人無法在貧瘠時代有所作為的時候，便將一切複雜的心緒化約為暴力的「文本」記號。<sup>52</sup>文學敘事特許詩人的創作欲望，這確切反映在海藏樓隱居時期撰寫的日記與詩作，醞釀著個人理想的再次召喚，使得日記裡的「預言」彷若「戲語」。

1924 年 10 月 23 日，又一次十年過去，鄭孝胥在日記張貼大篇幅《中華報》的報導：「馮玉祥等組織中華國民軍、根本改造國家通電……」大致內容是說馮玉祥（1882—1948）有感於「國家建軍，原為御侮，自相殘殺，中外同羞」，其一生最重要的「北京政變」已悄然發生。<sup>53</sup>鄭孝胥對此尚未作出評論，但是連續幾天密切在日記裡關注馮玉祥等人的消息：24 日讀《京報號外》記下「吳（吳佩孚）不意馮之入京，疑通電為捏造者；馮復敬電，求其同意停戰。」；25 日馮玉祥通電說明「祥等武人，不諳政治，痛民生之益蹙，懼國破之無日，爰敢不揣固極，一本良心所見」的《建國大綱》；11 月 2 日《星報》載京師治安維持會「議和」通電、吳佩孚（1874—1939）申明己志，回應「天禍中國，喪亂相尋，張作霖實為禍首」，並承諾「若夫政治問題，佩孚願放成見，聽候海內賢豪、各省代表為公平解決，絕不敢飾非易暴，號為不擾民而實致民於水火之中」……。<sup>54</sup>直到 11 月 5 日「忽楊蘇拉來報：馮軍三百餘人入宮，神武門已閉，宮中消息不通」之時，鄭孝胥的態度才明顯轉為積極。<sup>55</sup>日記寫道：「繞地安門，適遇十數車出門北行，望車中人似為帝後，被馮軍押出禁城。」方知

<sup>51</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975。

<sup>52</sup> 王德威：「隱含在傷痕裡的是一項肉體證據，指向身體曾經遭受的侵害，指向時間的流程，也指向一個矛盾的慾望——一方面想要抹銷，一方面卻又一再重訪暴力的現場。在檢視個體的傷痕的同時，記憶被喚醒，一個隱含的敘事於焉成形。」見氏著：〈傷痕書寫，國家文學〉，《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1 年），頁 244。

<sup>53</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020-2021。

<sup>54</sup> 同前註，頁 2021-2025。

<sup>55</sup> 同前註，頁 2022。記曰：「弢庵來，咨宮中保護之策：余曰：『試求英、日二國，得數十人駐神武門，足矣。』得上海來電，云：『宮廷庵否？棟、爾愷、承幹。』即電復曰：『上安。』……」（1924 年 10 月 28 日）約略可見鄭孝胥之於北京政變的觀望態度。

宣統皇帝為馮玉祥逼出紫禁城。其後，鄭孝胥密謀「以醫生往視上，稱疾移入病院，或可脫險」不成，期望段祺瑞（1865—1936）幫忙：「許上移居東交民巷，暫避意外危險。」鄭孝胥憂心忡忡，即使得到了段祺瑞「皇室事，余全力維持保護，並保全財產……」的回覆，依然表示「視其行事若何，猶難恃以無恐」。<sup>56</sup>

溥儀為「中華國民軍」逼離紫禁城，對清遺民來說無疑是重大的打擊，幾乎勝過辛亥革命帶來的影響，儼然是一次真正的改朝換代，意識到民國的到來。至少鄭孝胥的體會相當深刻，有詩為證：

乘回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  
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

<sup>57</sup>

世變再次推翻原來的歷史想像，鄭孝胥這次在歷史現場見證了「溥儀出宮事件」的始末，更是促成溥儀移往日本使館的重要推手。<sup>58</sup>「青史」既為一般帝王將相史也是鄭孝胥私人的歷史藍圖，清王室離開紫禁城已然為「奇」，還參與了如此驚險的「告別」過程，對鄭孝胥來說確實經歷「天傾地坼」的變動。<sup>59</sup>而日記的詳盡描述，彷若回應著過去在「辛亥革命」的缺席——「手持帝子出虎穴」者正是「人間一禿翁」，鄭孝胥真正證實了自己有恢復歷史的本領。本質上，「北京政變」之於清遺民的歷史意義至關重要，若是讓溥儀在條約之外的情況下離開紫禁城，意味清皇室與民國政府並非過去協定的對等關係。<sup>60</sup>軍閥的逼近吹亂了清王朝僅存的一絲氣息，驗證民國已然到來的事實。而鄭孝胥親身參與了清朝最後一位皇帝的保衛行動，其帶來的震撼自是不言而喻。若「辛亥革命」真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沙培德（Peter Zarrow, 1953—）先生對

<sup>56</sup> 同前註，頁 2025-2026。

<sup>57</sup> 鄭孝胥：〈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輿幸日本使館〉，《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323。

<sup>58</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030-2031；梁敬鋗：「……向使當日鄭氏未到，或其策不為溥儀所納，則溥儀歷史固當重寫，而偽滿『康德皇帝』之一名詞，即可能不存在。」見氏著：〈記偽滿「康德皇帝」〉，《傳記文學》第 14 卷 2 期（1969 年 2 月），頁 54。

<sup>59</sup> 記曰：「余至醫院，慮汽車或不聽命，議以上坐馬車；又慮院前門人甚眾，乃引馬車至後門。一德國人持鉗，從一看護婦，引上下樓，開後門，登馬車。余及一僮駒乘。德醫院至日使館有二道，約里許，一自東交民巷轉北，一自長安街轉南。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館！』御者利北道稍近，驅車過長安街，上驚叫曰：『街有華警，何為出此！』然車已迅馳。余曰：『咫尺即至。馬車中安有皇帝？請上勿恐！』既轉南，至河岸，復奏上曰：『此為使館界矣。』遂日使館，竹本、中平迎上入兵營，弢庵亦至……」（1924 年 11 月 29 日；頁 2022）

<sup>60</sup> 「優待清室條件」即多次強調大清皇帝是以「辭位」的方式將政權轉移至民國。並在第一款直言：「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見《臨時公報》（1911 年 12 月 26 日），收入周光培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四編》第 1 輯（揚州：廣陵書社，2010 年，北京臨時政府中央行政部編）。

「北京政變」的評價頗有總結的意味：「這最終且無以借鑑之中國帝制歷史的一頁，卻是辛亥革命未竟事業的一個必要的收場白。」<sup>61</sup>據此，在「清遺民」的研究視域裡，「北京政變」的歷史意義可以投入更多的關注。

結局已定，溥儀經由鄭孝胥的安排來到日本使館，並於 1925 年 2 月 23 日喬裝潛往天津的日本租界，此時的溥儀意氣風發，決心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據王慶祥的考察：「乙丑年二月初二日（1925 年 2 月 24 日），對溥儀來說這是個大吉大利的日子：俗稱『龍抬頭』。當時溥儀把自己比作『困龍』，他要奮飛，重振『大清王朝』的雄風。」<sup>62</sup>寓居天津七年成為溥儀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時期，對於「小朝廷」的作為有了更多的自我見解。值得注意的是，溥儀的奮起竟也牽涉了鄭孝胥恢復歷史的欲望。且看鄭孝胥與段祺瑞有關「優待條件」的談判未成，溥儀的發言即展現了一次政治獨立宣言：

鄭孝胥曾經拍過胸脯，說以他和段的關係，一定可以把優待條件恢復過來……後來段祺瑞許下的空口願不能兌現，使鄭孝胥大為狼狽。對鄭孝胥的微詞就在我耳邊出現了。……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前一個回合中失敗的羅振玉，和這些反鄭的議論，有什麼關係。但是，我確實對鄭孝胥有了冷淡……<sup>63</sup>

身為策劃溥儀出宮至日本使館的關鍵人物，鄭孝胥自信能掌控全局。無奈談判破裂，謠言遍布，鄭孝胥聲勢不如從前；此時羅振玉（1866—1940）意圖爭取溥儀的信任，甚至改寫了「手持帝子出虎穴」的主詞，損害鄭孝胥的名譽。<sup>64</sup>再說，溥儀「出洋」的決心日益強烈，鄭孝胥始終不以為意。可以想見，鄭孝胥在「小朝廷」漸無容身之處，最終決計出京。溥儀如是回憶：「於是，鄭孝胥終於有一天鬱鬱地向我請假，說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當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也沒挽留，他就一氣跑了……」<sup>65</sup>兩人的關係至此有了微妙的變化。

鄭孝胥「決計出京」的決定隱然抗議自己在「小朝廷」的待遇。期間有人多次勸其入京，而日記存一說法可以看出鄭孝胥的態度：「有避，未能來。」

<sup>61</sup> 沙培德：〈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文化與歷史記憶：溥儀之逐出紫禁城〉，頁 2。

<sup>62</sup> 愛新覺羅·溥儀遺稿；李淑賢提供；王慶祥整理注釋：《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36；溥儀：「有一次，我騎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邊上，望著角樓和城堞的輪廓，想起了我剛離開不久的養心殿和乾清宮，想起我的寶座和明黃色的一切，復仇和復辟的欲望一齊湧到我的心頭，不由得心如火燒。我的眼睛噙著淚水，心裡發了誓願，將來必以一個勝利的君王的姿態，就像我的進關的第一祖先似的，重新回到這裡來。」見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4 年），頁 150。

<sup>63</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151。

<sup>64</sup> 同前註。溥儀：「我從他（羅振玉）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僅他是這場風險救駕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鄭孝胥成了個冒功取巧的小人。」

<sup>65</sup> 同前註，頁 152。

<sup>66</sup>溥儀背離皇族傳統的成長干擾了鄭孝胥恢復歷史的決心，有意避居上海的做法也確實得到他善意的回應。據周明之的描述：「溥儀在日本使館時，東渡日本的計劃不能施行，曾一再傳旨令鄭北上，出面交涉。鄭以不即不離的方式應付，沒有立即應命，益使溥儀覺得他是不可少的人才。」<sup>67</sup>其後，來到天津與「小朝廷」會合時，鄭孝胥將持續地進行恢復歷史的計畫，預示尚未鳴放的王道理想。<sup>68</sup>溥儀以為鄭孝胥來到天津以後「受到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且理想能切合溥儀的心思。<sup>69</sup>只是鄭孝胥的遠景更為宏大，已然無關乎溥儀的想法。且看日記（1925年3月14日）記載：

上語：「將來國號，即稱中華帝國亦無不可。」此語必自徐良所稱，乃康有為之邪說，孝胥但云：「俟他日討論此事。」<sup>70</sup>

溥儀的皇族身分貴為清遺民復興的最後期望，只是在兩人的互動裡，隨著成長以後的留學夢、移宮頤和園、優待條件的修訂，乃至於建立「中華帝國」等意料之外的判斷，鄭孝胥似乎另有打算，無法表示完全的服從。然等待恢復的歷史不能容忍任何妥協，故在日記裡稱之「邪說」。

從詩人的情感軌跡來看，時年66歲的鄭孝胥延續著「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的美夢，性格已然決定了他的命運。即使「行在」期間多次往返上海與天津兩地，但從詩文可以看出，鄭孝胥決意將「天津」作為又一次實現理想的據點。日記（1925年11月26日）有詩言志：

海上有孤月，流光遍人寰。世人不知敬，謂月光以寒。獨有愛月者，中宵起盤桓。願從月入海，萬頃輕波瀾。月光受之日，造化良無端。乘時復為日，舉世萬驚看。哀彼無知子，沉迷在其肝。孰能回日月，愚智還相安。

<sup>71</sup>

詩人既是「愛月者」亦是「孤月」，顯示孤芳自賞的心理。而內在的寂寞卻在「愛月者」的奮不顧身之中流露出來。月亮彷彿一種想像的自我，遠離塵間、不為世人所知，卻是極具影響力又無所不在。於是乎，在後半段將日月合併為一，並表明月亮實為主導，隱約感覺到潛藏在「孤月」裡的力量，即是詩人亟

<sup>66</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036。

<sup>67</sup> 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頁148。

<sup>68</sup> 「王道」是其後滿洲建國的精神和指導方針，鄭孝胥設想的烏托邦。相關討論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年），頁330-356。

<sup>69</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190。

<sup>70</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045。

<sup>71</sup> 同前註，頁2073-2074。

欲傳播的理想。鄭孝胥埋怨世人不能理解其中道理，甚或不給予支持，殊不知日月乃一切根本，便勝人間無數愚智。據此，「孤月」將鄭孝胥「一生負氣」的風格完滿呈現，似乎預告了自己即將展開最後的政治追求。然「孤月」只存在於黑夜，詩人墜入、沉迷其中，遂成為鄭孝胥實現理想的完美起點：「夜起庵」。

#### 第四節 夜起：鄭孝胥晚期思想之主導

本文引論曾引述一則日記（1926年10月31日）材料，鄭孝胥偶然在《東方日報》讀趙熙的詩作：「……誰識心雄萬夫上，無窮事在一樓間。未來天地從君卜，大海潮頭壁立山。」據此，前面章節的討論旨在還原鄭孝胥在歷史情境（辛亥革命、北京政變）裡的心情表述，因而詩作內容描述的人物其實並不陌生，只是向來為滿洲國的背景遮蔽。鄭孝胥「自是衰遲偷生者」的回應雖然不見往日負氣，卻可以從「夜起庵」時期的紀事發現一項計算精密的行為蘊蓄於內，以政治的本體論為樞要，顯現豐富的晚期思想意蘊。

1926年12月15日，午刻始抵天津。這是鄭孝胥「賞假一個月」的歸返，至此以「夜起庵」為長居。<sup>72</sup>求索詩人決意居住於此的心情，尚有〈將赴天津〉為證：

羈旅心知異守官，暫歸猶覺別家難。看花隔歲休驚老，投袂臨歧敢避寒？  
婚嫁粗完身可去，兵戈間阻事無端。小窗短榻裁容膝，誰作高樓百尺看！

73

寄身他鄉未若一般執行官務，必須耗費極大心力。只緣鄭孝胥知曉暫居於此亦是通往「王道」理想的必經過程。由「暫歸」至「別家」，以舊地變化慨歎時間的流逝；而「兵戈間阻」決斷了人生行路，乃若非有此身。在「將赴天津」的決定裡回盼過往，隱約有總結個人境遇的想法。無情的年歲提醒著歷史的不可逆行，投袂而起的詩人盼望著「高樓百尺」，此時甘願沈潛於「小窗短榻」。據此，在鄭孝胥的晚期思想找到了凝聚的動力，即是詩人與時間的抵抗、追逐。

溥儀在回憶錄裡特別說道「鄭孝胥的理想」，約略可知詩人何以不肯放任時間的流逝：

<sup>72</sup> 同前註，頁2122。記曰：「請假一月赴滬，奉面諭：『賞假一個月。』」（1926年11月6日）

<sup>73</sup> 鄭孝胥：〈將赴天津〉，《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338。

有一次，（鄭孝胥）在給我講《通鑑》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長安，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說時是禿頂發光，唾星四濺，終於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sup>74</sup>

鄭孝胥面對正史的有感而發，期許想像的帝國最終可以得到正名。由此看來，這位總務重臣心裡的「高樓百尺」是極為高峻、廣闊。辛亥革命殘留「未完成」的傷痕以及北京政變「親歷其境」的震撼，始終期盼「照耀一世」的夢想成真。而這些心情在溥儀面前竟是完全的坦白。若不以 1932 年成立的「滿洲國」為後見之明，鄭孝胥的言論即是一種「烏托邦」的先驅者想像，此時的溥儀只想重登皇座，無論是大清帝國或是「中華帝國」。領導如是，鄭孝胥至此確立了「小朝廷」共同的施政方針。<sup>75</sup>

鄭孝胥在政治上得到了實踐理想的良好位置，背後隱然有強大的意念作為支撐，值得注意的是，「夜起庵」的命名行動完善顯現鄭孝胥晚期思想的重要面向。且從「夜起」的名號說起，這是鄭孝胥在天津刻意維持的作息。《鄭孝胥傳》附〈軼事〉記道：

先生生平，自奉簡樸，其暮年生活，尤有規則，蓋自追隨行在移居津沽時，即開始夜起習慣，《夜起庵賦》，即作於此時，是為民國十四年秋間，先生年六十六歲。其序曰「予戌而寢，丑而興，歲一星矣。乙丑孟秋，賃宅依於行在，率其素而不懈，遂名之夜起庵」云云。以上略述其夜起之由來，所謂戌時（午後九時）就寢，丑時（午前三時）起床，蓋紀實也。嗣後來滿「建國」以後，北地苦寒，且冬季天明甚遲，午前三時，猶在半夜中，而先生仍習之如常，老而彌堅，此亦習久成自然歟？<sup>76</sup>

鄭孝胥嚴以律己，甚或以「夜起」為住處名，顯示通向目標的決心。如此嚴謹的作息延續到天寒地凍的滿洲國，依然不改其志。換言之，鄭孝胥「夜起」的行為貫串了詩人最後的政治追求，讓這場「命名」可以理解為詩人晚期思想的妙門關鍵。材料透露的訊息尚可推知鄭孝胥至天津時期才開始「夜起」行為，其實是一次「重啟」的決定。若往前追溯鄭孝胥「夜起」的緣由，便會發現一道私密的歷史痕跡。汪辟疆有此記載：

<sup>74</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190。

<sup>75</sup> 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著；黎鳴、李書崇譯：「佔主導地位的烏托邦常常是作為某一個人的願望和幻想首先提出的，只是後來才被合併為更廣泛的群體的政治目標……即使在一個似乎孤立的個體賦予其群體的烏托邦形式，說到底，也可以正確地把這歸於那個群體，因為他的成就符合群體的集體衝動。」見氏著：《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211。

<sup>76</sup>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 149-150。

吾嘗見孝胥為其姪孫彥綸書箋一詩云：『山如旗鼓開，江自南塘下。海日生未生，有人起長夜。』此為其早年居福州南臺山之作，凌厲無前，寄意深遠。細細味之，頗有劉越石聞雞起舞之意，而其人之不甘寂寞，低首扶桑，真可以窺其隱微矣。此詩未收入《海藏樓集》，蓋不輕示人也。<sup>77</sup>

這是鄭孝胥一次私人的記錄，不足為外人道也。詩人覺醒於長夜，天尚未明，既是「愛月者」奮起之時，亦存有以「孤月」自喻的想像，等候、發明、操控旭日的到來。因而汪氏評說：「此詩太夷甚自負，以為有英雄氣也。鄭在滬時，嘗自署名為夜起，本此。」<sup>78</sup>學人的記錄以及《海藏樓詩》裡多篇詩作證實了詩人早年即有「夜起」的行為，而晚年重拾「夜起」之名號，奮而不懈，隱約可以感受鄭孝胥求其放心的意念，盡在「負氣」之外。<sup>79</sup>其後，鄭孝胥「夜起」的名號在天津時期成為一則公開的宣言，銘記於屋廡，表現為一種刻意雕琢自我的技術。質言之，「夜起庵」之於鄭孝胥實有「莫忘初衷」之想望，無奈最終離開天津的動機牽涉滿洲國的性質，幾乎隱沒了詩人這段時間的沈潛。<sup>80</sup>

「夜起庵」築造以前，鄭孝胥時常往返於「海藏樓」。期間詩人與「夜」的相處凝結成詩，盡是無限寂寞之音：

海上無山可似歸，登樓詩卷暫相依。投閒轉覺憂危集，行意誰令去住違。  
俱老人書真是業，孤吟松竹自成圍。今宵招得春申月，欲為知音論見幾。

81

鄭孝胥的個人理想發端於對時局的危機意識，因而孤獨與焦慮相雜，非詩卷所能平息，且邀海上明月相論將要發生之事。就詩作內容來說，詩人彷彿安排一

<sup>77</sup> 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頁 224。

<sup>78</sup> 汪辟疆：〈讀常見書齋小記〉，《汪辟疆詩學論集》下冊，頁 446。

<sup>79</sup> 張煜以為鄭孝胥的「夜起」可以追溯至光緒十六年（1890）在北京與福建出現的「夜坐」詩，如〈官學雨中與陳笙陔夜坐〉、〈八月二十八日夜坐時將出都〉、〈聽水樓偕伯夜潛夜坐〉等詩。張氏如是說道：「隨著清王朝的日薄西山，夜起後來竟然成了鄭孝胥的生活習慣，而他自己也樂意將之作為憂心國事的某種象徵。」見氏著：《同光體詩人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229-230。本文期望進一步指出「夜起庵」時期的「夜起」是一次重啟行動，詩人用心不止於憂心國事而已。

<sup>80</sup> 陳衍對鄭孝胥之「夜起」即有此揶揄：「清季國事日非，蘇戡中宵即起，托詞鍛煉筋骨，備萬一起用上陣，實就其妾宿也。為妻所破，詬諱之聲，聞於戶外。蘇戡大言欺世，家之不齊，安能救國乎！」這段往事可追溯至 1902 年，陳衍的記憶似乎有意刪除鄭孝胥晚期重拾「夜起」的意義。見陳衍說；錢鍾書記：《石語》，頁 2185-2186；近人研究甚或以「神秘主義」解之：「鄭孝胥『夜起』牌大葫蘆中貯存的就是『鶴知夜半』的丹藥——只不過這粒靈丹妙藥是海藏樓主清夜用來自療心病，因而秘不示人，遑論公開出售也。」見張榮明：〈「鶴知夜半」：鄭孝胥的隱秘情結〉，《從老莊哲學至晚清方術：中國神秘主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88。

<sup>81</sup> 鄭孝胥：〈海藏樓夜集〉，《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334。

場極為慎重的告別儀式。鄭孝胥將要離開上海，即將割捨的「詩作」與「住處」代表著過去行跡。詩人迫切地尋覓心中的「歸宿」——生命政治的最後實現。「海藏樓」已然無法完滿於鄭孝胥的美夢，直至今日「夜起庵」定名以後，詩人與「夜」相處之餘，雖有流露時光推移之歎，卻轉向了積極的生命活動，與過去的「夜起」不可同日而語：

落月好顏色，東方殊未明。徘徊若相顧，欲逝轉含情。殘夜成元賞，祁寒見獨行。此生如此已，誰與惜平生？<sup>82</sup>

在天津殘夜裡，詩人與無畏嚴寒的「落月」相遇，並從「相顧」至「含情」的過程裡感受到時間的匆匆流逝。詩人恰以「落月」興發，並在末聯留下對一生際遇的反省，自命孤獨又不辭風雪。只是現身於殘夜之時便無人可以感同身受。據此，不妨對讀「夜起庵」時期另一首詩作：

殘宵孤坐將何待，暗裏流光亦可驚。夜色蒼蒼收欲盡，卻看墜月入天明。

<sup>83</sup>

可以發現，在「殘夜」裡看「落月」儼然成為詩人「夜起」的意趣。詩作呈現詩人有所待的「夜起」，以及對月亮的隱喻與換喻。既然無處尋覓知音，便將自己看作自己的知音，靜候「孤月」潛翳天明。有趣的是，「夜起庵」時期的鄭孝胥又何嘗不是一次通往天明的漫長等待？對時局「暗裏流光」的警覺、將夜色「收欲盡」的無盡執著，讓這份等待有了理由，從此找不到平靜，隱含著對於未來的展望。

鄭孝胥的詩集在刊行流佈的過程中有多次重刻。據校點者的考證：「鄭孝胥曾刻《海藏樓詩孝胥乙丑至丙子所作》，作為《海藏樓詩》之卷十一至卷十三，紅色印本。」<sup>84</sup>詩人有意將天津「小朝廷」至出任「滿洲國」總理時期視為人生裡的一次重要回顧，由此歸納鄭孝胥的晚期思想是相當明確。圍繞在「夜起庵」的詩作，往往透露了鄭孝胥晚期的沈潛與焦慮，顯現一種難以解決的矛盾。且看一首詩題即為「夜起庵」的作品：

一別高樓寄此庵，五年況味更誰諳？枕堪待旦天難曉，薪已將然臥豈酣。  
滄海徑歸真上策，舊京入夢奈空談。丹青自寫靈臺狀，莫信人誇蔗境甘。

<sup>85</sup>

<sup>82</sup> 同前註，〈十一月十七日四鼓覩月〉，頁338。

<sup>83</sup> 同前註，〈十五夜看月落〉，頁344。

<sup>84</sup> 同前註，前言。

<sup>85</sup> 同前註，〈夜起庵〉，頁381。

旅居天津已達五年，詩人心情仍是心神不寧，「夜起」是自律，但可能也有不成眠的緣由。時局動盪未定，故難眠；人生至此尚不能從心所欲，亦難眠也。真正令詩人不安的其實還有與「海藏樓」的告別：過去「高樓」埋藏一段不該如此發展的歷史、隱而未見的傷痕，而一切難解之心緒只能寄託在「夜起庵」。

<sup>86</sup> 《海藏樓詩》詩注有記：「相者謂余當有晚遇。」<sup>87</sup> 詩人在寫作的當下難以想像自己未來際遇如何，詩注即是事過境遷以後的一次回顧，驚覺於「昨日之詩」作與「今日之我」的對照。〈夜起庵〉敘寫的即是詩人的沈潛與焦慮，即使取得政治上的優勢也無法保證理念的完成。正是表面上的志得意滿，讓詩人在夜起時分挖掘出背後的虛無與荒涼：「丹青自寫靈臺狀，莫信人誇蔗境甘。」可以推想，即使鄭孝胥對「夜起庵」的命名行動展現了實現政治理想的決心，「夜起」亦顯現一種刻意與「自我」作對的想法，過程的辛酸難以言說，詩人彷若安排了一場通向烏托邦的荊棘之路。<sup>88</sup>

從文學文本透露「夜起」的自覺行為來看，鄭孝胥確實是不負其名。陳曾壽（1878—1949）即有詩贊曰：

……嚴整性所耽，雞鳴日孳孳。屬作夜起圖，此意誰能知？精金淬百鍊，  
事會無窮期。夜衣不遑寢，逆旅真吾師。<sup>89</sup>

詩作內容具體展示了鄭孝胥「夜起」時的刻苦耐勞。其以「嚴整」的態度肅清一般耽樂之性，「夜起」行為切斷了常人的生活機制，重新規劃屬於「個人」的自處空間，慎其獨也。丁卯年末，曹經沅（1891—1946）昧爽見訪。鄭孝胥詩曰：

中夜起待旦，初非欲人知。好我且信我，可感孰若斯？昧爽聞叩門，是子  
決不疑……<sup>90</sup>

<sup>86</sup> 日記（1930年1月29日）徒留「作《夜起庵》詩」之句，後附詩作全文，似為〈己巳日記〉作一總結。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268。

<sup>87</sup> 「晚遇」一事可能為出版時增加。據此，時間將推至印行詩集（卷十一至卷十三）的1936年，當年鄭孝胥已辭滿洲國務總理大臣職務。這段文字可以支持「夜起庵」時期之於鄭孝胥生命歷程的重要性。

<sup>88</sup> 一如嚴志雄曾關注到錢謙益（1582—1664）晚期的自我期許。雖然未有「病榻消寒」之時，鄭孝胥的「夜起」同樣顯現詩人晚期難得的積極面向。見氏著：〈自我技藝與性情、學問、世運——從傅柯到錢謙益〉，收入王瓊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文學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頁413-450。

<sup>89</sup> 陳曾壽：〈為蘇戡作夜起圖即祝其七十初度〉，收入氏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78。

<sup>90</sup> 鄭孝胥：〈曹纓衡昧爽見訪〉，《海藏樓詩（增訂本）》，頁350。

陳曾壽的稱許並非個案，與鄭孝胥親近的友人多擇「夜」拜訪，加強說明了「夜起」的宣言已得到諸多肯定。雖然並非鄭孝胥的原意，其間蘊藏私人的追求，但還是相當歡喜友人的拜訪。箇中滋味難以言說，詩人大致講述了「夜起」的外在妙用：

夜起既有年，斯道良可久。頗同獻曝心，願以遺吾友。晦明轉移間，造物露樞紐。人身小天地，吐納等難朽。清明常當令，昏惰詎能糅。神完形不敝，聊用却老醜。死生雖繫命，操縱或在手。終時幸無疾，何必千歲壽。

91

在殘夜裡創建自己的「小天地」，並透過個人修養以保有清明之心境。鄭孝胥儼然傳授了一套晚年自我琢磨的技術：「夜起」促成詩人在混沌世界裡劃出一道私密空間，透過操縱、訓練令氣息能隨時調整，並以清明的狀態維持神形完全、無懼老朽。這些技巧在日記裡的紀事則是加以系統化，成為一套定名為「練魄制魂說」的工夫論：

人生始化曰魂。既生魂，陽曰魂。不能練魄則多欲，不能制魂則多思。多欲多思則流蕩忘返，良知本性皆淹沒於多欲多思之中，永無見道之日矣。……吾自辛亥至今二十二年，半夜即起，坐以待旦，乃得練魄制魂之說。《孟子》所謂養心寡欲，《周易》所言無思無為，皆不外此。<sup>92</sup>

這套技術發言為日記文字（1933年6月26日），亦是鄭孝胥「夜起」之集大成也。「魂」與「魄」皆需要透過鍛煉、克制的手段，還原「良知本性」、求其本心矣。辛亥以後，詩人「昧爽即起，寢不安席」的不平之氣竟是「夜起」的契機。可以推想，革命傷痕在鄭孝胥心裡到底潛藏了多久，如何在之後的人生道路上開啟漫長的修煉。

告別「海藏樓」，定居「夜起庵」。鄭孝胥在天津的生活一直是以「羈旅」的態度警醒自己，而「夜起」已是鄭孝胥面對有限生命的一種「練魄制魂」的技術。直到1932年寓大連文化臺九十五番，亦有詩曰：

殘夜不須眠，獨起誰同調？老我莫徬徨，片月猶年少。愚公欲移山，恃有子孫在。老夫當及身，移樓著人海。<sup>93</sup>

又見一次「夜起」時刻，詩人依舊呢喃著天下無人與他同在。從天津至東北以來作息未有太多改變，此次「夜起」作詩卻再次複習了自己的孤獨。鄭孝胥屆

<sup>91</sup> 同前註，頁351。

<sup>92</sup>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頁2468。

<sup>93</sup> 鄭孝胥：〈十二月廿六日天未明〉，《海藏樓詩（增訂本）》，頁401。

時年近 73 歲，將出任滿洲國總理視為通向理想實現的舞臺，當「愛月者」成為「孤月」本身，詩人已然東山再起，重新喚起過去對政治的憧憬。但是，詩人在現實層面強烈感受到歲月並不待人。得到權位以後，鄭孝胥在滿洲國期間轉為積極入世，任「王道」理想遍傳各地，詩注卻有「於收京後必更造海藏樓」之想，或是緬想起過去恬淡論詩的日子。回憶起辛亥時期的憾事：「人生種因得果，類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樓，遂適為避世之地，此歲豈吾所及料哉……」據此，鄭孝胥在完成「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的政治美夢以後，內心的盼望便是在理想國瓦解之前，重建「海藏樓」，最終確立個人的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從「夜起庵」的發想到理想的完成，鄭孝胥為此寫作兩篇〈夜起庵賦〉試遣其衷。前篇寫於乙丑孟秋（1925 年），序文直述命名緣由「賃宅依於 行在，率其素而不懈，遂名之曰『夜起庵』。」賦作內容張揚了詩人的「負氣」，心情卻是徬徨不定，無法安居於此：

納舉世於斯夜，繫獨宿乎一室……夜之象也則靜，其德則曠，治萬物為本體，示造化之恆狀，時惟大人，觀乎物始，玩一氣之消長，羌中夕而屢起，清明兮在躬，屋漏兮相爾，制乎未發之原，操乎無形之裏，非茲庵之可託，幾何而不為南溟之徒。<sup>94</sup>

天地萬物皆在暗處調養生息，而詩人執迷於一切平靜以後的黑夜。此時，鄭孝胥的期待尚未有政治的具體落實，只能化為「夜」的頌歌，許下構築「夜起庵」的初衷。由此對照乙亥年（1935 年）的續作：「夜起二十餘年，有類於先憂者，然獨樂之不倦，豈必果志於天下者乎，乃為後賦以自釋。」鄭孝胥當年辭退滿洲國國務總理，以此總結了過去積累的政治期望、稱頌「夜起」的效果：

……惜此良夜，寒彩未沒，夜寒漸長，深入沈沈，驅夢履覺，萬端奚侵，謂我心憂，謂我何求，卻老還少，吾將焉瘦，空桐自竄，天下方亂，長夜漫漫，將何時旦。<sup>95</sup>

如今面對黑夜，詩人與之交融，在滿洲國彷彿體現了「夜」的幽深以及「治萬物為本體，示造化之恆狀」的本領。即使恢復了過去殘缺的歷史，至今無法告別的仍是動盪未定的時局。這個歷史的大哉問難以作答，鄭孝胥亦於心無愧。最終，無論「滿洲國」結局如何，歷史自有評判。從鄭孝胥的眼光投射出來，國家的存在已然完滿了詩人想像的烏托邦世界。

<sup>94</sup> 鄭孝胥：〈前夜起庵賦并序〉，《鄭孝胥傳》，頁 93。

<sup>95</sup> 同前註，〈後夜起庵賦并序〉。

## 第五節 結論

「夜起庵」時期之於鄭孝胥晚期思想的意義尚未獲得學界充分的討論。這段生命經驗正好落在「辛亥革命」以後、「滿洲國」成立之前的模糊地帶，容易使人遺忘，或是輕忽其學術價值。而鄭孝胥一生充滿爭議：「辛亥革命」前後尚能以「賢臣」、「遺老」身分稱之；進入東北以後則淪為「漢奸」，從此無法得到公允的評價，如何理解鄭孝胥成為文學史上的難題。在理解政治、道德和文學可能帶來的研究限制以後，「鄭孝胥」的爭論同樣需要一個新的觀察視角。本文即是為此作出一些嘗試，期望能開啟新的討論空間。

辛亥革命帶來的影響自不待言，對於懷抱「復辟」期望的清遺民來說，「北京政變」可能是他們生命裡更為重要的歷史經驗。至少鄭孝胥的「見證」值得注意，這是延續革命「傷痕」以後的又一次衝擊。「夜起庵」的築造便來自於此，其複雜的心緒顯現在同時期的詩文裡，成為重新理解鄭孝胥必須掌握的材料。其次，「夜起庵」的命名行動逐步鍛鍊為一種技術，宣告詩人為最後一次政治追求所立定的決心。學人關注「夜起」，常為鄭孝胥一生負氣、熱衷功名的性格引導，進而連結至出任偽職的決定，如此則難以明白「夜起」的內在理路，以及最終完成「練魄制魂說」的學說意義。然而，不同時期的「夜起」亦須分明：若早年的「夜起」單純指向「其人之不甘寂寞」，鄭孝胥在天津時期重新拾回「夜起」、構築「夜起庵」，其間意義又如何理解？「滿洲國」是鄭孝胥烏托邦想像的最終實現，對於「夜起庵」期間的沈潛與焦慮時有回顧，在詩人的記憶裡卓然顯現不同於其他時期的歷史價值。

從「海藏樓」至「夜起庵」，龔鵬程（1956—）先生有此評說：

海藏樓與夜起庵，遙遙相對；抱器懷質，遜藏上海，是為海藏；皤然一叟，匍匐東北，又非夜起而何？<sup>96</sup>

相較於滿洲國時期的「柳下居」，鄭孝胥心裡是相當明白上海與天津分別成就了不同的自己，在生命經驗裡別具意義。據此，雖然鄭孝胥在「滿洲國」收穫了最後一次政治成果，其「王道」思想也成為當時的精神和指導方針。但論及鄭孝胥的晚期思想，「夜起庵」時期的沈潛應當成為主導。<sup>97</sup>從現實情況來說，

<sup>96</sup> 龔鵬程：〈論晚清詩——雲起樓詩話摘抄〉，《近代思想史散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頁156。

<sup>97</sup> 記曰：「攜五丁、菊十、小猛、小蘭同至王道書院，檢書數冊，又鈔〈夜起庵賦〉。」（1937年8月24日）；同年，記曰：「使商務支店來試灌留聲片，為夜起庵誦文、誦詩、誦詞，共五片。」（1937年9月5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頁2683、2685。以上材料可知在滿洲國時期，從「夜起庵」

「夜起庵」時期正是「小朝廷」前途未卜之時，只能在民國與外國之間等候歷史的審判。然而，越是困頓之時，越能引發詩人之「興」。且看「天道從來看後起，祗將白髮待還京」，鄭孝胥從「傷痕」與「見證」之間尋得平衡，決心重拾初衷、接受自我的考驗。詩人精確地將一切準備就緒，最終完成理想，快意落筆「述意」之詩。當一切事過境遷以後，鄭孝胥已然不負個人奉行之道，縱有歷史罵名，於我何有哉？

---

發揮而來的思想確實為晚期之主導，又可能與「王道」學說有所關聯。暫且筆記於此，期待來日的追索，豐富鄭孝胥從「政治詩作」（political poetry）至「政治詩學」（political poetics）的內涵。



## 參考文獻

### 一、報刊

《申報》（微縮資料）（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上海圖書館攝製），1906年。

### 二、文獻

《臨時公報》，收入周光培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四編》第1輯（揚州：廣陵書社，2010年，北京臨時政府中央行政部編）。

〈滿洲國建國宣言〉，收入吉林省圖書館整理：《偽滿洲國研究資料：滿洲國現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932—1933年版）。

斗山山人著；齊思整理：〈記女伶金月梅母女事〉，收入章伯鋒主編：《近代史資料》總75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160-191。

王揖唐著；張寅彭、李劍冰校點：《今傳是樓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235-534。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1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

狄保賢：《平等閣詩話》，收入張寅彭選輯；吳忱、楊君點校：《清詩話三編》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7001-7102。

李宣龔著；黃曙輝點校：《李宣龔詩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沈其光著；楊君點校：《瓶粟齋詩話》，《民國詩話叢編》第5冊，頁501-778。

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新校本）》，《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66-132。

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收入氏著；張亞權編撰：《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頁150-256。

房玄齡等著；楊嘉駱主編：《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林庚白著；周永珍編：《麗白樓遺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

林紹：《畏廬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75冊，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頁561-604。

林紹：《畏廬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75冊，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頁605-640。

林紹：《畏廬詩存》，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7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頁685-723。

孟森：《廣西邊事旁記》，收入氏著；孫家紅編：《孟森政法著譯集刊》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44。

胡先驥著；劉夢芙審訂：《胡先驥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

胡思敬：《退廬文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宣統甲子刊本）。

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柳棄疾：《南社紀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26輯。

范曄著；楊嘉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夏敬觀著；張寅彭校點：《學山詩話》，《民國詩話叢編》第3冊，頁31-71。

張之洞著；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陳三立著；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陳衍：《石遺室師友詩錄》，收入國學萃編社編：《國學萃編》第4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1907-2138。

陳衍：《石遺室詩話》，收入氏著；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470。

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陳衍詩論合集》上冊，頁471-706。

陳衍：《石遺室詩集》，收入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311。

陳衍說；錢鍾書記：《石語》，《陳石遺集》下冊，頁2175-2188。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點校：《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陳曾壽：《讀廣雅堂詩隨筆》，收入王培軍、莊際虹輯校：《校輯近代詩話九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49-171。

陳獨秀：《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1922年）。

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經沅遺稿；王仲鏞編校：《借槐廬詩集》（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

陸機著；劉運好校注整理：《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楊天石、王學莊編著：《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愛新覺羅·溥儀遺稿；李淑賢提供；王慶祥整理注釋：《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4年）。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1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979年中華書局影印阮元刻本）。

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趙翼著；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

鄭孝胥原著；野村瑞峯譯解：《孔教新編釈義》（東京：深川母子園出版部，1934年）。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1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年），頁459-481。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潘飛聲：《在山泉詩話》，《清詩話三編》第10冊，頁6841-6999。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收入周谷城主編：《民國叢書》第1編第88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滿洲圖書株式會社1938年版影印）。

- 劉禹錫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劉義慶等編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99年）。
- 劉鶚著；徐少知新注：《老殘遊記新注》（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
-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錢仲聯著；張寅彭校點：《夢苕盦詩話》，《民國詩話叢編》第6冊，頁143-410。
- 錢仲聯著；周秦、劉夢芙編校：《夢苕盦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 羅振玉：《集蓼編（外八種）》，收入氏著；羅繼祖主編：《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7-90。
- 顧雲：《益山詩錄》，《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59冊，清光緒十五年刻本，頁742-766。
- 蘇軾著；張志烈等校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英】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著；陳時傳譯：《紫禁城的黃昏》（臺北：博雅書屋，2009年）。
- 【日】芥川龍之介著；秦剛譯：《中國遊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日】德富正敬：《滿洲建國讀本》，《偽滿洲國史料》第20冊，滿洲國通信社發行，頁1-218。

### 三、專書

- 王仁祥：《先秦兩漢的隱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年）。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2003年）。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
-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1年）。
- 朱興和：《現代中國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
- 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2008年）。
- 李歐梵：《未完成的現代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2004年）。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年）。
- 林香伶：《南社文學綜論》（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
- 周一良：《周一良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2012年）。
- 周策縱：《周策縱自選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
- 俞大綱：《寥音閣詩話》，收入俞大綱紀念基金會主編：《俞大綱全集——詩文詩話卷》（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143-269。
-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
- 高友工、梅祖麟：《唐詩三論：詩歌的結構主義批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桑兵：《走進共和：日記所見政權更替時期親歷者的心路歷程：1911—1912》（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 袁進：《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
-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
-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張之淦：《遂園瑣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
-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77年）。
- 張煜：《同光體詩人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張榮明：《從老莊哲學至晚清方術——中國神祕主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年）。
- 黃錦樹：《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
- 楊萌芽：《古典詩歌的最後守望——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研究》（武漢：

武漢出版社，2010 年）。

劉夢芙：《二錢詩學之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7 年）。

劉鳳雲、劉文鵬主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錢仲聯：《夢苕盦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羅志田：《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龔鵬程：《近代思想史散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 年）。

Prasenjit Duara（杜贊奇），*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主權與本真性：滿洲國與東亞現代）（Lanham & 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2004）。

【美】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美】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2010 年）。

【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劉尊棋譯：《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 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

【法】弗朗索瓦·于連（François Jullien）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

【英】利奇（Edmund Leach）著；郭凡、鄒和譯：《文化與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英】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蔡玉輝譯：《什麼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

【瑞】卡爾·榮格（Carl G. Jung）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臺北：立緒文化，1999 年）。

【匈】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著；黎鳴、李書崇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日】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

【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恆、駱玉明等譯：《中國詩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日】岡本隆司著；李雨青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新北市：八旗文化，2016年）。

【日】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

【日】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

#### 四、一般論文

孫家紅：〈師之大者：史學家孟森的生平和著述〉，收入何齡修編：《孟心史學記：孟森的生平和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106-127。

陳弱水：〈追求完美的夢——儒家政治思想的烏托邦性格〉，收入黃俊傑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一：理想與現實》（臺北：聯經出版，1982年），頁211-242。

龔鵬程：〈晚清詩話〉，收入王翼奇等著；劉夢芙編校：《當代詩詞叢話》（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頁517-600。

【法】米歇·傅寇（Michel Foucault）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Text/Contexts of Other Spaces），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頁399-409。

#### 五、期刊論文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頁177-194。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探索與爭鳴》第9期（2015年9月），頁64-71。

王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民初上海租界中的清遺民〉，《中國近代史》第7期（2006年7月），頁70-79。

吳盛青：〈亡國人·採珠者·有情的共同體：民初上海遺民詩社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4期（2013年4月），頁46-61。

黃小蓉：〈從賢臣到遺民——鄭孝胥「海藏樓雜詩」論析〉，《雲漢學刊》第21期（2010年6月），頁168-189。

陳仕軒：〈殘夜不須眠——論鄭孝胥晚期的政治詩作〉，《中國文學研究》第 42 期（2016 年 7 月），頁 79-118。

陳永發：〈關於滿洲國之建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4 期（2004 年 6 月），頁 177-184。

陳秀武：〈《滿洲建國溯源史略》的思想史解讀〉，《外國問題研究》總 197 期（2010 年），頁 3-8。

陳瑋芬：〈「天道」、「天命」、「王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繼承和轉化——兼論中日帝王的神聖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3 期（2003 年 9 月），頁 235-262。

陸胤〈「同光體」與晚清士人群體〉，收入袁行霈主編：《國學研究》第 22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03-350。

梁敬鑑：〈記偽滿「康德皇帝」〉，《傳記文學》第 14 卷 2 期（1969 年 2 月），頁 51-57。

蔣宜芳記錄：〈世變與文變——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8 卷 4 期（1998 年 12 月），頁 3-36。

劉恆興：〈大道之行也——「滿洲國」大同時期王道思想及文化論述（1932-1934）〉，《漢學研究》第 30 卷 3 期（2012 年 9 月），頁 297-329。

劉納：〈陳三立：最後的古典詩人〉，《文學遺產》第 6 期（1999 年），頁 84-92。

鄭雅尹：〈論同光體詩人的鬼魅氛圍——以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為探討對象〉，《中極學刊》第 4 輯（2004 年 12 月），頁 99-119。

## 六、會議論文

甘德星：〈「正統之源」：滿洲入關前後王權思想之發展與蒙藏轉輪王觀念之關係考辨〉，收入汪榮祖、林冠群主編：《民族認同與文化融合》（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 年），頁 119-174。

沙培德（Peter Zarrow）：〈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文化與歷史記憶：溥儀之逐出紫禁城〉，中國近代史學會、中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辦：「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15 日，頁 1-24。

桑兵：〈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頁 67-80。

- 高嘉謙：〈家國零落餘此身：梁鴻志通敵前後的憂患與風雅〉，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古典文學新視境」學術研討會，2016年4月，頁247-261。
- 章開沅：〈辛亥百年遐思〉，收入周言，方墨編：《未完成的革命——辛亥革命論壇演講錄》（臺北：秀威資訊，2012年），頁15-27。
- 張淑香：〈抒情自我的原型——屈原與〈離騷〉〉，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2001年），頁47-74。
- 梁敬鑑：〈記偽滿「康德皇帝」〉，《傳記文學》第14卷第2期（1969年2月），頁51-57。
- 黃錦樹：〈採珠者・超自然傳統・現代性〉，法鼓人文社會學院主辦：「兩岸青年學者論壇」——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研討會，2000年12月，頁239-247。
- 楊玉成：〈文本、誤讀、影響的焦慮——論江西詩派的閱讀與書寫策略〉，收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329-428。
-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周言、邱婕譯：〈不確定的遺產〉，《未完成的革命——辛亥革命論壇演講錄》，頁5-9。
- 錢仲聯、嚴明：〈袁枚與陳衍——論詩壇盟主對清詩發展的積極影響〉，收入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主辦：《第一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頁343-365。
- 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頁209-253。
- 嚴志雄：〈自我技藝與性情、學問、世運——從傅柯到錢謙益〉，收入王瓊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文學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頁413-450。

## 七、學位論文

- 鄭雅尹：《幽靈・風景・現代性：同光體個案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